保加利亚简史

上 册

科 谢 夫
〔保加利亚〕赫里斯托夫 著
安格洛夫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保加利亚简史

下 册

科 谢 夫
〔保加利亚〕赫里斯托夫 著
安格洛夫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保加利亚简史

上　册

科　谢　夫
〔保加利亚〕赫里斯托夫　著
安格洛夫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保加利亚简史

下册

科谢夫
〔保加利亚〕赫里斯托夫 著
安格洛夫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内部读物

保加利亚简史

（上、下两册）

科谢夫
〔保加利亚〕 赫里斯托夫 著
安格洛夫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9 14/16・插页16・字数277,000

1974年8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1093・2　定价：共两册2.00元

D. KOSSEV H. HRISTOV D. ANGELOV

A SHORT HISTORY

OF

BULGARIA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SOFIA 1963

本书作者：D·科谢夫院士(第六、七章)、H·赫里斯托夫教授(第五、第七至十章)、D·安格洛夫教授(第一至四章)。H·赫里斯托夫负责编辑全书。

英译者：玛格丽特·阿列克西耶娃、尼古拉·科列达罗夫。

绘　图：伊凡·鲍格丹诺夫、弗拉基斯拉夫·帕斯卡列夫。

出版说明

本书是根据1963年索非亚出版的英译本转译的。原书作者D·科谢夫、H·赫里斯托夫和D·安格洛夫都是保加利亚的历史学家。科谢夫是保加利亚科学院历史和教育学部院士秘书，历史研究所所长，全国历史学会主席，索非亚大学校长。赫里斯托夫是索非亚大学教授，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安格洛夫是索非亚大学哲学历史系主任，国际拜占廷学者协会执行局副主席。

本书从古代色雷斯人的活动和罗马人对巴尔干半岛的侵占开始，叙述了保加利亚的形成和发展，其中包括：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和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兴亡，保加利亚人民为推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而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1878年解放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和君主法西斯专政的革命斗争，以及1946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直到1962年保共“八

大"召开为止。

本书虽称简史，作者收集并利用了大量原始资料，对我们了解保加利亚的历史情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作者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恩格斯曾指出沙皇俄国所谓"解放"保加利亚是**"沙皇式解放"**，是**"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而作者却以较多篇幅吹嘘和歌颂沙俄，强调沙俄在俄土战争中起的所谓"进步作用"，竭力美化侵略成性的沙俄，和一再为老沙皇翻案的苏修新沙皇唱一个调子。作者还在书中宣扬"唯生产力论"、"和平共处"等修正主义谬论，并吹捧苏共"二十大"。全书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保加利亚的论述极少，而且在引用时出现错误。

原书有地图十二幅，插图一百一十八幅，现仅将地图全部照译。书末所附人名索引和地名、民族名索引，也按原文次序照译，凡发现与正文不符之处，已据正文加以订正。中译本分上、下两册出版。

1973 年 8 月

目 录

本书地图：

目　录

本书地图：

第一章　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形成前的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土地上最早的居民　在保加利亚发[9]现的最初的人类遗迹，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即所谓的穆斯特时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十万年至四万年。在此期间，巴尔干半岛气候异常恶劣，里拉、罗多彼、皮临等高山上都复盖着冰川。这些原始人借洞穴悬岩藏身，靠狩猎、捕鱼以及采集树根和野果为生。他们已经学会取火，用以取暖和烧烤食物。他们使用的工具和武器粗糙简陋，都是用未经磨光的石块制成的。由于个人力量单薄，难以同大自然和野兽作斗争，他们群聚而居，以便能比较容易地获取食物和抗御外敌。当时，基本的社会单位是氏族，在氏族中，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都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在保加利亚的不少地方，已经发现了旧石器

时代中期的原始人遗迹。德佛塔基村（位于保加利亚北部的洛佛奇城附近）的一个洞穴里所发现的文物，尤为重要。在保加利亚北部的德里扬诺伏修道院的巴乔基罗窟里，也发现了值得注意的10资料。

到了新石器时代（约在公元前7000—3000年），巴尔干半岛的气候条件大为改善。气候转暖，植物丛生。原始人的生活，也随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开始脱离穴居生活，用树干和树枝盖起了外涂粘土的小屋舍。有的还用木桩在水上筑起住房，他们觉得这样能更有效地防御外敌。水上建筑的遗迹，已在马其顿西部的普雷斯帕湖和瓦尔纳港附近的德文亚湖中发现。

在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了改进。人们开始用石块和兽骨制作较为精致的刀、錐、矛头、刮削器等。弓箭也发明了。经济生活已不仅限于狩猎、捕鱼和采集。土地初次得以耕种。首批动物被驯养，畜牧业也从此开始。

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氏族组织发生了变化。由于妇女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们已在氏族中占了突出地位。母系制开始

了。

约在公元前2000年初，劳动工具进一步得到 11 改善。巴尔干半岛的居民开始使用红铜①，从而进入所谓铜石并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1900年）。近年来发现的资料，使我们对这一时期居民的生活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在这方面，卡腊诺伏村（位于保加利亚南部新扎果腊附近）的住宅遗址上发掘出来的文物，特别有研究价值。这个住宅遗址上发现了连续五层居住层②，它表明这里大约有一千二百年延续不断的居住史。

人们在使用红铜的基础上，又开始使用青铜，主要是用来铸造武器，如矛、斧、剑、箭等，但也用来制作各种工具和器皿。

金属的使用，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已成为主要的生活手段。部落也分成了两大类，有的耕种，有的放牧，他们互相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手工业，其

①红铜，即天然铜。——译者

②居住层是指古代人类居住遗迹、遗物和有机物等所形成的堆积层。——译者

中以制陶业的发展水平最高。纺车和陶轮也发明了。

大约到了公元前1000年初，铁器开始和青铜并用。这就更加促进了经济生活的发展，工具也进一步完善起来。

生产中的重大变革，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改变。母系制氏族逐渐为男子起主要作用的父系制氏族所代替。

色雷斯人 迄今已知的保加利亚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是色雷斯人①。但他们究竟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土著，还是从多瑙河以北移居而来的，到现在还无法考查清楚。

最早提到色雷斯人的是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希腊作家们的著作，当时色雷斯人占据着辽阔的巴尔干半岛，北起多瑙河，东临黑海，南至爱琴海。色雷斯人还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和小亚细亚的某些地区。伊里利亚人是他们的西方邻族，希腊人则是他们的南方邻族。

据希罗多德、斯特拉波等作家的叙述，色雷

①色雷斯，Thrace，又译为色腊基。——译者

斯人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可是，他们分成许多部落，有时互相混战。保加利亚境内比较有名的部落，在南部的有奥德里西、阿斯提和贝西，在东北部和西北部的有莫埃西亚、格提和特里巴利。塞迪部落居住在西南部，其土地上最重要的城市也因此定名为塞迪卡，即现在的首都索非亚。

由于色雷斯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学，他们的语言迄今只留下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痕迹。尽管如此，现已查明色雷斯人属于印欧人种。在保加利亚南部的埃泽罗伏村发现的一只刻有希腊文的金指环，对于探索色雷斯人的语言具有重要意义，可是至今尚未加以充分研究。

色雷斯人主要从事农耕和畜牧，但也已掌握了一些手工业。采矿和金属加工已有相当普遍的发展。他们用青铜、铁和黄金制造各种用品，其中主要是工具、装饰物等。在这方面，从梅泽克、13 杜范利、布雷佐伏等村庄的色雷斯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文物，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最近，在丘斯滕迪耳城附近的希希科夫戚村，发现了一辆完整无损的色雷斯战车。色雷斯人是手艺高超的金匠，

在普列文城附近的武尔契特龙村和保加利亚南部的帕纳吉尤里希特城发现的黄金器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其巧夺天工的技艺给人的印象极深。然而，有的考古学家却认为，在帕纳吉尤里希特城发现的珍品，是从小亚细亚传入的希腊工匠的杰作。

色雷斯人大都散居于乡村，但他们也修建了一些设防城镇。几年前，在卡赞勒克城附近的科普林卡村兴修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水坝时，首次在保加利亚发掘出一座这样的古城。这座城根据公元前四世纪末色雷斯王修瑟斯的名字而定名修梭波利斯。全城占地四万六千平方公尺，是按照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方案建成的，并修筑了带有角楼的城墙加以防卫，墙厚达二公尺。

14 根据现已掌握的史料判断，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原始公社制在色雷斯人中虽占统治地位，但已在解体。在色雷斯人的社会里，贫富差别日益悬殊。富裕的部落和军事统治阶级和普通的农民阶级同时形成，奴隶劳动的使用也开始了。这一过程在色雷斯各部落中发展得并不平衡：有些发展得较快，其他的则比较长期地维持着旧的社会

关系。

公元前七世纪，由古希腊市民在爱琴海和黑海沿岸建立的殖民城市开始兴起，成为当地色雷斯部落的近邻。其中最重要的是：埃内兹（在爱琴色雷斯，位于马里查河口）、亚得拉（离梅斯塔河口不远）以及位于黑海沿岸的托米（康斯坦察）、奥德索斯（瓦尔纳）、梅森布里亚（讷塞巴尔）、昂恰路斯（波莫里埃）、阿珀洛尼亚（索佐波耳）和拜占兴（君士坦丁堡）。

这些地处黑海和爱琴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城市的兴起，对色雷斯部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有深刻15的影响。这些城市是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它们同色雷斯人贸易往来频繁。这就扩大了希腊文化对色雷斯诸部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部落）的影响。

色雷斯人的宗教，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不统一。他们是多神论者，崇拜各种自然力，并赋之以人形（神人同形同性说）。兹贝耳苏尔德是色雷斯人主要的神，被认为是雷电之神。其他的神有本迪达、扎耳莫克西斯和萨巴西厄斯。萨巴西厄斯是酒神，即希腊家喻户晓的

狄奥尼苏斯神。

但是，色雷斯人信奉最广的是赫罗斯神（据传是色雷斯骑士）。还愿匾上的赫罗斯神作骑马执矛状。这种有赫罗斯神形象的还愿匾，至今已经在保加利亚发现了数千个，由此可见当时对这个神信奉之广。

如同许多别的部落一样，色雷斯人相信人死后将继续在“另一世界”生活。他们在死者墓里放置食物、武器和其他用品，供其在“另一世界”享用。殷富的色雷斯人都修筑了专用坟墓，死后以16全副甲胄和武器陪葬。在保加利亚发现了数以百计的色雷斯古墓，有些已被发掘并加以研究。斯维兰格勒城附近的梅泽克村的古墓，给人的印象最深刻。它是一座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墓顶是圆形的，通向墓室的墓道顶呈拱形。1944年在卡赞勒克附近发现的古墓，尤为壮观。就其结构来说，这座古墓是反映公元前四世纪色雷斯建筑艺术的一个典型建筑物。墓中精致的彩色壁画，清楚地表明希腊艺术已在当时色雷斯贵族中广泛传播。

色雷斯人喜欢音乐，爱好唱歌和寻欢作乐。他们无限敬仰神话中的歌手奥菲士。据传说，奥

菲士就生活在罗多彼的崇山峻岭之中。

随着原始公社制的逐步解体，出现了阶级社会，产生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五世纪初奥德里西部落所建立的国家。它包括现今色雷斯的东部和南部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其首都是乌斯库达马（即亚德里雅那堡，今名埃迪尔内）。

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出现于巴尔干半岛西南部。在血统关系上，马其顿人和伊里利亚人可能很近。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及其继承人亚历山大大王（公元前336—323年），乘色雷斯各部落四分五裂之机，先后征服了它们，把保加利亚北部和南部的许多色雷斯部落置于马其顿的统治之下。但是，马其顿在色雷斯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半个世纪，色雷斯人经过浴血奋战，重新赢得了独立。可是，他们却没有能够统一起来，仍然和以往一样处于分裂状态。

罗马人的统治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人就首次踏上了巴尔干半岛。当时，他们已在意大利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仍企图继续向外扩张领土。公元前168年，罗马人灭亡了马其顿王

国，接着就去征服为数众多的色雷斯部落。色雷斯人对这些新的征服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为保卫自由而英勇奋战达二百年之久。尽管如此，他们最后还是被迫放下了武器。到公元46年，巴尔干半岛上的色雷斯疆土已全部为罗马人所统治，并被划分为两个行省：巴尔干山脉以南为色雷斯省；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之间则为莫埃西亚省。

巴尔干半岛被罗马人征服后，在色雷斯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引起了根本的变化。一个奴隶制占优势的强大帝国，取代了四分五裂的色雷斯诸部落。被奴役的色雷斯人的境遇每况愈18下。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征服者夺去，建立了大庄园（拉铁芬丁①），由奴隶或隶农（科洛尼②）从事耕作。大批色雷斯人被劫往意大利当奴隶。领导公元一世纪③奴隶大起义的斯巴达克，就是色雷斯人。但是，灾难最为深重的还是色雷斯的农

①拉铁芬丁，Latifundi，罗马的大庄园，一种主要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土地所有制。——译者

②科洛尼，Coloni，罗马的隶农，耕种大庄园的小块土地，交纳一定租额。——译者

③原文如此。史传斯巴达克领导奴隶起义的时间，或为公元前73年，或为公元74年，其说不一。——译者

民，他们不得不忍受着大庄园主和罗马政权的双重压迫，担负着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斯卡普托帕腊村（今为布拉戈耶夫格勒区的格腊马达村）居民致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238—244年）的请愿书，最生动地倾诉了他们的疾苦，反映了罗马统治下色雷斯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境地。

色雷斯人在成年累月身受压迫的情况下，经常举行暴动。这些暴动的主力是奴隶和农民。为了迫使被征服的人民顺从，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罗马统治者在这里广事开拓，大兴土木。他们修筑了许多道路，也兴建了一些驻兵的设防城市。这些城市，有的是新建的，有的则是在原来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的居民点的基础上扩建的。罗马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城市是塞迪卡（原色雷斯居民点）、菲律波波利（原色雷斯居民点，马其顿的腓力曾把它修建为军事要塞，现名普罗夫迪夫）、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朗（在今日保加利亚北部的尼丘普村附近，现已成废墟）以及奥埃斯卡斯（在多瑙河上的吉芬村附近，现已成废墟）。

19

这些城市成了罗马帝国的行政中心和军事枢纽。为了修筑它们，当地居民付出了大量无偿劳动，一切已知的城市建筑技术也全部用上了。这些城市都修筑了城墙、公共浴池、剧场、运动场、市镇议事厅和其他各种公共建筑物。

保加利亚的考古学家对于本国大量的标志着罗马文明的遗迹和废墟，不断地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近年来，在奥埃斯卡斯、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朗、索非亚等地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许多珍贵文物。在索非亚（古代的塞迪卡）所发现的特别有价值的资料，使人们对这个古代的罗马城市有了更为完整的了解。

罗马人在征服色雷斯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明。这一新文明开始日益扩大其影响。色雷斯除了受到来自希腊化国家的影响外，如今又加上了罗马帝国的影响；当前者的影响还主要是在巴尔干山脉以南的色雷斯省比较强大时，后者的影响又已进人了地处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莫埃西亚省。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色雷斯人在双重文化影响之下，开始失掉其原有的种族特征，有的采用了拉丁语而被罗马化，有的则希腊化了。

但这一同化过程主要只限于城镇居民，并没有遍及全部色雷斯人。色雷斯的农民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种族特征、语言和文化。

罗马帝国在取得了巨大的外交胜利和领土扩张之后，于三至四世纪发生了尖锐的危机。当时，作为罗马社会基础的奴隶劳动，已不能在生产上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

奴隶主开始给奴隶以人身自由，并给他们小块耕地，使之成为隶农(科洛尼)。与此同时，自由农民也相继沦为隶农。

三至五世纪遍及整个罗马帝国的隶农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向新的封建关系的过渡。当时，罗马社会内部矛盾和斗争不断加剧，其基础开始动摇；隶农制度已无法起到巩固这一基础的作用。 20

所谓“蛮族”的入侵，使上述矛盾和斗争更为加剧。三至四世纪，以日耳曼人和撒马特人为主的一些部落（居住于罗马帝国北部边疆一带）开始入侵。夸德、马可曼尼、艾厄泽格等部落也相继侵犯多瑙河以南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来自俄罗斯南部的哥特人的入侵，持续时间最久，破坏性也最大。376 年以后，为匈奴人所追逼的大批

哥特人，渡过了多瑙河，到了莫埃西亚省，与罗马政府结盟而在那里定居下来。然而，哥特人却在以后发起了一场反对罗马统治的大暴动，这一暴动随即为巴尔干半岛各处掀起的奴隶和隶农大起义所响应。

395年以后，罗马帝国分为两个部份：西罗马帝国，定都于罗马城；东罗马帝国，定都于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后来被称为拜占廷。五世纪前半期，它曾受到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组成庞大部落联盟的匈奴人的进犯。这个部落联盟解体后，东哥特人又出现在巴尔干的土地上。

震撼巴尔干半岛达三个世纪的“蛮族”连续入侵，引起了深刻的种族变化。当地居民有的被屠杀，有的被逐离故土而沦为奴隶。倖存的那一部分居民，则与新来的日耳曼人、撒马特人和突厥人杂居在一起。于是，大规模的种族混居从此形成。尽管这样，在今日的保加利亚领土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仍然是色雷斯人，其中虽然有一部分罗马化或希腊化了，但其余的却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点。

第二章　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及其巩固和繁荣

斯拉夫人和原始保加利亚人　斯拉夫—保加 21 **利亚王国的建立**　保加利亚王国①的建立，起源于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许多斯拉夫部落。

斯拉夫人同色雷斯人一样，属于印欧人种。考古学的发现已经证实，斯拉夫人在迁移到巴尔干半岛以前，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喀尔巴阡山脉和波罗的海之间）的辽阔土地上。

六世纪时，斯拉夫诸部落中以斯拉维尼亚人和安提人最为有名。他们都居住在东罗马帝国的边境。斯拉维尼亚人居住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地区，即今日的罗马尼亚境内；安提人则居住在他们以东，即顿涅次河和第聂伯河之间

①保加利亚王国，即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史称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译者

的地区。

这些部落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它们也发展了各种手工业，如制陶、木工和铁工之类，但商业还不很发达。它们同拜占廷帝国进行贸易，以粮食、奴隶和木材换回武器、细布等。

22　斯拉夫人主要定居在村落里，他们居住的小屋通常建造在地面以下，是一种半埋在地下的房屋。最近，在波皮纳村（位于多瑙河旁的锡利斯特拉附近）考古发掘时，就发现了这种斯拉夫房屋。斯拉夫人同拜占廷帝国发生战斗时，他们又开始在其居住地四周用泥土垒起了防御工事。

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这和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一致的。他们崇拜各种神、各种圣灵和神话中的人物。他们认为在众神之中有一个主要的神(后来被命名为佩龙)，并对其顶礼謨拜，祭祀供奉。斯拉夫人信奉的其他神，有达日博格(丰收神)、沃洛斯（牧人守护神）等等。

后来，祭祀死者也在斯拉夫人中盛行起来。他们同色雷斯人一样，也把武器、食物和其他物品放在死者的坟墓里，因为他们相信死者在“另一世界”还要使用这些东西。

五至六世纪，当安提人和斯拉维尼亚人成为拜占廷帝国的邻居时，他们已进入了所谓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即原始公社制的最后解体阶段。斯拉夫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有着很多成员的家庭，它包括同父所生的几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

这种家庭叫做“扎德鲁加”①。几个相邻的“扎德鲁加”组成一个村社，几个村社组成一个部落。每个部落由一酋长率领，各酋长又都有自己的武士团。在战争时期，酋长对部落拥有全权；在和平时期，他的权力则受到家长会议的限制，并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外，酋长还应召集部落的全体成员会议，即所谓的“佛切”。凡是能够拿起武器的自由成年男子，都参加这种会议。

五至六世纪时，斯拉夫人中已出现了私有财产，贫富已有显著差别，一个富裕的部落和军事统治阶级日益居于显要地位。以酋长为首的这一

①扎德鲁加，Zadrouga，是一种家长制家庭公社，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

——译者

[23]阶级，力图聚敛财富，并获得战利品、奴隶和武器。当时，斯拉夫人对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所进行的不断袭击，主要就是由这个阶级发动的。

五世纪末，斯拉夫人首次袭击拜占廷帝国；到六世纪前半期，他们的袭击就更加频繁了。拜占廷人为了阻止他们的侵袭，分别沿多瑙河、沿巴尔干山脉、在埃皮鲁斯以及在马其顿修筑了许多要塞。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斯拉夫人仍然不断地、大规模地侵入拜占廷。

起初，斯拉夫人在侵袭时满足于掠夺财物、牲畜和俘虏，然后他们就渡过多瑙河返回本土。但到了六世纪后半期，他们却开始在攻占的地区定居下来。斯拉夫人花费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克服了拜占廷帝国的反抗，占领了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许多斯拉夫部落占据了原来罗马帝国的莫埃西亚省和色雷斯省。此外，也有不少斯拉夫人定居在希腊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以及阿尔巴尼亚，有些甚至还在爱琴海的一些岛屿上定居下来。

当斯拉夫诸部落在巴尔干半岛定居下来的时

候，安提人主要居住在半岛的东部地区，而斯拉维尼亚人占据了中部和南部地区。同安提人和斯拉维尼亚人血统相近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部落，则在半岛的东北部地区定居下来。

斯拉夫诸部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定居，使那里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带来了自由农民所组成的村社，使当时的社会秩序普遍地遭到破坏，奴隶制和隶农制也被废除了。

同时，大批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定居又引起了深刻的种族变化。斯拉夫人在他们侵占的地方，人数居于优势，使当地的色雷斯人开始斯拉夫化，逐渐忘记了自己过去一直使用的拉丁语、希腊语和色雷斯语。经过不太长的时间，色雷斯人完全被同化了，他们已被泛滥于整个半岛的斯 24 拉夫人的汪洋大海所吞没。他们的西邻，即土地已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部落占领的伊里利亚人，也很快地被同化了。尽管如此，有些色雷斯人和伊里利亚人，却由于生活在山区而得以保留其种族特征。符拉克人就是这些色雷斯人的后裔，而阿尔巴尼亚人则是这些伊里利亚人的后裔。

为了使巴尔干半岛的土著（色雷斯人、希腊

人等）屈服并逼迫他们纳税服役，原有的斯拉夫氏族和部落这种组织已显得不够有力了。因此，部落的掌权者不得不扩大其职权范围而成为一个常设政府的代表，以便迫使被征服者顺从。

激烈的阶级矛盾和争夺财物的矛盾，以及斯拉夫族居民内部的冲突，也都要求建立起一个国家组织。在征服巴尔干半岛时，部落军事贵族大发横财，并取得了许多经济特权和社会特权。为了保持这些特权，他们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这也只有通过国家组织的建立才能做到。

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建立国家的进程，还因受外来敌人、特别是拜占廷的威胁而加快了。拜占廷人对他们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不肯轻易罢休，竭力想夺回被斯拉夫诸部落所占据的土地并恢复其统治。这就迫使斯拉夫人不得不组成部落联盟和建立更永久性的政权组织，以便与他们的共同敌人作斗争。七世纪时，一个这样的部落联盟就在莫埃西亚（今日的保加利亚北部）建立了。这个联盟由七个斯拉夫部落组成，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组织。

七世纪后半期，来自拜占廷的威胁大大加剧。

拜占廷人把爱琴色雷斯和马其顿南部的一些斯拉夫部落分别置于其统治之下。莫埃西亚的斯拉夫 25 人受到的威胁也增加了。正在此时，原始保加利亚人在巴尔干半岛上出现了。

原始保加利亚人属于突厥人种。二世纪时，他们同其他一些突厥族部落一起从中亚细亚来到欧洲，定居在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区。他们分成科特拉季、萨腊古里、奥诺古恩杜里等许多部落。所有这些部落似乎都被称为“保加尔人”。

四世纪后半期，原始保加利亚人的一些部落被匈奴人所征服，并加入了后者原已组成的部落联盟。尽管如此，453 年匈奴酋长阿梯拉死后，他们又重新获得了独立。

六世纪后半期，由于大批阿瓦尔人从中亚细亚来到这里，一些原始保加利亚部落被他们赶走，迁居到多瑙河中游和蒂萨河一带，剩下的继续留在他们的故土——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和黑海北岸。在阿瓦尔人入侵的数年之后，这些原始保加利亚人又被西土耳其人的可汗西耳季布所征服，并被迫加入其部落联盟。大约到了六世纪末，他们才终于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组成了一个

强大的部落联盟，即拜占廷编年史家所称的“大保加利亚”，在库班河、亚速海和黑海以北的土地都包括在内。统率这个部落联盟的是库勃腊特（库尔特）可汗。

库勃腊特死后，约在660年，原始保加利亚人的部落联盟遭到哈扎尔人的侵袭而解体。部分原始保加利亚人当时就被击溃，他们的酋长也向哈扎尔人屈服了。另一个名叫科特腊格的酋长，率部北撤到伏尔加河流域一带，后来在那里出现了所谓的“伏尔加保加利亚”。还有一个名叫阿斯巴鲁赫（伊斯彼里赫）的酋长，率部向多瑙河河[26]口进发，在南比萨拉比亚安下营来。以上事件都发生在七世纪的七十年代。

原始保加利亚人既已成为拜占廷帝国的近邻，便开始侵袭其领土并进行劫掠。当时的拜占廷皇帝康斯坦丁四世帕哥纳特斯，为了对付新的敌人，于680年出兵攻打原始保加利亚人，但是他的出征却以完全失败而告终。拜占廷军队溃不成军，仓皇败退，原始保加利亚人则乘胜追击，一直深入到今日的保加利亚东北部，抵达了巴尔干山脉。

得胜的原始保加利亚人，在阿斯巴鲁赫的率领下，与统率“斯拉夫七部落联盟”的当地斯拉夫贵族达成了协议。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斯拉夫一保加利亚国家，并为抵御拜占廷和其他敌人新的侵袭而采取了措施。

不久，阿斯巴鲁赫重新同拜占廷作战，并开始进攻其巴尔干山脉以南的国土。拜占廷皇帝康斯坦丁四世帕哥纳特斯，被迫于681年同原始保加利亚人媾和，答应年年纳贡。这个新国家也从此得到了事实上的承认。

保加利亚东北部的普利斯卡，成了681年建立的斯拉夫一保加利亚王国的京城，它距离今日的科拉罗夫格勒(原名舒门)大约有二十五公里。新国家的疆界，东起黑海，南至巴尔干山脉，西抵伊斯克河，(后来又扩至提莫克河)。关于北部的边界，尚无确切的资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多瑙河以外的地区，也在这个国家的疆界之内。

新兴的保加利亚，在其社会和政治制度上，属于早期封建制度的类型。当时国内主要有两个阶级：自由农民和地主贵族。

自由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是主要的生产者，也为国家提供了兵力和财源。象前几个世纪一样，他们生活在自己组织起来的村社里。

27 大多数农民是小自耕农，或拥有中等规模的庄园。但是，村社里也有些成员逐渐贫困化，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被迫租种别人的土地，或者在贵族的领地上当雇工。这就是最早的封建剥削形式。

七世纪到九世纪时，保加利亚的另一个主要阶级是地主贵族。其主要财产是赖以获得收入的土地。这批贵族是由斯拉夫人的氏族、部落和军事的上层代表人物所组成的。他们在征服巴尔干半岛后，把大片的最肥沃的土地攫为己有。这些贵族中也包括原始保加利亚人的氏族、部落和军事的上层代表人物，他们是跟阿斯巴鲁赫一起来到巴尔干的。

在古代的保加利亚，还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但是，他们在经济生活中只起到次要作用。

保加利亚在七至九世纪的国家制度，是与上述的社会、经济基础相一致的。国家由大公或可汗统率，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都集中

在他的手里。他的权力也受到贵族的限制；当时的宫廷会议，就是从贵族中选拔一些人组成的。

起初，原始保加利亚贵族在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起着较重要的作用。他们的首领阿斯巴鲁赫被公认为最高统治者，并在普利斯卡定居下来。他又是军事首脑，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和征集来的贡品，统统被他攫为己有。原始保加利亚贵族及其可汗所掌握的最高权力，一直维持到下一个世纪。

七至八世纪在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之所以主要使用原始保加利亚人的政治和法律术语，其原因也在于此。“保加利亚”这个名字，就是这样被强加于整个国家，并被一直保留下来。这个国家的人民，也被称为保加利亚人。

斯拉夫人和原始保加利亚人融合为一个民族的过程，早在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建立后的头 28 一个世纪就开始了。在这一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原始保加利亚人逐渐被同化，并最终成为斯拉夫人。

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的强盛和扩张　阿斯巴鲁赫的继承者帖尔维耳可汗(701—718年)，把

色雷斯东部的一部分并入其领土。这是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的第一次领土扩张。同拜占廷帝国签订第一个通商条约(716年),也是在帖尔维耳统治时期。

八世纪后半期，在帖尔维耳几代后的一些可汗统治期间，保加利亚发生了内乱。贵族形成了两个集团，互相争权夺利。在短期内就几度更换可汗。

伺机已久要消灭这个新国家的拜占廷人，乘保加利亚内乱时，对它发动了长期的战争，但却未能得逞。

卡尔达姆可汗统治时期(777—803年)，内乱得以平息，中央的权力也加强了。卡尔达姆战胜了拜占廷，并击退了拜占廷一再发起的多次进攻。

卡尔达姆的继承人克鲁姆可汗，是中古保加利亚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他统治期间(803—814年)的成就最为显著,保加利亚的领土也大大扩张。

克鲁姆在位的头几年里，保加利亚与拜占廷一直是和平相处的。这就使保加利亚能够把注意

力转向西北部的邻国阿瓦尔。这个国家位于现在的匈牙利平原，当时已由于法兰克人的侵略而衰弱。805年，保加利亚最后消灭了阿瓦尔国，把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广阔地区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对富有盐矿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兼并，也给保加利亚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其后，保加利亚又把矛头转向拜占廷帝国。29 809年，克鲁姆可汗攻下重镇塞迪卡(今日的索非亚)。拜占廷皇帝尼瑟佛鲁斯组织了反攻，于811年率领大军进入保加利亚东北部。保加利亚京城普里斯卡失陷，焚为焦土。拜占廷军队把所侵占的地方洗劫一空后便撤兵回国，但在归途中，于巴尔干山脉的一个隘口遭到伏击，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尼瑟佛鲁斯皇帝也在这次战役中死去。

保加利亚人乘胜侵入色雷斯东部，夺取了亚德里雅那堡和其他一些城镇，直逼君士坦丁堡城下。拜占廷帝国的形势十分危急。克鲁姆聚集了大批兵力，急不可待地准备攻占拜占廷的京城。可是，他在814年的突然死亡，却使这场已经计划好的攻城战中止了。

克鲁姆在战争中的多次获胜，有力地巩固了

保加利亚王国，拜占廷想征服保加利亚王国的打算，也被推迟了好多年。

斯拉夫一保加利亚王国的第一部法典，是在克鲁姆统治期间颁布的。这部法典，旨在巩固地主贵族的地位。它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私有财产的严厉措施，以及对盗贼和国事诽谤者的惩罚条例。克鲁姆的法律，反映了八至九世纪保加利亚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也表明了封建制度的日益发展。

在克鲁姆的继承者奥穆尔塔格可汗统治时期(814—831年)，保加利亚与拜占廷签定了和约，保加利亚在色雷斯获得的领土也得到了确认。同时，由于屡次战胜神圣罗马帝国，保加利亚的版图也向西北扩张了不少。德拉瓦河流域的土地都被并入这个国家。

在马拉米尔(831—836年)和普雷西安（836—852年）统治时期，保加利亚又把目光转向西南部，觊觎马其顿。这时，整个马其顿都隶属于30拜占廷帝国，但却稠密地聚居着一些斯拉夫部落。这些部落不满于拜占廷的统治，宁愿与保加利亚境内的同族人合并到一起。

普雷西安统治时期，拜占廷忙于同小亚细亚的阿拉伯人作战，保加利亚人乘机吞并了马其顿的整个中部地区及其南部的部分地区。

这样，由于九世纪前半期在战争中连续获胜，保加利亚的版图大为扩张，国内新增加了大量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增多，也加速了原始保加利亚人的同化。

封建关系的确立　斯拉夫一保加利亚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封建关系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破产，经济上陷入依附地位；另一方面，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却越来越多。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直到九世纪后半期，才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确立。国内出现了两个主要阶级：封建地主贵族和依附于其领地的农民。这些贵族即所谓“博亚”，是原始保加利亚贵族和斯拉夫贵族的后裔。他们这时在种族上已经完全混合起来，只有“大”和“小”的区别。

有些农民被许可离开自己的土地，享有人身自由。然而，当时也已出现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叫做“帕里特西”。部分农民由中央政府直

接统治，其余的则依附于地方贵族。

农民不但要缴纳各种实物税（麦种、谷种或酒类），而且还要为领主服各种徭役，即无偿劳动。

封建关系的发展，大大繁荣了国家的经济生31活，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方面。这时，由于贵族拥有大的庄园，对农民又掌握着大权，他们已能取得大量剩余农产品，并通过商人主要地输出到拜占廷以换回华服、武器和奢侈品。保加利亚还同其他一些邻国如基辅俄罗斯、摩拉维亚等建立了贸易关系。

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多瑙河畔和黑海沿岸的许多城市日趋重要，其中包括德鲁斯图尔（斯托里厄或杜罗斯托朗，即今日的锡利斯特拉）、瓦尔纳（古代的奥德索斯），维契纳和普雷斯拉佛茨。

有些城市是过去罗马人和拜占廷人建立的，而另一些则是后来兴起的，是由斯拉夫—保加利亚人建立的。位于多瑙河口的普雷斯拉佛茨城，日益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

国内确立了封建制度的重要成果是：经济发

展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加强了；作为保加利亚早期历史典型特征的部落闭关自守和各自为政的局面消失了。要使农民屈服于自己的贵族，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些贵族也需要政府在防止外敌侵袭的同时扩张国土，以便于他们获得新的土地和更多隶属于他们的劳力。

为此，贵族都纠合在统治者的周围，并帮助他致力于在国内建立行政上和政治上的统一。

克鲁姆可汗是第一个在保加利亚试行中央集权制的人。奥穆尔塔格则更有成效地继续了这一做法，他用直属中央的政权机构代替了保加利亚西北地区一些斯拉夫部落的酋长，从而摧毁了他们原有的独立权力。马拉米尔和普雷西安也推行了同样的政策。

七至九世纪的保加利亚文化 七至九世纪的保加利亚文化是一种混合的继承物，既包括了斯拉夫人和原始保加利亚人带到巴尔干半岛来的文化传统，又继承了色雷斯时代和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当地遗产。这些上古末期的遗产，丰富了斯拉夫—保加利亚文化，也为它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32

我们对于这个时期的斯拉夫—保加利亚文明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对长期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建筑物遗迹的研究而获得的。对于供统治阶级（可汗及其家族和大臣们）居住和使用的建筑物所作的研究，尤为充分。这些建筑物以其规模宏伟和建筑坚固而具有不朽性，从中也可以看出罗马—拜占廷时期的当地建筑传统。

尽管大多数人居住在村庄里，但也确已有了[33]一些城镇，其中有些是罗马和拜占廷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居民点，后来归入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的疆界之内。这些城镇多半是在黑海沿岸和多瑙河畔，其中有瓦尔纳、德鲁斯图尔、奥埃斯卡斯（在伊斯克河口）等。其他的都是在斯拉夫人和原始保加利亚人出现后才兴建起来的新城镇。

京城普利斯卡是当时最闻名的城市，这是通过在那里进行的多次考古发掘而得到证实的。这座城的面积达二十三平方公里之广，分为外城和内城。外城四周有土墙和城壕；内城则由一道筑有几座塔楼的坚固石墙加以保护。普通平民——农民和手工业者都住在外城。在那里所发现的三

十多处建筑物（住宅、教堂、作坊等）的遗迹说明，直到十二世纪末，这个城市还是一个很繁华的中心。这里的住宅规模不大，都是用加工过的34石块连同泥土或木材建成，外面再抹上粘土。普利斯卡的居民从事于耕种、放牧、狩猎和各种手工业。制陶业在当时也已有了高度发展，这可以从外城发现的专用双层窑得到证明。

可汗和贵族的宫殿都在内城，宫殿的地基至今犹存。这些宫殿可能是在奥穆尔塔格可汗时代修建的，因为811年拜占廷人焚毁了这个保加利亚京城之后，奥穆尔塔格可汗又加以重建。其中，有一座名为大宫或王宫，长五十二公尺，宽二十六点五公尺，用加工过的长方形大石块垒成，墙厚达二点六公尺。所谓小宫，实际上也相当大，是由错综复杂的建筑群所组成的。除这两座宫殿的地基外，在普利斯卡的内城，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建筑物（一个浴室，一座宫廷小教堂和一座长方形大会堂）的遗迹。

从这里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内城还有排水系统和供水设备，用以取暖的罗马式的炕也早已出现。以上都表明，这个具有显著罗马和拜占廷

传统的新兴国家的城市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35 波皮纳村的斯拉夫居民点遗迹，为研究小型居民点的结构，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这个居民点很可能出现在五、六世纪斯拉夫人定居在多瑙河南岸的时候，并一直存在到十一世纪初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灭亡时为止。这个居民点四周筑有土垒，外面又修建了一道防守用的石墙。

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所遗留的许多文物中，以八、九世纪的许多石柱碑文最值得注意。这些碑文是根据历代可汗（帖尔维耳、克鲁姆、奥穆尔塔格、马拉米尔等）的命令铭刻的。碑文的内容各不相同，有些是纪念可汗的近臣的；有些则记载着关于建筑物或国际条约的资料；还有一些是36记述可汗的丰功伟绩的，等等。碑文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当时的原始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

最引人注目的刻有碑文的古迹之一，是马达腊村（离保加利亚东北部的科拉罗夫格勒不远）附近的高大峭壁上的浮雕。它刻在离地面二十三公尺高的地方，表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后面有一

条狗跟着跑，马蹄下则有一头身上戳着长矛的雄狮。浮雕上还看得出有三段用希腊文写的碑文的残迹，是在不同时期铭刻的：第一段刻于帖尔维耳可汗统治时期；第二段刻于其继承者科米西亚斯统治时期；第三段则刻于奥穆尔塔格可汗统治时期。上述碑文分别记叙了三个可汗在位时保加利亚和拜占廷的关系。它也是一种刻在石头上的编年史，用来纪念保加利亚历代统治者的业绩。遗憾的是碑文已遭到严重侵蚀，难以全部辨认。

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时期的一项有研究价值的史料，是所谓的《原始保加利亚历代可汗名册》(以下简称为《名册》)。这是七、八世纪原始保加利亚历代可汗的名册，上面记载着他们的名字、其家族成员和各可汗的在位时间。《名册》从杜洛王族[37]各可汗的名字开始，阿斯巴鲁赫就属于这个王族。有关阿维托霍耳可汗和伊尔尼克可汗的资料，属于轶事性质。《名册》里记载的最后一个可汗是766年的乌马尔。

《名册》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于阿斯巴鲁赫时代，他想用这部编年史来颂扬自己的王朝；第二部分则写于他的几个继承者的统治时期。两

部分都是用这个国家当时的官方文字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原文没有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只是后来的斯拉夫译文。

38 《名册》中所用的年表，是根据所谓的“循环法”。它是以十二年为一轮，每一年都用一种动物来表示，如狗、鼠、牛等。这种亚洲人所特有的纪年法，是由原始保加利亚人带来的。保加利亚人在信奉异教时期，都是用的这种纪年法，而在信奉基督教以后，则改用了拜占廷纪年法。

基督教被奉为国教 865年，当普雷西安的继承者博里斯一世（852—869年）在位时，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异教被废除，以东正教形式出现的基督教，则被奉为国教。拜占廷教会的教士，也从君士坦丁堡被派往保加利亚传教。

当时对基督教的信奉，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首先，这对使封建阶级统治隶农合法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这也是统治者用以竭力建立专制政体并进一步巩固其中央政权的重要措施；最后，这对稳定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来说，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信奉了新的宗教，保加利亚得以参加到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中，并

同它们处于平等地位。过去，这些国家曾因为保加利亚信奉异教而一直对它存有戒心；现在，它们的疑惧消失了。

随着对基督教的信奉，保加利亚教会也创立起来了。博里斯千方百计地想创立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为此，他曾分别同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总主教进行协商达数年之久，企图利用他们之间的纷争达到这个目的。87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教会会议，终于决定保加利亚教会仍归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管辖，并安排了一位大主教来主管保加利亚教会。

信奉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拜占廷在保加利亚影响的加强。仿效拜占廷法制的新法制被推行；拜占廷文学开始在全国传播；拜占廷的宗教绘画和宗教建筑的形式也被采用。拜占廷在这个时期中对保加利亚的深刻影响，既具有积极作用，也对保加利亚大有裨益；因为，拜占廷帝国不但继承了丰富多采的文化，而且还尽可能广泛地向国外加以传播。

信奉基督教的另一重要后果是：原始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之间仍然存在的一些差别已经完

全消失，一个保加利亚民族最后形成了。因为，对共同的宗教的信仰，必然会引起共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的形成。原始保加利亚人终于被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同化了。斯拉夫语成为最主要的语言，而原始保加利亚语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一些词汇。

斯拉夫文字的创造和传播 九世纪后半期保加利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斯拉夫字母的创造和最初的斯拉夫文学的出现。

创造斯拉夫字母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由以下一些原因所决定的：一、保加利亚已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并已在建国后的头三个世纪中稳步地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二、斯拉夫人已在保加利亚各族人民中占了优势；三、基督教已被奉为国教。为了传播新的宗教，需要有祈祷书和礼拜祷告书。此外，人民也要求有更多样化和更加普及的文学作品。

斯拉夫字母是由著名的斯拉夫教育家西里耳和梅索迪亚斯两兄弟创造的。他们于九世纪初出生在当时拜占廷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萨洛尼卡，其祖先是斯拉夫人。

哥哥梅索迪亚斯，在拜占廷任行政要职多年，后来当了修士。弟弟西里耳，在少年时代就好学[40]不倦，多才多艺。他在君士坦丁堡有名的麦格诺拉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了哲学、神学、几何学、算术和其他学科。西里耳离开麦格诺拉学校就当了修士，并在圣索非亚教堂管理图书。他很快就得到了皇帝和大臣的赏识，并开始被委以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教会使命。851年，他被派到巴格达回教国的阿拉伯人那里去传播基督教。后来他又同他哥哥梅索迪亚斯一起访问了哈扎尔王国（今日的南俄罗斯）。

两兄弟为斯拉夫各民族创造一套字母的想法，早已酝酿成熟；因为，有了这套字母，他们就能用本民族的语言来教导斯拉夫人民。855年，他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字母，即所谓的“格拉戈里提克字母”，后来又改成为“西里耳字母”。

接着，西里耳和梅索迪亚斯就在其门徒的协[41]助下，把比较重要的宗教书籍译成斯拉夫文。

862年，拜占廷皇帝应摩拉维亚的请求，把他们两兄弟派去。这个西斯拉夫国家的统治者罗斯提斯拉夫，要他们向新近改信基督教的人民传

授斯拉夫文字。他想通过这种办法把摩拉维亚从日耳曼贵族派来推行其征服计划的日耳曼教士手中拯救出来。

两兄弟热心地从事于教育摩拉维亚人民的工作，却被日耳曼教士指控为异端。他们被迫到罗马去向教皇申辩。在途中路过威尼斯时，他们与当地的教会人士展开了一场辩论。这些教会人士认为：举行宗教仪式时，只能使用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三种语言，斯拉夫民族无权使用自己的文字。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占着优势，西里耳仍然义正词严地对它进行了驳斥。他坚持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

当两兄弟都在罗马时，西里耳于869年去世，留下梅索迪亚斯一个人继续工作。他孜孜不倦地又把一些书籍译成了斯拉夫文，并且培养出一批造诣较深的门徒。但是，梅索迪亚斯却未能顺利地完成他的使命。日耳曼教士不断地对他进行迫害，曾经两次把他投入监狱。885年，梅索迪亚斯去世，其门徒哥腊兹德又接替了他的工作。

梅索迪亚斯去世后，日耳曼的影响在摩拉维亚牢固地建立起来，梅索迪亚斯的门徒都被驱逐

出境。其中，克利门特、纳胡姆和安格拉里厄斯这三个门徒到保加利亚避难。他们受到了保加利亚统治者博里斯的热诚欢迎。当时，博里斯正力图使保加利亚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并想找到开导人民以实现其意图的途径。他发现西里耳和梅索迪亚斯的门徒正是贯彻他这一政策的最合适的人物。于是，他就把克利门特派到了保加利亚西南部。克利门特在那里成为一个非常积极的教师和传教士。他开办了一所学校，并在短期内把三千五百多个学生训练成为教师和神父。893年，克利门特被任命为奥赫里德(今日的马其顿)的主教。梅索迪亚斯的另一门徒纳胡姆，则留在保加利亚的新京城普雷斯拉夫；一个学术中心也从而在那里形成了。克利门特成为主教后，纳胡姆接替他担任了教师和传教士。

由于西里耳和梅索迪亚斯及其门徒克利门特与纳胡姆的辛勤工作，保加利亚成了使用斯拉夫文字的中心和斯拉夫文化的中心。曾长期作为这个国家官方语言的希腊语，逐渐为斯拉夫语所代替。在奥穆尔塔格、马拉米尔等可汗的时代，碑文还全是用希腊文写的；到了十世纪，开始出现

了用斯拉夫文字刻写的碑文。例如，1952年在普雷斯拉夫发现的贵族丘尔古比利亚·莫斯提奇墓上的碑文，就是用的斯拉夫文。从这一碑文可以看出，莫斯提奇是西美昂和彼得统治时期的一个 43 大臣。993 年，保加利亚沙皇萨穆伊尔为纪念他的父母和兄弟而写的碑文，也是用的斯拉夫文字。

由于斯拉夫字母在保加利亚的传播，这才有可能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创作大批文学作品。在这方面，保加利亚人民的条件要比西欧各国优越得多；因为，九、十世纪西欧各国的书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用人民大众难懂的拉丁文写的。

十世纪初保加利亚的领土扩张和文化发展 十世纪最初的二十五年里，当博里斯的儿子西美昂（893—927年）在位时，保加利亚的领土扩张达到了极点，国势处于全盛时期。中央集权加强了，贵族也都被笼络在新即位的统治者周围。同拜占廷进行的战争连綿不断，其目的是要从拜占廷帝国手中夺回斯拉夫人居住的全部领土。保加利亚人在战争中连连打败拜占廷军队，取得了辉煌胜利。特别是917年在黑海之滨的阿黑洛河（波

莫里埃城附近的一条河流）战役中，拜占廷人更遭到了惨败。保加利亚军队深入拜占廷帝国的腹 44 地，甚至到达科林斯地峡和格利博卢（切尔索内塞）半岛。又有一些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地区被并入了保加利亚的版图。由于拜占廷帝国曾多次想与塞尔维亚结盟，这就使塞尔维亚也于924年沦亡于西美昂的统治之下。

对拜占廷作战获得巨大胜利后，西美昂废弃了“克尼阿兹”（相当于原始保加利亚人的可汗）的称号，自封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之沙皇”。他同时又宣布当时保加利亚教会的首领为总主教。

保加利亚在十世纪最初二十五年中的领土扩张，使贵族积聚了巨额财富，并使之更加自命不凡。它也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建筑和艺术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893年，保加利亚迁都到普雷斯拉夫（在保 45 加利亚东北部的普利斯卡以南），这座城也成了保加利亚的文化中心。据传说，西美昂历时二十八年才把它建成。和普利斯卡一样，普雷斯拉夫也包括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其周围筑有带角楼的、

防卫严密的石墙。

外城供平民居住。通过近年来在这里进行的多次考古发掘，人们发现了九、十世纪时各种建筑物的遗迹，它表明外城曾是一个活跃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各种手工业如金工、陶工、石工、铁工等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也已相当发达，一些店铺和摊床的遗迹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除了商业和手工业外，有些居民还从事于农业和畜牧业。

内城主要供封建贵族居住。他们的住宅比平民住的更为宽敞和坚固。这些贵族仿效拜占廷的46传统，都修建了私有的小教堂，并用以作为其家族的墓地。

皇宫的遗址已在内城发掘出来。它的主要部分是一个长方形宝殿，其中用两排圆柱分成三条廊道。

外城南部的宫殿附近，在高地上耸立着所谓的“金色教堂”。它是一座圆形建筑物，其中设有八个壁龕，分别排列在祭坛所在的半圆形凹室的两侧，并有三个出口通向前廊。这座金色教堂以其建筑艺术和装饰的富丽堂皇而驰名。

当时的杰出作家约翰教区长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对西美昂的京城及其宫殿和教堂的富丽堂皇，曾作过以下的生动描写：

“若有他乡异客或贫者初抵外城，甫见城垣，必瞠目而莫知所至。继至城门，更将惊叹不已，疑入梦境。及入外城，乃见两侧屋宇櫛比林立，或饰以诸色玉石，或雕以精细木刻。复前，遂入内城。此间宫殿巍峨宏伟，教堂高耸入云。观其外，缀玉镂木，五色缤纷；入其内，则见遍饰云石、紫铜、黄金、白银，竞相辉映。斯人居乡，但见茅舍陋室，不识人间有如此景象，虽尽其所知，亦无与伦比，唯有叹为观止而已。”

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文学创作也繁荣起来了。普雷斯拉夫涌现了不少作家，其中有约翰教区长、康斯坦丁主教和切尔诺里捷茨·赫腊布尔（赫腊布尔修士）等，他们都得到了沙皇西美昂的支持。流传至今的一些普雷斯拉夫作家的作品，足以表明当时在精神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堪称为保加利亚文化教育上的真正的“黄金时代”。这一进展的取得，可能是由于在西里耳和梅索迪亚斯的第一批门徒那个时期中所形成的

教育和文学传统，它们给整个保加利亚留下了深刻影响。

这些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个是约翰教区长，他是君士坦丁堡的麦格诺拉学校培养出来的。他的
47文学生涯是从翻译《论正教信仰》一书时开始的，这部书的作者是八世纪的拜占廷神学家约翰·达马辛，书中阐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约翰教区长最重要的著作是《六昼书》。这是一部拜占廷和古希腊作家的作品汇编，约翰教区长则作了一些独具卓见的增补。这本书鼓吹圣经中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观点，并对某些古希腊哲学家的唯物论观点提出了异议。各章中有关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科学的丰富资料，
48使这部著作具有中古自然科学百科全书的特色。约翰教区长在《六昼书》中所加的那些增评补注极有价值，为我们了解中古保加利亚的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也表明约翰教区长是一位善于观察的、有才能的作家。

普雷斯拉夫学派的另一个作家是康斯坦丁主教。他最有名的一部作品是《福音导言》，全文共分为五十一讲。此书虽根据拜占廷神学家约翰·

克里索斯托姆对有关福音内容所作的各种解释译[49]出，但是，在好几讲的序和跋中，也可以看出康斯坦丁本人的一些见解。这本书旨在灌输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道德观念，使读者不再墨守某些异教传统，并认识到举行宗教仪式以及顺从其主子的必要性。换言之，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刚刚出现的基督教封建思想。

在《福音导言》中，最前面的一章是用韵文写成的序言，被称为“字母顺序祈祷文”。这是中古保加利亚文学中诗歌创作的最初尝试。

普雷斯拉夫的学者们遵照沙皇西美昂的命令，编纂了三大卷有关神学以及非宗教性内容的读物。

第一卷译自希腊文，包括二十五名拜占廷作家所写的三百八十三篇文章。大多数是有关神学的，但也有些片断涉及到逻辑学、伦理学、语法[50]和文学理论。此卷的内容表明，保加利亚社会上对进一步了解丰富的拜占廷文化有很大的兴趣，这种文化在基督教传入后就已同保加利亚社会发生了密切关系。

在这一卷的序言中，对西美昂是这样称誉的：

"上皇嗜书若命，为遍求天下新著勤劳如蜂，更广收寰中英俊撰文立说，人谓托勒密①再世，洵不诬也。"1073年，此卷被带往俄国，抄呈切尔尼戈夫的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雅罗斯拉伏维奇（1027—1076年），因而在以后被称为《斯维雅托斯拉夫藏书》。

第二卷有以约翰·克里雷索斯托姆为主的一些作者所写的讲道内容和教义。编纂这本书是为了使读者尊敬宗教信条、教士和统治阶级。第三卷的内容也属于这一类。

第一部见诸文字的法典，很可能也是西美昂时期写成的，即人所共知的《审判法》。流传至今的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删节本，一种是全文。

51 十世纪前半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虽然大多数属于宗教性质，但是也反映了保加利亚社会上对非宗教性知识的兴趣。约翰教区长的《天堂》和《六昼书》这两本书，还有1073年的《斯维雅托斯拉夫藏书》，都对此提供了有力证据。这种文学的

①托勒密 Ptolemy，即托勒密二世，古代埃及王（公元前308—246年），相传以其对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奖励而著称于世。——译者

另一特点，是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倾向，以及已在发展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在赫腊布尔修士所写的《谈文字》一书中，表现了最鲜明的爱国主义倾向。作者用生动丰富的语言，捍卫了斯拉夫字母的创始者西里耳的工作成果，并充分证明了斯拉夫各族人民有权用自己的语言来学习和受教育。他驳斥了“三种语言论”的信徒所主张的“只有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才是神圣语言”的谬论，也证明了斯拉夫文字[52]有充分理由存在下去，并有权与上述三种语言同时发展。赫腊布尔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拜占廷人贬低西里耳和梅索迪亚斯的著作，并强调他们创造的文字及其文化的优越性。他坚持斯拉夫人有权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进行学习。他的书显示了保加利亚人民及其有文化的各社会阶层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们迫切要求发展自己文化的强烈愿望。

十世纪后半期，在保加利亚还出现了另一种与正统文学共同繁荣起来的文学，即所谓的经外文学。这种文学主要是从拜占廷流人的一些书籍，

其内容多半是些与新、旧约全书中所写的事密切相关的故事；然而，同宗教文学相对比，这些书籍里还有着新旧约全书中所缺少的一些细节和新内容。这些书都写得饶有情趣，使人浮想联翩，其目的是为了迎合中古时期人们的好奇心，使他们对于正统的宗教文学中涉及极少或写得枯燥无味的很多题材，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其中有一本讲述了宇宙的起源和结构；另外几本对耶稣基督的生平作了较多的叙述；还有一些则提供了有关各种自然现象、动物、世界末日等方面的资料。某些经外书明确地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对现存种种不公正现象的不满，以及他们对统治者和压迫者的仇恨，其中有一本是作者不明的《约翰启示录》。这本书大约在六世纪末写于拜占廷，其佚名作者在书中预言了“最后审判日”来到后，那些国王和总主教在地狱里的悲惨命运。这些经外书通常是由异教徒所编写并加以传播的，他们也就是那些反对正统教会及其宗教信条的传教士。

十世纪的文学，无论是正统的还是经外的，都大大促进了斯拉夫语言的最终确立，保加利亚民族的巩固，以及原始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间

差别的消除；共同的教育和文化，已经把这两个民族联合在一起了。

与此同时，这种文学也对保加利亚周围的斯拉夫各国，首先是对基辅俄罗斯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文学传到基辅俄罗斯主要是在988年以后，当时俄罗斯人已经信奉了正教，需要有人民大众懂得的斯拉夫文写的祈祷用书和世俗书籍。这样的书籍，只能来自保加利亚，因为当时那里是一个重要的斯拉夫文化中心，也是一个教育和宗教启蒙的策源地。

十世纪前半期，保加利亚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商业和各种手工业都有了蓬勃发展。在普雷斯拉夫出土并陈列在当地博物馆里的大量用具，足以证明当时的经济生活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保加利亚的封建贵族，在巩固了他们对农民的统治后，已有可能积累起大量剩余农产品，通过商人向国外销售，以换取其他必需品。当时，保加利亚与拜占廷之间的通商往来最为频繁。保加利亚与多瑙河中游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也扩大了贸易关系。当时，许多内地城镇（其

中多半比较古老）如塞迪卡（早以“斯雷德茨”这一斯拉夫名字而为人所共知)、普罗夫迪夫（古代的菲律波波利)、亚德里雅那堡（色雷斯的乌斯库达马）等，同德鲁斯图尔、瓦尔纳和普雷斯拉夫一样，成了很重要的贸易中心。这些城市的兴起，主要由于它们是行政和经济中心，并在地理上处于内陆交通要道。

第三章　保加利亚的衰落及其在拜占廷侵略下的沦亡

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　鲍古米尔运动　十世[54]纪时，随着封建制度在保加利亚的巩固，农民的处境日益恶化。各种负担，尤其是名目繁多的徭役，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无休止的战争，使大部分农民家破人亡。他们对封建统治者——沙皇、贵族和上层教士的不满与日俱增。

西美昂的继承者彼得统治时期（927—969年），农民的不满情绪引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史称鲍古米尔运动。运动的发起人是鲍古米尔神父，其教徒被称为鲍古米尔派。

鲍古米尔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旨在反对封建压迫的社会教义，它集中地反映了农民的反抗意识。这一教义是以“异端”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它反对以正统教会作为现存制度的支柱。鲍古米尔

派的观点，受到了早期的社会思潮和宗教思潮的影响，其中对它影响最深的是当时已在整个拜占廷帝国广泛传播的保罗教派和马萨利亚教派。

鲍古米尔派是二元论者。他们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本原：善和恶。他们认为，天国以及人55的灵魂是善原，而尘世以及人的肉体则是恶原。这些二元论者否认物质世界，并宣称世上一切有权势的人，都是撒但（魔鬼）的仆人。

鲍古米尔派对教会和上层教士进行了最无情的抨击，痛斥他们离经叛道而又贪婪成性，穷奢极侈。与此同时，鲍古米尔派拒绝履行既定的宗教仪式和圣礼，如洗礼、圣餐、婚礼等等，甚至对十字架、圣像和圣物也概不尊敬。他们在努力使宗教简单化并使它摆脱繁琐仪式这一方面，成了波希米亚的詹·胡斯、英国的约翰·威克利夫等宗教改革家的早期先驱者。

鲍古米尔派还强烈反对一切世俗政府的代表人物。十世纪后半期的一个反对鲍古米尔派的保加利亚作家科兹马，在他的一篇辩论文中，对鲍古米尔派是这样描述的："彼等辱骂富者，教唆信众悖主抗上，憎恶君王，侮慢长者；依其所见，

凡为君王服役者，莫不为上帝所憎，一应农奴，均不得为其领主劳作。”

鲍古米尔派的教义，反映了劳苦大众对那些养尊处优的富人的深恶痛绝。鲍古米尔派抨击财富，反对衣着奢华和大吃大喝。在这方面，他们痛斥的主要对象是上层教士的代表人物。

产生于作为中古特征的战乱连绵这一环境之中的鲍古米尔派，也宣称反对流血和不断的战争。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讲道内容，符合人们当时的普遍心情，表达了人民心头蓄积已久的、对沙皇和贵族所挑起的频繁战争的痛恨。

关于鲍古米尔派在国内各地活动初期的组织情况，史料极少。现在只知道，在十世纪出现了一个总的领导者，其手下有门徒若干，称为“使徒”。其后，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加，鲍古米尔派开 56 始创立宗教会社。每个会社都有自己的领导者，由称为“戴迪特”的长老担任。到十二、十三世纪时，在保加利亚的西南部和色雷斯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会社，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加利亚会社和德腊果维契亚会社。

鲍古米尔派的教徒，分为三个等级，即“至

圣”、“信徒”和“教友”。“至圣”是会社的领导者和教义的传播人。他们必须恪守教规，过严格的禁欲生活，生活简朴，并弃绝一切世俗安乐。可是，对“信徒”和“教友”来说，却并不强求他们严格地禁欲修身。他们对“至圣”关于摒弃世俗利益、逆来顺受、修身养性等说教，也并不十分满意。与此相反，这些主要是贫苦农民和城镇居民的鲍古米尔派教徒，宁愿拿起武器进行战斗，以改善其生活，夺回被封建领主霸占的土地，并废除一切赋税和徭役。正统鲍古米尔派所宣讲的那套纯理论，也被许多教徒按照他们的切身利益和自己的理解加以修改，扬弃了其中的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成分，变得更富有现实意义，也更加切实可行了。

鲍古米尔派的活动集中于他们的宗教会社之中，会社的组织大体上与福音书中的基督教团体相似。会社由“至圣”领导，一般举行四种仪式，即祈祷会、忏悔会、“教友”晋升“信徒”以及“信徒”晋升“至圣”。

鲍古米尔运动在保加利亚获得了有利于其发展的条件，因而不久就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鲍古米尔派从农民和城镇贫民中吸收的教徒人数最多。

鲍古米尔运动的广泛传播，激怒了教会和国家的掌权者。他们早在沙皇彼得统治时期就已对57这些异教徒进行了长期的残酷迫害，或予以监禁，或驱之出境。尽管如此，这一新教已无法加以根除，因为当时的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它的传播。

在中古保加利亚历史上，鲍古米尔运动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鲍古米尔派间接地鼓舞了保加利亚人民去进行反封建压迫的斗争，并唤起他们不要对强暴专横的行为袖手旁观。这一运动也表达了保加利亚人民对自由幸福生活、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渴望。

鲍古米尔运动对中古保加利亚的文学和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鲍古米尔派为了在人民中间传播教义，除了口头布道外，还利用了书籍。他们写出了大量的作品，用生动而形象化的语言，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些书脍炙人口，开阔了人民大众的眼界，从而使他们的教育状况大为改善。

在长达五个世纪左右的一段时期里，鲍古米

尔运动传播极广，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保加利亚的国界。它渗透到邻近的各民族中去，并在那里获得了有利于其发展的条件。十一世纪前半期，鲍古米尔派的传教士到了拜占廷（色雷斯南部和小亚细亚）；其后，那里就有整村整村的居民信奉了这种新教。与此同时，鲍古米尔派也开始传到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特别是在波斯尼亚深深地扎下了根。

到十二、十三世纪，这一新教更从巴尔干半岛传播到了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在二元论的影响下并根据当地情况，有名的卡瑟里和阿尔比塞教派的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发展起来，成为西欧第一次对天主教的群众性反抗，也为后来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准备了条件。

因此，保加利亚是中古波澜壮阔的宗教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保加利亚的鲍古米尔会社，既是传教中心，也是同所有接受了58鲍古米尔教义的国家保持组织联系的中心。这些会社被认为是这一异端教派的“先锋”和起表率作用的典范。关于这一点，一度信奉卡瑟里教派的意大利作家雷内里厄斯·萨克乔尼 在 他 1250 年

所写的一部作品中，就曾经清楚地着重指出过。根据萨克乔尼的叙述，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建立起十六个二元论者（包括鲍古米尔、卡瑟里、阿尔比塞等教派）的会社，它们分布在巴尔干半岛、法国南部和意大利。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两个鲍古米尔派会社，即保加利亚会社和杜冈济亚会社（德腊果维契亚会社），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雷内里厄斯还强调指出："共余会社，悉赖此二者以存"。

拜占廷征服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王国在西美昂统治时期，曾扩张了大片领土，此后即开始衰落。频繁的战争和封建贵族日益加深的压迫，使人民财穷力竭，陷于绝境。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贵族，羽毛既丰，便开始力争获得更大程度的自治，对国王及其宫廷也不再唯命是从。

保加利亚的衰落，引来了邻国的入侵。马扎儿人从西北侵入，他们在彼得统治时期几度进犯保加利亚，夺去了它在多瑙河以北的领土。

拜占廷人是更危险的敌人，他们一心想要灭亡保加利亚。967年，拜占廷皇帝尼瑟佛鲁斯·

佛卡与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结成了联盟。968年，斯维雅托斯拉夫便派遣一支由魏金人和俄罗斯人组成的大军，占领了保加利亚东北部的大片领土。但俄罗斯人的出现也同样对拜占廷构成了威胁。斯维雅托斯拉夫拒不撤兵回国，反而与彼得的继承人博里斯二世(969—971年)结成同盟，决心占取拜占廷在巴尔干山脉以南的领土，以继续扩大其版图。于是，俄罗斯人和拜占廷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59 971年，拜占廷皇帝约翰·戚米瑟斯率领大军进人保加利亚的东北部，攻陷了保加利亚的京城普雷斯拉夫，粉碎了当时已结盟的俄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抵抗。接着，他又把斯维雅托斯拉夫围困于多瑙河上的要塞德鲁斯图，并迫使后者撤离保加利亚回国。约翰·戚米瑟斯在赶走俄罗斯人以后，便把所占领的地区宣布为拜占廷的一个行省，并于同年将保加利亚沙皇博里斯二世掳往君士坦丁堡。

但是，保加利亚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沦于拜占廷统治之下的仅仅是它的东北部，即多瑙河、巴尔干山脉和黑海之间的地区。保加利亚西南部

的半壁河山，仍继续保持着独立。这一地区的政权，落入当地贵族大卫、莫泽斯、萨穆伊尔和亚伦四兄弟之手。在他们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的西保加利亚国，定都于普雷斯帕，以后又迁往奥赫里德。

西保加利亚国一建立，就与拜占廷帝国展开了殊死斗争。这场斗争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

在最初的几年里，保加利亚人还处于优势。976年，四兄弟从拜占廷人手里解放了保加利亚东北部，接着又攻克了马其顿南部和色萨利的部分地区。四兄弟中年龄最小的萨穆伊尔，在共执政期间取得了特别巨大的胜利。他使拜占廷人遭到一系列惨败，并在马其顿南部和亚得里亚海沿岸扩大了王国的版图。986年，他在特腊姜隘口（位于保加利亚南部，距现在的伊赫提曼城不远）取得了空前大捷。拜占廷皇帝巴西耳二世几乎在这场战役中丧命。保加利亚人在西北部也取得了胜利。萨穆伊尔乘塞尔维亚王国分崩离析之机，先后攻占了代厄克利、特雷宾杰、扎奇路莫伊等地区，并使这些地区的塞尔维亚王族俯首称臣。

然而，一开始在保加利亚人打击之下屈服的

60 拜占廷帝国，却逐步地恢复了元气。拜占廷皇帝巴西耳二世（976—1025年）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萨穆伊尔占领的拜占廷领土，进而对保加利亚施加压力，并最后征服它。

十一世纪初，巴西耳二世为了实现他的计划，对保加利亚发动了几次战役。拜占廷军队首先攻占了保加利亚的东北地区，使这一带复归拜占廷统治。然后，他们又进犯保加利亚西南部和马其顿，但却在这些地区遇到要塞司令官指挥下的全体居民的顽强抵抗。在塞尔维亚、伏登、维丁、帕尔尼克等要塞，入侵者所遇到的抵抗更为剧烈。统领克腊克腊率众坚守帕尔尼克，不管拜占廷人如何劝说，始终不肯投降。维丁的守卫者也表现了极大的勇敢，他们在敌人异常凶猛的进攻下，竟坚持达八个月之久。

尽管人民进行了顽强抵抗，保加利亚的一些贵族却已经倾向于对敌媾和。在封建贵族中开始出现了危险的分裂预兆。

拜占廷人在沉寂了一段时期之后，又重新侵犯保加利亚。1014年，巴西耳二世统率大军侵入保加利亚，并在贝拉西察山的一个隘口设下埋伏，

大败了保加利亚人。被俘的一万四千多名保加利亚士兵，在拜占廷皇帝的命令下，惨遭剜目。这次大败后不久，萨穆伊尔逝世，其子加夫赖耳·腊多米尔（1014—1015年）继位。

萨穆伊尔死后，保加利亚人民继续抗击拜占廷侵略者，为捍卫自由而坚持战斗。但是，贵族们却早已丧失斗志，许多人都主张投降。巴西耳二世巧施伎俩，助长了这一倾向。内讧终于爆发了。加夫赖耳·腊多米尔被弑，其堂弟伊凡·弗拉基斯拉夫继位。他想对拜占廷人进行反击，但却于1018年在围攻亚得里亚海岸的代尔哈契昂（杜腊佐）时阵亡。

弗拉基斯拉夫死后，贵族统治阶级继续分 61 裂。大批贵族决定放下武器向巴西耳二世投降。这对拜占廷皇帝极为有利，使他能够更快地征服整个保加利亚。1018年，京城奥赫里德落到了他的手中。

保加利亚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因为奥赫里德的失陷而告终。一些统领，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拒绝向拜占廷屈服。统领伊瓦茨始终坚持不渝地反抗拜占廷，他率领部下撤退到阿尔巴尼亚，对

巴西耳二世的多次招降都置之不理。拜占廷皇帝无计可施，便暗下毒手，把他的双眼弄瞎，这才征服了那个地区。斯伦地区（位于萨瓦河和多瑙河之间）的总督所作的抵抗，表现得同样顽强。62他也被用阴谋诡计除掉，他所守卫的要塞接着便被巴西耳二世攻了下来。于是，到1018年年底，整个保加利亚沦于拜占廷的统治之下。

拜占廷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人民 在保加利亚人民的历史上，拜占廷统治时期是最艰难的时期之一。拜占廷在重要的地方都驻扎了军队，用以镇压人民。大批的拜占廷官员也被派了来，他们对人民施行苛政，暴行累累。人民被迫负担着名目繁多的赋税和徭役；他们在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时代只要缴纳实物税，而如今（1040年）却必须63缴纳货币税。由于保加利亚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国家，缺乏货币，缴纳货币税使农民的处境大为恶化。

高度发展的拜占廷封建制度，从此在保加利亚确立了。大土地所有制随着发展起来，教会封建领主和世俗封建领主攫取了大权，农奴的数目不断增加。

拜占廷教会是保加利亚人民最凶恶的压迫者。以奥赫里德大主教为首的拜占廷上层教士，在保加利亚取得了大片领地，整个整个的村庄连同居民一起为他们所占有。作为拜占廷专制政权和封建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代表，教会的任务在于同化保加利亚人民。

除上述社会压迫和精神枷锁外，保加利亚人民还遭受着被侵略的种种灾难。十一世纪中期以后，保加利亚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领土，经常受到佩彻涅格和乌西这两个部落的侵扰，他 64
们所到之处都被洗劫一空。1096 年和 1147 年，当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在前往小亚细亚途中经过巴尔干半岛时，他们也给保加利亚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十字军敌视巴尔干人，认为巴尔干人是 1054 年罗马教廷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分裂后的异教徒。在他们进军途中，人民常常横遭屠杀和蹂躏。

保加利亚人民在拜占廷统治下的悲惨处境，也促使鲍古米尔运动得到了传播。在异族压迫的情况下，鲍古米尔派的活动带上了显著的爱国主义色彩。

拜占廷的统治确立后，保加利亚争取解放的斗争几乎立即开始。1040年，在马其顿爆发了一次起义，由萨穆伊尔的孙子彼得·德利延领导。65起初，起义者屡屡获胜，他们解放了整个马其顿以及保加利亚西南部的其他一些领土，并接着向希腊北部和中部挺进。埃皮鲁斯和阿尔巴尼亚的人民也奋起支援他们。但不久起义者却遭受了挫折。曾供职于拜占廷的起义领导人之一阿路西恩叛变，他弄瞎德利延的双目后投靠了拜占廷。起义也因而被逐渐镇压了下去。

1072年，在马其顿爆发了新的起义。这次起义以斯科普里城为中心，领导者是当地知名人士格奥尔基·伏伊特。当时泽塔(门的内哥罗)的统治者米哈伊尔曾派出一支为数不多的塞尔维亚军队支援他们。最初，起义者也是连战连捷，收复了马其顿的不少城镇。但拜占廷人在逐渐恢复元气后，纠集兵力把这次起义也镇压了下去。格奥尔基·伏伊特被俘并押往君士坦丁堡。

保加利亚人民并没有被这两次起义的失败所吓倒，他们继续掀起反对拜占廷的斗争。人民的66反抗增强了，全国怨声载道，群情激愤。1074年、

1079年和1084年，在保加利亚的一些地方（多瑙河沿岸城镇、索非亚、普罗夫迪夫附近以及梅森布里亚城），先后爆发了反抗拜占廷统治的起义。由于这些起义仅限于局部地区，它们都比较容易地被镇压了下去。但是这些起义却表明，保加利亚人民从未放弃过争取政治自由、把征服者逐出国土的强烈愿望。

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鲍古米尔运动再度兴起。著名的传教士瓦西里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他率领十二门徒跋涉全国，信徒人数与日俱增。拜占廷政权受到了严重威胁，又开始对异教徒进行迫害。他们将瓦西里用诡计骗进了宫廷，并威逼他当着皇帝的面供认其观点。他坚贞不渝地捍卫了自己的信念，结果被判处死刑，烧死在火刑柱上。

第四章　第二保加利亚王国

67　**阿森暴动和保加利亚从拜占廷统治下的解放**　十二世纪末，保加利亚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拜占廷官吏的专横跋扈使人无法容忍，农民所受到的压迫越来越重，赋税和徭役也增加了。

拜占廷帝国的国势日趋衰落。皇帝的权力极弱，有些封建领主开始独霸一方，自称为王。帝国边境受到塞尔柱土耳其人、马扎儿人、诺曼人等一些外敌侵袭的威胁。1183年，马扎儿人进犯帝国，深入腹地，直逼索非亚。两年后，诺曼人又开始从意大利侵入巴尔干半岛，并占领了萨洛尼卡。

这种形势对拜占廷帝国极为不利，保加利亚人便在著名的贵族阿森和彼得两兄弟的率领下，再次奋起暴动。暴动的中心是保加利亚北部的图尔诺沃城。

暴动于1185年秋爆发，并很快地波及到保加利亚的整个东北部。在这一带的城镇几乎全部从拜占廷统治下获得解放后，阿森和彼得又率部越[68]过巴尔干山脉，挥戈转战于色雷斯。

拜占廷皇帝艾萨克·安格尔(1185—1195年)为保加利亚人势如破竹的进军所震惊，亲自带兵镇压他们。1186年夏，他统率大军越过巴尔干山脉，迫使阿森兄弟退到多瑙河以北。拜占廷对保加利亚北部的统治，暂时又得以恢复。然而，阿森和彼得不久就又带领库马尼亚雇佣军打了回来。(库马尼亚人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属于突厥部落。)于是，反抗拜占廷人的斗争重新开始，保加利亚人很容易地就把他们赶回到巴尔干山脉以南。但两兄弟的目的，却不仅是收复保加利亚王国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疆土，而且还要把拜占廷人从色雷斯和马其顿驱逐出去。

在色雷斯和马其顿展开了一场持久和顽强的战争，双方各有胜负。经过多次战斗后，艾萨克·安格尔又率军进入保加利亚北部，企图以围攻方式夺取洛弗奇要塞。可是，他却遭到了挫败，并不得不在1187年与阿森等人缔结和约。根据这

项和约，保加利亚已被解放的领土，得到了事实上的独立，第二保加利亚王国也从而诞生，定都于图尔诺沃。

这样，阿森等人的暴动就以胜利而告终。这一胜利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人民的大力支持；二、良好的组织；三、与库马尼亚人的联盟；四、对拜占廷内部弱点的巧妙利用。

这个胜利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几乎整个保加利亚北部都从拜占廷统治下获得了解放，成为新王国的中心地区。然而，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保加利亚在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其他领土，都尚待解放。

69 **十三世纪前半期保加利亚的巩固和扩张** 保加利亚摆脱拜占廷的统治后，阿森登上了王位。他在位期间（1187—1196年），保加利亚与拜占廷虽然订有和约，但其相互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一场新的战争终于爆发了。保加利亚人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他们解放了整个索非亚地区，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几度打败了拜占廷人。

1196年，以伊凡科为首的一些心怀不满的贵族杀害了阿森。后来伊凡科为彼得所逐，不得不

逃往拜占廷。彼得继承其兄阿森才一年，也遭谋害。他们的三弟（也是最小的弟弟）卡洛扬继承了王位。

卡洛扬在位期间（1197—1207年），为解放保加利亚其他领土而对拜占廷进行的战争，比以往更为激烈。其结果，瓦尔纳被攻克，保加利亚在色雷斯的领土也被夺回。

拜占廷皇帝安格尔·阿列克西斯三世抵挡不住，被迫于 1201 年同保加利亚人媾和。整个保加利亚北部，连同黑海沿岸的城镇以及马其顿的大部分土地，全都获得了解放。

为了巩固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卡洛扬开始与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协商，以求同罗马教会达成“教会结合”。教皇也竭力想搞好同保加利亚君主的关系，以便把罗马教会的影响扩大到巴尔干半岛，从而孤立拜占廷。协商进行得很成功。1204年，教皇公使在图尔诺沃授予卡洛扬以国王称号，保加利亚教会的领导者图尔诺沃大主教，也被授予首席主教① 的称号。

①首席主教 Primas，天主教的教衔之一，其权位高于一般的大主教。——译者

在为了达成“教会结合”而进行协商的期间，巴尔干半岛上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204年，主要由法国贵族组成、并由威尼斯共和国起重要作用的第四次十字军，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廷70的京城陷落后，十字军接着又征服了巴尔干半岛上仍由拜占廷占领着的全部领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①。只有埃皮鲁斯得以摆脱拉丁人的统治而成立了一个公国。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属地，也未受到拉丁人入侵的影响，而在那里建立起以捷奥多尔·拉斯卡里斯为首的尼西亚帝国。

这样，十三世纪初在保加利亚南部边境，一个新的邻国——拉丁帝国就代替拜占廷帝国而出现了。在这一新形势下，卡洛扬认为最好还是同拉丁人保持友好关系。然而，这些拉丁人却傲慢不逊，竟然对原先在拜占廷帝国版图内的保加利亚领土提出了要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最后导致战争的爆发。

战争一开始，保加利亚人就向色雷斯发动了

①即史称的拉丁帝国（1204—1261年）——译者

进攻。1205 年 4 月 14 日， 他们在亚德里雅那堡把十字军打得一败涂地。无数骑士被杀，拉丁皇帝鲍尔温·弗兰德被俘并解往图尔诺沃。保加利亚人的胜利，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此以前，拉丁军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曾参加过第四次十字军并对亚德里雅那堡战役颇为了解的罗伯特·德·克拉里惊呼："拉丁骑士之花凋矣！"根据同时代的拜占廷编年史家尼瑟塔斯·乔尼亚茨的叙述，则连"以其巨矛而所向披靡、威震天下之拉丁军精锐将士"也被完全击溃。著名的十字军参加者乔弗鲁瓦·德·维耳阿尔杜安在他写的编年史中，对亚德里雅那堡战役和拉丁人所受到的沉重打击，也作了异常生动的描绘。

这一战役后，卡洛扬继续率部鏖战于色雷斯西部，接着就进入马其顿，攻克了许多城镇，开拓了新的疆域。1207年，他又企图攻下萨洛尼卡，但却在围城时被贵族所谋害。

卡洛扬死后，阴谋分子把他的侄子博里耳（1207—1218年）捧上了王位，一个暂时的国势衰落随之而出现。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倾轧，把

71 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贵族日益胆大妄为，割据的局面也从而形成。鲍古米尔运动的广泛传播，反映了农民对封建贵族压迫的不满。为了镇压鲍古米尔派，1211年博里耳不得不在图尔诺沃召集了一次会议。

1218年，博里耳被废黜。阿森之子、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伊凡·阿森二世即位。他在位（1218—1241年）的头几年，太平无事。这非常有助于安定国家局势和结束内乱。王权在被割据的各省重新建立起来，贵族又陆续归附于新的君王。

埃皮鲁斯的暴君捷奥多尔·科姆涅纳斯，为保加利亚王国的巩固及其对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影响的扩大而惶恐不安，就在1230年背弃了他与伊凡·阿森签订的盟约，突然举兵侵犯保加利亚。可是，在克洛科特尼察（保加利亚南部哈斯科伏城西北的一个村子）的战役中，侵略者却只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捷奥多尔·科姆涅纳斯自己也成为俘虏被押解到图尔诺沃。这一暴君的失败，也促使幅员辽阔而内部虚弱的埃皮鲁斯公国迅速

72 崩溃。保加利亚军队开始向四面八方挺进，如入无人之境。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就先后占领了

色雷斯东部、从格利博卢半岛到奥林匹斯山的爱琴海沿岸地区以及整个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此时，保加利亚王国的疆土已扩展到三海（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滨，它也已上升为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强国。

为了纪念克洛科特尼察战役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领土扩张，伊凡·阿森下诏铭刻纪念碑文，存放于图尔诺沃的主要教堂——四十殉道者教堂。碑文迄今犹存，它用伊凡·阿森二世的口气记述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以及他在位期间保加利亚王国的威力。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自亚德里雅那堡至亚得里亚海岸的德拉齐（迪尔哈契昂）的全部土地，都已归属伊凡·阿森二世。碑文中接着还这样写道："唯是城与毗邻君士坦丁堡之诸城为法兰克人所辖，然亦皆臣服于我，盖舍朕而外，别无二主，其得以存者，均仰于朕也。"

克洛科特尼察战役后，保加利亚面临着和平发展以及经济和文化高涨的大好前景。国内外贸易也发展了。保加利亚与亚得里亚海岸的杜布罗夫尼克（拉哥萨）通商往来频繁，伊凡·阿森还赐

给该城商贾特许状，以利于他们在保加利亚经商。这些经济活动需要有大量货币。保加利亚的硬币——铜币、银币和金币，便在伊凡·阿森二世统治时期首次铸造出来。

1235年，保加利亚作为尼西亚帝国的盟国，卷入了对拉丁人进行的战争之中；因此，保加利亚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达成的“教会结合”也被解除。在尼西亚人的同意下，保加利亚教会的领导人接受了“总主教”的称号。

73　**十三、十四世纪保加利亚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拜占廷统治保加利亚期间，封建制度已得到高度发展，十二世纪末成立的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就是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十三、十四世纪时，这种封建制度得以进一步巩固，并达到了全盛时期。

这一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权力极大，他们拥有着绝大部分土地。有些贵族的领地，甚至包括了整个整个的省，所属大小村庄不计其数。十三世纪中期的“瑟巴斯托克腊托尔”① 彼得就是其中

①瑟巴斯托克腊托尔 Sebastokrator 和普罗托瑟巴斯特 Protosebast，均为保加利亚沙皇赐给皇室近亲的称号——译者

之一，保加利亚的西北部几乎全部归他所有。当时的其他豪富贵族有马其顿的“普罗托瑟巴斯特”普里博、罗多彼山区的暴君斯拉夫等。修道院也拥有大量的领地，例如：圣乔治修道院（位于斯科普里城附近）就拥有三十个村庄，分布在马其顿各地；里拉修道院也拥有二十多个村庄。沙皇伊凡·希什曼在1378年赐给修道院的特许状，就是令人信服的证据。

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其中有些是自由民，他们虽有人身自由，并有权迁居，但仍依附于贵族的土地。另一类是农奴，他们的人数在拜占廷统治期间就已经相当可观，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当时已有一些村庄全部住的都是农奴。

名目繁多的赋税，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其中，最普遍的是根据农产品（小麦和水果）与家畜（牛、羊、禽）征收的各种什一税。每幢住房都要纳税，名为“狄姆尼奈”；又要向教会纳税，名为“卡诺尼孔”；又要缴纳许多其他苛捐杂税。除常规赋税外，农民还经常被迫额外缴纳一定数量的食物和家畜，以供官吏和军队之需。他们如要从事某些经济活动（打鱼、磨面等）或使用归

国家和贵族所有的森林与牧地（打柴、放牧等），74也必须缴各种捐税。绝大部分赋税以实物形式缴纳，但也有些必须交付现金。

封建领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封建领主直接经营的地产，另一部分则是租给依附于他们的农民耕种的土地。某些领主在其领地上享有全权，他们除向依附于他们的居民征收全部赋税以供自用外，并拥有行政权和司法权。

除赋税外，农民还要担负各种义务劳动或徭役，如架桥，修路，建筑城堡，在封建领地上耕作、打草和收割，等等。

十三、十四世纪时，农民的经济状况常有变化。由于沉重的赋税、连绵的战争以及其他原因，有些农民丧失了全部或大部分土地，沦为贵族领地上的雇农。

城市生活达到了新的和更高的水平。一些富75裕城市兴起了，其中有图尔诺沃、索非亚、维丁、德鲁斯图尔、瓦尔纳、昂恰洛、梅森布里亚、索佐波耳、普罗夫迪夫、斯科普里、比托拉等。这些城市地处水陆要道，在日益兴隆的国内外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很发达的手工业的中心。

城市人口相当可观。以普罗夫迪夫为例，根据参加过1189年第三次十字军的阿诺耳德·卢卑克所提供的材料，十字军十二万大军驻扎于该城时，仅占用了全部住房的一半，由此可见当地人口之多。黑海沿岸的一些城镇，人口也较密集，它们在这一时期内，参与了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所经营的繁忙的贸易运输。举其中之一梅森布里亚（讷塞巴尔）为例，拜占廷作家尼瑟佛鲁斯·格雷哥里就把它描述为“金城汤池，人烟稠密”。根据另一些拜占廷作家的记载，索佐波耳也是“富庶繁华，輻輳万家”。瓦尔纳更是人口众多，为当时保加利亚东北部最重要的黑海港口。多瑙河上的维丁，则以一个设防坚固的重要商业中心而著称。

这些大城市的社会结构，由不同的阶层组成。为数很少的包括封建领主和豪富市民的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居于统治地位，他们是城市贵族。其余的居民统称为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小自耕农、中农、手工业者、商人和工人，下层教士也包括在内。这些城市居民的经济状况，相差极为悬殊；虽有一富裕阶层，但同时也存在着数量相当大的城市贫民。

京城图尔诺沃，是一个最豪华和最大的城市。按照十四世纪作家格里戈里·察姆勃拉克的描绘，图尔诺沃城“雄伟盖世，华美绝伦。城郭环抱，坚不可摧。其富无敌天下，其民群集若云。宫殿金碧辉煌，固远近驰名；而教堂宏丽轮奂，亦誉满全国。”在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家的作品中，76这座保加利亚京城也被誉为“帝王之都——图尔诺沃城”或“伟大之城图尔诺沃”，甚至被颂为“图尔诺沃乃上帝所赐，永受上帝庇祐。”

图尔诺沃地势险要，敌人进攻时很难接近。这座城坐落于察雷佛茨山和特腊佩济察山两座山上，扬特腊河蜿蜒其间。两山都围以城墙，大量遗迹迄今犹存。

保加利亚中古京城的主要部分——察雷佛茨山上的皇宫，已于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这座皇宫是由一些用厚墙和塔楼加以防卫的宏伟建筑物组成，其中有许多宫室，栉比鳞次；还有一间宽敞的宝殿供正式觐见和召集御前会议之用，它以爱奥尼亚式圆柱① 分成三个部分，其面积之

①一种希腊式圆柱，柱头有涡卷形装饰。——译者

大，给人以深刻印象。宝殿的地面按几何图形铺砌。四壁则覆以彩釉镶嵌物和各种壁画。紧邻宝殿的是御教堂，墙上用华丽的壁画装饰着。它也是保加利亚历代帝王的陵墓所在，其中曾发现一口石棺，盛殓的残骸可能是沙皇伊凡·亚历山大（1331—1371年）。

察雷佛茨宫不仅有宽敞的宫室供起居之用，还附设食品库、面包房、酒窖等建筑物。在宽阔的庭院中也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其容积约为一百立方公尺。

除皇宫外，贵族的府第也矗立在察雷佛茨山上，但其遗迹留存极少。总主教的升天教堂和总主教府，则坐落在山顶上。总之，察雷佛茨是京城的心脏，也是一座防守严密的卫城，世俗的和教会的封建贵族都住在这里。

图尔诺沃的其他居民，住在扬特腊河两岸的低地上。手工业者聚居在所谓的“下区”，即阿森区。统称为法兰克人的、具有西方血统的外国人，居住在察雷佛茨山东南坡下，至今那里还叫作法兰克城。修士则住在南面的一座叫作“圣林”的小 77 山上，位于察雷佛茨山对面。特腊佩济察山的东

北麓，是犹太人的居住区。有些贵族的小教堂，也建筑在特腊佩济察山上。

活跃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使图尔诺沃城充满了生气。各国的使节经常到这里来，商人们也不时来此做买卖。这座京城也是生气勃勃的文化中心。当时一些最卓越的作家在这里进行创作；最有才华的艺术家和圣象画家在此创作出他们最优秀的作品；技艺最精湛的建筑师也在此修盖起许多宫殿、教堂和住宅。

十三、十四世纪，保加利亚在经济上还是一个主要从事农、牧业的国家，以务农为生的，不仅有农民，而且有许多小城镇的居民。由于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各种手工业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较大的城镇。在索非亚、普罗夫迪夫、图尔诺沃、德鲁斯图尔等一些城镇里，铁匠、木匠、裁缝、织工、金匠等手工业者为数很多。在大的封建领地上，为了满足当地居民和封建领主的需要，手工业也有所发展。

国内贸易已相当发达。虽然总的来说，当时的经济还是以实物交换为基础，许多城镇、村落和封建领地都能自给自足，但城乡贸易关系也已

有了很大发展。城镇需要粮食和原料，而乡村则需要手工业产品。这一交易主要在每周一次的定期集市上进行。集市设在城镇上，到时候附近村落里的很多居民都来赶集。除城镇集市外，有些贵族或修道院还另外组织集市，因为他们拥有大量土地，从其管辖的人民手里征收来的农产品数量很多，需要设法销售出去。

许多已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硬币，足以证明十三、十四世纪保加利亚国内贸易的发达。但应指出，国内的封建割据以及贵族和修道院的大块自治领地的存在，也严重地妨碍了贸易的发展。生产者或商人要把他们的货物拿到市场上去出售，78 就不得不在桥头、路口、山隘等处付出名目繁多的赋税和过境税。

农民不能占有其全部劳动产品这一事实，也大大妨碍了贸易的发展。产品的一大部分，被直接统治他们的封建领主或君王的代理人拿去，他们所能自由支配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剩余产品。这就使他们不可能作为商品生产者经常地、大量地到集市上去进行交易。

对外贸易也同国内贸易一样有了相当大的发

展。封建领主由于控制了农民，就能够获得大量剩余的粮食和原料，并通过商人运到国外销售。同时，他们要求过舒适和奢侈的生活，也迫切想从国外获得各种商品。于是，同杜布罗夫尼克、热那亚、威尼斯以及拜占廷帝国的通商关系，都大大发展了。1352年，在伊凡·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保加利亚与威尼斯签订了通商条约。1387年，多布罗加的统治者伊凡科，又与热那亚签订了通商条约。黑海沿岸的城镇瓦尔纳、梅森布里亚、索佐波耳和昂恰洛，还有多瑙河上的一些城镇如维丁、锡利斯特拉等，都在对外贸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保加利亚也通过这些多瑙河上的城镇，同德国、波希米亚、匈牙利等中欧国家保持着联系。

贵族的内部倾轧　以伊瓦义洛为首的反封建农民起义　十三世纪后半期伊凡·阿森二世去世后，保加利亚的国内形势恶化了。各派系贵族之间混战不休，都想争夺王位，掌握全国大权。这种冲突引起了接二连三的王位更迭。

79　贵族康斯坦丁·阿森即位（1257—1277年）后，纷争仍未中止。贵族米措宣布反对康斯坦丁，

自称南保加利亚的沙皇，并得到了拜占廷人的支持。漫长的内战接着爆发了。结果，米措被迫逃往拜占廷。但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对手贵族亚科夫·斯佛托斯拉夫，他也从王国中分裂出去，在保加利亚的西北地区独立称王。

贵族之间无休止的混战，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些贵族，为了获得武器和物资以便同自己的敌手打仗，变本加厉地向农民征收捐税和增加徭役。此外，农民的家园在敌对贵族的频繁冲突中，也经常遭到蹂躏、抢劫和焚毁。

保加利亚的衰弱，给其邻国以向它发动进攻的可乘之机。主要的攻击来自拜占廷人，他们在几次连续的战争中，占领了色雷斯和马其顿的许多保加利亚城镇。匈牙利人则从西北入侵。鞑靼人也开始从北方进犯，他们每年都要侵入保加利亚北部大肆劫掠。康斯坦丁·阿森由于无力对抗他们，被迫向鞑靼可汗诺盖称臣。

连绵不断的战争，尤其是鞑靼人的侵略，使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他们把满腔怨愤都集中到以沙皇为首的封建领主身上，因为这些人只是向农民征收捐税和摊派徭役，但同时却无力抵御外

敌以保护他们。这些不满，导致1277年以伊瓦义洛为首的一场伟大的农民起义的爆发。

伊瓦义洛是一个质朴的农民和猪倌，聪明能干，机智勇敢。他精力过人，口才出众，从而使很多农民团结在他的周围，并在其领导下同贵族进行斗争。他对农民们说自己是“秉承上帝旨意”来接管国家政权的。

80 起义在保加利亚东北部爆发。在几个月里，武装的农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许多贵族领地落入他们手中。伊瓦义洛在打垮了贵族之后，开始抗击鞑靼侵略者。他击败了鞑靼的两支派遣军，把他们逐出国土。这位农民领袖的声誉从此大振。他的军队数量日增，战斗经验也愈益丰富。

农民的胜利使康斯坦丁·阿森大为震惊，他马上出兵镇压正向京城进军的伊瓦义洛。可是，沙皇的军队被击溃了，康斯坦丁也被杀，他的大部分士兵都归附了伊瓦义洛的队伍。

由于这一巨大胜利，伊瓦义洛的下一步军事行动得以顺利展开。他兵不血刃地使一些新的地区归于农民的统治。1278年春，伊瓦义洛进入图尔诺沃，娶了康斯坦丁·阿森的寡妻玛丽亚，并

被拥立为保加利亚沙皇。

保加利亚农民起义的胜利，使拜占廷帝国的统治集团胆战心惊，他们害怕拜占廷的农民也如法炮制，相继起义。还在伊瓦义洛开进图尔诺沃之前，拜占廷皇帝巴列奥略·迈克尔八世（1259—1282年）就已决定进行干预并派兵前往保加利亚。他的目的是粉碎农民起义，并在图尔诺沃的宝座上安排一个忠于他且能奉行亲拜占廷政策的人物。

伊瓦义洛被拥立为沙皇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对付拜占廷的侵略。与此同时，他还要防御再次越过多瑙河进犯保加利亚北部的鞑靼人。他以非凡的精力指挥着这两条战线上的战争。他先赶走了鞑靼人，接着就着手打击当时已在保加利亚南部和东北部占领了大片土地的拜占廷人。经过激烈战斗之后，侵略者被迫撤离他们所占领的大部分土地。

可是，事态的发展又带来了各种新的复杂情况。鞑靼人再次出现在北方，伊瓦义洛不得不率兵前往受到威胁的地区。与此同时，图尔诺沃贵 81
族的不满情绪增长了，因为他们对这位猪倌出身

的沙皇本来就没有好感，而且担心他会进行有利于农民的种种改革。当伊瓦义洛同鞑靼人交战时，拜占廷人又兴师长驱直入，一直打进了保加利亚京城，并把他们所信任的伊凡·阿森三世立为沙皇。接着，他们又向北转移，占领了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许多保加利亚城镇。

在此期间，伊瓦义洛终于赶走了鞑靼人，并准备打击拜占廷侵略者。他的进军在君士坦丁堡引起了恐慌。拜占廷皇帝巴列奥略·迈克尔八世看出这是对其计划的威胁，便于1280年夏又向保加利亚派出了两支拜占廷军队，以便挡住伊瓦义洛。这两支军队遭到了保加利亚人的迎头痛击，被打得一败涂地。

伊凡·阿森三世看到自己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偷偷地离开图尔诺沃逃往拜占廷。伊瓦义洛大胜拜占廷人后就准备向京城进军。然而，曾经背叛过伊瓦义洛的图尔诺沃贵族知道，一旦这位农民出身的沙皇获胜，他们决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就决定竭尽全力来反对他。他们把库马尼亚血统的一个显赫贵族格奥尔基·帖尔特捧为沙皇，全国的贵族也都纠合到他的周围。他们为新

近发生的种种事件吓得魂不附体，于是便组织力量抗击伊瓦义洛的军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防止农民起义再次爆发。

在这次重新掀起的斗争中，农民遭到了失败。他们早已被同鞑靼人和拜占廷人连续进行的战争拖得精疲力尽，再无余力来对付组织严密和装备优良的贵族军队。封建贵族阶级获得了胜利。伊瓦义洛被迫从保加利亚逃往鞑靼军营中去避难，但却在那里被诺盖下命令杀害了。在他被害后，这次农民起义也就结束了。

伊瓦义洛的起义，是保加利亚农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和反封建压迫斗争的一个最卓越的范例。尽管起义者斗志昂扬并在初期取得了胜利，起义还是失败了。

正如中古的各次农民起义那样，以伊瓦义洛[82]为首的这次起义也是出于自发的。揭竿而起的农民没有任何明确的纲领，只是想把一个他们本阶级的人捧上沙皇宝座，希望借此改善他们的命运。

四分五裂的保加利亚　由于长期内战以及鞑靼人和拜占廷人的侵略，保加利亚在伊瓦义洛起

义被镇压下去后变得虚弱不堪。此外，为了对付农民而一度纠合起来的贵族，现在又开始自相残杀，力图割据称王。到了十三世纪末，某些封建贵族已在国内不同地区各霸一方，他们权力极大，很少听从沙皇的命令。其中，贵族希什曼成了提莫克河和伊斯克河之间地区的统治者，以维丁为其首府；斯米列茨两兄弟——腊多斯拉夫和沃伊西耳，拥有巴尔干山脉和斯雷德纳戈腊山脉之间的广大领土；贵族埃耳提米尔则统治着今日的卡赞勒克城周围的地区。

这一封建割据，使保加利亚新沙皇格奥尔基·帖尔特（1280—1292年）的权力大为削弱。在他短短的统治期间，鞑靼人又一次兴师进犯，帖尔特迫不得已而称臣于诺盖。可是，他的处境并未因此得到改善，还是被迫逃亡国外。其后，贵族斯米列茨登上了王位（1292—1298 年）。

斯米列茨完全仰仗诺盖的鼻息而存，鞑靼人也从而完全控制了保加利亚。1298 年，斯米列茨被废黜，诺盖之子查卡自封为保加利亚沙皇。但是查卡统治时间很短，格奥尔基·帖尔特之子托多尔·斯佛托斯拉夫又密谋推翻了他。查卡被捕

入狱并被绞死，托多尔·斯佛托斯拉夫也由贵族一致推举为沙皇。

在托多尔·斯佛托斯拉夫的统治（1300—1321年）下，保加利亚国内形势暂趋稳定。新沙皇成功地使贵族俯首听命，加强了中央政府。由于他设法同鞑靼人保持了友好关系，保加利亚人[83]民才终于免受他们的侵略。斯佛托斯拉夫在即位后的头几年里，还利用拜占廷在小亚细亚受到土耳其人打击的困难处境，向拜占廷发动了一场卓有成效的战争。这一战争以巴尔干山脉和斯特兰贾山脉之间的土地获得收复而告终。

1308—1321年期间，保加利亚处于和平状态，从而使经济有所恢复。同拜占廷、威尼斯和杜布罗夫尼克之间的贸易关系扩大了。黑海沿岸的一些保加利亚城镇（瓦尔纳、梅森布里亚、索佐波耳等），也开始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保加利亚人通过这些城镇出口小麦、兽皮、木材和其他产品，也进口纺织品、武器等等。

1321年，托多尔·斯佛托斯拉夫去世。他的儿子格奥尔基·帖尔特二世在位期间很短，其后再次出现了旧王已死新王未立的一段空位期。由

于贵族们野心勃勃地争夺更大霸权，国家又陷于新的纷乱之中。梅森布里亚和斯利文两城之间的全部地区割让给拜占廷。巴尔干山脉和斯雷德纳戈腊山脉之间的国土也被分割出去。

1323年，统治维丁地区的贵族米哈伊尔·希什曼被选立为沙皇。他使巴尔干山脉和斯雷德纳戈腊山脉之间的土地复归于保加利亚的版图，但未能夺回梅森布里亚和斯利文之间的地区。

米哈伊尔·希什曼统治时期（1323—1330年），一直是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度过的。起初，他对拜占廷人开战，想利用拜占廷国内安德洛尼卡二世和他的孙子小安德洛尼卡之间的内部纠纷而从中渔利。但是，这些反拜占廷的战争并没有给保加利亚人带来什么好处。1328年，两国签订了和约。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的西邻塞尔维亚正在阔步前进。塞尔维亚国王米卢廷（1282—1321年）和斯特凡·德昌斯基（1321—1331年）在位期间，塞尔维亚人已夺去了马其顿的一部分，现在又一84心想继续扩张版图。塞尔维亚人的这一威胁，迫使保加利亚和拜占廷结成同盟以采取联合行动。

可是，保加利亚人却在不久就爆发的战争中被打败了。1330 年 6 月 28 日，在佛耳布日德（现在的丘斯滕迪耳）一役中，米哈伊尔·希什曼本人也战死了。

下一个沙皇伊凡·斯特凡在位时间极短，其后贵族伊凡·亚历山大（1331—1371年）被选为保加利亚沙皇。他在位期间，保加利亚王国的形势更加恶化。塞尔维亚国王杜善统治时期（1331—1355 年），马其顿已被塞尔维亚人所征服。杜善去世后，马其顿就被当地的封建领主瓜分了。

大约在十四世纪中期，保加利亚北部也同样被当地的封建领主瓜分了。贵族巴利克占据了多瑙河下游和黑海之间的地方，成为独立的君主。继承他的是其弟多布罗提察，这个地区后来也因此命名为多布罗加省。多布罗提察把他的领地沿着黑海海岸向南一直扩张到梅森布里亚城。他死后，政权传给其子伊凡科。

保加利亚王国在其东北地区分割出去之后，剩下的国土又被分为图尔诺沃王国和维丁王国。这是伊凡·亚历山大自己决定这样做的，因为在王位的继承问题上出现了纠纷。他把维丁王国给

了他的一个儿子伊凡·斯特腊战米尔，又把图尔诺沃王国给了另一个儿子伊凡·希什曼。伊凡·亚历山大于1371年去世后，弟兄俩就各自接管了所分到的那一半国土。可是，他们之间关系很坏，各自为政，互不往来。

保加利亚此时已分裂成三个部分，这种分裂使国势大为衰落，也减弱了其军事和经济实力。伊凡·亚历山大执政时期同拜占廷人和匈牙利人进行的多次战争，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四世纪中期，保加利亚的社会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农民在贵族阶级的统治下，对横加在他85们身上的沉重负担怨声载道。许多农民背井离乡，逃进深山丛林，组织武装队伍，袭击贵族和修道院的领地。

以莫姆奇耳为首的武装队伍最为出名，多年来他们一直活跃在保加利亚和拜占廷的接壤地区。从领主那里逃出的穷苦农民纷纷跑来参加他的队伍。后来，莫姆奇耳在罗多彼山区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地盘。他是最早抗击侵人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士之一。在佩里特

要塞（位于色雷斯南部，爱琴海沿岸）的一次战斗中，莫姆奇耳不幸阵亡。作为一个农民的保卫者和反抗土耳其人的战士，他的英雄形象长存于民歌和传说之中。

保加利亚沦于土耳其统治之下 十四世纪，当保加利亚和其他巴尔干国家因连年战乱而财穷力竭并在政治上趋于分裂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国家已经在小亚细亚兴起，并占领了拜占廷在那里的大片领土。土耳其的国家是按军事和封建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奥斯曼土耳其人中涌现出一个强有力的封建贵族阶级，他们以征战和掠夺为生，并早已对邻近的巴尔干土地垂涎欲滴。

1326—1352年期间，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半岛频频侵袭，并在很多地方，主要是在拜占廷的领土上，大肆蹂躏。1352年，他们在占领了格利博卢半岛上的青佩堡后，便在巴尔干站稳了脚跟。两年后，格利博卢要塞也落入他们手中。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引起了巴尔干各国人民的惊慌。在1351年和1355年，保加利亚与拜占廷曾就共同抵御侵略者的问题几度进行协商，但毫无成果。两国人民强烈要求达成谅解并[86]

结成同盟，但两国统治集团之间的敌对状态，却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从而带来了灾难。

穆拉德一世（1362—1389年）登基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了征服巴尔干的大规模行动。他们在几年之内征服了几乎整个色雷斯东部，包括亚德里雅那堡和迪迪莫提昌（迪莫提卡）两城在内，并侵入保加利亚领土。1364年，旧扎果腊和普罗夫迪夫两城落入他们手中。保加利亚人民奋起反抗，阻止了侵略者的继续入侵。

1371年，马其顿的两个封建领主武卡辛和乌格列什，决定采取联合行动反击土耳其人。然而，他们的军队却被打败了，他们自己也在切尔诺门村（位于马里查河沿岸离亚德里雅那堡不远处）一役中阵亡。

土耳其人在这一战役后开始西进，侵入希什曼的王国和马其顿贵族的领地。在很多地方，他们遭到了人民为保卫其家园而进行的顽强抵抗。比托拉城的居民长期地阻挡住了土耳其派遣军的挺进，他们以其大无畏的精神，为保加利亚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在罗多彼山区的策佩纳要塞（距

今日的佛林格腊特不远）和腊科维察要塞（现别洛沃村所在地），土耳其人也遭到了当地人民的顽强抗击。

1371—1375年期间，穆拉德还向色雷斯东北部的保加利亚领土发动了进攻。延保尔和卡诺巴特二城虽被攻陷，但侵略者也曾在这里遭到猛烈抵抗。

经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之后，土耳其人又向索非亚进军，并对它进行了长时期的围攻。然而，当地人民也顽强地进行了抵抗，多次粉碎了敌人攻占这个坚固要塞的企图。于是，土耳其人只好施展奸计。1382年，他们把索非亚驻军中组织该城防务的班·亚努卡抓到了手，索非亚这才被迫投降。

索非亚和马其顿南部的一些地区被攻陷后，87 土耳其人着手准备攻打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和波斯尼亚国王特弗尔特科为首，组成了反抗土耳其人的同盟，保加利亚沙皇伊凡·希什曼也参加了这一同盟。1387年，在塞尔维亚境内托普利察河岸的普洛奇尼克镇附近，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联军使穆拉德的军队遭到惨败。但是

联军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胜利所造成的大好时机，土耳其人又恢复了元气并继续推进。穆拉德决定这次先攻打保加利亚人。1388年，一支三万人的土耳其大军，越过巴尔干山脉进犯保加利亚东北部，攻陷了舒门（今日的科拉罗夫格勒）、奥佛奇（今日的普罗瓦迪亚）和马达腊三城。可是，他们却未能攻下瓦尔纳。当地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坚固的城墙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京城图尔诺沃也挡住了土耳其人的进攻。

穆拉德在结束了保加利亚东北部的战役之后，开始对塞尔维亚人采取新的军事行动。1389年，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平原之战中被打败了，他们的国家变成土耳其人的藩属。然而，穆拉德也在这一仗中送了命，由其子巴耶济德一世继位（1389—1402年）。

这个新的土耳其苏丹，立志要完成征服保加利亚的霸业。1393年，他率领大军进攻图尔诺沃。几十年来，保加利亚人民曾与土耳其侵略者殊死奋战；此时，他们又为保卫其京城而进行了最后一次顽强抵抗。他们凭借坚固的城墙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毫不理睬土耳其司令官的种种威胁

利诱，坚守图尔诺沃达三个月之久。但最后粮尽援绝，这个京城在1393年7月17日沦入土耳其人之手。

图尔诺沃陷落后，土耳其人又北上攻陷了多瑙河畔伊凡·希什曼所在的尼科波尔要塞。希什曼也被巴耶济德下令杀害了。

随着图尔诺沃和尼科波尔的失陷，图尔诺沃王国灭亡了，只剩下了伊凡·斯特腊戚米尔的维丁王国。早在1388年，伊凡·斯特腊戚米尔就已 88 被迫成了苏丹的藩臣，又让一小队土耳其卫戍军进驻了维丁城。然而，他并不甘心于藩臣的地位，总想找机会摆脱这种臣属关系。1396年，当匈牙利国王西吉斯孟德兴师反抗土耳其人时，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维丁人民赶走了土耳其驻军，打开了要塞大门，迎进了匈牙利人。匈牙利人继续沿多瑙河而下，在保加利亚人的积极支援下，占领了奥里亚霍伏要塞。但是，西吉斯孟德的军队，却在尼科波尔遇上了由巴耶济德亲自率领的一支强大的土耳其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巴耶济德接着立即向维丁进发，包围并攻陷了该城。伊凡·斯特腊戚米尔被俘并押解到小亚细亚，他

那小小的王国很快就被土耳其军队全部占领。随着维丁王国的沦亡，整个保加利亚在1396年陷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

还在土耳其人开始侵犯巴尔干半岛时，保加利亚就已经不是一个强盛和统一的国家了。它分裂成为三个部分，其统治者互不支持，甚至还互相残杀。这三个部分又进一步分裂成为许多封建辖区，而统治着这些地区的贵族也是各自为政，他们只要对自己有利，甚至不惜投敌。这一切都大有利于土耳其人的获胜。

另一个导致土耳其人获胜的重要原因是，当他们侵入欧洲时，巴尔干各国之间的关系很坏。他们非但没有团结一致以御外敌，反而互相征伐，彼此都弄得财穷力竭。拜占廷、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封建统治阶级，只顾竭尽全力地损人利己，却没有看到来自亚洲的侵略者的严重威胁。

尽管保加利亚处境不利，国势衰弱，保加利亚人民却为了维护其自由而不屈不挠地与土耳其人战斗达半个世纪之久。索非亚、延保尔、图尔89诺沃和其他城镇失陷前后所发生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件，都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一反侵略斗争，

也鲜明地表现在那个英雄时期的许多民间传说和民歌之中。在这些流传于国内各地的民歌中，中心人物是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沙皇伊凡·希什曼；他被描绘成一位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英勇战士，也被看作是全民抗战的象征。

十三、十四世纪的保加利亚文化 在异族统治时期，保加利亚人民的文化生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当他们从拜占廷统治下获得解放并建立了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后，文化生活的发展才具备了有利条件。到了十三、十四世纪，中古保加利亚的文化，更达到了全盛时期。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在继承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古老传统并推陈出新的基础上，获得了很大发展，表现为：兴建了许多要塞、宫殿、寺院和教堂；写下了大批书籍；画出了一些奇妙的小型插画；教堂和其他建筑物上都饰以精致的雕刻。文学艺术领域内流派四起，各有所长。

建筑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贵族阶级和教会的需要。频繁的战争和敌寇人侵已使这类建筑大部分毁坏，但仅从所余无几的一些就足以看出当时建筑规模之大。

要塞通常修建在高不可攀的地点，外形千变万化，因地而异。城墙粗糙，但却坚固，足以抵御敌人的进攻。要塞建有塔楼，其上设有小门和射击孔，想经过这里进入要塞很不容易。构筑要塞是保加利亚在战祸连绵、内讧不息的封建时代 90 的一个特点。这一时期所修建的要塞，绝大部分是在当时保加利亚和拜占廷帝国的边境所通过的罗多彼山区发现的。其中之一是阿森要塞，由保加利亚沙皇伊凡·阿森二世修建于 1231 年。它耸立在高山之上，位于阿森尼察河流域的今日的阿谢诺夫格拉德镇以南，其遗迹迄今只剩下了一座塔楼和一座教堂。在原先修筑着要塞的那块岩石上，还有伊凡·阿森二世为纪念这一要塞的构筑而下令刻写的铭文。

在罗多彼山区的其他要塞，有巴库恩、普雷波雷克、策佩纳和奥斯特腊。奥斯特腊要塞位于阿尔达河中游，它保存得较好，特别引人入胜。它的城墙高达八至十公尺，并建有坚固的角楼。策佩纳要塞也很宏伟，几世纪来，它那厚实的城墙不止一次地抵挡了敌寇的入侵。

不仅险阻难攀的山区居民点围以坚固城墙，

就连平原上的城镇也是如此。例如，保加利亚北部的切尔温（在今日的鲁塞以南），城墙就非常[91]坚固结实。它是十三、十四世纪全国经济生活和宗教生活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个筑有城墙的要塞，有一座巍峨的五层塔楼保存迄今，它在外形上和结构上都是保加利亚中古要塞的最好的范例。

多瑙河上的大城市维丁（古代的博努尼厄），在中古时期也是设防坚固的。它有一座名叫巴巴维达（维达奶奶）的城堡，从那个时期一直保留到今天。这一城堡雄伟坚固，有好几座塔楼，四周围以城壕，经常从多瑙河引水注入其中，从而使城堡固若金汤。巴巴维达堡大约建于十三世纪末，当时那个地区是由希什曼王朝的独立的封建领主统辖着。该城堡在土耳其统治期间，曾几经修复，迄今虽被保留下来，但其外形已与原来的结构稍有不同。

由于土耳其对保加利亚的侵略和占领，所有的中古城堡，不是整个被毁掉，就是只留下很少的一些遗迹。但是，从这些残存的极少遗迹中，也能十分明显地看出中古建筑的巨大规模。

在十三世纪，除要塞外还兴建了大量教堂。京城图尔诺沃就以其教堂而闻名，因为它是一个92宗教中心，也是保加利亚教会总主教的所在地。这些教堂中，首屈一指的是迄今犹存的四十殉道者教堂。它是1230年根据保加利亚沙皇伊凡·阿森二世的命令在扬特腊河畔修建的。著名的刻有纪念克洛科特尼察村大捷的铭文的大理石柱就在这里。教堂内还有一根大理石柱，柱上的铭文记载着奥穆尔塔格可汗大兴土木的活动。这个教堂用壁画装饰得金碧辉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廊内墙上带插画的教历。它由若干画面组成，画的是各基督圣徒殉道的事迹。每幅画上还标着该圣徒的忌日。

图尔诺沃的另一个吸引人的教堂是圣迪米特尔教堂，1185年，阿森等人就在这里发动了反抗拜占廷统治的暴动。教堂内原来也饰有絢丽的壁画，但未能保存下来。第二保加利亚王国期间，这个教堂曾在当时的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十四世纪时建于图尔诺沃的，还有圣彼得—圣保罗教堂。圣乔治教堂也建于那个时期。有些

贵族还在特腊佩济察山上修筑了一些教堂，作为他们的家庭小教堂，保存迄今的有十七座，但大部分已成断壁残垣。

讷塞巴尔（梅森布里亚）城也有很多中古的教堂，它们大部分建于十三、十四世纪。其中，圣约翰·阿利特格托斯教堂建造得最为精致，保存得也比较好。施洗者圣约翰教堂也很吸引人。

在保加利亚西部和现在的马其顿，也保留下来许多教堂。马其顿的教堂中，以奥赫里德城的圣克利门特教堂和圣约翰教堂最为著名；保加利亚西南部的教堂中，则以博亚纳村（在索非亚以南维托夏山麓）的教堂和泽门村的教堂最为著名。

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教堂都比较小，它们是用石块与砖相间砌成的。外墙上的拱形壁龕，连同带有彩釉陶瓦和琉璃器皿的装饰，使这些教堂的外表看上去五光十色，絢丽如画。 93

保加利亚有很多修道院，有些建于这一时期，其余的修建得还要早些。

这些修道院之中，最有名的是位于保加利亚西南部的里拉山脉的里拉修道院，它是由里拉的

隐士约翰于十世纪中期创建的。接连好几个世纪，它一直是中古保加利亚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修道院。它的教友极多，其宗教仪式也最为虔诚。从这里还兴起了一个文学流派。土耳其人入侵前，这个修道院就曾经几度被毁并几度重建，如今遗94留下来的唯一建筑物，是一座孤零零的五层塔楼，高达二十五公尺。它是在1335年由当地的封建统治者"普罗托瑟巴斯特"赫列利奥修建的，因为里拉修道院曾一度处于他的领地范围之内。在时局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内乱绵延不绝，外敌频频入侵，这座塔楼就是为了保卫修道院并庇护封建王公的家眷和该院修士而兴建的。它本身就是一座堡垒，用砖石建成，窗户狭窄，射击孔无数，可以从里面射击敌人。最高的一层楼上有一座小教堂，装饰着各种各样的壁画。塔楼顶部平坦，四周环以雉堞。

另一座有名的中古修道院是巴奇科伏修道院，位于阿谢诺夫格拉德以南罗多彼山区的查亚河谷之中。它是1083年由格鲁吉亚血统的拜占廷大臣格里戈里·巴库里安尼创建的。古老的修道院建筑未能保存下来，从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只

有一座建筑在修道院的回廊外面的骨堂。它的下 95 层是陵墓，上层是小教堂，里面有着引人入胜的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壁画，还有其他一些吸引人的文物，其中之一是一幅保加利亚沙皇伊凡·亚历山大（1331—1371年）的画象。在巴奇科伏修道院里，还保存着一幅有价值的圣母像，画于1310年，上面有格鲁吉亚文的题词。

在十三、十四世纪还有一些较为知名的修道院，它们是图尔诺沃附近的神圣的三位一体① 修道院、索非亚以南维托夏山麓的德腊加累符戚修道院和腊多米尔城附近的尼古拉·姆腊奇基修道院。

在上述这一段时期里有一种流行的风俗，即在巨大的岩石里，凿一些窄小的、几乎无法攀登的石窟，供修士或隐士隐居其中，以祈祷斋戒度过他们的一生。这一风俗的形成，同神秘主义的泛滥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人民宁愿以冥想度日的苦闷心情分不开。保加利亚人民的这种心情，产生于十四世纪那些动乱不安的艰苦岁月里，特

①神圣的三位一体，Sveta Troitsa (Holy Trinity)，基督教认为圣父上帝、圣子耶苏和圣灵三位为一体，故名。——译者

别是在他们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前夕。在保加利亚东北部科拉罗夫格勒城附近的马达腊村，以及在多瑙河上鲁塞城附近的伊凡诺沃村，都发现了这种在岩石里凿成的隐士石窟。伊凡诺沃的石窟，大多数都饰有絢丽的壁画。瓦尔纳城附近，还保留着一个引人入胜的石窟修道院，名叫阿拉贾修道院，也就是彩色修道院，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各个石窟都在壁上覆盖着许多图画的缘故。这个修道院由一些石窟组成，它们是从岩石上分上、下两层开凿出来的。沿石阶拾级而上可抵达下层，一条从岩石上凿出的小道则通往上层。

人们对十三、十四世纪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比较熟悉，因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保存了下来，但对同时期的世俗建筑却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很少有私人住宅的遗迹可供查考。只有在保加利亚西南部的梅耳尼克城还保存下来一幢比较古老的房屋。（梅耳尼克是这个时期的一个要塞，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那幢房子一共有三层：第一层当作地窖；第二层供起居之用；第三层是个阁楼。房屋内部已全部毁坏，现在只剩下了外墙。象当时的教堂一样，它也用一层石头一层砖交替

砌成，看上去美丽如画。房屋顶上还矗立着一座塔楼，以防外来的袭击。它很可能是梅耳尼克豪富贵族的住宅。

这一时期的艺术主要是宗教性质的，这同当时的教堂和修道院都要求装饰其内部很有关系。在图尔诺沃、博亚纳、泽门、奥赫里德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教堂的四壁上，保存下来很多壁画，它们都是些圣徒的肖像和以新、旧约圣经为题材而创作的图画。

这个时期艺术的特征是：虽然宗教题材仍占支配地位，但现实主义的倾向已有所表现，画家们在赋予形象以个性这一方面，作了种种努力；此外，肖像画也出现了。当时的艺术家已不满足于那套呆板的、因袭的格式，也不再盲目追随以象征主义和非人格化为特征的中古传统宗教风格。他们画出了能反映不同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

这一新的风格，是十三世纪图尔诺沃画派的代表人物首先倡导的。四十殉道者教堂内的某些壁画，就是这种风格的范例。但是，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风格的，却是闻名世界的博亚纳村（在

索非亚以南维托夏山麓）教堂里的壁画，它们是由一位佚名大师在1259年创作的。在这些壁画中，以该教堂的施主贵族卡洛扬和他妻子德西斯拉娃的肖像最为杰出，画家运用了现实主义大师的全部技巧，把他们表现得生动逼真。当时的保加利亚沙皇康斯坦丁·阿森和他妻子伊丽娜的肖像，在画技上也毫不逊色。圣殿诸学者簇拥着年轻的耶稣，在画家的笔下展现得栩栩如生；许多[97]圣徒、天使和使徒的形象，也被这位佚名大师绘[98]制得维妙维肖，各有各的内心世界，已经不仅是因袭的、刻板的偶象，而成了有个性和有特色的人物。博亚纳的壁画，给所有见过它们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中古保加利亚艺术的最优秀的成就。

泽门村（在保加利亚西南部的丘斯滕迪耳城附近）的中古修道院里的壁画，也有很高的艺术性。它们画于十四世纪中期，其中以修道院施主暴君德扬和他妻子多娅的肖像画得最为出色。许多取材于新、旧约圣经的画面，也绘制得生动逼真，独具一格，并经常以建筑和风景作为其背景。

宗教艺术的明显特点，是带有民间色彩和反映了日常生活。例如，博亚纳教堂里有一幅壁画《最后的晚餐》[①]，画中使徒的膝盖上放着一条长餐巾，就象当时通常所使用的一样，而在餐桌上的菜碟里，还可以见到保加利亚人普遍爱吃的大蒜。里拉修道院赫列利奥塔楼上的壁画中，有一幅就是画着当时流行的圆舞（或称为"霍罗舞"），乐师们伴奏所用的，也都是一些民间乐器。宗教艺术中出现的这种民间情调，给人以一种特别新颖的感觉；而从当时艺术力图摆脱中古拜占廷教会的陈规旧俗和刻板章法这一点来说，则更是一种显著的进步了。

除宗教艺术外，小型插画和手工艺也获得了很大发展。保加利亚沙皇伊凡·亚历山大在位期间，有两本书以其小型插画而著称：一本是拜占廷编年史家马纳瑟斯所写的已译成保加利亚文的编年史；另一本是新约圣经。马纳瑟斯的编年史

①《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是一个传统的宗教题材，内容是耶稣在被钉于十字架的前夕与其门徒共进晚餐，当耶稣在餐席上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把我出卖"时，各门徒表现出不同的内心反应。——译者

现存于梵蒂冈，那本圣经（也即所谓的《伦敦圣经》）现存于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编年史附有六十九幅小型插画，除有些是希腊原作的复制品外，其余的都是原作，它们描绘了保加利亚历史上的许多大事。沙皇伊凡·亚历山大和他儿子的小型画像也在其中。《伦敦圣经》有三百五十二幅99彩色插画取材于新、旧约，其中也包括了伊凡·亚历山大和他一家的小型画像。

上釉陶器是手工艺中最发达的一种，因为室内装饰和建筑都大量用到它。金、银制品也出现了，如指环、耳环、手镯、圣像罩、圣器等等。近几年在保加利亚北部考古发掘出来的许多中古大墓地，提供了大量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物，它们本身就是保加利亚金匠巧夺天工的高超手艺的一个证明。木刻也风行起来，主要用以装饰大门和圣像壁。现仍保存于里拉修道院博物馆的一扇赫列利奥塔楼的木门，就是这一时期的木刻杰作之一。赫列利奥本人坐的宝座，也保存在这个博物馆里，它是当时保加利亚木刻家精湛技艺的另一范例。

文学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那个时期的作品，

有很多流传至今。当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其中大部分是封建贵族和上层教士，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其本阶级的思想和利益。在这些作家中，最杰出的有埃夫提米总主教、格里戈里·察姆勃拉克、康斯坦丁·科斯特涅奇基、西普里安等 100 人。

由于教会在保加利亚的封建时代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总是把它对人生的看法强加于人，当时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带有宗教性质。写于十三世纪前半期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所谓的《沙皇博里耳的宗教会议》。这部书的编写，同 1211 年召开的反对鲍古米尔派教义的会议有关，其内容包括鲍古米尔派教义的性质及其传播情况的一些资料，以后又增添了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新内容。这一著作也从而成为载有保加利亚从十三世纪初期直到它被土耳其征服这一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编年史。

十四世纪后半期，在伊凡·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伊凡·希什曼执政期间，宗教文学大为繁荣。当时，在图尔诺沃附近，建立了一所基利法里伏修道院，专门培训修士和教士以便日后当学者或

传教士。这一修道院的创始人是图尔诺沃的捷奥多西厄斯，他是广泛流传于拜占廷的黑济恰斯茨教派的拥护者之一。

101 保加利亚在十四世纪的最有名的宗教作家埃夫提米总主教，就是图尔诺沃的捷奥多西厄斯的一个门徒。1375—1393年期间，埃夫提米一直担任总主教。图尔诺沃陷入土耳其人手中后，他被流放到保加利亚南部并死在那里。他写了许多有关宗教的作品（各种赞辞、教义解说、圣徒行传等）。这些作品虽然也受到拜占廷文学模式的影响，但在素材的取舍和处理上，都表现出埃夫提米自己的极大独创性。大量比喻的运用，对大自然诗一般的描绘，使其文风富于艺术性。在埃夫提米所写的一些圣徒行传中，他还把宗教题材同对保加利亚历史的颂扬，以及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严重威胁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巧妙地糅合在一起。

埃夫提米总主教不仅以他的文学作品而闻名，而且也是为创造一种统一的文字拼法而进行102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功绩还在于改正了礼拜祈祷书上的某些谬误。

格里戈里·察姆勃拉克、康斯坦丁·科斯特涅奇基、西普里安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对保加利亚及其周围的各斯拉夫国家都大有裨益。这些作家都曾受到埃夫提米总主教很大的影响。

格里戈里·察姆勃拉克所写的一些作品，主要是训戒和赞辞。他最有名的赞辞是颂扬埃夫提米总主教的，其中运用戏剧性的艺术手法，描述了土耳其人对图尔诺沃的围攻，以及京城陷落后居民的遭遇。保加利亚陷于土耳其统治下以后，察姆勃拉克去俄国，并于1414年被推选为基辅的大主教。

康斯坦丁·科斯特涅奇基主要是在塞尔维亚工作。他竭尽全力地继续进行了埃夫提米总主教创始的拼法改革，并使它得以付诸实施。在他为塞尔维亚统治者斯特凡·拉扎列维奇（1389—1427年）所写的一部传记中，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写作天才。

西普里安主要是在俄国工作，并于1389年被任命为莫斯科的大主教。他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些有关宗教的作品如传记、赞辞等。西普里安以作

家兼学者的身分所进行的广泛活动，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并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丰富了它。

103　在宗教文学发展的同时，相当多的世俗作品，也广泛流传于保加利亚的知识界。例如，有一本名为《生理学家》或《博物志》的书就极为流行。该书不仅谈到了各种动物，也叙述了某些植物和矿物，着重介绍其实际的或想象的特性，目的在于扩大读者的知识面。《特洛伊寓言》也广为流传，讲的是特洛伊战争史。另一本流行的书是《亚历山大里亚》，叙述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生平及其业绩。这些传奇和故事，大部分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

十四世纪时，保加利亚社会上对历史事件的兴趣，即对各国人民，特别是本国人民的历史的兴趣，显著地增长了。有三个拜占廷编年史家的著作被译成了保加利亚文，他们是：格奥尔基·哈马尔托耳（九世纪）、佐纳腊（十二世纪）和康斯坦丁·马讷瑟斯（十二世纪）。在他们的著作里都可以找到有关保加利亚历史的资料。十五世纪初，又有一位佚名作家编纂了一部简明编年史，记述了第二保加利亚王国最后几年的大事以及反

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斗争。

经外文学也大大发展了。这些经外书籍，是由不知名的民间作家所写或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其内容极为广泛。有一些主要是讲关于经济 104 生活和农村生活（年成、健康、疾病等等）方面的问题。例如，一本所谓的《卜书》就属于这一类经外书，书中说根据不同的预兆或征候，即可断定庄稼好坏、年成丰歉、有无饥荒等。

另一类经外书反映了中古保加利亚人民的种种渴望，他们对现有的宗教不满，而要进一步探索人类和世界的起源及其实质。这一类的经外书有《以赛亚的幻想》、《埃诺克》、《三圣训诫》等。最后那一本也称为《论理书》，内容非常奇妙，它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对形形色色的有趣的问题详加解释。譬如说，地球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是谁在支撑着地球？第一个人是怎样创造出来的？第一个仆人和第一个裁縫是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经外文学主要同农民群众的生活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有密切联系，它反映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欢乐和痛苦。与此同时，经

外书也说明了中古保加利亚人民在艺术上和文学上所拥有的潜力；尽管条件较差，他们却成功地创造了自己的读物和精神食粮。

土耳其对保加利亚的征服，给了保加利亚的文学发展及其全部文化生活以沉重打击。它使保加利亚人民正常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断了好几个世纪。十三、十四世纪中，人民的创造力因此而无法得到自由发展，他们也未能在文学以至整个精神文化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第五章　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人民在土耳其征服者统治下的处境[105]

在土耳其压迫下，保加利亚进入了它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这一漫长的异族统治时期大约持续了五个世纪。在这一时期里，土耳其征服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把大批保加利亚人民赶出家园，竭力摧毁其民族，并把他们置于最残酷的压迫和最野蛮的剥削之下，致使保加利亚民族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异族的统治，阻碍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中断了保加利亚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的联系，也给了保加利亚的文化发展以严重打击。接连好几个世纪，土耳其征服者千方百计地企图吞并、同化和毁灭保加利亚民族，以确保他们对保加利亚土地的统治。然而，他们却未能如愿以偿。保加利亚人民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因此，尽管他们遭到种种史无前例的

残酷迫害和专制暴行，他们仍然保持了本民族的独立生存。经过一场持久的斗争，他们终于在斯拉夫俄国的帮助下获得了解放。

106 保加利亚被土耳其人征服后，城乡普遍受到蹂躏，人民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繁荣的城镇和乡村化为废墟，田园一片荒芜。整个整个地区的居民，为了寻找避难场所，不得不迁往深山老林或穷乡僻壤。为了代替他们，土耳其当局把许多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居民移居到保加利亚境内。大批的土耳其游牧主，则定居在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沃野上以及罗多彼山区之中。城镇里也住进了土耳其人，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很多保加利亚居民远离城镇并躲藏起来，有一些人惨遭屠杀，比较富裕的人则改信了伊斯兰教，从而逐渐被为数众多的土耳其移民所同化。这样，十五、十六世纪的保加利亚城镇就带上了土耳其情调，其居民也多半成为伊斯兰教徒。

土耳其征服者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带有军事封建性质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他们宣布所有被征服的土地——“米尔”都是苏丹的地产，也就是国有地产，把它们分给封建阶级的各个集团和

在这个国家定居下来的移民。一部分土地成了苏丹及其宠臣亲信和皇室近亲的私有地产。这部分土地分成“哈斯”和“加齐”两种，统称为“穆尔克”，其中也包括了城镇和乡村中那些被认为是私有地的耕地。另一部分土地被称为“瓦克夫”，分给了伊斯兰教的寺院。第三部分土地给了新定居下来的伊斯兰教徒，并被置于业已建立的军事封建政权的管辖之下。然而，最大的一部分土地是变成采邑交给所谓的“斯巴希”，即土耳其军队的骑兵，供他们在服役期间暂时使用。这种采邑，又按照从居民中所取得的封建剥削收入的多少，分成为小块封建领地“梯马尔”和大块封建领地“扎美特”两种。

以上各类封建领地都由被称为“赖雅”①的非穆斯林农奴耕种。每个农户领取一定数量的土地，大约五至十五公顷，用自己的牲畜和农具耕种，107 并向国家和他们的封建领主缴纳租税。这种租税可以用劳役、货币或实物的形式缴纳，由国家和封建领主分享；尽管有一系列的法令条文对其缴

①“赖雅”，Rayah，土耳其文，原意为“牲畜”。——译者

纳范围和分配加以限定，租税仍然不断地任意增加，居民也因而受到了最残酷的盘剥。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对金钱和物资的需要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封建领主只能在服役期间暂时享有土地，他们就力图在此期间从居民身上榨取最大利润。国家肆意增收强加在居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封建领主则强迫他们除每年法定劳动日外还要服无偿劳役，并任意提高货币租税或实物租税的数量。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农业下降到极低水平。有些曾在土耳其统治初期路过保加利亚的外国游客，如贝尔特兰登·德·拉·博基埃尔、菲·邦纳科尔西（卡利马丘斯）、布斯贝凯等人，都曾注意到在土耳其征服者这种空前的掠夺和暴政下农民的悲惨处境，以及大片肥沃土地荒芜的情形。

部分保加利亚居民被宣布为需要担负特殊义务的"赖雅"，也就是所谓的"瓦努加尼"、"代旺德纪伊"和"多冈德纪伊"，他们都要为土耳其当局完成一定的任务："瓦努加尼"在战时是土耳其军的辅助部队，在平时为苏丹看管马匹；"代旺德纪伊"驻守山隘以防盗匪骚扰；"多冈德纪伊"则

为苏丹的宫廷饲养猎鹰。“赖雅”完成了这些任务，就可以被豁免某些赋税并获得某些自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他们祖传的财产被肆意剥夺，额外的捐税、租赋和劳役又不断落在他们身上，其境遇仍然是每况愈下。

保加利亚的被征服，导致城镇手工业的衰退，108 也使作为经济中心的城镇趋于崩溃。只有少量保加利亚商人和手艺人留在城镇里，勉强应付着当地市场有限的需要。盛行的实物交易经济，阻碍了商品生产的提高；而且，当时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水平都很低，也不可能提出对商品的要求。十五、十六世纪时，城市经济之所以出现衰退，主要就是由于受到了土耳其军事封建制度的残酷掠夺。如果说还有一点对外贸易的话，也主要是由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一些外国商人经营的。他们从意大利北部的各个城市共和国输入工业品，又从这里输出农产品和原料，如谷物、羊毛、皮革等。

起初，昔日保加利亚的封建阶级中，还有一个人数极少的阶层留在城里，即所谓的知名人士和“韦勒毛兹希”。他们有的同土耳其当局狼狈为

奸，有的则把自己对征服者的敌意隐藏起来，因而得以将其一部分土地或一部分做买卖和放债的资金保留下来。尽管如此，这些保加利亚封建阶级的残存者，也逐渐被赶走，或遭杀害，或改信伊斯兰教而为土耳其居民所同化。在城镇居民中，还有一部分是杂居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当时的商业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

保加利亚被土耳其人征服后，保加利亚人民在土耳其当局的种族歧视和强制同化政策的残酷迫害下，处境更加恶化。土耳其征服者对其统治下的这些居民极端仇视，认为他们不仅在人身权利上不应享有平等地位，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低劣的，对待他们如同牲畜——“赖雅”。土耳其征服者还轻蔑地用“异教徒”这个名字来称呼被征服的基督教居民（包括保加利亚居民在内），并千方百计地强迫他们接受“真正的信仰”，即伊斯兰教。在保加利亚被征服后的头几十年中，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事件屡见不鲜。成千上万的保109加利亚人拒绝放弃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因为这是他们全民反抗征服者的力量源泉和具体表现；他们在反对伊斯兰教化的斗争中牺牲了。由于土耳

其封建统治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支柱是伊斯兰教，原来以鲍古米尔教派为主的反封建的异端运动，到了这个时期也就渐渐地消逝了。正相反，当时的英勇壮烈的事迹，却往往是凭着基督教信仰而做出的。1515年的索非亚金匠格奥尔基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他宁愿殉教而死，也不肯放弃他的基督教信仰。保加利亚被征服后的头一个世纪里，土耳其人就已强逼罗多彼山区的保加利亚居民改奉伊斯兰教；到了十七世纪，由于土耳其人增加了压力，保加利亚居民更大规模地被强行伊斯兰教化。尽管他们被迫改变信仰，罗多彼山区的保加利亚居民仍然保留了自己的语言、生活方式和文化，从而免于被土耳其人所同化。今日保 110 加利亚的伊斯兰—波马基人，就是由当时这一地区的居民发展而来。

土耳其征服者向保加利亚人民征收的赋税，要比向土耳其居民征收的重得多，这是歧视保加利亚人民和企图强行同化他们的又一做法。更有甚者，保加利亚居民还要缴纳一种名为“德夫沙尔美”的残酷的血贡税。这就是说，土耳其征服者每隔一定时间要征集一些保加利亚的小男孩，使

他们成为伊斯兰教徒，并不断地灌输以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和盲信精神，然后把他们送到土耳其步兵部队里去服役。这些人就是臭名远扬的土耳其近卫军（“雅内萨里”），后来成了土耳其征服巴尔干半岛的主力。土耳其征服者就是这样以保加利亚人民的血和汗来扩张其帝国和巩固他们对被征服者的统治。

保加利亚被征服后，保加利亚人民也失掉了他们教会的独立。图尔诺沃的总主教区被撤销，保加利亚的各个教区被置于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的管辖之下，后者与土耳其当局狼狈为奸，压迫和掠夺保加利亚人民。只有奥赫里德的大主教区得以暂时保持其独立，但以后也逐渐被希腊化了。

争取解放的初步努力　土耳其人在征服保加利亚后，继续四出侵略，以图征服巴尔干的其他国家。他们这时把矛头指向了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以及一度强盛而幅员辽阔的拜占廷帝国的残存疆土。他们还准备越过多瑙河，北上进犯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①。这样，保加利

①摩尔达维亚，Moldavia，在今日罗马尼亚境内的部分，现译为摩尔多瓦。——译者

亚的国土就变成了土耳其进一步扩张的跳板，从而使国家陷于新的经济崩溃，人民再度横遭洗劫。

尽管征服者残酷暴虐，保加利亚人民并不甘心于其政治独立的丧失。在被征服后的最初一些年月里，他们就已在寻找机会推翻土耳其人的统治，以摆脱土耳其封建统治阶级对他们的社会压迫和经济剥削。邻国抗击土耳其的战争，更使他们增长了谋求解放的希望。在1402年的安卡拉战役中，土耳其军队败于帖木兰（帖木儿）率领的鞑靼人，征服保加利亚的巴耶济德也被俘。他死后，他的几个儿子发生了内訌，巴尔干人民因此获得喘息之机，并积聚力量准备打击侵略者。

111

塞尔维亚国王斯特凡·拉扎列维奇摆脱了对土耳其的臣属关系。符拉克的总督米尔乔接着宣布反对土耳其。阿尔巴尼亚也加紧了对土耳其征服者的抵抗。在这种形势下，保加利亚两个末代君主的嗣子康斯坦丁（维丁沙皇伊凡·斯特腊戚米尔之子）和弗鲁津（图尔诺沃沙皇伊凡·希什曼之子），1403年在保加利亚西北部（主要是在提莫克河流域一带）发起了暴动。他们虽然在行动

上与塞尔维亚国王斯特凡·拉扎列维奇有所呼应，但未能同其他正在打击土耳共侵略者的力量——匈牙利人、符拉克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很好地配合起来。这次暴动终于被镇压了下去，巴尔干各族人民也没有能挡住土耳其人在内訌平息后继续发起的凌厉攻势。

1430年，土耳其新即位的苏丹攻占了萨洛尼卡，接着又为夺取君士坦丁堡进行了疯狂的准备，因为这座城位于土耳其欧洲属地的后方，是土耳其进一步向西扩张领土的障碍。土耳其人的再次出征，使毗连巴尔干半岛的各国的统治者大为震惊，他们组成了以波－匈国王弗拉基斯拉夫三世为首的联盟。参加这一联盟的，除波－匈外，还有塞尔维亚和以屡败土耳其人而闻名的詹·胡尼亚迪总督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

1443年，联盟的军队越过土耳其边境，经由尼什和索非亚，沿着从索非亚到普罗夫迪夫和亚德里雅那堡的古罗马大道，向色雷斯挺进。可是112当弗拉基斯拉夫三世的军队抵达西斯雷德纳戈腊山麓时，却发现特腊姜隘口已有土耳其重兵防守。他们企图从北面包围土耳其军队，但未能成功。

由于当时严冬已经来到，弗拉基斯拉夫的军队只好退回索非亚，以后又全部撤离了土耳其领土。翌年，双方又动刀兵。这一次，弗拉基斯拉夫三世的军队沿着多瑙河流域前进，其目的是先到黑海边的瓦尔纳，然后再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兵船的帮助下渡海去君士坦丁堡。在途中，他们攻克了维丁和多瑙河畔的尼科波耳要塞。就象第一次进军一样，这支基督教军队到处得到了保加利亚人民的积极支持，他们深信自己获得解放的时刻已经来到而一致行动起来。

联军一抵达瓦尔纳便发现自己受了骗而大失所望，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船只不但没有在瓦尔纳出现，反而帮助土耳其人把军队从小亚细亚运到了欧洲的黑海沿岸。这些土耳其人登陆后，便以急行军赶去与当地由新苏丹亲自统率的土耳其军队会合。结果，在瓦尔纳的一场激战中，兵力上相形见绌的基督教军队被打败了。

联军的战败也决定了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它由于大批土耳其军队从陆地和海上同时加以围攻而在1453年陷落。这对正在抗击土耳其征服者的巴尔干和东南欧的人民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沉重

打击。土耳其人攻下君士坦丁堡后，就在博斯福鲁斯海峡① 两岸驻军设防，严加守卫，然后又继续向西方和东方进犯。他们很快地就把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全部征服，并在十六世纪初又向匈牙利进兵。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被迫承认了土耳其的宗主权。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又继续东征，胜利地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阿拉伯的大部分土地和非洲北部。土耳其人凭着他们信仰113伊斯兰教这一点，自称为阿拉伯国家（当时都在近东）的继承人，以便利用这些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去征服中欧与东欧。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巨大扩张，使保加利亚人民的处境更趋恶化，也使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得到外援的希望越来越小。其时，保加利亚的国土已远离战线而位于庞大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内地；因此，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所有那些同土耳其作战的国家的军队，从来也没有能到达这里。这样，保加利亚人民由于在政治上被土耳其人所统治，在宗教上为君士坦丁堡总

①博斯福鲁斯海峡，the Bosphorus，即今日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译者

主教区所控制，身受着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最无情的民族歧视，再加上强制性的同化，已经面临着民族灭绝的威胁。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振作起来同征服者进行斗争，以保卫其民族生存。在异族统治下的黑暗岁月里，人民为了维护其生存，创造了各种新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形式。早在土耳其统治刚一开始时，名为“哈伊杜克”的武装支队就已在保加利亚土地上活动。这些支队给了霸占人民财产和践踏其人格的土耳其封建领主以罪有应得的惩罚，从而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也使他们对梦寐以求的解放没有丧失信心。与此同时，尽管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异常严酷，但在不少地方仍然自发地爆发了多次起义，这表明争取解放和摆脱封建剥削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在被奴役的黑暗岁月里，保加利亚人民中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俄国会担负起解放他们的使命。这种信念反映了人民对于解放的渴望，关于“伊凡老爷爷”的传说就是这一信念的体现。传说中的人物很可能是指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他执政期间，俄国挣脱了鞑靼统治，以后又逐步

发展成为一个信奉正教的斯拉夫强国——巴尔干信奉正教的斯拉夫各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俄国沙皇伊凡雷帝（伊凡四世）对喀山鞑靼汗国和阿斯特拉罕鞑靼汗国的征服，使俄国在保加利亚人114民心目中的威望更加提高了，也使他们更加坚信俄国一定会担负起解放他们的使命。这不仅是由于保加利亚和俄罗斯两个民族在种族上和宗教上同出一宗，而且还由于保、俄两国正主要通过教会和修道院逐渐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土耳其征服保加利亚后，许多保加利亚著名的教会人士和学者都到俄国去避难，并在那里的教会中担任了领导职务。其中，有莫斯科大主教西普里安和基辅大主教格里戈里·察姆勃拉克，后者是介绍保加利亚末任总主教的《埃夫提米行传》的作者。《俄罗斯圣徒行传》的作者帕乔米厄斯·洛哥瑟托斯，也曾在俄国避难。十五世纪末，保加利亚的里拉修道院同俄国的圣潘特累门修道院（位于阿托斯山上）签订了一个互助合同，从而把自己也置于热心保护阿托斯山俄国修士利益的莫斯科大公的保护之下。里拉修道院和保加利亚其他修道院的修士开始去俄国募集捐款。他们

回国后到处宣传“北方沙皇”的威力，从而使人民对俄国会来解放他们的信念进一步得到加强。

封建土耳其在进入十七世纪时的衰落 解放运动的加强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历经两个世纪的领土扩张和势力增长后，到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就进入了一个衰落时期，一个不断发生尖锐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的时期。土耳其的对外军事扩张到此也告结束。这一发展过程并不是突变的，甚至一度还曾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出现过平衡和变动的情况：土耳其先是前进，接着又在外敌的打击下后退。只是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这种平衡和变动的情况才为急剧衰落所代替；这时，土耳其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再也无法加以制止了。115

土耳其的衰落，可以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欧洲力量均势的变化中找到原因。从十六世纪末开始，土耳其之所以屡次战败，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以“斯巴希”（也就是军事封建地主）为基础的军事封建制度的解体。十七世纪初，随着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总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这种土地所有制开始衰落和崩溃。

早在十五、十六世纪，土耳其就已成为全凭武力支持的庞大帝国。它的生产力并不发达，尽管有些地区相当先进，但总的说来国民经济还是建立在实物交换的基础上。封建剥削的主要方式，是用实物或劳役交付的自然地租。战争中的掠夺和对别国强征贡品，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的生财之道。

土耳其虽然经济落后，但其生产力还是有所发展的，只不过是速度缓慢并极其有限而已。这是由于土耳其已成为中古最庞大的帝国之一，因此就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可供其任意支配。土耳其的城市居民有千百万人，行政机构臃肿，军队建制又庞大，所有这些都需要把大量工、农业产品组织起来供应市场。但实物交换的经济却不能充分满足居民和国家的需要，从而使为市场提供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简单商品生产得以逐渐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十六世纪时西欧正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这就使它与邻近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加速了。从那个时期以后，某些西欧国家如尼德兰、英国、法国等就同土耳其发生并日益扩大了经济关系。这些国家开始向土耳其输出工业产

品，并从那里输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116

新的商品、货币关系，首先发生在通商要道的附近地区和各大消费中心的周围地区，以后又渗透到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中逐渐起到重要作用的保加利亚。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破坏了建立在实物交换之上的土耳其军事封建制度的基础。由于部分农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土耳其封建领主开始对土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利用农民的劳动来发展农业生产。农产品也就在作为消费品的价值以外，开始具有更大的交换价值。这就使封建领主迫切地要求对土地拥有世袭权，以代替那种取决于其服役期的临时使用权；一句话，他们想要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以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支配。这样，从“斯巴希”土地所有制转变为世袭领地所有制的过程就发生了，而后者又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由此脱胎而来。从“斯巴希”土地所有制到领地所有制的过渡，意味着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被剥夺了承受和使用土地的权利，从而成为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叫作“赖泰”，也就是

佃农。土地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并为土耳其封建领主和那些拥有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的人所霸占。从“斯巴希”制度到领地所有制的过渡，也意味着农民处境的更加恶化及其阶级分化的愈益明显。

“斯巴希”军事封建制度的基础遭到破坏后，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到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时，它在技术上也较其对手落后了。117 土耳其帝国之所以开始一再战败，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对外征伐的屡遭挫折，也使土耳其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国家失去了额外的经济来源，并迫使他们加紧剥削被奴役的人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越是想从中解脱，就越需要加紧对被征服人民的压榨，但也就越发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在农业生产关系改变的同时，保加利亚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为了满足居民对工业品的需要，手工业生产和商业都加强了。简单商品生产的发展，使古老城镇附近出现了好几十个城市型或半城市型的新中心。供应市场的手工业品的生产，开始在这些新中心缓慢地发展

起来，它们也逐渐成了商业中心。在这些古老的和新兴的城镇里，生产出呢绒、棉布和各种服装，出现了鞣革、制皮、制鞋、原料加工等行业，也加工出毛皮制品、肉制品和奶制品。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都组织起行会，叫做“艾斯纳夫”，其任务是对生产进行调节并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当然，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一开始是非常缓慢的，几乎难以觉察；但这一过程却在不断地进行着，并逐渐地在社会和经济状况方面，以及在保加利亚人民谋求解放的斗争中，引起了一系列变化。城镇中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以后从简单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渡（大约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初这一期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有助于一个为数可观的保加利亚城市居民阶层的形成。古老的城镇中，保加利亚居民的人数又开始增多；在保加利亚各地，也逐渐形成了好几十个全部居住着保加利亚人的新兴城镇。

伴随着封建土耳其的衰落而来的，是保加利亚人民所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加强。国家为118了把无休止的侵略战争继续下去，不断加重常规

的和额外的赋税，而封建领主也日益加紧了剥削，使人民的处境每况愈下。不管住在那里，没有一个保加利亚人感到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尊严是有保障的。当然，在城镇中经济和人身还是比较安全的；但就是在那里，保加利亚居民也经常受到土耳其人的欺凌和蹂躏。商人特别遭殃，他们在贩运货物时，途中往往遭到袭击和抢劫。

土耳其的衰落以及被征服人民的悲惨遭遇，不仅为许多当时到过保加利亚的外国游客所目睹，也被土耳其统治阶级中一些比较明智的代表人物看出了，其中有一个是十七世纪一篇政论文的作者，格尤木季纳地方的库契贝。他在文中谈到军事封建采邑的解体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时，就这样写道："贫苦农民所遭受的压迫和暴政，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从未有过。"

土耳其统治阶级无力扭转国家的衰落，也无法避免军事上的失利，便对被征服的人民一味加强政治压迫和恐怖统治。凡是对进入保加利亚境内的外国军队表示同情或给予支持的人，无不受到残酷迫害。与此同时，对保加利亚人民的宗教歧视和强制同化也加强了。罗多彼山区、保加利

亚北部和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被大规模地强制信奉伊斯兰教，就是在十六世纪末，特别是在十七世纪发生的。

土耳其政权及其军事力量的衰落，被征服人民所受压迫和剥削的变本加厉，促使保加利亚人民加强了从土耳其征服者统治下争取解放的斗争。

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和身受重利盘剥而破产，这就更促进了“哈伊杜克”运动的发展。许多“哈伊杜克”支队，在其英勇统领的率领下，出现在保加利亚各地，特别是山区，毫不留情地处死 119 一切土耳其压迫者和掠夺者。每个“哈伊杜克”小组有战士十五至三十名，有时还要再多一些，在他们内部执行着铁的纪律。这是当时农民反抗土耳其当局残酷迫害的唯一道路。春天树木繁茂时，“哈伊杜克”战士纷纷进入森林，一直到晚秋时节才返回村庄和城镇，或在家里隐蔽下来，或同他们所信任并支持他们的群众住在一起，等到来年春天再上山。他们在山上有固定的会合地点，叫做“哈伊杜克集合点”，支队在此集合后便再度投入战斗。每个“哈伊杜克”支队都有一名旗手，他

是统领的副手。支队的统领,有时也由妇女担任。人民不仅无比热爱“哈伊杜克”战士，而且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地给予所有“哈伊杜克”战士以支持。无名的民间歌手则用成千首动人的歌曲歌颂了他们的英勇事迹，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哈伊杜克之歌”。许多坚强无畏的保加利亚人参加了“哈伊杜克”的队伍，同土耳其人作斗争,尽管他们知道很可能会因此而被送上绞架，施以刺刑或关进牢房。

“哈伊杜克”运动主要表现了农民对剥削和残害他们的土耳其封建领主进行反抗的阶级斗争。它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而只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但有时“哈伊杜克”的组织大量涌现，其行动超出了同土耳其封建领主和当局的局部冲突，也会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起到影响全国的重大作用。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解放斗争转入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暴动并蔓延到较大范围的时候。这时,“哈伊杜克”支队就会发展成为起义军的支队,或与起义军协同作战。

例如,1595年就曾有大约二千名“哈伊杜克”战士攻打过索非亚。有一个十七世纪的土耳其旅

游家兼作家埃夫利亚·切累比，也曾谈到过许多有关“哈伊杜克”支队袭击某些城镇或土耳其商队的事例，如有五百名“哈伊杜克”战士就对比托拉城进行过袭击，并占领了该城的“毕席斯顿”（搭 120 棚并设防的集市）。此外，埃夫利亚·切累比在随同一个商队经由希普卡隘口越过巴尔干山脉时，还曾亲自遇到过一次“哈伊杜克”的袭击。

十七世纪时，许多“哈伊杜克”支队在保加利亚西北部和北部行动起来了。参加这些支队的有破产并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有横遭土耳其当局和封建领主蹂躏与洗劫的保加利亚其他阶层。在此以前，即在十六世纪末，马其顿的普里累普地区还爆发过一场广泛的农民反封建暴动。十七世纪时，在马其顿和罗多彼山区也有“哈伊杜克”支队在活动。1575 年，帕纳吉尤里希特和西斯雷德纳戈腊山区骠悍善战的居民，发动了反抗土耳其当局的武装起义。在锡利斯特拉地区、保加利亚西部和其他地方，也先后爆发了农民暴动和骚乱。

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时期中，与自发的农民骚乱和“哈伊杜克”支队的活动同时，保加利亚还爆发了好多次有计划的起义。这些起义的

爆发，与土耳其同奥地利、波兰以及俄国作战中的一再失利有关。

最早的有组织的起义之一，是1598年的图尔诺沃起义，其目的是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次起义的爆发，与1593年开始的奥土战争有关。奥地利的一些指挥官和罗马教皇的代理人，为了取得土耳其统治下的信奉基督教居民的支持，号召他们在战争爆发前夕及其进程中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土耳其，并答应给予支持。掌握着同西方国家的大部分贸易的杜布罗夫尼克商人，成了奥地利指挥官和罗马教廷的代表。

奥地利军队多次打败土耳其人，为被征服的巴尔干各民族带来了巨大希望，特别是当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挣脱对土耳其的臣属关系并与奥地利联合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符拉克大公米哈伊尔·维提亚兹的军队渡过121了多瑙河，占领了土耳其在默钦、赫尔肖伐、锡利斯特拉、斯维希托夫、奥里亚霍伏等地的要塞，并扫荡了保加利亚北部的数十个土耳其村落。保加利亚人大为振奋，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反抗压迫者。保加利亚人组成的武装支队，在巴巴·诺伐

克的率领下，同符拉克的军队并肩作战。

奥土战争也促进了塞尔维亚南部、阿尔巴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的武装解放斗争的爆发。然而，由于奥地利军队未能给暴动者以援助，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失败并没有使解放运动结束，它已经蔓延到保加利亚和共他巴尔于民族之中。在保加利亚开始了全国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其领导者是知名人士托多尔·巴利纳、图尔诺沃大主教狄奥尼西·腊利和杜布罗夫尼克的巴维尔·卓尔季奇。他们为此进行了广泛的秘密串连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有图尔诺沃、洛佛奇、鲁塞、舒门和许多其他城镇的一大批保加利亚人，有保加利亚北部农民的某些代表人物，还有巴尔干山脉以南的山区居民。这些山区居民负责把守各个隘口，不让土耳其人从保加利亚的南部向北部调动军队。起义的组织者同符拉克大公和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取得了联系，他们都答应给予军事援助。图尔诺沃大主教访问了莫斯科，希望得到支援。奥地利皇帝也答应予以支持，但不久奥地利军队开始失利，支持的诺言也就落了空。尽管如此，起义还是在1598年爆发了。起义者把一个他们假

称是保加利亚末代王朝后裔的人，以希什曼三世的名义，立为保加利亚沙皇，并开始进行武装斗争。起义遍及保加利亚北部的图尔诺沃以及其他一些城镇和村庄。这次起义波及面很广，是在符拉克大公支持下爆发的。可是，不久就只剩下起义者孤军作战，土耳其人很快地就把他们打垮了。符拉克的军队撤回多瑙河以北之后，起义者只好放下了武器，成千上万的保加利亚人接着就逃亡122到瓦拉几亚，以免土耳其人对他们进行报复。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保加利亚人民的历史上却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为了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保加利亚而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起义，也是保加利亚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第一次明确的表现。

直到十七世纪，奥地利还在努力争取巴尔干各国信奉基督教的人民支持其政策。奥地利人处处与罗马天主教会步调一致，他们打着罗马天主教会的旗号，与之互相配合，广泛地开展了宣传。这一宣传的目的，是要把包括保加利亚人的巴尔干信奉基督教的人民置于罗马教廷的影响之下。在这方面，除杜布罗夫尼克的商人外，某些已经

信奉了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也给了奥地利和罗马天主教会很大的支持。

但是，尽管费力不小，罗马天主教的活动在保加利亚并未获得进展。保加利亚人坚信正教，并日益转向信奉正教的斯拉夫俄国寻求援助。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奥地利的统治阶级和罗马教廷才加紧宣传天主教；因为，他们不仅要争取对土耳其作斗争的同盟者，同时也想杜绝俄国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的影响。罗马天主教的宣传能找到市场的，只是在保加利亚北部和南部的保罗教派信徒中，以及在某些原来就有天主教徒的城镇（例如保加利亚西部的小矿镇契普罗夫戚，撒克逊矿工曾一度在那里定居过）。

波斯尼亚人彼得·索利纳特是方济各教会的修士，也是保加利亚的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士。他起先住在契普罗夫戚，后来成为索非亚的天主教主教。保加利亚南部和北部的那些保罗教派信徒聚居的村落，就是在他任主教时改信天主教的。他推荐了不少保加利亚青年去罗马深造，为的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传教士。这些人回来后，便在保加利亚继承了他的事业，其中就有保加利亚天主

教徒彼得·波格丹和彼得·帕尔切维奇。

123 应该指出，虽然这两个人是在保加利亚活动的天主教传教士，又是最著名的保加利亚天主教徒，但他们热爱保加利亚祖国的一片赤心却并没有泯灭。他们认为，只要保加利亚人民信奉了罗马天主教，就会得到西方各国、特别是奥地利的支持，因而也就能获得解放。这样，皈依天主教就成了保加利亚人民解放运动的一种表现，并被用来促进这一运动的发展。从伟大的保加利亚爱国者彼得·帕尔切维奇的活动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他以保加利亚东北部天主教大主教的身分，为争取奥地利、威尼斯和波兰支持保加利亚而奔走呼吁，表现得异常活跃。

由于这些活动，他被撤消了大主教的职务；可是，他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1646 年，土耳其同威尼斯为了克里特的所属权爆发了战争，有些保加利亚人又秘密地计划组织一次新的起义。他们向符拉克大公马特伊（马太）·贝萨腊巴要求支持，大公又建议他们向威尼斯和波兰求援。彼得·帕尔切维奇和一个天主

教修士被委派去向这些国家求援，但都没有成功。这并没有使保加利亚人、特别是帕尔切维奇气馁，他后来又不止一次地被委派到远近各国去执行同样的使命。

十七世纪后半期，土耳其军队在匈牙利和乌克兰西部被奥地利和波兰——哥萨克的军队打败。土耳其为了挽回其威望，于1683年出兵攻打奥地利，对维也纳进行了围攻；然而，他们却在那里又被波兰国王詹·索比埃斯基的军队打败，并在波兰和奥地利军队的打击下迅速撤退。1686年，俄国也加入了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的反土耳其同盟。这种局势使保加利亚人增强了解放祖国的希望，为起义而进行的准备又开始了。

保加利亚的故都图尔诺沃，是为这次起义作准备的中心。另一个假称是保加利亚皇室后裔的人罗斯提斯拉夫·斯特腊提米罗维奇自封为起义者的领袖。1686年，他到俄国去争取支持，起义也于同年爆发，罗斯提斯拉夫被拥立为大公。但土耳其军队很快就把他们打败了，罗斯提斯拉夫本人受伤，逃到巴尔干山区，后来就在里拉修道院里隐藏了下来。

124

两年后，即1688年，又在契普罗夫戚爆发了武装起义。这个小镇的居民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同附近信奉正教的村庄里的农民一起参加了起义。起义军组成了好几个武装支队，分别由格奥尔基·佩亚切维奇、伊凡·斯塔尼斯拉沃夫和路卡·安德列宁三位统领统率。可是，他们既无作战经验，装备又很差，因此就抵挡不住已投靠土耳其人并由大地主泰凯伊率领的匈牙利人的压力，起义也被镇压下去了。土耳其人对居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契普罗夫戚和周围参加起义的村庄都受到洗劫，焚为一片焦土，当地居民则横遭杀戮，或被赶出家园。很多保加利亚人被迫移居到瓦拉几亚和巴纳特，参加了奥地利人还在进行着的反抗土耳其的战争。

翌年，即1689年，奥地利军队在尼什打败了土耳其人，这在保加利亚的西部和西南部引起了新的动乱。当奥地利的一支先遣军到达马其顿的北部和中部时，那里就爆发了一场蔓延很广的武装起义，并根据起义的领导者的名字而被称为卡尔波舍夫起义。随着奥地利军队的东进，在皮罗特、贝尔科维察和维丁这些地区，也都爆发了武

装起义。

可是，保加利亚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再次遭到了失败。在奥地利军队撤走后，起义就都被镇压下去了。人民对奥地利的政策大失所望，因为唯利是图的奥地利在同土耳其 125 停战后，对十八世纪前半期始终继续着的保加利亚解放运动，不但不再给予支援，甚至还加以阻碍。于是，保加利亚人民又把解放的希望转而寄托于北方，俄国便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首次向保加利亚东北部的领土进军。

十五至十八世纪中期的保加利亚文化　保加利亚沦于土耳其统治下以后，它的文化发展遭到了严重摧残。教堂、修道院，几乎所有的要塞以及许多艺术或建筑方面的古迹都被破坏了，以免它们被人民在反抗征服者的斗争中加以利用。不少教堂被改成了清真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严禁修复旧教堂或兴建新教堂。珍贵的文献被焚毁，学者们也被驱逐出境。在此以前一直为兴修各种建筑和进行艺术创作提供充足财源的保加利亚封建统治阶级也被消灭了。不仅经管宗教事务、而且参与文化生活的教会，已经大部分为希腊人

所掌握，这时也在妨碍着保加利亚文化的发展。

保加利亚人民沦于土耳其统治下以后，尽管困难重重，他们的文化发展并没有停止。但这种文化，在其特征、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当时，它是在异族统治的条件下发展的，既丧失了广泛的物质基础，又由于种族和宗教歧视以及土耳其统治阶级强制同化保加利亚人民的压力而难以自由表达。然而，这时的保加利亚文化也日益通俗化并富有民主性。它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巩固其政权和统治的一种手段，而126成为人民用来反抗征服者的武器。它使人民始终保持着民族精神，也鼓舞着他们为争取解放而斗争。

在进入十七世纪时，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保加利亚文化的性质和成就都有所变化。除了沿袭中古传统以外，保加利亚文化中还出现了新的倾向。在这一时期，新的保加利亚语言出现了。一种更接近人民和更容易为他们接受的、新的保加利亚文学也开始出现了。它在题材上，既有宗教性的，又有世俗方面的。这些都反映了保加利亚人民物质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可是，

由于这些变化是缓慢地逐渐发生的，当时的文化生活还是在继续按照中古传统的精神发展着。

保加利亚人民陷于土耳其统治下以后，修道院成为保加利亚精神文化的主要中心。有些修道院倖免于劫难，还有一些后来也修复了。其中最著名的有里拉山脉的里拉修道院、罗多彼山区的巴奇科伏修道院，厄尔马河畔的波加诺伏修道院、马其顿的斯累普彻修道院、巴尔干山脉的埃特罗波累修道院和切雷皮希修道院，以及普罗夫迪夫附近的库克伦修道院。阿托斯山上的希林达尔修道院和佐格腊夫修道院，在这一时期保加利亚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这些修道院，特别是比较大的，还在一些城镇和村庄里设有分院。修士被派到那里去募集捐款或陪伴前来朝圣的人们。他们也在所谓的“私塾”① 里执教，这种“私塾”一般设在修道院或其分院内修士们的小屋里。在这里除写作和抄录一些教会的和其他宗教性的书籍外，还培训着神父、修士、学者、艺术家和木刻家。较大的修道院都

①“私塾”，Cell school，直译为“小屋学校”或“密室学校”。
——译者

同俄国的教会和修道院有密切联系，也不断派出一批批的修士去俄国募集捐款。这对于建立俄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直接的文化联系起了很大作用；保加利亚的文化发展，也因此而受到了俄罗斯文化的有益影响。

127 大约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除修道院及其分院中的“私塾”外，由世俗人兴办的“私塾”也开始在某些城镇和村庄出现了。在这些“私塾”中任教的往往是手艺人，他们在业余时间给一些孩子上课。可是，在这里只能是启蒙识字而已，因为所学的不过是有限的几本宗教书籍。教育的发展还是极其有限的。当时，在索非亚、皮罗特、弗拉查、斯科普里、普罗夫迪夫和契普罗夫茨，则有些较为知名的学校。

土耳其统治期间，保加利亚的民族精神始终没有泯灭的原因之一是，中古保加利亚在沦亡于土耳其前形成的古老的学术传统被保存了下来。保加利亚的学术继续得到发展，则主要是在修道院。在那里，修士们用斯拉夫——保加利亚语言缮写教会的宗教性书籍，并根据中古道德观念编纂了一些说教用的书籍。当时，学者中也有些人

不是教士。

在土耳其统治的头几个世纪中，比较重要的学术中心有马其顿北部的卡腊托伏城、索非亚、里拉修道院、埃特罗波累修道院（也称为“伐罗维托维茨”）和普罗夫迪夫区库克伦村附近的修道院。学者们除抄写教会的宗教性书籍外，也创作了一些作品，如基督教圣徒的行传、王公贵族的生平、有关人民生活中重大事件的故事、编年史等等。128

十五世纪末，有个名叫弗拉基斯拉夫·格腊马提克的塞尔维亚学者在里拉修道院工作。他写了一个故事，讲的是1469年把约翰·里拉的圣骨从图尔诺沃运回里拉修道院的经过，其中有叙述土耳其统治初期保加利亚人民处境的珍贵资料。

索非亚是十六至十七世纪初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当时在这里工作的学者之中，有佩尤神父，他写作了惨遭土耳其人杀害的索非亚金匠格奥尔基的生平；有马特伊·拉姆巴达里，他写作了因拒信伊斯兰教而为土耳其人杀害的另一个保加利亚人皮匠尼古拉的事迹；还有画家兼书写家皮门修士。上述的金匠格奥尔基和皮匠尼古拉

后来都被基督教会追认为圣徒。

一个佚名作者于十五世纪写的《保加利亚编年史》，谈到了土耳其对巴尔干国家的侵略。乡村神父梅索迪亚斯·德腊吉诺夫写的一部编年 129 史，则叙述了1657年罗多彼山区的切皮诺山谷的保加利亚人民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经过。索非亚地区米尔科伏村的彼得神父，也写了一部编年札记，记述了1683—1699年奥土战争中所发生的事件。

在国外，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学者格里戈里·察姆勃拉克外，康斯坦丁·科斯特涅奇基也以作家的身分活跃在塞尔维亚。他是保加利亚末任总主教埃夫提米的学生，并继承了埃夫提米所创立的文学流派。康斯坦丁·科斯特涅奇基写了一部颇有创见的论文字的书，以及一本塞尔维亚国王斯特凡·拉扎列维奇的传记。保加利亚被土耳其征服后，许多保加利亚学者分别到俄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去避难，并继续进行其著述。

印刷术传入后，在保加利亚除手抄本外，印刷的书籍也开始出现了。这些书是由保加利亚人在一些邻国出版的，因为那里有使用斯拉夫字母

的印刷所。1508年，在罗马尼亚的特戈维希太城，出版了保加利亚的第一部印刷的书，即修士 130 默卡里伊所著的一部祈祷书。这个修士在不久以后又出版了一本保加利亚文的福音书。截至1605年，在罗马尼亚各印刷所出版的保加利亚文书籍，就有二十多种。十六世纪后半期，一个名叫雅柯夫·特莱科夫的保加利亚人，又在威尼斯出版了一些书籍。1651年，第一部带有新的保加利亚语言成分的保加利亚书籍，也在罗马出版了。这本书名为《阿巴加尔》，是由天主教主教菲利普·斯塔尼斯拉沃夫编纂的。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埃德萨国王阿巴加尔的野史轶事，以及各种祈祷文。1714年，在维也纳出版了一本名叫《斯提默土格腊菲厄》的书，这是保加利亚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作者赫里斯托佛尔·热法罗维奇，是多伊兰城的一个保加利亚人。这是第一部印刷出版的写世俗内容的保加利亚书。作者把这本书从拉丁文译成保加利亚文，但在译文中还附有书评，强调了保加利亚人民和塞尔维亚人民的光辉历史，以及他们在土耳其统治下的悲惨境遇。热法罗维奇的书，充满了对压迫者的仇恨，并号召人民为争

取解放而斗争。这本书表明了作者是一个有觉悟、有卓见的爱国者，他不愧为大约半世纪后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时期的伟大人物希林达尔的帕伊西的先驱者。

在各城镇和各邻国印刷出版使用教会斯拉夫语和新保加利亚语的书籍的同时，宗教题材的手131抄本也继续在国内传抄。流传下来的十七、十八世纪手抄本，有四百五十种之多。这还仅仅是在此时期所写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已在土耳其统治下暗无天日的恐怖岁月里失散或毁坏了。

学者大胡子约瑟夫的作品，在保加利亚文学发展史上是一种新的创造。十八世纪时他在里拉修道院工作，翻译了萨洛尼卡修士达马辛·斯士迪特的大量劝人为善的教谕（这些教谕也就以他的名字而被称为《达马辛》）。其内容虽属于宗教性质，但所用的语言却接近于新保加利亚语，这就是大胡子约瑟夫的翻译作品得以在保加利亚识字的人民中广泛传播的原因。

这一时期里，保加利亚的艺术也获得了发展。由于财力上的限制和土耳其政权的压迫，当时兴修的建筑物规模都很小。土耳其征服者不让被奴

役的人民修建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公共和私人建筑物住宅，唯恐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京城图尔诺沃的宫殿和教堂（坐落在令人难以忘怀的察雷佛茨山和特腊佩济察山上），都在该城沦陷时被毁坏了。在察雷佛茨山上修起了一座清真寺，象征着土耳其统治的建立。索非亚、奥赫里德和其他城镇中，清真寺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建筑物也在保加利亚教堂的废墟上或其附近建立起来。

在土耳其统治的头几个世纪里，保加利亚人民只被允许修建一些小型教堂，而且还要修在远离戒备森严的土耳其当局的地方。在这一时期里，又修复或重建了一些修道院并存留迄今，诸如巴奇科伏修道院、波加诺伏修道院、克雷米科符戚修道院（在巴尔干山脉）和罗仁修道院（在皮林山区）。图尔诺沃区阿尔巴纳西村有些保留至今的房屋，也是建于十七世纪，其内部装饰富丽堂皇，房间布局不落俗套，十分引人注意。这些房屋都 132 是由那些在富饶的图尔诺沃地区贩卖牲口和农产品的富商修建的。

当时的一些教堂里都装饰着壁画和圣象，并有着许多华丽精致的雕刻。各地的圣象画家中，

有些颇为出名，他们留下许多艺术作品，一直保存到今天。斯累普彻修道院、奥赫里德的圣克利门特教堂和阿尔巴纳西的圣乔治教堂里的雕刻，都以其技艺出众而著称。特别是罗仁修道院里的雕刻，更是当时最优秀的杰作之一。

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中期，保加利亚人民的文化，也表现在许多反映了人民集体创作天才的作品之中。这些作品包括民歌、民间故事和传说，表现了人民的精神生活、思想感情和理想。保加利亚人民的民间传说特别丰富，它通过诗歌形式表现了对侵略者的反抗，反映了被奴役的苦难，并歌颂了人民的保卫者“哈伊杜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传说中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英雄克拉列·马尔科为主要人物的。在这些诗歌里，不但表现了保加利亚人民对土耳其征服者的仇恨，也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土耳其征服者的高度蔑视。

第六章　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保加利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133]　十八世纪后半期，一个新的历史进程的最初的明显征兆在保加利亚出现了，这就是民族意识的复苏和保加利亚民族的再生。到了十九世纪头几十年期间，这一进程加快了。民族解放运动逐渐形成，其矛头指向来自外国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旨在摧毁残暴的土耳其封建制度，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保加利亚。

这个运动构成了保加利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个时期。它是保加利亚民族民主革命的各种有利条件逐渐成熟的时期，也是发生着深刻的文化变革并为争取独立、自由和民主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时期。

这一运动是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是当时保加利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土耳其封建制

度的解体，以及在此制度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构成了这个运动据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134 土耳其在征服保加利亚后所建立的军事封建制度，早在十六世纪末即已开始解体，而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和十九世纪前半期，这一解体的过程就更加快了。其主要原因是：新的生产力在保加利亚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在城乡经济中的扩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衰朽的军事封建制度内部的出现。

土耳其封建领主凭借暴力、残酷行为和贿赂，又倚仗其统治地位和遍及土耳其帝国的无法制状态，把他们按照采邑制占有的部分“斯巴希”领地变为其世袭领地，称之为“契夫利克”。十九世纪初，这种军事采邑制既已土崩瓦解，又严重危及帝国的军事力量，土耳其政府就在1832年把它废除了。当然，政府在实施这一改革时，还是竭力维护了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被迫缴纳一种新的特别税，以供养昔日的“斯巴希”领主。在保加利亚的某些地区，经改革之后，土耳其封建领主把原来按照采邑制占有的领地变为私有庄园，强迫

农民在苛刻的条件下为之耕种。

“契夫利克”是一种奇特的土地占有形式，它把封建的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掺合在一起。土耳其封建领主强迫农民以无偿劳动为他们耕种“契夫利克”，或把这种土地的一部分以非常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同时，他们也借助于雇佣劳力，自己耕种一部分“契夫利克”。这种雇佣劳力被称为“赖泰”、“莫姆戚”或“阿加提”。每当夏季，在收割庄稼、晒制干草和打谷期间，数以千计的农民就从山区来到多布罗加、色雷斯以及保加利亚其他农业地区，在土耳其人的“契夫利克”当雇工。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契夫利克”的领主们把愈来愈多的农产品送往市场。这就促使他们扩张自己的“契夫利克”，加紧对农民的 135 剥削和掠夺，并变得更为专横暴戾。

土耳其军事采邑制的解体，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又艰难的过程。在建立了专制统治并对基督教徒实行野蛮歧视政策的情况下，土耳其封建领主随时都可以把农民的全部土地攫为己有。尽管如此，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仅仅是一部分军事采邑的领地，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缓慢，而且在封建

专制的土耳其又毫无法律或秩序可言，被变成了“契夫利克”。封建统治阶级既然能任意掠夺保加利亚农民的产品，也就完全丧失了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当时，绝大多数土耳其封建领主，宁愿闲散终日，凭暴力致富，而不愿从事经济活动。

经过1832年的改革以后，有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被留在保加利亚农民手中。但是，仍有大量农民被夺去土地，他们不得不以向地主缴纳收成的一半为条件来租种土耳其的“契夫利克”。

在分崩离析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农民过着艰难悲惨的生活。欧洲再没有另一个地方的农民像他们如此横遭抢劫和摧残。凡是有机会对保加利亚人民的生活进行观察（即使是表面的观察）的外国游客，都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从土耳其的官方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土耳其封建领主对无力自卫的农民一贯专横暴戾，无恶不作，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保加利亚农民的苦难，还不仅仅来自封建领主的剥削和暴行。土耳其封建政府本身，作为国内的头号封建领主，也对农民进行着无情的剥削。

强加在保加利亚人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无偿徭役，名目繁多，不堪负担。在各种赋税中最重的是什一税，其征收过程往往伴随着种种敲诈勒索和残暴行径。结果，从农民手中收去的产品往往不是[136]十分之一，而是一半。即使在缴完这些重税之后，其剩余部分也并不能由农民自行支配。负责为国家征购粮食的官吏，强迫农民按规定的低价出售产品。此外，土耳其当局的官吏们还任意闯进保加利亚农民家里，白吃白喝，甚至蹂躏妇女。

十八世纪后半期至十九世纪前半期，农民和土耳其封建领主之间的阶级矛盾高度激化，引起了一系列自发的农民起义。土地问题成了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土耳其的压迫下首当其冲，使保加利亚的民族革命带上了群众性和反封建的性质。

工商业的发展，是缓慢而不断地破坏着土耳其封建制度基础的主要力量，也把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引上了历史舞台。十八世纪后半期，保加利亚的城市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增加了，劳动分工日益明确，手工业者

与国内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新的手工业也出现了。当时，还出现了头一批使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企业，虽然为数不多，却标志着保加利亚工业发展的新趋向。

商业也发展了。商品流通虽受到土耳其封建制度的阻碍，仍在保加利亚逐步扩大。除了为数众多的地方集市外，还出现了象在乌宗焦伏和斯利文两地举办的那种大集市。参加这些大集市的商人，年年络繹不绝，他们不仅来自保加利亚各地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不同地区，甚至还来自法国、奥地利、英国、俄国和意大利。在一些保加利亚城市中，富商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他们同希腊、俄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业界都建立了贸易关系。

137 以法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一方，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属国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贸易的迅速扩大，对于土耳其封建制度的瓦解及其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愈来愈多的商船从西方各国来到东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的一些港口。保加利亚的疆土逐渐被纳人了西欧的贸易网。西欧商品输人保加利亚

的数量不断扩大，而保加利亚的农产品以及后来某些手工业品的出口量也增加了。

但是，土耳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冲突，却阻碍了保加利亚经济的发展。军事采邑制的解体，引起了土耳其封建军队的全面崩溃。占很大比例的小封建领主日益贫穷，在战乱年代连维持生活都有困难，更不愿去服兵役了，这就使“斯巴希”部队大为削弱。同时，土耳其军队的主力近卫军也在瓦解之中。近卫军人陆续成家，把心思转到聚敛财富上；他们变得纪律涣散，也丧失了昔日的尚武精神。这些贫穷的小封建领主和近卫军人，只要有人肯给他们较高的饷银和更多的战利品，就甘心为之服役或作战。大封建领主利用这种情况，组成了自己的强大武装部队，拒绝服从中央政权，进而与之发生冲突。

土耳其在军事上的衰落，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它同俄国的几次战争中明显地暴露出来。它接连遭到惨败，失去了黑海北岸从库班河到第聂伯河的全部属地。

这些军事上的失利以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全面崩溃的危险，迫使苏丹塞里姆三世及其大臣对

军队进行改革，逐步以征募人伍的正规军代替了“斯巴希”骑兵和近卫军步兵。

这些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而是为了巩固它。尽管如此，它们却遭到了多数土138耳其封建领主的反对，因为他们看到，正规军的建立，将会加强中央的权力，而使他们的分裂割据活动从此告终。近卫军人也看清了所面临的威胁而哗变。至于被统治的各民族，他们当然不能指望从这些改革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为了将这些改革付诸实施，土耳其政府还把新的苛税和徭役强加在巴尔干各基督教民族的身上。

在因反抗这些措施而叛乱的封建领主中，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是维丁的副总督奥斯曼·巴兹温特沃格鲁。他大量网罗心怀不满的封建领主、近卫军人和其他叛乱分子，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割据了保加利亚北部的大片土地。他在维丁重重设防，多次击败了苏丹派来的讨伐军，并在那里割据称雄到1807年身死为止。

保加利亚的疆土，成了叛乱的封建领主和中央政府之间、以及互相争霸的各封建领主之间进行激战的主要场所。而且，无论是叛乱的封建领

主的军队，还是苏丹派来的讨伐军，都在城乡各地恣意蹂躏，纵火劫掠，其疯狂暴虐，如出一辙。

各封建领主之间互相争霸不休，中央政府企图压服他们又归于无效，这就为形形色色匪帮的组成创造了方便条件。这些匪帮是由小封建领主、近卫军人以及其他种种不法分子组成的，统称为“库尔查里伊”。他们蹂躏全国，袭击城乡，洗劫并残酷地屠杀和平居民。许多保加利亚的城镇和村庄，如科普里符希提察、特特文、卡洛弗、帕纳吉尤里希特等，都毁于这些嗜杀成性的匪徒之手。

封建领主之间的混战，“库尔查里伊”的烧杀抢劫，以及纪律败坏的苏丹军队的种种暴行，在保加利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城镇和村庄被洗劫焚毁，居民则横遭屠杀或逃往外地，许多教堂也被毁坏了。其结果，早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就已开始的工业发展突然中断，贸易也衰落了。

在持续达十五至二十年的封建领主混战和“库尔查里伊”匪祸之后，出现了比较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条件。保加利亚手工业大为繁荣，特别

是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末更甚。由于引进了较为完善的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企业的数目增加了。1834 年，在斯利文城创立了保加利亚的第一座纺织厂。在其他一些城市中，也涌现了一批小型工厂企业。尽管有外来的竞争，但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手工业商品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广大市场上还是能迅速地得到暢销。

然而，土耳其封建制度却是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无法克服的障碍。整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境内，毫无法律或秩序可言，专横暴行遍及全国，工业家及其资本和企业都得不到任何安全保障。例如，斯利文那家纺织厂，就是在开办几年之后被土耳其政府从其厂主保加利亚人多布里·热利亚斯科夫手中夺去的。1839 年苏丹以颁布“御园敕令”开始了他的所谓“革新时代”，其中煞有介事地许诺：帝国的全体臣民，不分信仰和民族，其生命、财产和荣誉均将获得保障。但是，到头来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工商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成分对农村经济的渗透，在社会生活中引起了重大变化。一些

保加利亚古城，如索非亚、图尔诺沃、普罗夫迪夫等，过去曾作为土耳其的军事和行政中心，如今又成为活跃的经济中心。工商业的发展，把周围村庄的一大部分人口吸引到城市中来。这些保加利亚居民的迁入，不仅使城市规模扩大，而且使市容也随之改观。过去，外国旅游者总把保加利亚城市描绘为土耳其化的城市，而到了十九世纪前半期，他们却着重描写其保加利亚特色了。与此同时，一些新城市也出现在巴尔干山脉两侧，并迅速发展成为活跃的经济活动和文化生活的中心。随着城市生活的发展，资产阶级已作为一个新的阶级而逐渐形成，并日益起到重要作用。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随着这个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而开始了。 140

要对人民群众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道路上所必须克服的巨大困难有所了解，就必须首先对这一时期的保加利亚社会结构加以探讨。

截至十八世纪，保加利亚存在着两个主要阶级：土耳其封建阶级和保加利亚农民。城镇中虽有商人和手工业者，但为数甚少。十八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十九世纪前半期，土耳其封建阶级和

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成了保加利亚最有势力的阶级。保加利亚农民则开始了阶级分化的过程，他们不再成为一个整体。至于土耳其农民，他们在法律上和社会上所处的地位，要比保加利亚农民优越得多。而且，由于若干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被灌输以宗教狂热和对“异教徒”的仇恨，这些土耳其农民还支持封建阶级。因此，保加利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每一次尝试，不仅遭到了土耳其封建国家的镇压，而且也遭到了充满宗教狂热的土耳其籍城乡居民的反对。

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保加利亚资产阶级身上。他们在经济上是软弱的，在政治上又是分裂的。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所谓的“乔尔巴德日”①，总是与土耳其封建阶级狼狈为奸，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经济活动中得到较多的自由，也才能保全其财富。这些“乔尔巴德日”剥削和压迫群众，对民族解放运动不仅不予支持，141 反而加以阻挠。因此，人民对他们十分仇恨。中等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则具有一定的

①“乔尔巴德日”，Chorbadjis，土耳其文，意为有钱的老爷，直译为给汤 (chorba) 的人。

爱国热忱和革命精神，他们对“乔尔巴德日”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新的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主要产生于这一部分人之中，他们用民主思想指导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运动的领导者。

保加利亚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除土耳其封建国家外，还遇到了另一个凶恶敌人——上层希腊教士。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所委任的主教，一贯推行反保加利亚的政策。他们也充当了力图同化保加利亚人的一些希腊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工具。

总的来说，这就是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概况；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并于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中期不断成长壮大的。必须强调指出，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历史的发展，赋予保加利亚人民以下列任务：把分散的地区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立自己的民族教育事业；从土耳其封建制度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以及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的精神枷锁下解放自己。实现了这些任务，就能为保加利亚的进步及其民主发展扫清道路。

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　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理论家是希林达尔的帕伊西。他才识过人，无限热爱被压迫的保加利亚人民。他是第一个掌握了保加利亚的社会发展新趋势的人，也是第一个能鲜明地把它们表达出来并为自己的同胞指明解放道路的人。

142　帕伊西于1722年出生在马其顿的班斯科城。1745年，他进了阿托斯山上的希林达尔修道院，并在那里产生了撰写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想法。帕伊西给自己提出的这项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当时，教育正处于最低水平，保加利亚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也都在忙于翻译或编写宗教书籍和简短的编年史。要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加以发展，根本就没有可能。他用了很长时间搜集有关保加利亚的史料，历尽辛劳，终于在1762年写成其名著《斯拉夫—保加利亚史》。

这部历史著作，无论是从实质上或从内容上来说，都与过去的保加利亚著作迥然不同。全书自始至终充满着伟大而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向保加利亚人民发出的一个响亮的号召，要他们认识到自己乃是一个民族，并召唤他们起来对

压迫者进行斗争。

在这部书的引论中，帕伊西教导他的同胞要爱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祖国和保加利亚人这一称号，教导他们决不要以称自己是保加利亚人为耻。帕伊西写道，每一个保加利亚人，都应当懂得自己的语言，应当学会读保加利亚文，学会写保加利亚文。他严厉地谴责了有一些同国人——通常都是些富人，这些人因为希腊人比他们有钱，而且文化水平也较高，就耻于称自己是保加利亚人，而一味追求希腊化，甚至自称为希腊人。

帕伊西还在这部书里向保加利亚人讲述了祖国的光辉历史，如中古的保加利亚王国的伟大业绩，对拜占廷作战的多次胜利，保加利亚军队的勇敢精神和英雄气概，创造斯拉夫——保加利亚文学和文字的西里耳与梅索迪亚斯两兄弟的巨大学术贡献，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历史事件。他想借此唤醒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因为他们在四个世纪的异族野蛮统治下已经濒临绝境，他们陷于贫困和文化落后，他们已因受尽凌辱而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他们也已忘记了本民族在历史上的业绩。

143 帕伊西把保加利亚人民在异族压迫下所处的卑贱地位，与保加利亚在克鲁姆、西美昂以及其他一些中古伟大君主治理下的强盛和荣耀进行对比，其目的是要鼓舞保加利亚人民，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并能在争取其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中，勇往直前，坚定不移。

帕伊西的这部书写得言简意明，所用语言与人民群众的口语较为接近。"为了淳朴的保加利亚人民，"他写道，"我写了这本淳朴的书。"由于当时保加利亚还没有印刷业，这本小书全凭手抄本传遍四方，读者很广，对保加利亚人民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正如民族诗人伊凡·瓦佐夫所说的那样，这部书是第一个火花，它点燃了以后保加利

144 亚民族解放斗争的燎原烈火。

在希林达尔的帕伊西的头一批后继人之中，最有才华的是斯托伊科·弗拉基斯拉沃夫。1739年他诞生于科特尔城，在那里担任神父和小学教员约二十年。1765年，他在科特尔遇见了希林达尔的帕伊西，当时帕伊西正携带其名著遍游全国。这次会晤，在科特尔城的这位青年神父和小学教员的一生中起着重大作用。他把帕伊西的史书抄

写了好多本，并把其中之一留在当地教堂，建议把它当作一本圣书保存在那里。

由于土耳其当局的残酷迫害和折磨，斯托伊科·弗拉基斯拉沃夫被迫离乡背井，历尽苦难，后来又移居到保加利亚北部。1794年，图尔诺沃的希腊大主教收了他一大笔贿赂，把他委任为弗拉查教区的主教。在他任主教时，斯托伊科·弗拉基斯拉沃夫以弗拉查的索弗罗尼厄斯（这是他刚当修士时所取的名字）而闻名于世。

土耳其封建领主之间的混战，当时正达到极点。弗拉查的索弗罗尼厄斯冒着生命危险走遍整个教区，用保加利亚语向教民布道。巴兹温特沃格鲁手下的人把他掳到维丁，并几乎把他当作囚犯来对待。但他终于设法离开了保加利亚，移居到布加勒斯特致力于写作。同时，他也为争取俄国帮助解放保加利亚的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45

弗拉查的索弗罗尼厄斯写了一部自传，名为《罪人[1]索弗罗尼厄斯的生平与苦难》。无论作为文学作品或历史文献，这部著作都极为重要。它

①按基督教教义，人皆生而有罪孽，故其教徒有时以罪人自称。——译者

文风朴实，感情真挚，其中对保加利亚人民和作者本人所经历的苦难的描述，读者阅后无不为之感动。在世界文学宝库之中，也许没有第二本书能像索弗罗尼厄斯的自传那样，把野蛮的土耳其封建制度暴露得如此充分有力，如此触目惊心而又如此令人信服。

弗拉查的索弗罗尼厄斯的事业，由约阿基姆·库尔乔夫斯基和基里尔·佩钦诺维奇两人继承了下来，他们都出生于马其顿并一直在那里工作。这两个人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写作并出版了几本宗教性的训诫世人的书，在保加利亚西部流传甚广。

保加利亚人民，不管怎样遭受压迫和陷于绝境，也不管有多少次曾对美好的未来失去信心，从来也不甘心忍受外来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随着土耳其封建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矛盾的加深，他们对于土耳其封建领主的剥削、掠夺和暴虐的不满与反抗也日益强烈。

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民族革命运动，但是保加利亚人民的反抗却采取了多种形式。农民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不断地在暗中

对封建领主进行着斗争。同时，“哈伊杜克”运动也发展了。一些无所畏惧的农民、商人和工匠，再也不能忍受土耳其封建领主的掠夺和蹂躏，他们离开家庭，辞别亲人，进入深山，组织起武装的“哈伊杜克”支队。人民把“哈伊杜克”看作自己的保护者，歌颂他们的英雄事迹。在广泛流传的一些民歌中，女统领（如西尔玛、博伊卡等等）与那些著名的男统领（如斯特腊希耳、查夫达、马努什、卡腊·塔纳斯等等）同样受到了颂扬。146 这表明了土耳其统治时期保加利亚妇女的大无畏气概和酷爱自由的精神。

这一时期中，保加利亚人民还以参加俄土战争和参加相邻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作为反抗土耳其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另一种斗争形式。

俄国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和十九世纪的几次对土战争，尽管沙皇政府旨在征服土耳其，却都起到了进步作用。俄国军队的每一胜利，都削弱了多民族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并推动了各个被征服民族的解放斗争。西方某些历史学家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一味强调俄国的目的在于征服土耳其。但是，当时被征服民族的斗争是为了推翻异族统

治和废除封建制度，否认俄国胜利的重大进步意义，也就意味着无视这些胜利与上述斗争之间的联系。

保加利亚人民满怀解放的希望，迎接1768—1774年俄国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一个在俄军中任上校的保加利亚人科腊津来到保加利亚，在被征服民族中散发了《俄军最高统帅部宣言》，号召保加利亚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俄国军队向保加利亚北部的进军，得到了居民的支持；保加利亚的游击队，也在伟大的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指挥下，参加了科兹洛加战役。

1774年在丘朱克—开伊纳季签订的俄土和约，对保加利亚人民的处境并无任何改善。但是，俄国的胜利，它已赢得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境内各基督教民族的保护权这一事实，以及保加利亚人民的参战，都进一步增强了保加利亚人民对这个伟大的斯拉夫国家所肩负的解放使命的信心。

因此，当一场新的俄土战争在1787年爆发时，保加利亚人民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积极地支持了俄国军队。

147 保加利亚人认为，从土耳其压迫下争取解放

的斗争，是一切被征服基督教民族的共同事业。因此，他们同情塞尔维亚的解放运动；当1804年以卡拉·格奥尔基为首的塞尔维亚起义爆发时，由康多和佛耳科两统领率领的保加利亚支队，就参加了塞尔维亚起义者的战斗。

同时，保加利亚的爱国人士也在竭力争取俄国的支援。弗拉查的索弗罗尼厄斯，就领导着争取在俄国的帮助下解放保加利亚的运动。在他的协助下，两名代表被从保加利亚派往彼得堡，他们到了那里才得知塞尔维亚也派去了特使。

保加利亚人和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斗的塞尔维亚人，以巨大的热情欢迎俄国在1806年又一次对土耳其宣战。在这场时断时续直至1812年才结束的战争中，保加利亚人积极参加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他们以陆军的名义组成了保加利亚志愿支队支援俄军。在攻克锡利斯特拉要塞的战役中，这些保加利亚志愿支队都表现得异常英勇。当时，弗拉查的索弗罗尼厄斯正在罗马尼亚避难，他组织了一个与俄军最高统帅部联系的保加利亚委员会，热烈呼吁保加利亚人民把俄国军队当作解放者来欢迎。

拿破仑一世准备对俄作战，迫使俄国政府结束了对土战争。这就使“波尔特”[1]得以把塞尔维亚起义镇压下去。但维也纳会议后不久，日益崩溃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爆发了新危机。塞尔维亚人民奋起斗争。在俄国的援助下，部分塞尔维亚领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1821年，希腊民族革命开始，危机就变得更加尖锐了。

希腊人民从土耳其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下争取解放的斗争，在欧洲各国进步人士中引起了深切的同情。保加利亚人民不仅对正在为自由而战148的希腊人民寄以同情，而且还广泛地参加了希腊人的起义。因此，土耳其当局所实行的恐怖政策，不仅指向希腊人，也指向保加利亚人。许多保加利亚爱国者在土耳其人的报复下牺牲了。尽管如此，保加利亚人民还是组成了一些志愿支队，协助起义的希腊人民。其中有一队开赴罗马尼亚，当时在俄军中任军官的希腊爱国者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正在那里组建一支军队，以便对土耳其作战。另一些保加利亚支队则向南开往希腊。保

①波尔特，Porte，土耳其皇家政府，由“崇门”或“高门”引出此名，指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总部。

加利亚志愿人员多次参加了希腊起义者对土军进行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由哈治·赫里斯托、彼得·莫腊利亚和哈治·米哈伊尔所率领的支队，表现得尤其出色。

土耳其人在镇压希腊起义过程中暴行累累，激起了欧洲进步人士的莫大义愤。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再次对土宣战。俄军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都迅速地获得了胜利。由迪比耶奇·扎巴耳坎斯基指挥的多瑙河一线的俄军，越过了巴尔干山脉，并在攻克亚德里雅那堡后，直接威胁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英、法两国为俄军的迅速获胜所震惊而开始准备参战，这才使土耳其倖免于彻底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停止了军事行动，于1829年在亚德里雅那堡与土耳其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一和约，一个独立的希腊国诞生了，它包括了几乎全部希腊领土；而塞尔维亚、符拉克、摩尔达维亚等公国，也都得到了较大的自治权。

保加利亚人民积极参加了这场俄土战争。由当时在俄军中担任军官的科特耳人格奥尔基·玛玛切夫所指挥的一支保加利亚志愿支队，在攻克

锡利斯特拉要塞的战役中立下了特殊功勋。起初，俄国政府想把保加利亚也建成一个自治的公国，但英国坚决表示反对，它担心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会因而增强。1829年格奥尔基·玛玛切夫 149 企图在保加利亚组织起义，俄军最高统帅部拒绝给予支持，其原因也在于此。

亚德里雅那堡条约签订和俄军撤退后，数以万计的保加利亚人，由于怕遭到土耳其人的报复而离开故土，移居到瓦拉几亚和比萨拉比亚。从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当年保加利亚人欢迎俄军之热烈及其参战范围之广。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的民族解放运动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这一期间，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果，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富裕；一个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在城镇中形成。这两者开始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资本主义性质的保加利亚社会与土耳其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特别是在衰朽的军事采邑制于1832年废除之后，保加利亚农民与土耳其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就更

加尖锐化了。

在此期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继续衰落。西方各国在1838年强加于土耳其的不平等通商条约，进一步破坏了它的经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首相拉施特帕沙① 和其他一些开明的土耳其封建领主，曾多次致力于革新，但几乎都是一无所成。顽固、僵化而又日益腐朽的土耳其封建制度，原封未动，继续成为进步和文明的巨大障碍。同时，埃及的脱离土耳其而独立，塞尔维亚、希腊、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相继建立公国，又使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几个最富庶的行省。沙皇俄国以及土耳其的西方对 150 头英、法两国，便乘帝国衰微之机，进一步对"波尔特"施加了压力。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这一期间，民族解放运动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创办了一所保加利亚本民族的世俗学校。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属巴尔干各行省中，就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而言，保加利亚所处的地位最为不利。它位

①帕沙，Pasha，土耳其文武高级官员的称号。——译者

于帝国内地，在同较为先进的欧洲各民族建立贸易关系和文化联系方面，比巴尔干其他国家要晚得多。此外，保加利亚是狂热的土耳其移民最密集的地方，与帝国首都的距离也最近，因而所受的掠夺和剥削也就最残酷。截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整个保加利亚没有一所实施世俗教育的学校，没有定期报刊，印刷出版的书籍也屈指可数。当时所有的仅仅是前一章所述及的“私塾”而已。由此可见保加利亚人民当时在文化方面的落后。

随着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出现，产生了对世俗教育的需要。算术、地理、博物学、化学、物理、外语等，已成为保加利亚的商人、工厂主和手工业者所需要的知识。由于没有保加利亚人自己的世俗学校，富裕的工商界人士只好求诸于希腊人办的世俗学校。这是由于希腊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比保加利亚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早得多，他们不仅在希腊，而且也在一些较大的保加利亚城市中开办了世俗学校。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很有利于教育的普及。但与此同时，这些学校也起着使保加利亚人丧失其民族性的作用；许多保加利亚富商子弟，一旦从希腊学校毕业，就以

希腊人自居，逐渐忘记了自己是个保加利亚人。151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爱国心的工商界人士也就产生了创办保加利亚世俗学校的想法。

首先提出创办一所现代化保加利亚学校的，是卓越的保加利亚学者和教育家彼得·贝朗博士。他在十八世纪末出生于科特尔城，后来在西欧受过良好教育。贝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自己民族的教育事业。1824年，他出版了一种初级读本，篇幅虽小，却极其重要，其中还提出了改造保加利亚教育的计划。贝朗坚决反对办“私塾”，建议创立现代化的保加利亚学校，讲授人文学和自然科学。他并建议采用当时新出现的贝尔——兰开斯特教学法。

乌克兰学者于里·伊凡诺维奇·维涅林（1802—1839年）的著作，对保加利亚的教育运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保加利亚人民的历史、文学和民间传说。为了进行研究工作，他走遍了保加利亚全国；每当遇到受过教育的保加利亚人，他就鼓励他们为推进本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而贡献力量。维涅林于1829年出版了他的名著《保加利亚人的今昔》的第一卷，

这部书对侨居俄国和罗马尼亚两地的、受过教育的保加利亚商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贝朗关于创办一所保加利亚世俗学校的想法，由1789年生于加布罗沃的瓦西耳·阿普里洛夫实现了。阿普里洛夫十一岁时，就和他的许多同胞一样，离开了保加利亚，侨居于莫斯科，并在那里的希腊学校读书。后来，他到维也纳一所大学学医，但因病辍学又回到俄国，成了一个商人。他以巨商身份长期支持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他自己也已希腊化了。但在日益高涨的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他曾熟读其著作的于里·维涅林的影响下，他决心为促进自己民族的文化发展贡献力量。1835年，他在加布罗沃创办了第一所保加利亚世俗学校，当地的一些知名商人 152 如尼古拉·帕拉乌佐夫、穆斯塔科夫兄弟等，都提供了帮助。保加利亚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尼奥菲特·里耳斯基，被指定为这所学校的校长。

加布罗沃学校成立后不久，类似的学校也在保加利亚其他城市纷纷出现。1840年，在普列文还开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大约在十九世纪中期，一个相当稠密的学校网已在保加利亚全境建立起

来。课程设置也同时得到了改进。其时，还出现了第一批保加利亚的中等学校。

俄国人民的帮助，对于保加利亚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许多保加利亚青年遵从阿普里洛夫的劝导，到俄国去上中学和大学。这些爱国青年回到保加利亚后，就致力于教育自己的同胞。俄国社会还为这些保加利亚青年提供了物质援助，诸如在某些学校中设立奖学金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等等。

保加利亚人民由于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十分迫切地要求受教育和学到知识。他们把斯拉夫文字和文学的创始人西里耳与梅索迪亚斯的纪念日5月11日（此系旧历，现为5月24日）定为保加利亚教育节，这一天也成了最盛大最隆重的全民节日。此事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人民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教育事业的发展遇到了巨大障碍。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学校不仅不给任何物质帮助，反而百般刁难，对其教师进行迫害，尤其是对那些在俄国受过教育的人。希腊的上层教士是保加利亚教育事业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得到了君

士坦丁堡总主教区以及希腊资产阶级中那些反动分子的支持。在马其顿的保加利亚教师，遇到的困难更为巨大，因为在那里早已设有许多希腊学153校。这些教师中有一位名叫约尔丹·康斯坦丁诺夫·季诺，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马其顿的保加利亚教育事业进行斗争，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因此遭到希腊教士的残酷迫害。为了破坏和摧毁保加利亚的教育事业，希腊的大主教和主教们经常向土耳其当局诬告这些教师，说他们是叛乱分子或俄国奸细。

由人民自己创办并维持的保加利亚学校，具有民主的性质。所有的保加利亚少年和儿童，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有权免费入学。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民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后来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保加利亚的文学也有了发展。加布罗沃学校的创办人瓦西耳·阿普里洛夫出版了好几部论述保加利亚教育状况、文学语言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尼奥菲特·里耳斯基也留下了相当多的文学遗产。这一时期的保加利亚著名作家，还有纳伊登·盖罗夫、尼奥菲特·博

兹维利等人。1844年，保加利亚的第一份期刊《语文》由康斯坦丁·佛提诺夫在斯米尔纳出版。伊凡·博哥罗夫则于1848年在莱比锡出版了第一份保加利亚报纸《保加利亚之鹰》。同年，一份名为《君士坦丁堡报》的保加利亚报纸也在土耳其首都出版，因为那里有一个人口相当多的保加利亚居民区。

这些教育、文学和新闻事业方面的成就虽然不大，对于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们大大激发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对保加利亚人民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进行了反抗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统治的斗争。

保加利亚沦于土耳其统治下以后，保加利亚教会即归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管辖。当时，土耳其当局承认了君士坦丁堡总主教是被征服基督教民族的代表，因为在它看来，这些民族都是“鲁迈累”，即希腊人。他们并不承认还有一个单独的保加利亚民族存在。 154

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派往保加利亚的大主教都是希腊人，他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不用保加利亚语，而代之以希腊语。这些大主教绝大多数都蔑视保加利亚人，千方百计使之希腊化。这样，保加利亚人民便处于土耳其封建领主和希腊教士的双重压迫之下。

十九世纪初，一批贪得无厌的希腊籍大主教在保加利亚就任后，保加利亚人所受希腊教士的压迫就更加厉害了。在土耳其当局卵翼之下，这些傢伙对人民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专横暴虐，无恶不作。同时，他们还加紧推行民族同化政策。1830 年希腊公国成立后，总主教和那些保加利亚的希腊籍大主教，更公然成了希腊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明目张胆地推行使一些保加利亚地区希腊化的政策。

希腊教士的所作所为，在保加利亚人民中激起了强烈愤慨。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带领人民群众——手工业者和农民，进行了反抗希腊籍大主教的斗争。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带有民族性和政治性。

1824 年，在弗拉查第一次掀起了要求驱逐希

腊籍大主教而代之以保加利亚人的斗争。其后，在保加利亚南部和马其顿，也发生了类似事件。1838年，当图尔诺沃居民起来反抗帕纳列特大主教时，斗争范围就更加扩大了。接着，反抗希腊籍大主教的运动，逐步波及到整个图尔诺沃教区。

“御园敕令”在1839年的颁布，鼓舞了保加利亚人民反对希腊教士的斗争。当然，苏丹所郑重宣布的人权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是，保加利亚人却能以此作为合法依据而提出一些要求，并坚持使之付诸实现。“敕令”颁布后不久，图尔诺沃教区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要求总主教罢免帕纳列特大主教，而委任卓越的保加利亚教师和作家尼奥菲特·博兹维利（1785—1848年）接替他。但是，总主教区却通过行贿和阴谋手段，使保加利亚人的这一要求未能实现，并又委任另一个希腊人尼奥菲特·拜占提奥斯为图尔诺沃大主教。保加利亚人对总主教区的这种做法深感愤慨，进一步把斗争扩大为反对一切希腊籍大主教和教士。在人民的支持下，尼奥菲特·博兹维利发动了反对图尔诺沃希腊籍大主教的强大运动。

155

总主教区为了除掉博兹维利，竟向土耳其当局控告他蛊惑人心，阴谋叛乱。1841年，这位热情的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被逮捕并流放到希林达尔修道院。然而，博兹维利却在1844年逃出修道院，接着又到君士坦丁堡继续进行斗争。他在那里遇见了伊拉利昂·斯托扬诺维奇（后改名伊拉利昂·马卡里奥波耳斯基），两位热情的爱国志士结成战友，共同领导了保加利亚的反对希腊上层教士的运动。

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保加利亚人尚未公开提出保加利亚教会自治的问题。他们在由尼奥菲特·博兹维利和伊拉列昂·马卡里奥波耳斯基两人签名送交土耳其当局的请愿书中提出的要求是：一、由保加利亚人担任保加利亚各教区的大主教；二、让保加利亚人在君士坦丁堡设置自己的教会代表，以便在土耳其当局面前维护本族人民的权益。

但是，总主教区却拒绝了保加利亚人的这些最起码的要求。它还对尼奥菲特·博兹维利和伊拉列昂·马卡里奥波耳斯基大肆诽谤，唆使土耳其当局把他们放逐到阿托斯山。1848年，博兹维

利在那里去世。

这些暂时的挫折，并没有使保加利亚人丧失信心。反对总主教区及其在保加利亚代理人的斗争进一步激化，终于迫使土耳其当局正式承认在156土耳其帝国内存在着保加利亚民族。这一承认是通过苏丹发布的“特别敕令”作出的。“敕令”中还授权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亚居民自建教会，由保加利亚籍大主教领导。教会也被宣布为“保加利亚公共财产”，交给当地的保加利亚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代表所组成的团体来管理。这一团体从此领导了争取保加利亚教会自治的斗争。

这一时期，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武装斗争也加强了。1829年亚德里雅那堡条约签订后，锡利斯特拉城按此和约规定由俄军占领，格奥尔基·玛玛切夫被委任为市长。希腊和塞尔维亚在俄国的帮助下获得解放后，保加利亚爱国人士更加坚信，只要保加利亚人民起义，俄国一定会给以援助。在这种希望的鼓舞之下，格奥尔基·玛玛切夫同保加利亚北部一些较为知名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取得了联系，并为准备起义进行了广泛的密谋活动。图尔诺沃的商人佛耳乔·阿塔纳索夫·扎姆季亚

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一活动也因此被称为佛耳乔密谋活动。它规定由承包商迪米特尔·索非亚利亚以修复毁于战争的瓦尔纳城堡为名，招募二千名左右的志愿人员。

1835年春，土耳其当局对这一密谋活动有所风闻，逮捕了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佛耳乔·扎姆季亚和好几位革命者受到了严刑拷打，被判处绞刑。格奥尔基·玛玛切夫由于是俄国臣民，被判流放到小亚细亚，接着又被送往萨摩斯岛，最后死在那里。

与此同时，在保加利亚西部也爆发了自发的农民暴动。当时，保加利亚农民与土耳其封建领157主的阶级矛盾已进入激化阶段。1832年土地改革之后，保加利亚农民当然指望能据此把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留在自己手里，以后只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但是，土耳其封建领主却按自己的方式对这一改革进行了“解释”。他们倚仗其社会地位，企图将过去的“斯巴希”领地变为自己的私产，强迫农民在极度苛刻的条件下为之耕种。更有甚者，他们还和手下那些贪官污吏，像最凶恶的匪盗一样对农民肆意掠夺，其暴行虐政，罄竹难书。土

耳其的官方文件对保加利亚农民的悲惨境遇就作了生动的描绘。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了起来反抗那些剥削和残害他们的傢伙之外，别无出路。

早在1835年，保加利亚西北部就有十六个村庄的农民发起了暴动。次年，在贝尔科维察和贝洛格拉齐克两地区又爆发了农民起义。贝尔科维察地区的起义农民有三、四千人，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持有武器。当时还是保加利亚人聚居的皮罗特区，也在这一年爆发了农民起义。

1837年，在皮罗特和贝尔科维察两地区又爆发了新的农民暴动。农民武尔班·潘诺夫和克鲁斯提乌·涅什金领导了贝尔科维察地区的暴动。土耳其当局不得不派遣强大的步、骑、炮兵部队，前往镇压这一伟大的农民起义。 158

保加利亚西部地区农民的这些反抗斗争，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里一直持续不断。1841年，在当时居住着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尼什的帕沙辖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分别领导这场斗争的是许多勇敢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农民，如米洛埃·约凡诺维奇、尼古拉·斯龙达克、

斯托扬·查夫达、斯坦乔·博亚季等等。土耳其当局派了强大的正规军部队和“巴希——巴佐克”①部队去镇压这一地区的暴动。农民们虽然拼死抵抗，但是，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大部分人又仅以斧、镰和牧羊人所用的带鉤拐杖为武器，只有很少几个小队持有步枪，因而处于劣势。

尼什暴动终于被残暴地镇压下去了。许多男子、妇女和儿童惨遭屠杀，数以百计的房屋被洗劫焚毁，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逃往塞尔维亚。

法国经济学家布隆基访问了暴动地区，在他所写的《保加利亚旅行记》一书中，对当时保加利亚人民的苦难处境和土耳其暴行，作了生动的记载。

土耳其暴行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民主人士中激起了莫大愤慨。沙皇俄国尽管对当时的各国民族革命运动一般地持否定态度，也出面为暴动的农民说话。可是，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却袒护封建土耳其。

尼什地区的农民暴动，也激起了巴尔干半岛

①“巴希—巴佐克”，bashi-bazouks，土耳其的非正规军，以其凶狠贪婪而臭名昭著。

共他地区群众的反抗斗争。同年，希腊人在色萨利地区和克里特岛举行了起义。俄国的外交活动，尽管进行得颇为谨慎，却已在被征服的各基督教民族中引起了一种希望，即俄国将会支援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

罗马尼亚境内的保加利亚流亡侨民，决定利用土耳其所处困境，建立武装队伍派往保加利亚组织起义。1841 年，在罗马尼亚的布勒伊拉城组成了一个大的支队，负责指挥的是塞尔维亚上尉弗拉基斯拉夫·塔提奇。几位希腊爱国人士也参加了这个支队。它的组成鲜明地体现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爱国者之间的战斗友谊。 159

派遣这个支队越境的准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在预定出发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保加利亚侨民在布勒伊拉港口集会。但是，符拉克大公吉卡，出于对土耳其人的畏惧，竟命令军队袭击起义者。经过一夜激战之后，这个支队被完全打败了。

尽管遭到了挫折，保加利亚侨民 1842 年又在希腊侨民的协助下，组织了一支新的起义队伍。这支队伍是由保加利亚青年革命者格奥尔基·萨 160

瓦·拉科夫斯基率领的。罗马尼亚当局再次挫败了这一行动，因为它怕被谴责为听任在其国土上建立反土耳其的武装队伍。经过一场小规模战斗，一个罗马尼亚上校被击毙，拉科夫斯基及其同志也遭逮捕。拉科夫斯基被判死刑，但却在其希腊友人的帮助下逃往法国。

1843年，侨居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流亡者，又密谋组织和派遣武装支队进入保加利亚。在这一密谋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瓦西耳·哈治·伏尔科夫，一位精力充沛的保加利亚革命者。但这一密谋仍被罗马尼亚当局察觉，伏尔科夫及其战友都被逮捕并判处苦役。

在此期间，保加利亚农民的不满情绪继续增长。武装农民和土耳其军队之间激烈的小规模战斗，实际上年年都在发生。1850年爆发的一场波及保加利亚整个西北部——维丁、库拉、贝洛格拉齐克和洛姆四个地区的农民大起义，极其有力地说明了保加利亚农民的不满和反抗。

土耳其的“巴希——巴佐克”部队和正规军镇压保加利亚西部农民起义的种种暴行，并未能使农民运动平息下去。军事采邑制废除后，农民经

常因土耳其封建领主争夺“斯巴希”领地而受到骚扰。

在保加利亚西北部带领不满农民群众斗争的，有佐洛·托多罗夫、伊凡·库林、佩特科·马里诺夫等人。这些农民运动的领导人，竭力使斗争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他们在腊科伏修道院举行会议，上述四个地区都派了代表参加。会上决定在1850年6月1日宣布起义，并作出了计划。起义者准备首先攻占洛姆、维丁和土耳其在保加 161 利亚西北部的行政中心贝洛格拉齐克三城。腊科维察村的克鲁斯提乌上尉、贝洛格拉齐克的伊格纳特和普尔凡·武尔巴诺夫被委任为起义的领导人。

6月1日，农民如期起义，并向这些城市进发。洛姆区的起义农民约有二千名。另外约有三千名农民集中在保加利亚西北部防御工事最坚固的维丁城附近，他们安营扎寨，等候邻近地区的援军来到。由配有炮兵的土耳其驻军防守的贝洛格拉齐克，也受到了一万至一万二千名起义者的围攻。

这次起义虽然具有群众性，仍被土耳其正规

军和“巴希——巴佐克”部队迅速镇压下去;因为,正如以往几次起义一样，农民的装备太差。保加利亚西北部的城镇乡村，再一次被淹没在血泊之中。贝洛格拉齐克所受劫难尤为深重，居民惨遭“巴希——巴佐克”屠杀，所有房屋被焚为一片瓦砾。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却也给了崩溃中的土耳其封建制度以沉重打击。尽管起义遭到镇压，农民的暴动仍未能平息下来，土耳其当局被迫答应解决有关“斯巴希”领地的争执问题。当然，他们又一次偏袒了封建领主，农民们虽然得到了土地，但却被迫在规定日期内交付偿金。

保加利亚西部的农民起义，图尔诺沃地区为准备武装起义所作的努力，以及在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侨民多次往保加利亚派遣武装支队的尝试，都足以证明人民革命力量的成长，也反映了他们高昂的战斗精神，以及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自己的意志。这些起义的爆发原因，决不是由于外国代理人的挑唆，而是由于无法容忍的、腐朽没落的土耳其封建制度，以及保加利亚农民要求从这一制度的压迫下获得解放的迫切愿望。起义

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对此后几十年中一个有组织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出现，却毫无疑义地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克里米亚战争及其在保加利亚的影响　1853 162 ——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对保加利亚的内部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它引起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也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克里米亚战争始于1853年，初为俄土两国之间的战争。但不久，英法两国即以保护土耳其为借口而介入；稍后，撒丁王国也参加了英、法、土一方。这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土耳其的强大军事同盟就形成了。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沙皇俄国和它在近东地区的西方劲敌英、法两国之间的矛盾。俄国力图摧毁土耳其帝国，从而独霸黑海海峡，并得以侵入地中海；而英、法两国却要保全土耳其，以便使之成为自己的半殖民地之一。土耳其政府则热衷于挑起战争，因为它一心想要报仇，即从俄国手里夺回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和库班。

保加利亚人民怀着早日获得解放的希望，热烈欢迎双方的宣战。由于俄军解放了希腊和塞尔维亚，俄国文化界给了保加利亚的民族教育运动广泛的支援，俄国广大人民又对保加利亚人摆脱异族统治的种种努力寄予深切同情，保加利亚人民也就更坚信俄国能肩负起解放他们的使命。

克里米亚战争，无论是从交战双方的哪一方来说，都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保加利亚人民，以及呻吟于苏丹暴政之下并为推翻它而奋斗的其他各国人民，都对俄国表示同情。土耳其统治下163的各民族，尽管向往西欧社会的民主思想和高度的文化水平，但当然不会支持西方各国所执行的旨在使他们永受奴役的政策。这一简单的真理，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至今未能理解，而卡尔·马克思却早在1853年就已明确地加以论述。他写道："就在俄国无所顾忌地动手割裂土耳其的时候，西方的外交官们仍然把现状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当做某种神圣物来保障和维持！只要西方外交的指导原则仍然是传统的政策，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要把俄国看做自己唯一的靠山，自己的解放者，自己的救世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莫斯科版，394页。）①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保加利亚人民直接尝到了西方国家政策的滋味。在保加利亚登陆的英、法两国军队的给养，如同千斤重担，落到当地人民肩上。土耳其当局也为自己及其盟国的部队四出搜刮更多的食物，对农民进行了无情掠夺。战争煽起了土耳其人的宗教狂热和对保加利亚人民的仇恨，他们复仇的渴望如同一股浊流，泛滥在这片被奴役的国土上。疯狂的土耳其武装暴徒，成帮结伙，流窜保加利亚全境，任意屠杀居民，连妇女儿童也未能倖免。某些法、英军官在写到土耳其人所犯罪行时，都对土耳其兽兵和武装匪徒的野蛮行径表示了愤慨。但是，法、英两国政府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制止保加利亚居民蒙受的白色恐怖。

①这段引文实际上不是马克思的，而是恩格斯的。见弗·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6页。引文除这一错误外，还在“只要西方外交的指导原则仍然是传统的政策”后，删去了原文中的“即无论如何都要维持现状，维持土耳其目前这种状态的独立，”但引用者未在此处加删节号。——译者

保加利亚爱国者坚信俄国必胜，战争刚开始即着手动员人民准备起义，并预定俄军一进入保加利亚就动手。精力充沛、热情饱满的革命者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领导了这一解放运动。

拉科夫斯基刚从法国归来，就和他的父亲一起被捕入狱，监禁了三年半。他在获释后当了几年律师，以后又致力于经商，积聚了一大笔财富，并与某些有权势的土耳其人来往密切。然而，在这些年代里，他却无时不在考虑着自己祖国的解放。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拉科夫斯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宗旨是为了在战争期间保护保加利亚人民，免受土耳其暴行虐政的残害，同时动员他们为进行武装斗争作好准备。他依靠土耳其友人的帮助，设法在土军参谋部弄到了一个职务，又以土耳其高级军官的身份为掩护，到过保加利亚的一些城市，并在那些地方组织秘密团体。另一个保加利亚爱国者巴维尔·格拉马多夫，则去马其顿鼓动人民起义。

拉科夫斯基设法同多瑙河北岸的俄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既送去有关土军调动的情报，也从那里了解俄国的意图。当时保加利亚人民的普遍

心情，他们想协助俄军的愿望，可从以下事实充分得到证明：一个年龄只有十三岁的爱国少年拉伊乔·尼科洛夫，居然单独一人横渡多瑙河，向俄军报告了土耳其人准备渡河的情况。

土耳其当局发觉了拉科夫斯基的密谋活动，逮捕了他并警卫森严地把他押往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位无畏的爱国志士却中途脱逃，组织了一个武装支队前往巴尔干山脉，等待俄国军队进入保加利亚。

在拉科夫斯基积极活动的同时，侨居罗马尼亚的著名保加利亚革命者尼古拉·菲利波夫斯基也回到了保加利亚，并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俄、土双方交战以前，他在侨居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流亡者的大力支持下，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在图尔诺沃定居下来，发起了一个鼓动武装起义的广泛运动。图尔诺沃、特里阿夫纳、果尔纳、奥里阿霍维察、伊耶累纳、加布罗沃等城镇以及许多村庄，在他的领导下，都建立了秘密团体。许多商人、手工业者和教师——佩特科·斯拉威科夫 165 也在其中——都参加了这一起义的准备工作。

同时，侨居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流亡者还成

立了一个委员会召募志愿人员，并组成了一个拥有好几千名志愿人员的保加利亚军团。这个军团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配合俄军作战，并以英勇善战而闻名。

但是，战局的发展并不象保加利亚爱国人士所期待的那样。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俄国，无力与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同盟相抗衡，战争也逐渐推移到克里米亚半岛，进入了俄国领土。尽管保卫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俄军将士英勇顽强，沙皇政府仍被迫求和。1856年在巴黎所签订的和约，旨在摧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保证西方各国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不受任何限制。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下，苏丹颁发了称为“哈提胡马荣”的《革新法令》，以表示对各基督教民族的关怀。西方各国政府对腐朽没落的土耳其封建帝国的维护，充分暴露了他们是巴尔干被压迫人民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

战局的意外转折，使保加利亚人对解放的到来感到希望渺茫。拉科夫斯基没等战争结束就解散了他的支队，越境进入罗马尼亚。但是，尽管

巴黎条约的签订造成了种种不利情况，一部分保加利亚爱国志士仍决定组织暴动，以抗议保加利亚仍被置于土耳其统治之下。当然，他们也知道暴动注定是要失败的。

1856年7月，图尔诺沃区爆发了由尼古拉·菲利波夫斯基领导的暴动。他率领了一个小支队向加布罗沃进发。一路上附近村庄的农民纷纷前来参加，兵力扩大到好几百人。支队在加布罗沃与土耳其军队相遇，经过短短的一场小规模战斗就被打败了。保加利亚西北部由迪米特尔·彼得罗维奇领导的一场暴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166

西方列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胜利，使保加利亚人民情绪极为低落，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再一次单独地面临强敌，又没有早日得到外援的希望。但与此同时，战争带来的种种后果却使群众的不满大为增长，一场遍及于整个保加利亚的革命风暴已在酝酿之中。

封建土耳其因克里米亚战争而更加依附于西方列强。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土耳其政府精疲力尽，财源枯竭，不得不求助于外债和重税。在二十年之中，土耳其所借外债竟达十五笔之多，其条件

也都很苛刻，实际上已把它置于附庸地位。土耳其外债有增无已，达到了惊人数字，以致使“波尔特”仅仅是为了偿付其利息，就要再举新债和增收赋税。1875年，局势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土耳其政府终于宣告破产，使其债权国和“保护人”大伤脑筋。

不断增加的赋税重担，给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于土耳其的关税政策，也促使农民生活更趋恶化。西方制造的商品的进口税仅为5%；从土耳其出口的农产品，征税却高达12%，而且都要由生产者——农民来负担。

压在保加利亚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其中最沉重的一种是什一税，即土耳其语的“约希土尔”，常使农民倾家荡产。更有甚者，这种税也象其他赋税一样，是以一种极为恶毒的方式来征收的。土耳其政府把各种赋税包给愿付最高定价的包税商，这些包税商便带上武装卫队去收税。他们倚仗着当局的袒护，横行霸道，作恶多端，保加利亚农民曾对他们提出过数不清的控167告。当时的保加利亚报纸，尽管为土耳其新闻检

查所控制，也通篇是有关包税商罪行的令人心碎的报导。

克里米亚战争后，保加利亚农民还遭到了另一场灾难。有十万名左右的塞尔卡西亚人①和鞑靼人被逐出俄国，土耳其政府把他们安置在保加利亚各地。保加利亚农民不但被迫为他们修建住房和农用房舍，而且还经常惨遭他们洗劫与蹂躏。

以上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后保加利亚农业发展的条件。万分沉重的苛捐杂税，各地区任意征收的关卡通行费，再加上包税商和土耳其官吏的掠夺，使农业备受摧残，始终停滞于原始状态，生产效率极低。勤劳的保加利亚农民，由于横遭土耳其封建国家以及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强取豪夺，生活一贫如洗，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就连劫后所余之物，也难以保住。 168

克里米亚战争后，占城市人口大部分的手工业者同样境遇困厄。从西方进口的商品有增无已，使保加利亚的手工业和制造工业一再受到打击。

①塞尔卡西亚人，Circassian，即切尔克斯人，高加索山民。——译者

西方工业产品价廉物美，保加利亚的手工业产品无力与之竞争。手工业开始衰落，手工业者也纷纷破产，成为雇佣劳动者。

大量破了产并随时准备出卖劳动力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为工厂工业的兴办创造了条件。但外国的竞争和土耳其封建制度本身，却又极大地阻碍了它的发展。因此，克里米亚战争后，在保加利亚只开办了为数很少的几家工厂。

土耳其当局在保加利亚商业发展的道路上，也设置了重重障碍。尽管如此，贸易仍然逐年得到了扩大。在外国资本家和保加利亚生产者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商人，活动范围尤为广泛。

克里米亚战争后，日趋没落的土耳其封建制度，使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也使保加利亚人民更感到这一枷锁的无比沉重。保加利亚的社会进步力量和土耳其封建制度的矛盾，尖锐到了极点。这时，民族民主革命的条件已在保加利亚完全成熟了。

农民、手工业者或小商人的处境，都已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他们已认识到改变其处境的唯一出路是挣脱土耳其的统治。从人民中涌现出来

而又接受了当时的民主思潮的知识分子，对苏丹的暴政已经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由于苏丹的暴政和土耳其封建制度阻碍着工商业的发展，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也同样感到不满。但是，这个阶级在经济上是软弱的，在政治上既如一盘散沙，又极胆小怕事。与西方商业资本有联系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在感情上是亲土耳其的。他们相信土耳其的各种改革，也相信它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则指望俄国来解放保加利亚。此外，还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期待着借助于西方以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 169

这就是为什么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说，对革命运动采取了逃避或敌视的态度。

教会自治　解放前夕的文化发展　克里米亚战争后，争取保加利亚教会独立的斗争进入决定性阶段。苏丹颁布的"哈提胡马荣"许下了一些诺言，其中有一条是在民族的基础上改组教会。保加利亚爱国者利用它公开提出了由保加利亚人民选举自己的上层教士的问题，但苏丹政府和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却拒绝了这一要求。

此后，这场斗争便在群众中展开了。城镇中开始了驱逐希腊籍大主教的斗争。寇寇希（在马其顿）的居民首先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这一运动接着就波及全国。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亚教会团体在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有些当时的杰出作家和知名人士，如佩特科·斯拉威科夫、托多尔·布尔莫夫、斯托扬·乔马科夫博士、加夫里耳·克鲁斯特夫等人，都是这一团体的成员。

1860年4月3日，在君士坦丁堡教会团体的支持下，伊拉利昂·马卡里奥波耳斯基代表保加利亚人民的意愿，庄严地宣布保加利亚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

170 由于这一行动，保加利亚人民和总主教区之间的斗争进入最尖锐的阶段。人民衷心地欢迎从此摆脱总主教区的统治；总主教区却因此怀恨在心，唆使土耳其政府将伊拉利昂·马卡里奥波耳斯基连同佛累斯的奥克森提主教和普罗夫迪夫的帕伊西主教一起加以放逐。

保加利亚人和总主教区之间的斗争，因种种外界因素的干预和影响而进一步复杂化。法、英两国力图利用希腊教会和保加利亚教会之间的冲

突，使保加利亚人民脱离俄国的影响。为此目的，两国的传教士竭力分裂保加利亚人民，想使他们分别归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罗马天主教在这方面的宣传尤为活跃。但是，保加利亚人民显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成熟，没有受这些外国侵略阴谋的欺骗。

俄国政府起初主张在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的管辖下，维持正教各民族的统一这一原则。但是，保加利亚的教会运动和民族运动的高涨，却迫使沙皇的外交官员和俄国教会的教议会改变了态度。俄国新任驻土耳其大使尼·巴·伊格纳切夫，开始站在保加利亚人一边，协助解决保加利亚教会问题。

六十年代末期前后，总主教区在保加利亚已无任何实权。群众游行示威，势如暴风骤雨，将希腊籍大主教纷纷赶走。人民普遍不满，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革命的最初征兆也已出现。只是到了这时，"波尔特"才被迫作出让步。

1870 年，苏丹颁布了一道敕令，授予保加利亚教会以自治权，由一位保加利亚教区长来管辖。

争取教会独立的斗争，对团结全国各地区人民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起到了重大作用。新成立的教会称为保加利亚大教区，它协助进行普及教育171的工作，并在马其顿以及保加利亚居民受到希腊等外国宣传威胁的其他地区开办了新的学校。

1878年获得民族解放的前夕，保加利亚人民在文化方面获得了显著发展。尽管生活条件极为困难，他们还是把全民教育提高到一个在当时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文学、新闻和艺术都得到了发展。

保加利亚人民渴望受教育，但却遇到土耳其当局和希腊教士设置的重重障碍。土耳其政府按著名的土耳其政治家米德哈特帕沙[①]的建议，制订了一项旨在摧毁保加利亚学校的计划，要把它们同水平极低的土耳其宗教学校合併起来。保加利亚文化界的舆论，自发地起来保卫本民族的教育事业，挫败了这一愚民政策。保加利亚的教师和教育家，还不得不与那些充当大希腊主义宣传

①米德哈特，Midhat pasa (1822—1884年)，1864—1868年任多瑙河保加利亚省总督，1876—1877年任首相，制定了土耳其第一部宪法。——译者

工具的希腊教士进行艰巨斗争。特别是在马其顿，冲突就更为激烈。那里的教育运动和争取成立民族教会的斗争，是由热情的爱国志士迪米特尔·米拉迪诺夫和约尔丹·康斯坦丁诺夫·季诺领导的。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为了除掉这两个人，对他们进行了残酷迫害。迪米特尔·米拉迪诺夫及其弟康斯坦丁（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被投入监狱，以后死于狱中。约尔丹·康斯坦丁诺夫·季诺也遭逮捕，受尽迫害，最后被流放。

尽管困难重重，保加利亚教育事业仍然阔步前进。1876 年已有约一千五百所小学、许多所初级中学和几所高级中学。第一所职业学校则是在 1873 年开办的。保加利亚报刊上也已在讨论创办学院或大学的问题。

当时，还开设了许多拥有藏书的公共阅览室，也称为讲演俱乐部，在那里定期举办各种科学讲座，组织戏剧演出，以及进行其他活动。这一情况表现了保加利亚青年一代对教育的迫切要求。到了土耳其统治末期，这样的讲演俱乐部在保加利亚已达一百三十个以上。

一些妇女团体也诞生了，其宗旨是在保加利 172

亚未婚和已婚的妇女中普及教育，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并帮助她们为参加社会活动作好准备。

在人民为发展民族教育、建立民族教会以及争取政治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定期出版的报纸起了重要作用。尽管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条件都很困难，这一时期中仍然创办了大量的保加利亚报纸。在土耳其首都所出版的一些保加利亚报纸中，由民族诗人佩特科·斯拉威科夫这一著名人物所编辑的《马其顿报》，为建设保加利亚教育事业和争取教会自治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此外，由柳宾·卡腊维洛夫主编的《自由报》和《独立报》，由赫里斯托·波特夫主编的《保加利亚侨民论坛》和《旗帜报》，也先后在罗马尼亚问世。

保加利亚的悲惨命运促使爱国人士研究其历史，以便通过它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继希林达尔的帕伊西之后，许多保加利亚爱国者都对有关自己民族历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保加利亚历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马林·德里诺夫（1838—1906年），他就学于俄国，并在哈尔科夫大学担任教授多年。德里诺夫曾就中古保加利亚

的历史，发表了好几篇专题论文和许多研究心得。斯皮里登·帕拉乌佐夫也是当时的一位卓越的史学家。

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彼得·贝朗进行了极其有益的工作，留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著作。

1869年，在布勒伊拉成立了学术协会，这是保加利亚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这一学术团体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名为《定期学报》，并通过这一刊物将保加利亚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活动综合到一起。以后，在自由的保加利亚，学术协会被改成为保加利亚科学院。

保加利亚新文学最初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在这时出现了。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保加利亚真正的诗歌和散文还处于萌芽状态。第一部具有 173 一定艺术价值的诗是纳伊登·盖罗夫的《斯托扬和腊达》。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的英雄诗《森林的旅客》，使保加利亚诗歌带有革命倾向性。多布里·钦土洛夫所写的《狂风呼啸，巴尔干回应》、《你在哪里，永世不渝的人民的爱》和《起来，巴尔干的英雄》这几首诗，洋溢着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流传极广。康斯坦丁·米拉迪诺夫、拉伊科·

任集佛夫、格里戈尔·帕尔利切夫以及共他一些保加利亚诗人的作品，也都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

很多民歌表达了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描绘了保加利亚的田园之美，反映了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民间英雄的热爱；这些民歌的收集和出版，对保加利亚的诗歌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意义。在已经出版的民歌集中，最能表明人民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力量和财富的，是米拉迪诺夫兄弟（迪米特尔和康斯坦丁）所收集的《保加利亚民歌集》。1861年，在克罗地亚大主教约瑟夫·斯特罗斯梅耶协助下，这本民歌集于萨格勒布出版。

保加利亚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是佩特科·斯拉威科夫（1827—1895年），他创作了许多抒情诗和爱国诗。他的最好的诗篇之一《无畏的女统领》174是用民间诗歌的风格写成的，既反映了人民对解放的渴望，也表现了那个时期保加利亚妇女的英雄形象。佩特科·斯拉威科夫在使诗歌形式臻于完美以及创造保加利亚通用的文学语言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赫里斯托·波特夫，是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保

加利亚诗歌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波特夫内心深深地铭刻着保加利亚受奴役人民的苦难，他满腔热情地向他们指出，只有起来革命才是争取解放的唯一道路。波特夫的诗与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斗争，始终是紧密相连的。在《致母亲》一诗中，他表达了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政体以及一切暴君和压迫者的深仇大恨；在《酒店里》和《爱国者》中，他愤怒地鞭挞了那些懦夫和假爱国者。与此相反，波特夫的许多诗篇都把自由作为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加以歌颂。他所写的《离别》一诗，有力地表现了高昂的革命热情。在他献给哈治·迪米特尔（1868年对土耳其军队作战中与其支队一起壮烈牺牲的英雄）的叙事诗《他活着，他依然活着》中，波特夫还表达了为自由而战死的英雄永垂不朽这一信念：

“为自由斗争、在战场牺牲的人，
将永生……”

保加利亚的散文也起始于这个时期。文学散文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杰出作家是瓦西耳·德鲁梅夫（1841—1901年）。他在《不幸的家庭》这个

故事中，描写了被近卫军头目屠杀的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展现了土耳其统治下保加利亚人民的灾难。伊利亚·布卢斯科夫的一些中篇小说，也以同样的题材为内容，其中《失去的斯丹卡》这一篇，描述了保加利亚人民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所遭受的苦难。

柳宾·卡腊维洛夫是直到解放时为止的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之一。他又是第一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175在为数约三十篇的长、短篇小说中，刻划了土耳其人的残暴专横和无法无天，揭露了保加利亚"乔尔巴德日"的巧取豪夺，描写了爱国者为解放祖国而进行的斗争，也绘出了人民的生活及其风俗习惯的画面。卡腊维洛夫比较著名的作品是《难道要咀咒命运吗?》、《昔日的保加利亚人》、《统领》和《妈妈的宝贝儿》。

保加利亚的第一批剧本也于此时问世。瓦西耳·德鲁梅夫的剧本《刺杀阿森一世的伊凡科》，作于1872年，以保加利亚中古史上的一个事件为题材。保加利亚的剧院也随着这一剧本而出现了。多布里·沃伊尼科夫（1833—1878年）的剧团最

为活跃。沃伊尼科夫本人为它写了许多剧本，其中最出名的是《被误解的文明》，直到今天，它还被一些保加利亚剧团上演着。

与文艺创作同时，文艺批评也发展起来，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涅朔·邦契夫（1830—1878年），他受到了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很大的影响。

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艺术和建筑也有所发展。

里拉修道院是这一时期保加利亚建筑艺术中最令人注目的代表作。这座巨型的四层建筑物拥有房间三百个左右，以宽敞的带顶阳台作为通道，柱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式样。它是在1834—1837年期间由建筑大师巴维尔、米连科、阿列克塞·里列茨和克鲁斯提乌·德布腊利亚先后建造的。营造这座庞大建筑物所需的款项，是从保加利亚全国募集而来。

这一时期具有艺术价值的其他建筑物，有帕扎季克的圣母教堂，以及由巴维尔大师修建的里拉修道院内的教堂。当时最著名的自学成功的建筑大师是科利奥·菲切托，他修造了洛佛奇和比

亚拉两地的大桥。在科普里符希提察这个小镇里，有为数极多的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时期的建筑杰作保存至今，它现在已成为一个大博物馆。

雕刻也随着建筑而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较176为杰出的雕刻作品中，有帕扎季克圣母教堂和里拉修道院教堂内的圣像壁。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保加利亚的艺术家们逐渐摒弃了宗教性的主题，开始将现实主义成分引进了自己的艺术作品。扎哈里·佐格腊夫（1810—1853年）为一些教堂和修道院画了大量壁画，但也创作了一些极为精美的肖像画。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保加利亚艺术又取得了新的成就。民族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艺术家是斯塔尼斯拉夫·多斯彼夫斯基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

斯塔尼斯拉夫·多斯彼夫斯基（1827—1877年）曾在俄国的艺术学院学习过，并受到了俄国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影响。他主要画风景和肖像。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1835—1894年）曾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学习艺术。他的作品丰富多样，主要以历史事件为主题。其名画《阿斯巴罗赫横

渡多瑙河》和《普雷斯拉夫宫廷的洗礼》的复制品，广泛流传于全国。巴甫洛维奇在其绘画作品中重现了保加利亚的光辉历史，从而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了保加利亚人民。

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保加利亚的国内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民主革命的年代里，抱改良主义主张的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反对以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土耳其封建统治。他们的思想家提出了“渐进”的原则，力图证明保加利亚可以通过发展教育或依靠外援而和平地解放。

但是，如果说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即使在土耳其封建制度的重重障碍下也还能发财致富，还可以自己毫不费力，等待别人给他们送来解放的话，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却除了革命之外，别无自救之路。教育事业的发展本身并不能给农民以土地，更不能使他们免受无止境的暴行和掠夺之害。它也不能使手工业者摆脱窒息他 177 们的经济恐慌。因此，农民和手工业者都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于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两股明显的潮流：一股是改

良主义的，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心情；一股是革命的和民主主义的，反映了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及其知识分子的愿望。

革命民主潮流的第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发起一个有组织的民族革命运动。

拉科夫斯基于1821年诞生于科特尔城。他的家庭虽属于保加利亚社会的富裕阶层，却以其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而著名。他的父亲曾与科特尔的“乔尔巴德日”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因为他们也同保加利亚绝大多数“乔尔巴德日”一样维护土耳其的统治。他的几个叔叔都以勇敢和爱国而闻名。他的舅舅格奥尔基·玛玛切夫，如前所述，在1828—1829年的事件以及1835年的事件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拉科夫斯基早年在君士坦丁堡一所希腊学校上学时，就以高昂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参加了争取教会自治的斗争，当时他还很年轻。由于才识过人和富于洞察力，拉科夫斯基成为最早掌握保加利亚的国内发展趋向并指明其解放道路的爱国志士之一。

1842年以及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曾两度试图利用武装队伍组织暴动，但都失败了。其后，拉科夫斯基开始从事写作。1856年，他到了诺维萨特，接着就在塞尔维亚政论家丹尼尔·梅达科维奇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下，出版了一份名为《保加利亚日志》的报纸。他也在这里发表了他的名诗《森林的旅客》，对保加利亚的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首诗里，拉科夫斯基通过对“哈伊杜克”英雄事迹的歌颂，向他们指出了斗争的道路：不是向个别的土耳其压迫者报仇雪恨，而是要开展推翻异族统治的全民斗争。

由于土耳其政府的坚持，奥地利当局将拉科夫斯基驱逐出境。他接着去俄国，并在敖德萨发表了好几篇有关历史、语言和人种学的著作。1860年初，拉科夫斯基移居到贝尔格莱德，同当时与土耳其关系紧张的塞尔维亚政府取得了联系。这一年年末，他又着手出版名为《多瑙河天鹅》的报纸。拉科夫斯基把这份报纸发行到保加利亚，想借助于它为争取教会独立的全民运动指出正确方向，并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保加利亚人民。同时，他又力图通过这份报纸向西方的舆论界正确地报 178

导保加利亚的种种情况。因此，《多瑙河天鹅》是分别以保加利亚文和法文两种文字出版的。

拉科夫斯基总结了“哈伊杜克”运动的经验，又总结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前的秘密革命活动和自发的农民起义的经验，从而把革命思想提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拉科夫斯基认识到保加利亚的解放只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但是，人民不能自发地武装起来，必须由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来领导和指引。拉科夫斯基认为，这种力量可由一支在某个与土耳其处于敌对关系的巴尔干邻国建立起来的、人数不多的保加利亚军队来担任。

1861年塞尔维亚与土耳其之间所处的紧张状态，使拉科夫斯基得以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按照他自己的关于革命的战术思想，并在塞尔维亚政府的支持下，他着手建立一支保加利亚部队，称之为“军团”。拉科夫斯基召募志愿人员的呼吁，在爱国青年中获得了热烈响应。志愿人员从保加利亚和保加利亚流亡侨民所居住的一些国家涌往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军团迅速扩充到六百人。

拉科夫斯基料想塞尔维亚与土耳其之间将爆

发战争，便据此制订了在保加利亚组织起义的具体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塞土战争一开始，军团将立即进入保加利亚，沿着巴尔干山脉的山脊前 179 进，并在途中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在保加利亚境内也要组织一些委员会，其任务是使各地的暴动迅速扩大，并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拉科夫斯基确信他能用这种方式建立一支兵力可观的革命军队，足以与敌人抗衡。至于这一起义的总领导，按计划将由一个以拉科夫斯基为首的保加利亚临时政府负责。

1862 年初，塞尔维亚人与土耳其人在贝尔格 180 莱德发生了武装冲突。驻守要塞的土耳其卫戍军炮轰城区，塞尔维亚人则以围攻要塞作为回击，一场激烈的战斗爆发了。

保加利亚军团在拉科夫斯基率领下，积极参加了城区发生的冲突和塞尔维亚人对土耳其卫戍军的战斗。

然而，塞尔维亚与土耳其之间并没有爆发正式的战争。冲突由于欧洲国家的外交调停而得到解决，拉科夫斯基解放保加利亚的计划遭到了挫折。这种新的形势使保加利亚军团不可能继续留

在塞尔维亚。在塞尔维亚政府的要求下，它只好于1862年9月解散了。

保加利亚国内期待着军团入境的那些拉科夫斯基的拥护者，早已在图尔诺沃地区建立了一支起义支队，并已向巴尔干山脉进发。在土耳其军队的追击下，它被击败而溃散了。被派率领一支小支队进入保加利亚发动暴动的帕纳约特·希托181夫，在同土耳其人进行了几次小规模战斗之后，也被迫向塞尔维亚撤退。

1863年，拉科夫斯基曾在塞尔维亚政府的同意下去希腊和门的内哥罗，试图组织一个反土耳其的巴尔干联盟。不久，他就认识到这一时机尚未成熟，于是便离开贝尔格莱德移居到罗马尼亚，并着手出版一份定名为《未来报》的报纸。

1866年，土耳其帝国上空又一次风云密集。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举行了暴动，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迅速恶化。也在这一年，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废黜了库扎大公，把卡罗尔大公（后为国王）拥上了宝座。土耳其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苏丹的宗主权，便在多瑙河上集结军队对罗马尼亚政府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俄国乘法、德两

国矛盾增长之机，也采取了更为活跃的近东政策。于是，在它的庇护下，巴尔干各国组成了以塞尔维亚为首的联盟，准备对土耳其采取联合行动。

这一连串的重大事变，在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引起了骚动。

1866年，以伊凡·卡萨博夫为首的一个保加利亚侨民集团，与罗马尼亚政府代表签订了一项建立罗保反土耳其神圣联盟的协议。此举的倡议者就是在废黜库扎大公时起主导作用的那个罗马尼亚委员会，它希望一旦土耳其对罗马尼亚作战，保加利亚国内能爆发起义。卡萨博夫及其赞助者建立了一个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负责准备和宣布在保加利亚发动起义。但是，起义必须事先取得罗马尼亚委员会的同意，从而使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处在从属于罗马尼亚委员会的地位。

其后，由于土耳其政府放弃了对罗马尼亚作战的意图，神圣联盟已对罗马尼亚改良主义者失去重要性，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便与之分开，并以一个独立组织而继续存在着。

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改 182

良主义的组织。它在1867年发表的一份备忘录中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纲领，即建议创立一个二元制的土耳其——保加利亚君主政体，其形式与同年宣布的奥匈君主政体相似。

亲俄的保加利亚大资产阶级也在这时进行了一项政治活动。他们在布加勒斯特组织了一个以富商赫里斯托·格奥尔基耶夫为首的所谓长老委员会。1867年初，这个组织按照俄国外交官员的建议，同塞尔维亚政府举行了谈判，其目的是结成一个反对土耳其的联盟，并在取得最终胜利后建立一个联邦性质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国家，即南斯拉夫王国。

在此期间，曾暂时离开罗马尼亚的拉科夫斯基又回来了。他大力发动了一个反对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的运动，再度把革命的保加利亚侨民团结在他的周围。拉科夫斯基反对使保加利亚的革命运动依附于外国的政策。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称为最高民军司令部，其目的是建立一些武装支队，并使它们团结一致和服从严格的革命纪律。为此，他还替这些支队起草了一个纲领。

1867年，拉科夫斯基终于设法组成了两个武

装支队，并委派帕纳约特·希托夫和菲利普·托提乌分别担任其统领。但是，在这些极度紧张的革命活动中，他患了重病，于1867年10月8日逝世。

显然，在拉科夫斯基的以全民性武装起义解放保加利亚的计划中，他着重于在某一邻国建立革命支队。这也就是拉科夫斯基的所谓支队战术。

力量尚未巩固、组织尚未健全的保加利亚民族革命运动，因拉科夫斯基的逝世而失去了自己最卓越的理论家和最杰出的领袖。由于当时还找 183 不到一个有声望、有经验的革命者立即接替他的工作，这一损失就尤其严重。保加利亚的民族革命运动也因此一度为流亡侨民中的资产阶级建立的长老委员会和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所左右。

当时，长老委员会正与塞尔维亚政府谈判成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联盟，它决定将拉科夫斯基所创建的武装支队派到保加利亚去了解人民的情绪。这两个支队的统领还受命不得组织起义，避免与土耳其人交战，仅仅是观察人民是否已经作好起义的准备。

帕纳约特·希托夫的支队于1867年4月28

日渡过了多瑙河，向巴尔干山脉东部斯利文和科特尔两城之间的地区进发。附近城乡青年听说支队开到，纷纷赶来要求统领接纳他们入伍，或者允许他们组织暴动。然而，帕纳约特·希托夫却遵照所接受的命令，拒绝了这些要求并让他们耐心等待。支队于是又沿巴尔干山脉西进，去了解保加利亚其他地区人民的情绪。

菲利普·托提乌的支队，于1867年5月17日在斯维希托夫渡过多瑙河。当抵达图尔诺沃区佛博符卡村时，它被大股土耳其地方武装包围，双方发生了激战。尽管保加利亚革命者英勇顽强，支队还是被战败而溃散。菲利普·托提乌领着部分人员设法突围，边战边走，到达了巴尔干山脉，并在兹拉提察城与帕纳约特·希托夫的支队会合。后来，他们一边继续与土耳其人作战，一边向塞尔维亚撤退。

这两个支队的进入保加利亚，以及它们同土耳其地方武装的战斗，在保加利亚人民中间留下了深刻印象。保加利亚的爱国青年大受鼓舞，他们的战斗精神也因而增强。由于当时国际局势正184处于紧张状态，这两个支队也在土耳其统治集团

及其西方保护国中引起了惊惶不安。

长老委员会把支队派入保加利亚后，又与塞尔维亚政府达成协议，在贝尔格莱德开办了一所训练保加利亚青年的军校，以便为日后在保加利亚的起义准备军事指挥人员。约有二百名青年志愿人员入了学，由塞尔维亚军官加以训练。

在此期间，土耳其的国际形势开始好转。由于奥匈帝国的影响，塞尔维亚政府放弃了同土耳其作战的意图。克里特岛的起义也行将失败。俄国政府又改变了外交政策，转而倾向于同西方列强就近东问题达成协议。

在这种局势下，培养保加利亚青年的军校（也称为第二军团）如继续在贝尔格莱德开办，将对塞尔维亚政府大为不利。于是，它就在1868年春关闭了。

保加利亚青年革命者因受某些塞尔维亚军官的侮辱，又对长老委员会的政策感到绝望，就离开塞尔维亚到了罗马尼亚，决心沿着拉科夫斯基所指引的道路独立地继续进行斗争。拉科夫斯基的两个杰出的追随者——斯利文的哈治·迪米特尔·阿森诺夫统领和土耳恰的斯特凡·卡腊扎统

领，又着手组织一个大支队。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乘保加利亚青年爱国者对长老委员会失望之机，决定支持这两位统领，以便利用这个支队的进入保加利亚，实现其建立二元制君主政体的政策。

1868年7月16日，哈治·迪米特尔和斯特凡·卡腊扎组成的一百二十五人的支队，渡过了多瑙河向巴尔干山脉进发。

支队一路上击退了土耳其地方武装的多次猛烈进攻，向南方挺进并到达了图尔诺沃区维肖夫格勒村附近的坎路德雷。它在这里又遭到了大量土耳其军队的进攻。这是一场殊死激战，支队中185有很多人阵亡。斯特凡·卡腊扎受了重伤，被俘获并解送到鲁塞，后因伤重而死于狱中。为了恫吓保加利亚居民，土耳其当局把这位统领的尸体吊在绞刑架上。

哈治·迪米特尔率领支队中还活着的革命者突破重围，到达巴尔干山脉的布兹路贾山（即今日的哈治·迪米特尔山）。土耳其当局派出许多部队追击他们。7月18日下午，这些革命者又被土耳其正规军包围了。他们宁死不屈，血战到底，

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哈治·迪米特尔统领也在这场激战中阵亡。

国内革命组织的创建　六十年代民族革命运动的经验，使保加利亚革命者中的有识之士得出如下重要结论：186

第一、要发动人民起来暴动，不能靠外来的武装支队，必须在国内进行长时期的准备工作。这一点已经清楚。

第二、保加利亚开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并不赞成革命，一味依靠外国干涉和外国援助；因此，他们总是竭力使革命运动从属于这一国或那一国的政策。这一点也已经清楚。

第三、保加利亚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沿着自己的独立道路前进；保加利亚人民必须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

第一个得出上述结论的人是瓦西耳·列夫斯基。人民恰如其分地称他为“保加利亚解放的使徒①”。

①使徒，Apostle，原指耶苏基督的门徒，此处用以借喻列夫斯基宣传革命真理，一如使徒当年宣传基督教义，起到了极为巨大的作用。——译者

瓦西耳·伊凡诺夫·孔切夫，后称列夫斯基，1837年7月6日诞生于卡尔洛沃（当时发达的工业中心之一）。列夫斯基的父亲是城里的手艺人，不幸早死，遗留下人口很多的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因此，少年时代的瓦西耳仅能勉强在故乡读完小学，接着又在旧扎果腊读了两年初中。列夫斯基因渴于求知，接受了他的舅父要他当修士的建议，条件是送他去俄国继续受教育。他成了教会中的一名执事，但其舅父却没有信守诺言。

1861年春，列夫斯基在保加利亚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的影响下，脱下教服，到贝尔格莱德参加了拉科夫斯基的志愿军团。他的革命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1867年，列夫斯基是帕纳约特·希托夫支队187的一个成员。1868年，他进了贝尔格莱德军校（第二军团），因患重病而未能参加哈治·迪米特尔的支队，但却于同年末受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派遣进入保加利亚宣传其主张，行迹遍于全国。1869年，他再度奔走于保加利亚境内，到过许多城镇和村庄。

188 列夫斯基两度走遍保加利亚全境，对他日后

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他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并得以更深刻地体会保加利亚人民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愿望和心情。第二次旅行结束时，列夫斯基已经确信：为了解放保加利亚，必须首先在人民中间进行持久的和系统的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这就是他在1869年7月带回罗马尼亚的一些想法。在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列夫斯基试图说服保加利亚流亡侨民中间那些有声望的人物，使他们认识在保加利亚国内开展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必要性。但是，他的努力毫无成效。正象他自己后来所写的那样，侨民中最有声望的人物分裂成不同营垒，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有的把保加利亚的解放事业与俄国的政策相联系，有的把它与塞尔维亚的政策相联系，还有的则把它与西方各国的政策相联系。

列夫斯基认识到侨民之中无人能为革命运动指出正确方向，便于1870年5月末又进入保加利亚，亲自着手建立国内的革命组织。

瓦西耳·列夫斯基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是

一个坚定不移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真正反映了城乡群众的情绪、利益和愿望，以及他们摆脱土耳其封建制度的意志。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在他为所建立的革命组织起草的章程中，列夫斯基把它的根本目标规定如下："通过普遍的、全面的革命，推翻现存的暴君专制的国家制度，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国。"他认为，在保加利亚民主共和国中，各民族将和睦相处，互相友爱，完全平等；他们将用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管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尊重土耳其人民，并宣称他所号召反对的仅仅是土耳其的"暴君专制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那些人。

189 列夫斯基坚决反对鼓吹任何形式的君主制度。他写道："我们将高举一面旗帜，上边写着'神圣纯洁的共和国。'"他还对那些拥护苏丹统治的保加利亚"乔尔巴德日"说："保加利亚将没有国王，而只有一个人民的政府。"由于深信唯有民主共和国才能够为保加利亚的各族人民确保真正的繁荣、自由与平等，他在他所起草的章程中规定，任何一个企图组织党派反对民主共和国和建立君主统治的人，都要被处以最严厉的惩罚。

作为一个革命者和群众领袖，列夫斯基具有罕见的品质：精力充沛，刻苦耐劳，无畏，冷静，善于当机立断，并能迅速判定人们的长处和弱点。他的性格坚强如钢，待人极为诚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列夫斯基自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也要求别人严格遵守纪律。

在列夫斯基考虑着创建国内革命组织的同时，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侨民中还出现了另一位重要的革命者柳宾·卡腊维洛夫。他在写作和新闻报导方面具有很大才能，是保加利亚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以出版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和民主观念的优秀组织者。

柳宾·卡腊维洛夫1834年出生在科普里符希提察。他的父亲是一个殷富的包税商，这就使他有条件受到良好教育，并能遍游全国，研究保加利亚人的生活状况。1857年，卡腊维洛夫到俄国继续其学业。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卓越的俄国革命者，研究了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说，并在思想成长上受到这两个人很大的影响。

1867年，卡腊维洛夫在塞尔维亚定居下来，

致力于文学工作和新闻事业。他从塞尔维亚为一些俄国报纸撰写通讯，向俄国舆论界报导南部斯190拉夫民族问题的有关情况。他在贝尔格莱德与名为“青年”的塞尔维亚自由主义组织有所联系，并对它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来，卡腊维洛夫由于在他所写的批判性通讯文章中触犯了塞尔维亚政府，被驱逐出境，移居到当时由奥地利统治的诺维萨特。塞尔维亚大公遇刺后，卡腊维洛夫因与塞尔维亚进步人士有联系而一度被捕入狱。

1869年秋天，卡腊维洛夫开始在布加勒斯特出版《自由报》。这份报纸当即成为革命事业的主要喉舌，在动员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力量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后来他又出版了《独立报》，实际上是《自由报》的继续。在这些报纸上，他无情地批判了日益崩溃的土耳其封建制度和列强在近东的反动政策，宣传了民族革命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并对那些拥护土耳其统治保加利亚的人进行了无情揭露。他在用革命精神对保加利亚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方面，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

卡腊维洛夫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是保

加利亚革命民主运动中最有才干的思想家之一。他尖锐地抨击了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那些资 191 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二元制纲领，充分地论证了这一纲领的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对长老委员会的头子及其反动政策，他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卡腊维洛夫并不否认为争取保加利亚教会自治和发展保加利亚教育事业而斗争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能从土耳其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下解放保加利亚人民的，决不是这种斗争，而是革命。他在 1870 年发表的一个纲领中，对巴尔干半岛各基督教民族——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建议按民主原则成立一个巴尔干联邦。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卡腊维洛夫也反对保加利亚的“乔尔巴德日”，因为他们拥护土耳其的统治，压迫人民群众。上述纲领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把我国的‘乔尔巴德日’也列为敌人之一，并将随时随地镇压他们”。

列夫斯基回到保加利亚后着手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地方革命委员会。必须建立许多这样的委员会，形成稠密的网点，以便与群众建立

直接联系，并把他们动员起来。为了这个目的，列夫斯基经常忙于奔波，他不知疲倦地到许多城镇和乡村走访农民、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商人和神父，向他们灌输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并使他们与革命委员会建立联系。几个世纪以来，对专横的土耳其当局那种强权和残暴的恐惧，已经渗透到保加利亚人民的灵魂深处，要消除这种心理状态是不容易的。列夫斯基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更为显著，到 1870 年末，他已建立起为数相当可观的委员会，从而为国内的革命组织奠定了基础。他在苦难深重的农民群众中取得的成就最大，这一点列夫斯基在他交给土耳其预审官的证据中就亲自有所记述。目击这些事实的民族诗人伊凡·瓦佐夫在献给列夫斯基的诗中写道："淳朴的农民把他称为圣人。"

列夫斯基一边建立各革命委员会，一边让它192们彼此取得联系。为此，他还组织了一个秘密交通站，由各个革命委员会的信使为它服务。各革命委员会以及一些较为知名的成员均有代号，以防万一信件落到土耳其当局手中时被发现。国内组织与保加利亚流亡侨民之间，则通过罗马尼亚

的土尔努——马格里利城中列夫斯基的拥护者保持联系。

国内革命组织的核心领导，称为保加利亚临时政府，后来改名为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这一组织的任务及其各级机构，中央委员会和各革命委员会的权利与义务，对违犯纪律者的惩处等等，都规定在由列夫斯基起草的章程，即他所称的《保加利亚解放工作者守则》之中。章程中还规定中央委员会设于保加利亚国内，但并未具体规定设在那个城镇。实际上，当时列夫斯基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是在洛佛奇城。

列夫斯基及其战友们，在建立革命组织的同时，千方百计地为它提供武器，并对其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列夫斯基指示革命委员会从一切可能的地方筹集武器。但是，为了在以后举行起义时武装人民，还必须从国外购入大量的武器。这就需要一大笔款项，而各革命委员会募集所得却寥寥无几。列夫斯基只好在富裕的“乔尔巴德日”身上打主意，并威胁他们不得拒绝，也不得向当局告发，否则将予以严惩。

1871年，革命组织获得了发展，领导它们以

及为其筹集武器的任务也相应地加重了。列夫斯基于是指定迪米特尔·奥勃什提和安格尔·孔切夫担任他最亲近的助手。迪米特尔·奥勃什提曾参加贝尔格莱德的第一军团，还在伟大的意大利革命家加里波第所领导的支队中当过志愿兵，后来又参加过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起义。他是一个193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但却刚愎自用，目无纪律；无数事实表明，他不能胜任领导革命组织的工作。列夫斯基很快地就发现了他的这些缺点，而不再加以信任。安格尔·孔切夫是一个热情、诚恳和忠贞的革命战士，但他在保加利亚进行革命活动的时间却是短暂的。一次当他从鲁塞乘船越境去罗马尼亚时，土耳其当局企图加以逮捕，他为了避免被敌人活捉而举枪自杀了。

在此期间，欧洲的一些重大事件——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苏丹土耳其的主要保护人）的垮台、意大利爱国者对罗马的攻占以及巴黎公社的斗争——在巴尔干的各基督教民族中重新引起了骚动。侨居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保加利亚人激动起来，其中部分指望塞尔维亚与土耳其之间发生战争的人，认为这是与塞尔维亚政府谈判采

取联合行动的有利时机。但是，列夫斯基却写信对这些侨民中的革命工作者作了严肃的回答，告诉他们在保加利亚人民未为武装起义作好充分准备之前，不要与任何政府举行谈判。列夫斯基写道，保加利亚革命的问题，将由保加利亚人民和他们的国内革命委员会来决定；没有中央委员会的许可，谁也无权采取任何行动。

列夫斯基在尖锐地批判侨民革命者的错误思想及其内部不和的同时，要求一切爱国力量、一切真诚的革命者在革命组织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对柳宾·卡腊维洛夫特别尊重。经过长时间的协商后，终于达成了协议，由国内组织和侨民分别派代表在罗马尼亚举行大会，讨论革命运动的有关事宜。

1872 年 4 月末，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大会。大会采纳了列夫斯基为革命组织所起草的章程，拟订了一个新的纲领，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柳宾·卡腊维洛夫；副主席，基尔亚克·燊科夫；秘书，奥[194]里姆皮伊·潘诺夫；司库，迪米特尔·策诺维奇；委员，帕纳约特·希托夫和瓦西耳·列夫斯基。

按照章程的规定，中央委员会的每一成员，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持有由中央委员会授以特权的信件，均可代表中央委员会行事。中央委员会把这样一封信授与列夫斯基，要求他继续领导保加利亚国内的革命组织。

大会所通过的新纲领，确定了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精神上的革命和武装斗争解放保加利亚。”为了避免讨论未来的保加利亚政府的形式，纲领规定这一问题将于解放后根据人民的意志来解决。纲领强调了保加利亚人民愿与巴尔干各族人民兄弟般地和睦相处，并愿与他们结成联邦，又强调了保加利亚并不反对土耳其人民，而只是反对土耳其政府，最后还写上了这样的结语：“总之，全世界各国人民，不分其信仰与民族，只要同情我国神圣的和正义的事业，我们都把他们认为是我们的朋友。”

大会以后，列夫斯基回到保加利亚，以更加充沛的精力继续工作。他带回了大会通过的章程，指示各革命委员会加以充分研究，以免犯错误。他募集款项用以购置武器，负责安排某些人员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在暴动中担任领导，并建立了一

些新的地方委员会。革命组织发展得越来越多，为了便于领导工作，列夫斯基又着手创设革命区，分别由区革命委员会加以领导。

然而，1872 年末，土耳其当局却出其不意地给了国内革命组织以沉重打击，起义的准备工作暂时打乱了。迪米特尔·奥勃什提为了想搞到组织活动经费，未经列夫斯基同意，擅自决定拦劫土耳其邮车。1872 年 9 月，他调集一个小支队，195 在阿腊巴康纳克隘口袭击了运送土耳其公款的邮车。奥勃什提的轻率行动，给民族运动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一个月后，土耳其当局查出了邮车袭击者，逮捕了许多人，迪米特尔·奥勃什提也在其中。被捕者，尤其是奥勃什提，供出了许多情况，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新的搜捕。土耳其政府已搞清楚保加利亚国内有一个庞大的秘密革命组织，其主要鼓动者和领导人就是列夫斯基。为了捉拿他，当局向各城镇逐一传示他的照片，并派遣侦缉人员四出追踪。

当列夫斯基得知革命组织在保加利亚北部受到意外打击时，他正在保加利亚南部各地进行惯常的巡视。他不同意中央委员会关于立即举行起

义的建议，因为他觉得人民既未作好准备，时机也不利。他决定立即去罗马尼亚，与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研究在保加利亚出现的新形势。在去罗马尼亚途中，他到洛佛奇取当地委员会的档案，要委员会司库克鲁斯提乌神父提出财务报告。

列夫斯基在洛佛奇发现，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已全部遭到破坏。与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被捕的克鲁斯提乌神父被吓破了胆，堕为土耳其警方的密探。他接受了协助捉拿列夫斯基这一条件后被放了出来。列夫斯基收拾好委员会的档案后，动身前往图尔诺沃，途中在库克林纳村附近的一家小旅馆过夜。土耳其警察接到克鲁斯提乌神父的密告，包围了这家旅馆。列夫斯基企图突围，但交战不久即受伤被俘。

他和革命组织其他被捕成员，在索非亚受到了特别法庭的审讯。列夫斯基在法庭上表现得立场坚定，大义凛然。1873 年 2 月 6 日，他被处以绞刑。迪米特尔·奥勃什提也被绞死。其他成员则被判处徒刑，流放到小亚细亚。

196 列夫斯基死后，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争吵和纠纷，从而妨碍了它对革命运动实行坚强有力

并始终如一的领导。再也找不到一个足以代替列夫斯基来直接领导国内组织的人。中央委员会曾把这项重任委托给一个青年教师阿塔纳斯·乌祖诺夫，而他只干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在哈斯科伏被捕，与另一些革命者一起被流放到小亚细亚。被指定接替他的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同样未能有多大作为。

在此期间，土耳其国内外局势继续恶化。由于面临经济崩溃的危险，土耳其政府便乞灵于再度加重赋税。1874年夏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旱灾，接着又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农民的牲畜因缺乏饲料而饿死了成千上万头，甚至连人也有死于饥馑的。尽管灾荒如此严重，土耳其政府还是继续对保加利亚农民进行了无情的掠夺。

怨愤不满遍及于全民。在保加利亚举行大规模群众起义的条件至此已经成熟。1875年6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又发生了暴动，进一步打击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保加利亚出现的革命形势，要求加紧革命宣传，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为起义作好准备。以赫里斯托·波特夫为首的青年革命者担起了这项任

务。为了使革命组织能有自己的机关报，波特夫于1874年末办起了一份《旗帜报》。1875年8月，革命者举行了一次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赫里斯托·波特夫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

波特夫于1848年12月25日诞生在卡洛弗城。他的父亲博提乌·佩特科夫曾就学于俄国，是一个知名的教师和学者。波特夫在卡洛弗城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863年，他去俄国人敖德萨第二男子高级中学就学，并享有敖德萨保加利亚人协会为帮助有志求学的保加利亚青年而设的奖学金。但是，敖德萨的保加利亚富商，因波特夫与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些著名代表人物有所来往而对197他不满，在第二学年末就取消了他的奖学金。虽然此后一直无以为生，他还是在俄国又逗留了一年。

在俄国度过的三年，是波特夫思想成长的重198要时期。他在那里研究了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两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还如饥似渴地接连读完了许多伟大的俄国诗人和作家的著作。

1867年，波特夫回到了保加利亚。当他在卡

洛弗学校中暂时代他父亲任教时，波特夫的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给其他教员和卡洛弗的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纪念西里耳和梅索迪亚斯的5月11日那天，他发表了一篇激烈的革命演说，吓坏了“乔尔巴德日”和一些胆小的人，却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欢迎。同年，波特夫去罗马尼亚，与进步的保加利亚侨民取得了联系，并致力于革命活动。

波特夫于1871年出版了一份名为《保加利亚侨民论坛》的报纸，他的宣传家的杰出才干，也从中首次显示出来。1872年，他迁居到布加勒斯特，同卡腊维洛夫一起先后编辑了《自由报》和《独立报》。同时，他自己还出版了一份讽刺性的报纸，称之为《闹钟》。

赫里斯托·波特夫不仅是保加利亚解放前时期最伟大的诗人，而且也是保加利亚民主革命的杰出思想家。在这个时期里，保加利亚的革命思想通过他发展到了最高峰。

波特夫禀性聪慧，富有洞察力，刻苦自学，知识渊博。他接受了当时在俄国和西欧盛行一时的最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潮。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

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主要是一些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信徒。同他们一样，他认为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又从手工业的同业公会和各种男、女文化团体中，看到了将来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社会的萌芽。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波特夫把农民看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199他还研究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并十分赞賞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斗争和巴黎公社的斗争。

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波特夫又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某些著作。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开始领会到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以及世界各国工人的阶级团结的重大意义。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热情奔放地谈到马克思所创立的第一国际。但是，波特夫却没有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保加利亚在经济上所处的落后状态，使他无法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由于他的祖国既无发达的工厂工业，又无工业无产阶级，他当然不可能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当时，保加利亚正处于民族民主革命前夕，因此在波特夫的政论文章中，对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宣传占了主要位置。他看清了分崩离析的土耳其封建制度必将在保加利亚崩溃，因而不断地号召保加利亚人民起来进行无畏的斗争。由于对当时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反动、自私政策了如指掌，他又谆谆告诫保加利亚人民，首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赫里斯托·波特夫热情地支持巴尔干各民族联合起来结成兄弟般的联盟这一想法。但他反对通过与现存的各资产阶级——君主制政府谈判来达成这样一种联盟。他认为，唯有自由的民族，才有可能在民主原则上结成联邦同盟。他也赞成为了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和苏丹暴政，与土耳其人民达成兄弟般的谅解。波特夫这样写道："容许苏丹和资本家存在的现有社会制度，是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苦难的根源。因此，任何被这种制度剥夺了人权的人，任何由于它而注定要在贫困和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任何仇恨这种非人境遇并希望获得解脱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

以波特夫为首的新中央委员会，立即着手准200备起义。青年革命者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和尼古拉·奥布雷特诺夫被派到了保加利亚，其任务是在人民中鼓动起义，号召他们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与此同时，委员会还委托帕纳约特·希托夫和菲利普·托提乌负责组织一些大的支队，以便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协助人民起来暴动。为了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者取得联系，委员会又派了一个代表去贝尔格莱德。波特夫自己则去俄国向那里的保加利亚侨民募集款项，而更主要的是劝说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的保加利亚军官辞职回国，在起义中担任指挥官。

9月初，斯塔姆博洛夫到达了旧扎果腊，他把当地革命委员会成员召集起来，向他们提出了立即宣布起义的问题。革命委员会成员以及周围村庄派来的人，绝大多数都赞成宣布起义，日期定于1875年9月16日。

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在没有做好必要准备时就决定立即宣布起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考虑到当时国内革命组织已经大为削弱这一事实。自列夫斯基牺牲以后，没有人再使各革命

委员会时刻保持着战斗准备，也没有人供应武器，并在人民中进行系统的宣传。由于革命组织所处的这一不良状态，起义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错了。

9月16日傍晚，一队起义者在旧扎果腊举事，并在城郊占领了一个据点，等待起义农民的到来。事实上夜间真来了一大批农民，但由于联络太差，起义领导人却未能与他们接上头。黎明时，农民各自回家，旧扎果腊的这队起义者也就只好撤退，并在与土耳其人进行了几次小规模战斗后溃散了。

在舒门和鲁塞两区，举行起义的尝试也都没有成功。虽然在这两处都出现了起义者的支队，201 但当他们确信邻近各区都没有举行起义时，也就迅速解散了。

土耳其当局利用这一机会，对保加利亚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借以恫吓他们。如在旧扎果腊就有七十八人被捕，交特别法庭审讯，其中七人判死刑绞决，其余的关进了监牢。

1876年的4月起义 1875年9月的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保加利亚爱国人士并未因此丧失信心。日益尖锐的土耳其内部危机，已使革命的

爆发成为必然，保加利亚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对这一点，不仅保加利亚革命者、就是土耳其的西方保护国也都同样看得清清楚楚。例如，英国《泰晤士报》就认为，要想使土耳其复活并重新成为一个强盛的文明国家，就象要复辟神圣罗马帝国一样，根本没有可能。这家报纸写道，“尽管土耳其的前途已显得相当黯淡，如果黑塞哥维那的暴动再继续几个月，如果奥地利和俄国放松对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的控制，如果这一愤怒的烈火蔓延到保加利亚，那么，土耳其的前途还将会更加黯淡。在这种情况下，东方问题就很可能会出现那种恰恰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所要竭力避免的形势。”

革命组织的代表们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他们于 1875 年年末在罗马尼亚朱尔朱城聚会，建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大规模起义。按所订计划，保加利亚被划分为四个革命区：保加利亚东北部为第一革命区，以图尔诺沃为中心；保加利亚东南部为第二革命区，以斯利文为中心；保加利亚西北部为第三革命区，以202弗拉查为中心；保加利亚西南部和普罗夫迪夫地

区为第四革命区，以普罗夫迪夫为中心。

中央委员会给每一革命区委派了一位主要领导人和两位助手。第一革命区的主要领导人为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助手为赫里斯托·卡腊敏科夫和格奥尔基·伊兹米尔利耶夫。伊拉利昂·德腊哥斯提诺夫为第二革命区领导人，斯托伊耳统领和格奥尔基·奥布雷特诺夫为其助手。斯托扬·扎伊莫夫被任命为第三革命区领导人，以尼古拉·奥布雷特诺夫和尼古拉·斯拉夫科夫为助手。而帕纳约特·沃洛夫则为第四革命区领导人，其助手为格奥尔基·本科夫斯基和格奥尔基·伊科诺莫夫。

各区主要领导人（也被称为使徒）及其助手的任务，是准备并领导本区的起义。

1876年初，各使徒及其助手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分别到达各区，着手准备起义。

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及其助手到达第一革命区后，立即出发走访本区的城镇和村庄。他们加强了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振奋了居民的战斗精[203]神。不少勇敢的本地革命者前来协助他们，其中有比亚拉·切尔克伐村的巴乔·基罗·彼得罗夫、

塞夫利厄伏的斯特凡·帕谢夫、加布罗沃的粲科·迪尤斯塔巴诺夫等多人，他们都早已赢得当地居民的尊敬和信任。

在第二、第三革命区，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同样在进行之中。

第四革命区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最为广泛，其中心则由普罗夫迪夫改为帕纳吉尤里希特。沃洛夫和本科夫斯基不断地四出奔走，除加强已有的革命委员会外，还建立起来一些新的革命委员会。同他们一起积极活动于该区的，还有许多在当时起到重要作用的勇敢的革命者，如科普里符希提察的托多尔·卡勃列什科夫、梅德文村（在科特尔附近）的扎哈里·斯托扬诺夫、帕纳吉尤里希特的巴维尔·鲍别科夫、布腊戚果伏的瓦西耳·佩特列什科夫等人。准备起义的过程中，格奥尔基·本科夫斯基在所有的革命人员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干劲，他的坚定，以及他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使他在第四革命区被一致公认为主要的使徒。

本科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也从军事方面着204眼，为准备起义作了巨大努力。凡是能拿起武器

的人，都被组织成十人、百人或千人的队伍。各队都委派了指挥官。革命委员会购置了许多武器弹药。不少地方的起义者还造了木炮，准备用以对付土耳其的炮兵。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革命委员会都秘密地组织了操练和军事演习。

1876年4月初，第四革命区的使徒们决定召集一次会议，讨论有关准备和宣布起义的一些问题。会议于4月14日在斯雷德纳戈腊山脉一个名叫奥博里希特的地方（距帕纳吉尤里希特不远）举行。这就是保加利亚的第一次革命的国民大会。第四区各革命委员会有五十六名代表参加，连同大会的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其他人员，共有三百多人在奥博里希特集会。

格奥尔基·本科夫斯基在这次会议上起了主导作用。他凭着自己坚定不移的革命性，克服了205某些犹豫不决的代表的反对，并把主张立即发动武装斗争的代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大会根据本科夫斯基的提议，决定授予各使徒以宣布并领导起义的权力。起义的日期也定为1876年5月1日。

在全体代表的一片高昂热情中，奥博里希特

大会闭幕了。代表们接着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继续满腔热忱地为起义进行准备。

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泄密的措施，土耳其当局还是对奥博里希特大会上所作出的决定有所风闻，并立即派警察部队分头到帕纳吉尤里希特和科普里符希提察去搜捕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土耳其警察企图在科普里符希提察逮捕卡勃列什科夫，但他设法逃脱并隐蔽了起来。他把当地委员会的成员召集到一起，经过简短磋商，决定提前宣布起义。

206 1876年4月20日，起义者的武装部队攻占了当地的土耳其政府衙门，并在教堂鸣钟作为城区起义的信号。科普里符希提察的居民，第一个宣布推翻了长达五个世纪的土耳其统治。在一片无法描绘的欢腾之中，卡勃列什科夫给帕纳吉尤里希特的使徒们去信报告了科普里希提察的解放，并表明当地居民深信普遍的起义也将来临。

以本科夫斯基为首的使徒们一接到卡勃列什科夫的来信，立刻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帕纳吉尤里希特当即也获得了解放。全城居民怀着难以形容的欣喜，热情高涨地准备为捍卫他们新赢得的

自由而战斗。同时，本科夫斯基又组成了一支名为“飞行支队”的起义者的骑兵支队，奔赴乡村发动人民起义。起义迅速扩大到第四革命区的许多村庄和小城镇。马里查河右岸揭竿而起的，有佩鲁希提察、布腊威果伏、巴塔克等一些大村庄。这样一来，全区相当大的一部分地方就落到了起义者手中。

在此期间，土耳其政府急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镇压起义。开始时，他们把大批装备优良的“巴希——巴佐克”部队派往起义的城镇和村庄，随后又派去了正规部队。毫无疑问，土耳其人可以调遣的兵力，远远超过了保加利亚起义者。此外，起义者的武器绝大部分都已陈旧过时，而就连这样的武器也为数不足。

土耳其人首先进攻斯特雷耳恰村，虽然农民奋勇抵抗，村庄仍然被毁。接着，他们又向克利苏腊城发动了进攻。当地居民英勇地进行了抗击。但这座城也被攻占，并全部焚毁。其后就轮到了帕纳吉尤里希特。土耳其政府派来攻城的不但有“巴希——巴佐克”部队，而且还有大量正规军，步、骑、炮兵俱全。整整三天，帕纳吉尤里希特

的居民勇敢地捍卫了第四革命区的首府，坚决击207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在4月30日，城内因土军大炮轰击而着火，“巴希——巴佐克”和土耳其正规军乘机而人，大肆劫掠，不分男女老幼都惨遭屠杀。

与此同时，斯雷德纳戈腊山脉西部的埃累季克山上，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因为邻近村庄有大批起义农民携家带口聚集在那里。本科夫斯基及其支队起初也在埃累季克山上，在获悉帕纳吉尤里希特处境危急之后，决定前往支援守城的起义者。接着，农民盖内·帖利伊斯基担负了领导埃累季克山上的农民起义者的任务。但是，他们的阵地却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攻而告失守，帖利伊斯基也阵亡了。

佩鲁希提察在“巴希——巴佐克”和土耳其正规军的围攻下，也进行了一场英勇顽强的保卫战。土耳其人攻入村庄后，好几百个男人、女人和儿童撤退到一座教堂里，闭门死守，决心战斗到底。土耳其炮兵轰击教堂，起义者再也守不住了。科乔·契斯特门斯基和斯帕斯·吉诺夫，为了避免落人嗜血成性的敌人手中，先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儿女，接着就自杀了。

在布腊戚果伏，起义者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一再击退了“巴希——巴佐克”的进攻。他们直到土耳其正规军开到后才被迫放下武器，因为这时起义已经完全失败。那里的起义领袖瓦西耳·佩特列什科夫被俘，但他在被押往帕扎季克途中服毒自尽了。

土耳其的“巴希——巴佐克”在镇压巴塔克的起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攻入村庄后，在凶残的封建领主阿罕默德·巴鲁亭利亚指挥下，屠杀了男女老幼居民五千名左右。

第四革命区起义失败后，本科夫斯基带着一部分起义者向巴尔干山脉撤退，但在特特文附近遭到伏击而不幸阵亡。帕纳约特·沃洛夫、托多尔·卡勃列什科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起义领导人，也先后向巴尔干山脉撤退。卡勃列什科夫被俘，以后在加布罗沃狱中自尽。沃洛夫和伊科诺莫夫奔赴罗马尼亚，但在比亚拉城附近遭到土耳其地方武装袭击，并在涉渡扬特拉河时溺死。208

图尔诺沃革命区的起义规模没有帕纳吉尤里希特区那样大，只有个别几个村庄起义并组织了

武装支队。

贝拉切尔克伐、穆西纳、维肖夫格勒、迪钦、戈利亚莫亚拉雷等村庄的起义者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支队，由哈利东神父率领向巴尔干山脉进发，以便与其他起义队伍会合。他们在遭到土耳其军队袭击后，被迫退入德里扬诺夫修道院固守。一连九天，仅有旧式步枪的支队，英勇地击退了配备有新式步枪和大炮的土耳其军队的多次进攻。起义者弹尽援绝，企图夜间突围，但未能成功。在夜战中，支队被完全击溃，只有四十人活着逃出，其中之一是巴乔·基罗·彼得罗夫。然而，他后来仍然被捕并受审。巴乔·基罗在法庭上表现得极其勇敢和坚定。他的辩护律师在为他申辩时说他精神失常，巴乔·基罗当场否认了这种说法，庄严地声明他神志清醒，为保加利亚民族的解放而战斗。最后，他被判死刑绞决。

在属于图尔诺沃革命区的塞夫利厄沃地区，有巴托谢沃、诺沃谢洛和克鲁文尼克这几个大村庄举行了武装起义。与这些起义农民会合在一起的，有由粲科·迪尤斯塔巴诺夫率领的一支加布罗沃支队，以及由扬科·卡腊吉奥佐夫率领的一

支塞夫利厄沃支队。但是，在各村和在马腊季迪克山上进行了几场激战后，起义者也同样被全部打垮了。迪尤斯塔巴诺夫被俘，绞死于图尔诺沃；卡腊吉奥佐夫也在塞夫利厄沃被绞死。

斯利文革命区的运动软弱无力。只是在斯利文、延保尔和几个村庄组成了一些小支队，但它们先后都在与土耳其地方武装的零星战斗中失败了。

弗拉查区没有爆发起义，因为有大量土耳其军队集结在那里，准备对塞尔维亚作战。

1876年4月到5月的起义，以伟大的保加利亚革命家和诗人赫里斯托·波特夫率领的支队所进行的英勇战斗而告结束。 209

波特夫一听说在保加利亚已经宣布起义，便和他在罗马尼亚的战友们组成了一个约二百人的支队，迅速前往支援自己的人民。赫里斯特·波特夫任支队统领，尼古拉·伏伊诺夫斯基为军事指挥。

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起义者在不同的港口，分成数批，不引人注意地登上了奥地利船“腊德茨基”号；武器和军服用木箱包装，伪装成出国

的保加利亚蔬菜种植商的行李交到船上。航途中，一声信号，起义者即在波特夫率领下夺取了船只，强迫船长在保加利亚的科兹洛伊村附近靠了岸。1876年5月17日，支队就在这里登上保加利亚的土地，向弗拉查进发。

210 由于弗拉查区没有爆发起义，土耳其政府得211以集中全力来对付这个支队。支队在土耳其地方武装的追击下到达了米林卡木克高地，在那里同土耳其人进行了第一次大战斗。当晚，支队得以撤到佛斯勒茨高地。5月20日晨，支队向伏拉山移动时遭到大股地方武装和土耳其正规军的袭击。起义者迅速地占领了卡马腊、库彭、奥科耳奇察等高地，奋战终日，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傍晚时，山间暮色四起，战斗停止了；精疲力尽的起义者下山去附近一处山泉取水，波特夫与几位助手留下来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就在这时候，一颗敌弹突然飞来，使波特夫受了致命伤。他死后，支队分成几个小组活动，但都在土耳其的地方武装追击下先后被消灭了。

1876年的4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和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嗜血成性的土耳

其匪帮，灭绝人性地屠杀了约三万名保加利亚的男女老幼居民。巴塔克等一些村庄，变成了一片片大坟地。许多能干的保加利亚青年爱国者或捐躯于疆场，或惨死在绞刑架上。数以百计的城镇[212]村庄被洗劫焚毁，夷为平地。

4月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使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统治遭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起义也使保加利亚人民与土耳其苏丹的血腥暴政更加势不两立。正如许多文件所表明的那样，保加利亚爱国人士虽然暂时遭到了挫折，但并没有从此屈服，而是紧接着又立即着手准备进行新的战斗。当本科夫斯基站在斯雷德纳戈腊山脉的高处遥望一片火海中的帕纳吉尤里希特时，他对他的战友们讲了一句千真万确的话："我已经使暴君的心脏受到了重伤，他再也不能复原了。"4月起义还再次暴露了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封建统治的最最丑恶野蛮的狰狞面目，从而撕下了那些袒护苏丹暴政的西方国家所持反动政策的假面具，并为保加利亚人民赢得了整个民主世界的深切同情。

保加利亚的解放　1876年4月到5月在保

加利亚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尽管各国反动政府及其亲土耳其的新闻界竭力歪曲事实真相，以图混淆公众视听，对土耳其加以粉饰，但西方各国的民主主义者仍对土耳其的大量暴行进行了猛烈抨击，并纷纷出面为维护保加利亚人民而大声疾呼。盖·麦克加汉、舒勒尔、德·韦斯亭、施奈德尔以及其他一些公正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员，报导了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犯下的屠杀、抢劫等种种暴行，在西欧各国民主人士中激起了莫大愤慨。亲土耳其的报纸胡说什么保加利亚人民根本就不应该起来反抗，他们既然这样作了，那么遭到镇压就是咎由自取。麦克加汉对此作了最出色的回答，他写道，“事实乃是，保加利亚人民好几个世纪以来惨遭213的种种暴行、洗劫和压迫，除了这些保加利亚人以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民族，就连一天也都是忍受不了的。假使有人只不过是企图把那个国家现行的赋税制度搬到英国来的话，英国人民就一定会万众一心地起来反对政府。那么，凭什么我们要因为那些不幸的保加利亚人做了我们在类似情况下也都要做的事情而对他们横加非难呢？”

伟大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不仅大声疾呼地维护保加利亚人民，还对反动的西方各国政府进行了揭露，强调指出他们应对土耳其暴行负责。英国在野党自由党的领导人威廉·格莱斯登所写的几本小册子，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这些书中抨击了贝肯斯菲尔德爵士① 的亲土耳其政策，还列举了土耳其在保加利亚所犯暴行的种种事实。

在报纸所公布的暴行真相的影响下，英国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支持保加利亚人民的运动。大批英国工人、学者、作家和时事评论家纷纷提出了抗议。英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卓越代表查理·达尔文和奥斯卡尔·王尔德也都为捍卫保加利亚人民而向社会上发出了强烈呼吁。

在意大利，维护保加利亚人民的运动更为广泛。许多意大利城市举行了抗议大会和各种集会，参加的有大批意大利工人、知识分子和妇女。伟

①贝肯斯菲尔德爵士，Lord Beaconsfield，即本哲明·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年）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两度任英国首相，一贯推行维护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译者

大的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加里波第，在起义爆发时，向保加利亚革命者致意，祝他们成功；而当起义遭到镇压后，他又为保护保加利亚人民而大声疾呼。

但是，对1876年保加利亚所发生的事件反应最大的还是俄国。俄国报纸第一个刊载了4月起义的消息，以及保加利亚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关于土耳其匪帮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报导，在俄国的各社会阶层中激起了愤怒的风暴。一场广泛的214援助保加利亚人民的运动展开了。人们纷纷为保加利亚人民募款以减轻其苦难，向傲慢不逊的土耳其统治者提出愤怒的抗议，并大声疾呼地要求结束土耳其对保加利亚人的压迫。一些俄国的伟大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包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门得列耶夫和维列沙金这样的世界名人在内，表达了俄国人民对保加利亚人民的深切同情，也表达了他们随时准备以一切可能方法援助斯拉夫兄弟的迫切愿望。

由于俄国的坚持和进步社会舆论的影响，尽管土耳其的西方保护国不同意，欧洲各国还是成立了一个由列强代表参加的调查团。它走访了发

生起义的各个地区，也证实了一些关于大规模屠杀和种种暴行的官方报告。

当然，证实这些暴行并没有能改变西方各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因为指导它们外交政策的是私利，而不是正义和进步的原则。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无力阻止局势的发展。土耳其的内部危机深化了。1876 年 6 月，为了保护起来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居民，塞尔维亚政府向土耳其宣战，并指望俄国能给予支援。宣战之后，成千上万的俄国志愿人员立即涌入了塞尔维亚。

近东危机的加深，也促使保加利亚侨民积极地活动起来。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又在保加利亚慈善总会的名义下开始活动，向塞尔维亚派去了志愿人员，他们与俄国的志愿人员一起积极地参加了塞土战争。塞尔维亚战败后，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把这些保加利亚志愿人员调集到一起，安置于罗马尼亚，期待俄国与土耳其之间早日开战。

1876 年末，由于俄国的坚持，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列强代表会议，研究处理因保加利亚、21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而引起的种种问题。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采纳了俄国的建议，给予保加利亚、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以自治权。但是，为了避免出现一个庞大的保加利亚，从而成为俄国在巴尔干国家影响的中心，奥匈和英国竟然强行将保加利亚的疆土分为两个自治区：东保加利亚，以图尔诺沃为首府；西保加利亚，以索非亚为首府。这样，欧洲列强虽然作出了分裂保加利亚的不公正决定，却也正式承认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政治独立权。

但是，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列强的计划。它倚仗英国的支持，扬言会议的决定纯属多余，说什么苏丹已经批准了一部宪法，它足以保障土耳其国内各民族的权利和自由。

俄国政府为迫使"波尔特"执行君士坦丁堡会议的决议而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就决定诉诸武力。1877年4月12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土耳其宣战。

这一战争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一条在保加利亚，一条在高加索。保加利亚战线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已与俄国结成联盟并同意让俄军

过境的罗马尼亚的军队，也在这条战线上作战。

保加利亚人民怀着难以形容的喜悦心情欢迎俄国对土宣战。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发出了呼吁，号召保加利亚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号召他们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俄军，因为俄军是无私的，是为了从长达五个世纪的异族桎梏下解放保加利亚人民。同时，保加利亚爱国者也踊跃参加了由俄国人创立的保加利亚兵团（即人所共知的保加利亚志愿军）。在战争开始时即已组成了六个兵团，兵力总数达七千四百四十四人。其后在战争过程中，又陆续组成了另外六个兵团。俄国将216军尼·斯托列托夫被委任为志愿军司令。

1877年6月15—27日，俄军横渡多瑙河，解放了斯维希托夫。他们又从此地兵分三路作战：西路分遣军向尼科波尔进发；东路向鲁塞进军；南路由古尔柯将军率领，向图尔诺沃以及巴尔干山脉进军。

古尔柯将军的分遣军在四个保加利亚兵团的协助下，迅速解放了图尔诺沃，越过巴尔干山脉，进入保加利亚南部。

但是，由奥斯曼帕沙指挥的一支土耳其军队

这时已经占领了普列文，并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据守着。由苏里曼帕沙指挥的另一支土耳其军队，也同时从亚德里雅那堡向巴尔干山脉进发。在旧扎果腊发生了一场激战，俄军和保加利亚志愿军表现得极其英勇顽强。以后，古尔柯的分遣军撤出了保加利亚南部。

在这种局势下，俄军统帅部决定以小部队防守巴尔干山脉各处隘口，阻击苏里曼帕沙的军队，217以便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普列文。决定战争胜负的几个最大的战役，也就围绕着这两点展开了。

苏里曼帕沙挥军进攻希普卡隘口，在这里防守的是由斯托列托夫将军指挥的俄——保分遣军。土军仗恃其数量上的压倒优势，不断向隘口发起进攻，但一再遭到守军的猛烈抗击。俄——保分遣军所进行的最激烈的战斗是在8月9日、10日和11日，当时苏里曼帕沙为了想强行突破隘口而孤注一掷，将全部兵力投入了进攻。俄国士兵和保加利亚志愿军虽然都已精疲力尽，仍然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增援部队在守军最危急的时刻到达了。苏里曼帕沙的企图终于失败了。

普列文周围这时也正进行着激战。俄军接连

三次发起大规模进攻，均被击退，伤亡重大。罗218马尼亚军队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俄军统帅部于是决定切断普列文土军与外界的全部联系，并逐渐收紧包围圈。1877年11月28日，土军企图突围向索非亚撤退，但被击败而只好投降。

俄军攻下普列文后即转入了全面进攻。尽管时令已届严冬，他们仍然越过了巴尔干山脉。由古尔柯将军率领的一支俄军，绕过阿腊巴康纳克隘口，在萨兰威击败土军，攻克了索非亚，接着又向普罗夫迪夫进军。另一支由拉德茨基将军率领的俄军，绕过希普卡隘口，在谢因诺沃击败了土军。俄军进展神速，使土耳其人来不及组织亚德里雅那堡的防御，这座城未经战斗就被俄军拿下，从而扫清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但是，英国却不能坐视俄军哪怕是暂时地占领土耳其首都，便在奥匈的支持下以战争威胁俄国。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决定接受土耳其求和的建议。

和约于1878年3月3日在一个小镇圣斯特法诺签订，故名为《圣斯特法诺条约》。根据和约要建立一个自治的保加利亚国家，共范围包括保

加利亚的北部和南部以及几乎整个马其顿。俄军将在保加利亚留驻二年左右，直到新的保加利亚国家组成为止。按照《圣斯特法诺条约》，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等半附属国也都获得了完全独立。

沙皇俄国政府也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一样，其外交政策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转移的。它在1877—1878年战争中所追求的首先是自己的目标，即扩大它在近东的影响，等等。但是，尽管沙皇政府怀有此种意图，这场战争仍然具有进步的性质。它废除了保加利亚境内的土耳其封219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因此，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实际上起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作用，而这也正是保加利亚人民在自己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中所面临的根本任务。

对保加利亚人民来说，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俄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把保加利亚从长达五个世纪的土耳其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下解放了出来，恢复了保加利亚国家。保加利亚人民已经接连好几个世纪对俄国怀着友情和忠诚，相信它能肩负起解放自己

的使命。1877—1878年的战争，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感情，并使它变成了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俄保友谊。

《圣斯特法诺和约》也使保加利亚的民族问题得到了公正的解决。被划归保加利亚的土地上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保加利亚人。根据这一条约所 220 划定的保加利亚版图，与保加利亚大教区的范围大体相符，也同按照1876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决议本应建立的两个保加利亚自治区的疆界基本一致。因此，《圣斯特法诺条约》是以当时所公认的保加利亚民族分布区的疆界作为根据的。

尽管如此，英国和奥匈的政府，却坚决反对《圣斯特法诺和约》。英国害怕俄国增强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顽固地庇护封建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奥匈则认为一旦成立一个与俄国关系友好的庞大的保加利亚，将妨碍它实现其征服巴尔干半岛的理想。

沙皇俄国被战争弄得精疲力尽，不愿再惹起新的冲突，因而对英国和奥匈的压力作了让步，同意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

按照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建议，1878年6月13

221 日在柏林举行了以修订《圣斯特法诺条约》为目的的列强会议。会议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保加利亚问题。会上的斗争主要发生在俄国代表同竭力想破坏俄国所担负的解放事业的英国和奥匈的代表之间。英国和奥匈的代表得到了俾斯麦的支持，而俄国则陷于孤立。

1878年7月13日签订的《柏林条约》将保加利亚分割为三个部分：其一是保加利亚公国，包括保加利亚北部和索非亚地区，为苏丹的附庸国；其二是被名为东鲁米利亚的自治区，也即保加利亚南部，仍处于苏丹的政治和军事统治之下；其三是马其顿，交还土耳其。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则被置于奥匈的统治之下，尽管当地居民为了争取其解放曾洒尽鲜血。

222 《柏林条约》是英国、德国和当时的哈布斯堡帝国① 在十九世纪对待各个弱小国家所采取的野蛮自私政策的最丑恶的表演之一。在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欧尼斯特·拉维思和阿佛列·伦坡指导下出版的重要著作《世界通史》，就对这一条约作

①指奥匈帝国，因当时该国正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期间。——译者

了真实而确切的写照。在该书的第五卷中，作者于《柏林会议以前的欧洲政策》这一标题下，对这个问题论述如下："塞尔维亚民族曾希望重新组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却发现事与愿违，完全违背了他们在1876年7月所明确表示的合法愿望和意志：他们被一分为三，而奥地利则从中阻止三者互通声气。这种对一个民族的意愿的完全无视，也表现在将保加利亚分割为三个部分上。欧洲听从了英国和奥地利的怂恿，把马其顿复置于苏丹统治之下，这是对全人类的犯罪行为。在圣斯特法诺，俄国曾苦心孤诣地为各基督教民族谋求解放；而在柏林，列强却把正义，把各民族的意愿，甚至把常识和普遍的利害关系全都置之度外。其最后决议，是一座献给自私自利之心的纪念碑，也是互相嫉妒和个人仇怨结下的果实，既不道德而又卑鄙可耻，因为它非但远远不能确保和平，而且还为以后的冲突和战争埋下了无穷的祸根"。



第七章　从解放到十九世纪末的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公国和东鲁米利亚　俄国向土耳其[223]开战，其目的不是要征服保加利亚并把它变成俄国的一个行省（俄国的敌人对它却是这样横加指责的），而是在于创建一个能在政治上独立发展的保加利亚国家。从许多事实中仅举以下情况便足以说明这一点：早在战争开始前，俄国政府就已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多瑙河俄军的专职部门，负责在解放了的保加利亚国土上筹建行政机构。主管这一部门的是弗拉基米尔·切尔卡斯基公爵。

切尔卡斯基和他的同事们不辞辛苦地筹建保加利亚的行政机构，帮助那些可能是由于战争而蒙受损失的居民，以及处理诸如此类的事务。到圣斯特法诺条约签字的那一天，即切尔卡斯基逝世的同一天，共建立了八个省和五十六个区。

切尔卡斯基逝世后，亚历山大·德昂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将军被派往保加利亚担任帝国专员，

继续筹建保加利亚公国。根据柏林条约，俄国代管保加利亚的期限由两年缩短为九个月。于是，224德昂杜科夫加速了保加利亚公国的筹建工作。他建立了一个设有司法、财政等部门的中央政府。教育部门委托保加利亚学者马林·德里诺夫教授主管，其他部门也都分别由俄国的知名人士负责。公国的首都定于索非亚。

德昂杜科夫特别注意组织一支保加利亚军队，作为维护新兴的保加利亚公国独立的柱石。凡年满二十岁到三十岁的男子都要服兵役。保加利亚的新兵，由俄国军官和曾在俄国受训的保加利亚军官负责训练。到俄国临时政权结束时，已有二万一千名保加利亚青年受过军训。

这样，俄国不仅把保加利亚人民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还大力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以德昂杜科夫为首的俄国临时当局，不得不在极其艰巨复杂的环境下工作。一方面，西方列强的代表们不断地阴谋反对德昂杜科夫并阻挠他225的工作，企图中伤俄国和削弱它在保加利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被分割为三个部分的保加利亚，

人民群众对柏林条约普遍不满。只是由于俄国的崇高威望，德昂杜科夫才得以使保加利亚人民平静下来，避免了更大的国际纠纷。

在保加利亚南部（东鲁米利亚），土耳其政府正准备根据柏林条约派去军队；马其顿则继续处于土耳其统治之下。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尤其紧张。

保加利亚南部面临着再一次遭受土耳其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危险，这一地区的保加利亚居民因此而一致奋起。4月起义期间，这里曾经惨遭土耳其人蹂躏，保加利亚人民决不能再容许土耳其军队侵入。从城市到乡村，以体育协会的名义为掩护，到处组织了军事武装小组，准备抗击土耳其军队。

在马其顿，土耳其当局因被打败而激怒，变本加厉地对保加利亚居民实行恐怖统治，这就使反对柏林条约的运动具有群众性武装起义的性质。为了准备马其顿的起义，在公国和保加利亚南部，组织起无数名为“艾丁斯特沃”（统一）的委员会。与此同时，在马其顿当地也组成了一些小分队，同土耳其封建领主作斗争。

1878年10月，马其顿北部的克雷斯纳、弗拉希等许多村庄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者袭击了克雷斯纳村的土耳其驻军，并在一场激战后迫使他们投降。起义遍及梅耳尼克全区，又由此蔓延到邻近各区。起义中心在克雷斯纳村，因此这次起义称为克雷斯纳起义。起义者组成一个参谋部，由迪米特尔·格奥尔基耶夫担任参谋长。

土耳其政府调集了大量兵力镇压起义，但是226遭到了马其顿城乡居民的英勇抵抗。大约到12月中旬，起义才终于被镇压下去。当时，成千上万的马其顿居民逃往保加利亚公国以摆脱土耳其恐怖统治。

在此期间，俄国临时当局一面进行着筹建国家机构的工作，一面还在紧张地起草宪法。在著名的俄国法律学家谢尔盖·路基亚诺夫的指导下，起草了《构成法》①，即保加利亚公国的宪法。这一宪法将在俄国政府审核后，再交由保加利亚知名人士组成的议会审查批准。

为了实现保加利亚人民的民主愿望，俄国政

①《构成法》，Organic Statute，法律术语，即由地方成为国家时的制定法。——译者

府颁布，每一万人选出一名代表参加议会。此外，议会还被授权可以对《构成法》进行自由讨论，并在必要时加以修改，从而使之具有了真正的制宪议会的性质。

1879年2月10日，德昂杜科夫在中古保加利亚的京城图尔诺沃隆重召开了制宪议会。他在讲话中宣布，在审查《构成法》时，每个代表都有权暢抒己见，并按自己的信念行事。

制宪议会一开始便形成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它们之间在宪法的性质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代表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即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大地主和大承包商的利益的保守党，力图制定一部反动的宪法。这个党的领导人康斯坦丁·斯托伊洛夫、迪米特尔·格列科夫和格里戈尔·纳乔维奇企图建立两个议院，其中上院（即参议院）将在实际上掌握立法权。保守党人还想以财产和文化程度作为选举资格来限制人民的选举权。自由党，或称为民族自由党，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坚决反对保守党人所提出的议案。227 以佩特科·卡腊维洛夫、佩特科·斯拉威科夫和德拉甘·粲科夫为首的大多数自由党人，本着民

主精神对《构成法》作了重大修改。《构成法》这个名称也被取消了，这部保加利亚的根本法被称为《宪法》。

就当时来说，图尔诺沃宪法是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它是自由党的胜利果实，这个党在当时代表了占保加利亚人民绝大多数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图尔诺沃宪法确认了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地位，从而保障了资本主义在保加利亚的自由发展。

按照宪法规定，在制宪议会解散后，召开了大国民议会选举大公。1878年4月17日，大国民议会一致选举德国亲王亚历山大·巴滕贝克（俄国女皇①之侄）为保加利亚大公。

在起草图尔诺沃宪法的同时，制定东鲁米利亚《构成法》的工作也在进行。根据柏林条约，这一工作交由柏林会议各参与国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负责。

委员会起初在君士坦丁堡工作，以后又迁往东鲁米利亚的首都普罗夫迪夫。西方国家的代表

①俄国女皇，即叶卡德琳娜二世（1727—1796年）。——译者。

维护苏丹的权利，竭力想为该地区制订这样一部根本法，其实质是把东鲁米利亚变为土耳其的一个行省。俄国代表捍卫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加利亚居民的有力支持，他们举行集会和强大示威，表明东鲁米利亚是属于保加利亚的一个地区。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国际委员会终于在1879年4月14日完成了制定东鲁米利亚《构成法》的工作。它规定由苏丹任命的一名总督管辖这一地区，但此项任命必须经列强批准，行政权则由一个五人组成的执政团掌握。东鲁米利亚的立法机构是地区大国民议会，其决议需经苏丹批准方能生效。选举权则受财产和文化程度这些选举资格的限制。 228

任凭英国和奥匈的反动势力费尽心机，东鲁米利亚仍然属于保加利亚。由于居民的坚决反对和俄国的干预，苏丹被迫放弃了派军队去这一地区的打算。

根据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推荐并经其他列强同意，苏丹任命阿列科·博哥罗迪为东鲁米利亚总督，他原籍保加利亚，曾长期在土耳其担

任高级官员。

解放后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斗争 1877—1878年俄土战争的结果，不仅使保加利亚的大部分地方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也在国内引起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加利亚农村结构所发生的全面的根本变化。作为民族革命运动动力的保加利亚农民，不断地进行着旨在取得土地和摧毁土耳其封建制度的斗争。俄土战争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一切。

在这场战争中，将近十万名土耳其封建领主和塞尔卡西亚人以及大批土耳其农民离弃了他们的土地，南逃到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宗教狂热和民族仇恨，使土耳其农民不能同保加利亚农民站到一条战线上来反对苏丹的暴政。这些政治229上落后的土耳其农民，盲目地随同阿訇、领主和官员们离去。由于他们的逃离，许多大大小小的庄园被丢下无人经营。

保加利亚农民乘土耳其人逃离之机，开始抢占原属于各庄园或塞尔卡西亚人的土地。佃户们也停止了交租。战争接近结束时，特别是在圣斯特法诺条约签订后，由于农民确信土耳其封建领

主在保加利亚的统治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他们抢占土地就更为普遍了。与此同时，农民也争着耕种苏丹的土地，即国有土地。

但是，农民抢占庄园和其他土地终究还不是合法的。根据柏林条约第十二条的规定，逃离的土耳其人对其领地仍拥有所有权，并可以返回保加利亚任意加以处理。只要俄国临时当局还在掌权，土耳其封建领主就不愿返回保加利亚，他们怕因所犯罪行而受惩处。但是，在俄国军队撤离保加利亚以后，他们开始返回并索取其土地。

不管土耳其政府怎样劝诱，都不能再使土耳其封建领主长期留在保加利亚。首先，并不是所有的领主都返回，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害怕保加利亚居民的报复。其次，返回的那些领主也已发现今非昔比，他们再不能象往日那样作威作福了。因此，土耳其领主纷纷变卖其地产并迁往土耳其本土。那些不能亲自回到保加利亚的，也授权其代理人替他们变卖地产。只有那些全部聚居着土耳其人的村庄或地区例外，那里的土耳其居民继续留在保加利亚。

于是，迁居的土耳其人变卖土地的规模越来

越大。据不完全资料，保加利亚人(主要是农民)向土耳其人购买土地共约四十四万七千五百公顷，几乎占当时保加利亚可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230一。土耳其人的领地也就消失了。中、小型庄园成了保加利亚当时最为普遍的形式。

农民不是通过革命手段而是通过购买获得原土耳其人的土地这一事实，大大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分化。富裕农民购入较多的土地，变得更加富裕。昔日土耳其领地上的农工，除小块土地以外，当然不可能再购买更多的土地。国内市场从土耳其封建制度下获得的解放，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阶级分化。一部分农民开始失掉土地，变成无产者或半无产者；而另一部分则变成富农或农村资产阶级分子。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为数很少的地主阶层。然而，这一过程的发展是缓慢的，保加利亚仍然是一个中、小土地所有制的国家。

土耳其封建统治在保加利亚的垮台，为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已被确认的资产阶级的法律地位，也有助于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由西方国家同土耳其签订并根据柏

林条约强加于保加利亚的一些通商条约，却阻碍着这一发展，使保加利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克里米亚战争后即已开始的手工业衰落，解放后更为加剧。保加利亚的手工业者失去了土耳其帝国这一广大市场，在西方工厂工业的竞争下大批地破产。

手工业者的破产，以及一支随时准备出卖劳动力的后备大军的形成，为工厂工业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时机。然而，在保加利亚还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资本。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在数量上仍然很少，在经济上力量微弱。到解放后第一个十年末，保加利亚约有三十六个较大的工业企业，其中只有几个是比较近代化的纺织厂。

231

解放后最初五、六年间保加利亚公国的政治史，是一部富裕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剧烈地争夺政权的历史。这一场斗争是在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展开的，他们是当时保加利亚社会中这两个最活跃阶级的代表。保守党的基本方针是同大公结成联盟，并按反动精神修改图尔诺沃宪法。他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无视人民的意志而确保其权势。与此相反，自由党却依靠着城乡小资产阶

级群众的支持，把维护图尔诺沃宪法作为它的主要政治口号。

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当选为大公后，首先觐见了俄国沙皇，接着又拜谒了土耳其苏丹，然后才到保加利亚。1879年6月26日，他宣誓效忠于宪法并动身前往公国的首都索非亚。

巴滕贝克从来就是一个极端反动和仇恨俄国的家伙。他把对俄国的敌对情绪巧妙地隐藏起来，232以免引起俄国政府的不满。但是，他并不掩饰其反动思想，从一开始就公开地站在保守党一边。在觐见沙皇时，巴滕贝克曾要求沙皇允许他修改图尔诺沃宪法并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但却遭到了沙皇的拒绝。

巴滕贝克明知自由党在国民议会中占绝大多数，但他却不顾这一点而组织了一个保守党政府。1879年7月5日，保加利亚的第一届政府组成了。

保守党人一上台就开始肆意践踏宪法，并准备加以篡改。作为对策，自由党人通过舆论界和群众集会掀起了一个政治运动。两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开始了。

保守党虽然得到了大公的支持，仍未能保住其政权。尽管如此，巴滕贝克却满怀对自由党人的仇恨，又组成了以克利门特大主教（瓦西耳·德鲁梅夫）为首的另一届保守党政府，解散了大国民议会。但是，这一届保守党政府也未能保住政权。在新的选举中，保守党遭到了更为惨重的失败。

于是，大公被迫暂时让步，委托自由党中间派的代表德拉甘·檠科夫组织政府。

第一届自由党政府于1880年 3 月 26 日组成，其国内政策是以帮助城乡小生产者为目的，对外政策则是在柏林条约范围内尽力维护保加利亚的独立，并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

上述政策遭到了奥匈以及俄国的另一些西方对手的反对。

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日益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势，也加剧了列强在巴尔干的矛盾。奥匈在德国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抑制俄国在近东的[233]势力，以便对巴尔干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施加影响。英俄两国为了在保加利亚争夺势力，也在进行着斗争。

俄国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了巴尔干人民，现在当它的对手对巴尔干各国施加影响时，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而对奥匈和英国企图把它从保加利亚挤走就更为敏感，因为那里刚解放不久，而且俄国还曾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

自由党政府与奥匈的第一次冲突，是由于奥匈资本家企图对保加利亚修建铁路加以干涉而引起的。奥匈政府坚持保加利亚应该先修建别洛沃—索非亚—皮罗特线，因为这一线路是维也纳—君士坦丁堡铁路线中的一段，对于奥匈资本在巴尔干半岛的经济渗透极为重要。与此相反，俄国则要求先修建斯维希托夫—图尔诺沃—索非亚线，以便越过多瑙河把保加利亚同俄国以及罗马尼亚的铁路连接起来。

自由党政府支持俄国的方案，拒绝了奥匈的要求。它这样做不仅使自己同赞成奥匈方案的巴滕贝克关系恶化，也激起了奥匈统治集团的仇视。

1880年末，保加利亚政府与奥匈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这次是由于奥匈企图强行控制多瑙河下游的航运。为此目的，奥匈政府竭力争取沿多瑙

河各巴尔干国家加以支持。然而，保加利亚政府却不顾巴滕贝克的意愿而没有支持奥匈。于是，巴滕贝克给德拉甘·粲科夫横加罪名，硬说他的政府破坏了列强对保加利亚的信任，并勒令他辞职。

大公委托极端派自由党人佩特科·卡腊维洛夫组织一个新政府。然而，他实际上早就想借助于保守党人发动一次政变，并按反动精神修正宪法。这时，俄国发生的事件有利于巴滕贝克实现其计划。1881 年 3 月 1 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① 人所刺杀。巴滕贝克去圣彼得堡参加沙皇的葬礼，并设法使极端反动的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确信，保加利亚自由党人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就是靠图尔诺沃宪法才掌的权。 234

1881 年 4 月 27 日，巴滕贝克解散了卡腊维洛夫政府，组成了以国防大臣埃伦罗特（原籍芬兰，是俄国军队里的一个将军）为首的政府。巴滕贝克暂停宪法的实施，要求赋于他特权七年，

①民意党，Narodna Volya，俄国民粹派在 1879 年分裂成为两派之一。民意党人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把搞个人恐怖作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译者

以便在此期间修改宪法，并在国内建立起永久性的反动统治。在戒备森严的警察恐怖下选出的大国民议会，批准了大公所要求的特权。接着，自由党人惨遭迫害。德拉甘·粲科夫被逮捕并押解到弗拉查。佩特科·卡腊维洛夫、佩特科·斯拉威科夫以及自由党的其他领导人都逃往东鲁米利亚。

大公的轻举妄动使人民大为不满。巴滕贝克为了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而决定利用俄国235的威信，他请求亚历山大三世派两名俄国人来担任大臣。沙皇便把索波列夫和考耳巴尔斯两个将军派到了保加利亚。

俄国将军的执政，不仅未能巩固住大公的地位，反而使之更加岌岌可危。不久，巴滕贝克就同这两个将军领导的政府发生了冲突。索波列夫和考耳巴尔斯意识到巴滕贝克对俄国并非真心实意，而且还在支持俄国的敌手，就向亚历山大三世报告了此事。巴滕贝克为了拔除眼中钉，妄图在沙皇面前诽谤他们，但未能得逞。俄国政府已经看清这个大公是俄国的敌人，决定要把他从保加利亚除掉。

形势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巴滕贝克除了同他深恶痛绝的自由党人和解以外，别无他法。于是，他把这两个将军解职，并通过保守党的领导人开始与德拉甘·粲科夫谈判。1883年9月间，粲科夫组成了中间派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联合政府，并同意按保守精神对图尔诺沃宪法作某些修改。

以佩特科·卡腊维洛夫和佩特科·斯拉威科夫为首的自由党左翼，坚决反对德拉甘·粲科夫同大公和保守党人的妥协。极端派自由党人谴责了粲科夫的背叛行为，要求完全恢复宪法并重新进行选举。

极端派自由党人在这次选举中获得全胜。德拉甘·粲科夫下了台，成为反对派并另建新党，即后来的进步自由党。

1884年7月11日，以佩特科·卡腊维洛夫为首的政府组成，图尔诺沃宪法也得以恢复。

保加利亚公国与东鲁米利亚的合并 保加利亚人民对柏林会议分割保加利亚一事从未甘心。尽管列强将柏林条约强加于保加利亚，但保加利亚所有的爱国者都认为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保加

236

利亚北部和南部的合并，只是时间迟早和条件是否有利的问题而已。

在《构成法》起草完毕和俄国军队撤走后，东鲁米利亚的政治生活，在发展的总方向上是同公国一致的。起初，东鲁米利亚的保加利亚社会各阶层，由于受到土耳其和保护土耳其的西方国家的威胁，还能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当保加利亚人在地区大国民议会的初次选举中取得了绝对胜利，而东鲁米利亚又已确定仍应归属保加利亚时，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争权斗争，就也成为这里的突出问题了。在东鲁米利亚也组成了两个政党：一个是保守党（又自称为民族党），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个是自由党，代表着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同公国的保守党相比，东鲁米利亚的保守党人却是亲俄的。

两党争权都滥用了在人民中极为流行的“合并”这一口号。民族党即以这一口号在1884年的选举中获胜而取得政权，组成了以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伊凡·埃夫斯塔提耶夫·盖朔夫为首的政府。同年，东鲁米利亚的首任总督

阿列科·博哥罗迪任职期满。由于俄国的坚持，苏丹任命保守党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加夫里耳·克鲁斯特夫继任总督。然而，保守党却在执政后发表声明，声称宣布“合并”的时机尚未成熟。反对党也就因此称之为“假合并”党。

此时，资本主义在保加利亚北部和南部的发237展，尽管比较缓慢，已使人们日益感到国家被人为地分割所带来的不便。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公国那部分的资产阶级，对保加利亚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税壁垒再也无法容忍，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至于人民群众，则要求摧毁东鲁米利亚的封建残余，并把“合并”的问题同削减赋税以及改善生活联系在一起。因此，农民和城镇的劳动人民也都积极地投入了争取“合并”的运动。

大约在1884年末和1885年初，保加利亚公国内的马其顿移民，以及居住在东鲁米利亚的某些参加过民族解放运动的人，开始建立秘密委员会。这一起源于下层的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是扎哈里·斯托扬诺夫。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和记者，也是4月起义时本科夫斯基的亲密战友之一。由

于他的倡议，普罗夫迪夫委员会被宣布为保加利亚秘密中央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通过发动人民武装起义解放马其顿和东鲁米利亚，并使之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

然而，这个“合并”运动的领导权不久就被资产阶级接了过去，扎哈里·斯托扬诺夫本人也投向他们一边。资产阶级估计没有条件靠武力把保加利亚恢复到象圣斯特法诺条约所规定的那样，便放弃了解放马其顿的打算，只把注意力集中到公国和东鲁米利亚的合并上。同时，他们执意取消了发动人民起义的计划，而把这一任务交给军队去完成。为此目的，委员会与东鲁米利亚军队中的军官达乃耳·尼古拉耶夫、拉伊乔·尼古洛夫等多人进行接触，并把准备起义和推翻政府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巴滕贝克也得知了为“合并”而作的一系列准备。自与俄国发生争执以来，巴滕贝克一直在寻238找机会提高自己的威望，以便不顾沙皇的意愿而保住其大公的宝座。他意识到只要承认了“合并”就能获得这种威望。但同时，巴滕贝克又害怕被指责为违反柏林条约。这就是他对整个事态佯作

一无所知的原因。

由于考虑到土耳其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宣布"合并"的时机，选定在公国正结束军事演习而东鲁米利亚又开始演习之时。在推翻东鲁米利亚政府的行动开始以前，这一地区就爆发了暴风骤雨般的民众示威。

1885年9月4日，根据委员会的命令，在戈利亚莫康纳雷村宣布起义。9月5日，以普罗丹·提什科夫上士为首的一支起义大军在该村组成，接着就向普罗夫迪夫挺进。9月6日凌晨，尼古拉耶夫少校率部占领了普罗夫迪夫并包围了总督府。提什科夫的队伍也进了城。总督加夫里耳·克鲁斯特夫被逮捕并押往土耳其，他的政府也就被推翻了。

委员会立即向保加利亚人民发出呼吁，宣布保加利亚公国与东鲁米利亚合并。在普罗夫迪夫成立了临时政府。为了保卫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境，临时政府向所有年满十八岁到四十岁的男子颁布了动员令。 239

9月8日，大公到达普罗夫迪夫，承认了合并。

人民以巨大的热情欢庆保加利亚北部和南部的合并。索非亚和其他城镇都举行了群众集会，在会上人们表达了欢乐的心情，也表示他们随时准备捍卫保加利亚的自由和独立。

但是，在柏林条约上签字的国家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个问题现在是保加利亚人最关注的。大家都认为主要危险一定来自土耳其，因此军队主力也被部署在土保边境上。

土耳其政府果然对保加利亚违反柏林条约提出了抗议，并开始沿土保边境调集军队，但却没有能够挑起战争。土耳其向列强发出照会，要求迫使保加利亚政府从原东鲁米利亚撤军并在这个地区恢复原状。

列强交换意见后，10月24日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解决东鲁米利亚问题。

列强在处理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当然不240是本着主持公道或顾全大局的精神，而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切身利益来行事。保加利亚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俄国，因为它曾为保加利亚人民的解放作出巨大牺牲，并在柏林会议上为反对分割保加利亚进行过斗争。可是，亚历山大三世却厌恶巴滕

贝克，不肯让他利用承认“合并”一事巩固其大公的地位。于是，他命令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对保加利亚政府违反柏林条约一事提出抗议，并将俄国军官撤离保加利亚。

沙皇外交人员的这一态度决定了英国的行动。英国政府立即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其目的是在巴滕贝克和沙皇之间煽起仇恨，从而削弱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除英国代表外，其他列强都同意了土耳其的提议——要求保加利亚从东鲁米利亚撤军，并在新总督到任以前派特别专员到东鲁米利亚去接管其政府。然而由于英国的反对，决议无法通过，会议也陷入僵局。

此时，塞尔维亚政府正在准备侵袭保加利亚。当然，塞尔维亚人民并不想同保加利亚人民作战或夺取其领土；但以米兰国王为首的部分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却企图乘保加利亚在国际上处境艰险之机，吞并它西部的一部分领土。奥匈怂恿和唆使米兰国王采取这一冒险政策，以便使塞尔维亚不再注意被奥地利占领的领土，并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制造矛盾，从而有利于奥匈

势力对巴尔干的渗透。维也纳的银行家给予塞尔维亚政府以二千五百万第纳尔的战争贷款。米兰国王满以为胜利在握，并深信只要夺取了保加利241亚领土，他就能转移塞尔维亚人民的视线，缓和他们对其反人民政策的不满。

1885年11月2日，米兰国王借口保加利亚的“合并”破坏了巴尔干各国的均势，命令塞尔维亚军队进攻保加利亚。集结在摩拉瓦河流域的塞军主力向索非亚推进；而集结在提莫克河流域的另一股较小的兵力，则侵入保加利亚西北部，围攻维丁城。

不仅米兰国王，而且当时欧洲所有的人都相信塞尔维亚很快就能获胜。人们普遍地认为保加利亚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又缺乏指挥有方的将领，而俄国军官也已被召回。可是，塞尔维亚国王和外国的观察家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保加利亚人民具有巨大的爱国热忱，他们决心为捍卫“合并”和维护领土完整而奋起战斗。

242 塞尔维亚军队被钳制于索非亚以西的斯利夫尼察村，因为从土耳其边境调回的保加利亚军队已经迅速地在该村集结。斯利夫尼察战役持续了

三天，保军在青年军官阿塔纳斯·本德列夫上尉、波波夫上尉、奥里姆皮伊·潘诺夫上尉等人的指挥下，击败了塞军并逼使它仓皇退却。在攻占德腊果门、察里布罗德和皮罗特后，保军扫清了通往尼什的道路。塞军弹尽援绝，又因屡打败仗而士气低落，再也无法继续作战了。

奥匈向保加利亚指挥部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保军停止前进。由于这一干涉，米兰国王才倖免于彻底垮台。1886 年 2 月 19 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签订了和约，恢复了战前状态。

对保加利亚人民来说，1885 年的战争是一次正义的战争。他们抗击了无端侵袭，正义地捍卫了“合并”的事业以及国家的完整和独立。同时，保军的胜利也提高了保加利亚的威望，对东鲁米利亚问题的顺利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

塞保战争结束时，东鲁米利亚的收复已不成为问题。连土耳其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它在英国的建议下同保加利亚开始了谈判。在君士坦丁堡又一次举行了列强会议。经过冗长的讨论，保加利亚两个部分的合并终于被列强一致确认了。

1886—1887年的政治危机　合并以后，俄国

与西欧列强在保加利亚争夺势力的斗争，仍在紧张地继续着。俄国的外交人员为废黜巴滕贝克并243代之以忠于俄国的可信赖的人而活动。英国、奥匈等西方列强则支持巴滕贝克，认为他是一个同盟者。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也明显地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亲俄派和反俄派。

德拉甘·粲科夫的追随者和原东鲁米利亚的民族党，赞成保、俄亲善，主张保加利亚在对外政策上应与俄国配合。他们结成了以德拉甘·粲科夫为首的极端亲俄派。

保加利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与西欧资本有联系，他们要求将保加利亚的政策导向同英国和奥匈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反俄而又亲英、奥的这一派，是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和瓦西耳·腊多斯拉沃夫的追随者。他们退出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党而另立新党，代表着当时日益处于显要地位的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愿望。

资产阶级的这两派，在争夺政权和制订保加利亚的对外政策上，展开了剧烈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亲俄派求助于俄国，而反俄派则求助于俄

国的敌手。一派主张立即驱除巴滕贝克，改善同俄国的关系；另一派则维护巴滕贝克。

以佩特科·卡腊维洛夫为首的民族自由党，反映了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亲俄感情，赞成维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势力。但是，党的领导人却害怕使保加利亚陷入复杂的国际纠纷之中，并认为俄国人自会通过外交途径除掉巴滕贝克；因此，他们只是等待和观望着事态的发展，既犹豫而又被动。他们的这种做法，使反俄派得以在关键时刻占了上风。

资产阶级的两派之争，接着又发展到了军队，军官们也分为亲俄派和反俄派。1886年夏，亲俄派军官格鲁耶夫少校、阿塔纳斯·本德列夫上尉、拉德科·迪米特里耶夫上尉等人组织了范围广泛的军事政变，并于8月9日晚拘捕了巴滕贝克。巴滕贝克被迫退位，并被驱逐出境。 244

然而，这次政变缺乏政治上的准备，政变的领导人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从而使其对手有机可乘。当时正在图尔诺沃的大国民议会议长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一听说发生了政变，马上就组织反政变。他命令普罗夫迪夫的卫戍司令萨瓦·

穆特库罗夫上校向索非亚进军，同时致电巴滕贝克返回保加利亚。索非亚的临时政府被推翻了。反俄派政党闹哄哄地把巴滕贝克迎了回来，然而，他却已无法再继续就任大公了。慑于沙皇的忿怒，巴滕贝克终于退位，并在组成以斯塔姆博洛夫为首的摄政机构后，离开了保加利亚。

一场尖锐的政治危机在保加利亚爆发了。列强又为未来的保加利亚大公候选人开始了斗争。245 俄国的外交政策是，只要政权在反俄派手中，就反对召开大国民议会选举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三世还把考耳巴尔斯将军派到保加利亚，其任务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反俄派下台，并配合建立一个亲俄政府。可是，俄国的外交政策却由于其粗暴干涉和拙劣行径而未能达到目的，只是加剧了政治矛盾而已。

斯塔姆博洛夫无视俄国的意图，强行召开了大国民议会，把丹麦的瓦德马尔亲王选为保加利亚大公，但这位亲王却遵照亚历山大三世的要求而拒绝登位。

保加利亚的政治危机日益尖锐。一方面由于以斯塔姆博洛夫为首的反俄派在英国和奥匈鼓励

下的拒不妥协和固执，另一方面又由于沙皇外交人员的拙劣行径，事态竟然发展到了如下严重地步：1886 年 11 月初，俄国政府以无足轻重的事件为借口，断绝了与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

由于资产阶级的两派无法和解，国内的紧张局势就更为加剧了。塞保战争中的英雄阿塔纳斯·本德列夫、奥里姆皮伊·潘诺夫、阿塔纳斯·乌祖诺夫和其他亲俄派军官，为推翻政府进行了军事密谋。在他们的领导下，1887 年 2 月于锡利斯特拉和鲁塞爆发了起义。政府残酷地扑灭了这次起义，起义的领导人都被捕获，判处死刑并枪决。

为了结束这一场政治危机，政府在奥匈的支持下，决定不经俄国同意就选出保加利亚大公。1887 年 6 月 25 日，大国民议会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进行选举，把奥匈政府建议的候选人斐迪南·萨克西·科堡选为大公。

俄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要求土耳其政府也根据柏林条约拒不让斐迪南去保加利亚。然而，土耳其却站在西方列强那一边。在奥匈、英国和意大利的鼓励下，斐迪南到达保加利亚即位。他 246

一登位立即委托斯塔姆博洛夫组成了政府。这一任政府统治保加利亚达七年之久。

斐迪南·科堡酷爱权势，性情极为暴躁鲁莽。他在位期间给保加利亚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灾祸。作为奥匈和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成了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中最反动势力的后台，并与他们狼狈为奸，把保加利亚引向了民族灾难。

斯塔姆博洛夫的专政 人民党人和腊多斯拉沃夫分子的政府 保加利亚解放初期政治生活中的最大特征，是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的争权斗争。1885—1900年期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政党，它们之间的斗争，使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更加复杂化。德拉甘·粲科夫、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和瓦西耳·腊多斯拉沃夫的追随者，相继脱离了庞大的自由党。粲科夫的党取名为进步自由党；斯塔姆博洛夫的党名为人民自由党；腊多斯拉沃夫的党名为民族自由党。以佩特科·卡腊维洛夫为首的原自由党，改名为民主党。由原公国和东鲁米利亚的两个保守党合并的党，则定名为人民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也成立于这一期间。十九世纪末还出现了一个农民的政党——保加利亚农民

联盟。

这些新政党的涌现及其相互之间的激烈斗争，是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保加利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解放初期一定数量资本的积累，以及保加利亚南、北部合并后一个更大国[247]内市场的形成，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合并以后，工厂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了。1885—1901年期间，共建立了一百零四个比较大型的工厂。此外，还涌现了几百个较小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工业企业。铁路、港埠、公路、电话线路等建设加强了。到十九世纪末，保加利亚已有铁路一千五百六十六公里。

保加利亚的国内外贸易也得到了发展。对外贸易主要是面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奥匈和英国。这些国家向保加利亚提供了工厂工业所需的机器以及各种工业产品，并从保加利亚进口农产品。

尽管1885—1900年期间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加快了，保加利亚仍然还是一个轻工业稍有发展的落后农业国。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引起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土地集中的过程加快了，大地主和农村资

产阶级分子的人数也随之而增多。虽然如此，保加利亚在土地所有制和生产规模方面，还依旧都是中、小型的。

在资本主义发展得还不充分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因急于致富而进行着激烈的争权斗争，他们都想掌权后通过各种途径盗窃国家资财。为了取得和保住政权，各资产阶级政党肆意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大搞警察恐怖，在选举结果上弄虚作假，甚至采取政治暗杀的手段。

1887—1894 年的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政府，是一个典型的警察恐怖政权。

支持斯塔姆博洛夫政府的，主要是一部分新兴的保加利亚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同奥匈和英国的资本家都有着经济联系。这个政府从各方面248促进保加利亚的资本主义发展。它给予一些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以国家援助，向维也纳、伦敦和柏林的银行借款四次共达二亿五千万金列弗以供修建铁路之需，为修改由柏林条约强加于保加利亚的不利关税率而努力，等等。总之，斯塔姆博洛夫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立足于推动工厂工业和贸易的发展。1892 年，在普罗夫迪夫举办了有某些

西欧国家参加的首届保加利亚经济展览会。这次展览会鲜明地反映了保加利亚的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也推动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斯塔姆博洛夫政府的社会基础极为薄弱。绝大多数农民和城镇中小资产阶级、大部分教士、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某些大资产阶级，都反对政府的反俄政策。当时日益起重要作用的工人阶级也反对这一政策。失去了人民支持的斯塔姆博洛 249 夫，为了维持其政权，只好乞灵于野蛮的警察恐怖，并肆意践踏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

亲俄的反对党都被取缔，他们反对政府的斗争也因此而被迫转入地下。唯一合法的反对党是腊多斯拉沃夫的党，因为它承认了对斐迪南的选举，并赞同政府的反俄政策。

事实证明，亲俄的反对党在组织群众并发动他们起来推翻政府上是无能为力的。不仅如此，某些亲俄派（主要是在军官中），只会采取恐怖手段来回答政府的恐怖统治。然而，结果适得其反，政府更加剧了对亲俄派的恐怖统治。

1890年初，政府破获了以帕尼察少校为首组织的反政府密谋活动，帕尼察本人被判死刑枪

决。

1891年3月，一些亲俄分子策划刺杀斯塔姆博洛夫，但行刺时却误杀了他的财政大臣赫里斯托·贝尔切夫。政府即以此为借口，对亲俄党派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审讯。其中，有三人被判死刑绞决，佩特科·卡腊维洛夫则被判处徒刑，投入“黑牢”。还有很多著名的亲俄人士也被逮捕，受到严刑拷打。

250

由于农民对政府的反俄政策和苛捐杂税表示了强烈不满，斯塔姆博洛夫对他们的反抗也进行了无情镇压。他派遣军警开进起义村庄，这些军警在那里驻扎下来，鱼肉乡民，实行恐怖统治。

斯塔姆博洛夫政府奉行极端敌视俄国的外交政策。它在这方面受到了英国、奥匈和意大利的支持和鼓励。为了帮助斯塔姆博洛夫稳定政局，西方国家对斐迪南的大公地位予以事实上的承认，并命令他们的外交代表与之保持正式关系。

在此期间，反对斯塔姆博洛夫的力量也在日益增长。需要大笔国家经费维持的秘密警察和正规警察的庞大队伍，以及政府的种种专横和暴虐行为，在各阶层人民中激起了普遍的不满。

新建立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了反对斯塔姆博洛夫专政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为数尚少，但却以其勇敢和精力充沛而著称。他们揭露了政府的反人民政策并领导了各种抗议集会。斯塔姆博洛夫看出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就对其党人和追随者进行了残酷迫害。

最后，斐迪南亲自出面反对斯塔姆博洛夫的专政。在巩固了大公地位后，斐迪南一心想要得到所有国家在法律上的承认；他发现，要达到这一目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将斯塔姆博洛夫撤职，另外组成一个能与俄国和好的较为灵活的新政府。德俄关系的暂时改善，也促使斐迪南这样做。251 他便与资产阶级反对党的代表们取得联系，并伺机解除斯塔姆博洛夫的职权。

1894 年春，斐迪南背着政府同俄国驻维也纳的大使接触。斯塔姆博洛夫得悉后即向政府提出辞呈，以示抗议并要挟大公。然而，这正是斐迪南求之不得的，他接受了辞呈，并委托人民党领导人康斯坦丁·斯托伊洛夫组织新政府。

斯塔姆博洛夫的追随者企图通过在索非亚和其他城市举行会议对大公施加压力。以学生和社

会主义者为首的广大群众，针锋相对地组织了强大示威，反对斯塔姆博洛夫重新上台。军队也出面干涉，驱散了斯塔姆博洛夫分子和赶来支援他们的警察。

为人民深恶痛绝的斯塔姆博洛夫专政被推翻了。人民党掌了权，它代表着大部分农村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倒向法、俄的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康斯坦丁·斯托伊洛夫的政府，以历届政府所未有的充沛精力，继续推行了斯塔姆博洛夫的经济政策。1894 年，它通过了一项促进地方工业发展的法令。其后，它又与外国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并根据协定将工业品的进口税提高到14%。人民党政府还废除了土耳其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农产品什一税，代之以土地税。铁路修建的规模也更大了。

新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同俄国达成和解，因为不这样做保加利亚的国际关系就252不能正常化。法俄联盟的缔结和英德关系的紧张化，使俄国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这一现实的国际局势，也促使人民党政府与俄国和解。

1895年，保加利亚政府派了以著名的亲俄人士克利门特大主教为首的代表团去圣彼得堡。代表团到1894年去世的亚历山大三世墓前献了花圈，并受到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这是导致双方和解的决定性步骤，和解从而顺利达成。保加利亚与俄国的外交关系也在次年恢复。斐迪南被承认为合法的保加利亚大公。

康斯坦丁·斯托伊洛夫政府一上台，就不得不在其外交政策上承认一个新的重要事实——马其顿民族革命运动的出现。1893年末，达梅·格鲁耶夫、赫里斯托·塔塔尔切夫医生等人在萨洛尼卡建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后来叫做“马其顿—亚得里雅那堡内部革命组织”。1894年，哥策·德尔切夫参加了这一组织，不久即成为马其顿和东色雷斯民族解放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尽管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占了大多数，这一组织的创建者考虑到当地还有着其他种族，特别是为了排除敌对的巴尔干国家的干扰，提出了马其顿自治的口号。

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和斐迪南的企图，并不是在马其顿和东色雷斯搞一个独立的民族解放运

动，而是想自己控制“马其顿问题”，使马其顿的解放运动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发展。为此，1894年他们在索非亚建立了马其顿—亚德里雅那堡最高委员会，其任务是干预马其顿—亚德里雅那堡内部革命组织的活动，并使之符合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政策。

人民党政府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执政是为了恢复宪法自由、法治和正义，但它在与反对党的斗争中却使用了种种非法手段，甚至搞政治性暗杀。其党人则利用职权大搞形形色色的骯髒交易和贪污盗窃勾当。1895年7月，斯塔姆博洛夫在索非亚被暗杀。次年，人民党人又雇刺客谋杀其政治对手米哈伊尔·塔克夫，但被害的却是保加利亚著名作家阿列科·康斯坦丁诺夫。

253

在人民党人执政时期，斐迪南开始明目张胆地要使自己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决策人。他在被列强承认为合法的大公后，更加飞扬跋扈。党同伐异、互相争权的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为这个嗜权君主建立所谓“独夫政体”帮了不少忙。这些资产阶级政客在野时，都抨击斐迪南独断专横，酷爱权势，而一旦斐迪南让他们掌了权，就成为其驯

服工具，卑躬屈膝地为他效劳。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斐迪南开始在保加利亚国内外政策上起到首要作用，并任意地改组其政府。

1899年1月1日，斐迪南考虑到人民党政府已经声名狼藉，就干脆令其下台。新政府由腊多斯拉沃夫的党组成，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中的亲德派。腊多斯拉沃夫的党党内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和草包，热中于攫取权势和金钱。在这个党的统治下，盗窃国库以及在履行国家合同时占用公款成风。因此，人们把腊多斯拉沃夫政府叫做匪盗政府。

腊多斯拉沃夫分子一上台就发现国家财政处于极度困厄的境地。外债到期需予偿付，而国库却空空如也。也没有钱来满足执政党人贪得无厌的利欲。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政府决定采取增加税收、特别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办法。然而，当政府决定用缴纳实物的形式恢复谷物什一税时，农民们已经忍无可忍。国内爆发了农民起义，腊多斯拉沃夫的党也更加不得人心。1901年初，腊多斯拉沃夫分子终于下了台。 254

社会主义运动的诞生和初期发展 十九世纪

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保加利亚的出现，1891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在保加利亚的近代史上都被列为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前进，并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作斗争中，迅速地成长为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实现其历史任务——推翻资本主义的先锋队。在保加利亚的工人革命运动中，象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瓦西耳·科拉罗夫这样一些国际运动中的杰出人物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保加利亚的工人阶级，在土耳其封建统治被推翻、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被扫清后才开始形成，为时较晚。1892年前后，保加利亚虽已有雇佣工人约二十七万五千人，但由于工厂工业发展缓慢，他们分散而不集中。工业无产阶级在人数上还是不多的。只是到了斯塔姆博洛夫统治时期，由于工厂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才开始有所增加。

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工人群众的生活

极其艰难。他们每日劳动长达十四至十六小时，而工资却很低。工厂和工场的卫生条件极差，大[255]多数工人患有疾病。根本就没有什么劳动法规。资本家任意解雇工人，科以罚金，连他们少得可怜的工资也不如期发给。在工厂和仓库中，工头对工人态度粗暴，蛮横无理。从事生产的女工和童工的处境更为糟糕，所干的活几乎与男工相等，而其劳动所得仅为男工工资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残酷无情的剥削，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以及资本家的横行霸道，迫使工人为保护其切身利益而进行斗争。最早的几次工人罢工爆发于八十年代。1883年，印刷工人组成了一个印刷工人互助协会。这个协会在一些较大的城镇都设有分会，并与国际印刷工人工会有联系。

保加利亚的工人运动，开始时力量很弱，缺乏组织并带有自发性。工人还不了解历史发展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对于工人阶级应该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也一无所知。当时在保加利亚，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广为泛滥，但只能助长工人思想上的混乱，根本谈不上启发工人的觉悟或为他们指明阶级斗争的道路和任务。

保加利亚的工人运动，只是在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后，才开始走上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工人阶级的自觉斗争的道路。

十九世纪最后十五年到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间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保加利亚人民最杰出的儿子之一、当时保加利亚和巴尔干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于1856年诞生在马其顿的卡斯托区附近的扎戈里恰内村，并在热情的爱国教师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夫(别名丁卡)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初等教育。布拉戈耶夫在十四、五岁时到君士坦丁堡学制鞋手艺，但不久就离开了这个行业，到佩特科·斯拉威科夫任教256的保加利亚学校入学。1875年，他又到加布罗沃大学预科学校就学，并在该校参加了4月起义。1876年他转学到旧扎果腊学校。布拉戈耶夫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又曾参加过保卫旧扎果腊的战斗。

1878年保加利亚解放后，布拉戈耶夫去俄国

继续求学。他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时，接触过俄国民粹派革命者的团体，但不久就对他们的恐怖主义策略感到失望，又开始学习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布拉戈耶夫并不是一下子成为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在学习马克思的学说的同时，他还研究了菲迪南·拉萨尔和俄国民粹派分子彼得·拉甫罗夫的著作，并受了他们一些影响。尽管如此，学习《资本论》却为布拉戈耶夫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帮助他在以后克服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推动了布拉戈耶夫参加革命活动。他一开始在圣彼得堡的学生和工人中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1883年，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俄国的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叫做“布拉戈耶夫小组”。这个小组开始出版定名为《工人》的报纸，布拉戈耶夫撰写了确定其纲领的文章。

布拉戈耶夫在俄国的革命活动，终于为警察当局所制止。1885年2月26日，他被逮捕并驱逐出境。于是，他又回到了保加利亚。

布拉戈耶夫一回到保加利亚就开始宣传社会

主义思想。1885年夏，他与后来成为其妻的维拉·日夫科娃一起出版了保加利亚第一份社会主义刊物《当代指南》。这份刊物的目的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但实质上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只出了三期即因塞保战争爆发而停刊，布拉戈耶夫也作为志愿兵参加了这次战争。

翌年，社会主义的宣传逐渐加强。一些马克257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初次翻译出版了。在这一影响下，第一批社会主义小组纷纷成立。

1891年春（斯塔姆博洛夫专政时期），在布拉戈耶夫和图尔诺沃社会主义小组的创议下，在图尔诺沃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其他城镇的小组也派代表来参加。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图尔诺沃社会主义者，提议成立一个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公开地按照自己的纲领进行活动。由于各小组的代表争论不休，决定再召开一次会议。

1891年7月21日，在巴尔干山脉的布兹路贾山（即今日的哈治迪米特尔山）举行第二次会258议，主要讨论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未来的保加利亚机会主义者作了自我表演，他们力图论证成立这样一个政党为时尚早。

尽管如此，在听取了布拉戈耶夫及其支持者的争辩后，会议决定建立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布兹路贾山会议也就成了党的成立大会。会议接着通过了党纲和党章。

大会还决定出版党报和着手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其中的第一本定为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写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其在我国能否成功》。这是第一本保加利亚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在援引保加利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资料的基础上，驳斥了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所谓在保加利亚绝无条件传播社会主义的胡言乱语。

那些在布兹路贾代表大会上力图证明以社会 259 民主党名义公开出现的时机尚未成熟的代表，马上着手大搞分裂活动。他们无视代表大会的决议，开始出版另外一份刊物，其中又一次提出了成立社会民主党的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他们对代表大会决议的这种粗暴违反，实际上导致了保加利亚民主党的分裂。1892年在普罗夫迪夫举行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就没有再让这些分裂主义者参加。作为对策，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联

盟，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中也从此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组织。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及其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出现，激起了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深恶痛绝。斯塔姆博洛夫政府对社会主义者进行了种种迫害，或开除其公职，或加以逮捕法办。资产阶级报刊则对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极尽诽谤之能事，并怂恿政府对社会主义者采取更残酷的镇压措施。总之，斯塔姆博洛夫政府是保加利亚新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莫大障碍；因此，社会主义者为了推翻它而进行了无畏而有力的斗争。

1894年，上述斗争使人们产生了把“党员派”（社会民主党人自称）和“盟员派”（社会民主联盟盟员自称）联合起来的想法。布拉戈耶夫反对这样的联合，因为他已看清社会民主联盟的那些领导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者。但这些人却使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确信，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两派之间过去的分歧已经消失，没有任何理由再来反对联合。

1894 年 2 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

主联盟联合成为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政党，定名为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

正如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所预见的那样，事实证明这种联合对于新兴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害的。“盟员派”果然都是些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参加保加利亚工人社会260民主党以后，就竭力想使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变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党。

1894—1903年期间，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艰巨的意识形态上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接着主要的是反对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

在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几个俄侨民粹派分子（博里斯·敏策斯、帕斯梅尼克博士等）着手“驳斥”马克思主义，破坏马克思主义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他们侈谈什么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对保加利亚不适用，又胡说什么在保加利亚没有条件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是毫无意义的。

布拉戈耶夫科学地批驳了民粹派的谬论。他

在一系列文章中揭露了民粹派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毫无科学性，并论述了马克思的学说已完全为保加利亚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所证实。此外，保加利亚的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批驳了民粹派的谬论。民粹派分子终于哑口无言，一败涂地。

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则更为艰巨，更为漫长，而且对于保加利亚工人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斯塔姆博洛夫专制政府垮台后，联合在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内的原"党员派"和"盟员派"之间，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员派"主张工人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政府改善他们的命运，因而坚持必须继续进行反对人民党政府的斗争。与此相反，"盟员派"却开始侈谈同政府进行所谓"积极合作"。在即将来到的竞选中采取什么策略这一问题上，两派之间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更大分歧。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利用竞选运动传播社会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此相反，机会主义者把竞选运动当作在

261

大国民议会取得席位的手段，并为此目的想修改党纲以适应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联合以后的党在1894年7月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后，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新的党章和党纲由于是两派妥协的产物，就使更多的机会主义分子得以钻进党内，也使机会主义者有了同资产阶级政客达成协议的充分余地。以扬科·萨库佐夫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开始破坏党的纪律；他们不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就出版报纸，公开鼓吹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思想，并不加选择地吸收新党员。机会主义者把所有这些广泛活动美其名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理解；因此，他们被称为“广泛社会主义者”。不久，党便为小资产阶级野心家充斥其中，并有蜕变成普通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危险。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这一机会主义倾向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前，机会主义倾向始终占着上风；但在1897年召开的这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们受到了第一次沉重打击。第四次党代表

大会决定：不得与资产阶级政党作任何妥协；不得在竞选中与个别领导人达成协议。大会也决定出版《工人报》作为党的机关报，由格奥尔基·基尔科夫主编。在这以前不久，还决定出版期刊《新时代》作为党的理论刊物，由布拉戈耶夫主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版的《新时代》和《工人报》，在克服机会主义倾向上起了巨大作用。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以及杰出的、他当时最亲密的战友格奥尔基·基尔科夫和加夫里耳·格奥尔基耶夫，领导了这一场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使党的工作主要面262向工人阶级，使党变为保加利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在党的队伍内建立铁的纪律。他们运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要进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教导，反对机会主义者关于与自由资产阶级搞共同事业的谰言。机会主义者指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狭隘”的理解，把他们叫做“紧密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在为了使党承认阶级斗争现实而进行的战斗中，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教导的，正是那些开始被称为“紧密社会主义者”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保加利亚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逐年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阶级斗争的激化，在客观上帮助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当时，国内爆发了一系列的罢工。工人们在捍卫自己利益的斗争中，在党的指导下，开始通过工会组织起来。越来越多的工人入党这一事实，巩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在两种倾向的激烈斗争中，现在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党的一些代表大会上日益占了上风。

这一斗争妨碍了党的革命活动，也不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把机会主义者清除出党，已日益成为当务之急。1903年8月在鲁塞城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实现了这一点。在这次会上通过了决议，把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或所谓的“共同事业派”）开除出党。从此，党才得以集中全力把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捍卫他们的利益。

263

农民运动和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诞生 十九世纪末，保加利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锋芒指向城镇资产阶级的利己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有意识地将赋税的主要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农民运动的出现，是保加利亚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保加利亚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于政治发展极为重要。农民摆脱了城镇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一事实，以及独立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大大地削弱了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基础。此外，这个运动由于其参加者都是中、小农民，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这也就促使农民成为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天然同盟军，并在经过多次考验后，最终导致工农战斗联盟的实际形成。

农民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不满已久，到了腊多斯拉沃夫的党执政时，这种不满终于强烈地爆发了。

腊多斯拉沃夫政府提出议案，要以交纳实物的形式恢复什一税这一土耳其封建统治残余，在农民中引起了极大不安。他们一致反对这种措施。大地主和富农也反对，因为这种赋税妨碍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

利益。但反抗得最激烈的是中、小农民，因为这意味着腊多斯拉沃夫的官员对他们的新的掠夺，也意味着他们的进一步贫困化。

农民的抗议运动很快地波及整个保加利亚。其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集会和示威。在很多地方，农民运动是由农村资产阶级带头的。城镇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插手这一运动，企图借以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并指望在日后的竞选运动中得到农民的同情。农村资产阶级和城镇资产阶级竭力使农民运动不要搞得太激烈，并使之脱离有组织的斗争。

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运动。但是，党在当时还没有农业纲领，对列宁关于在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中结成工农联盟的教导也一无所知；因此，它在农民运动的问题上，就没有能采取正确的立场。

尽管农民纷纷集会表示强烈抗议，大国民议会仍然通过了什一税法。这激起了农民的极大愤慨。集会和示威如汹涌怒潮又一次席卷全国。抗议运动，还在许多地方发展为同军警的武装冲突，以至于起义。

1900年3月5日，在瓦尔纳召开了一次全区性的抗议集会，参加的有来自周围各村的数千名农民。腊多斯拉沃夫的警察首先挑衅，引起激烈冲突，致使农民与区长官召来的军队之间发生了流血事件，伤亡了若干人。在鲁塞区的特鲁斯特尼克村爆发了正式的武装起义。当地居民反对政府撤换他们村长的企图，准备进行武装斗争。265 周围各村的农民也参加了他们的斗争。农民和派来镇压他们的军队发生了多次冲突，双方各有伤亡。

巴尔契克区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杜兰库拉克（今日的布拉特尼察）、沙布拉和许多其他村庄的农民拒绝交出计征什一税的农作物收获量报告单，并宣布不让政府官员到他们地里去查点谷物的实收数。杜兰库拉克的居民，在警察企图逮捕其村长时揭竿而起。附近各村也参加了这一起义。好几千个农民，大多数赤手空拳，遭到了派来镇压他们的军队的袭击。在紧接着发生的一场正式战斗中，农民方面死了九十人，伤了八百人；军队方面则死了两个军官和几个士兵。

为了把农民的抗议运动镇压下去，腊多斯拉

沃夫政府在好几个区宣布了戒严令。

保加利亚农民联盟这一农民政党，就是在这一缺乏组织的农民抗议运动的高潮中建立起来的。保加利亚在进入二十世纪前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当时农民所处的困厄境遇，为该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里，资本主义正进入其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农民的处境也开始急骤恶化。受到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已经不仅仅是工人，而且还有农民。中、小农民完全看清了城市 266 大资产阶级所推行的只是谋取私利的狭隘阶级政策。因此，农民兴起了创建独立的农民政党的运动，以便由这一政党领导他们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捍卫他们的切身利益。毫无疑问，这一新的农民组织的最初创建者，是以1891年建立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人党作为其榜样的。

约尔丹·佩卡列夫在1898年首先提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想法。在他的倡议下，1899年3月21日在巴拉贾村召集了区农民会议，决定在瓦尔纳区建立一个农民组织。

腊多斯拉沃夫政府公开敌视农民的政策，以

及农民为反对恢复什一税而进行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加速了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以粲科·巴卡洛夫·策尔科夫斯基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比亚拉切尔克伐向农民们发表了成立农民联盟的宣言。

建立一个农民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1899年12月末，在普列文城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由扬科·扎布诺夫和粲科·巴卡洛夫·策尔科夫斯基起主要作用的农民联盟，最初在性质上只是一个教育和行业的组织。但不久人们就已看清楚，农民联盟作为一个捍卫农民利益的组织，决不能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1901年，在联盟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将这一组织转变为一个政党。农民联盟的章程和纲领表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政党。

第八章　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

巴尔干战争前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　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保加利亚的发展加速了。相当大的资本被积累起来，投入资本主义生产。此外，商品和各种原料的小生产者已被挤垮，又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手工业的衰落和贫苦农民的破产也扩大了国内市场，为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产品创造了销售的条件。 267

当时，出现资本主义发展高潮的另一原因是，政权于1903年落入正在形成的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手中。这部分人推行了一种更加明确的保护政策，他们分别于1905和1909年扩大与修订了《地方工业保护法》的范围。一些新的工业部门被列入了保护范围，受保护企业所需具备的资本额和工人数也降低了。

1904年推行了新的关税率，将一些本国能够

制造的工业产品的进口税加以提高。资本家在进口机器和原料方面，以及在按照降低的运费使用 268 国有铁路运输货物方面，都得到了优惠待遇。他们还被豁免了数项国税（开业税和建筑税）。

保加利亚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高潮，是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相一致的。这一过渡对保加利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

外国资本渗入保加利亚主要通过国家贷款的形式。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保加利亚向外国借债五次，总额达数亿列弗，国家年度预算中将近四分之一用于偿付外债。

帝国主义列强力图通过这些贷款迫使保加利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依赖于它们。另一方面，它们对保加利亚的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根本就不感兴趣。为此，它们所给予的贷款，只有一部分用于发展铁路交通，主要则用于军备。

除通过国家贷款这种形式以外，外国资本还通过私人投资的形式渗入保加利亚。许多股份公司和银行就是这样由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德

国等外国资本创办，或由外国资本和保加利亚资本联合创办。它们主要从事于信贷和商业股票交易的活动。为了利用现成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有些外国资本家也转而开办轻工业和加工工业企业。

这样，通过贷款以及银行和股份公司的资本，外国资本家从保加利亚的国民经济中榨取了巨额利润，并使其屈从于他们的利益。在这方面，他们也得到了保加利亚某些资产阶级人物的帮助，这些人有的是与西方做交易的经纪人，有的是外国股份公司和银行的利润的分享者。这样，巴尔干战争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高潮，在提高保加利亚的生产力的同时，也使它更依赖于帝国主义列强。

但是，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就其整体来说，269 其利益与外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它想要推行有利于地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保护政策。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一致。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拥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它想利用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同盟国和协约国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

盾，以达到自己在对外政策上的目的。这一点在巴尔干同盟的形成上，以及在巴尔干战争的过程中，都表现得特别明显。

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在农业上，资本主义的渗透尤为明显。其结果，农民的社会分化加速了；用于交易的农产品增加了；而随着雇佣劳动的使用、机器数量的增加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变得更加普遍了。

保加利亚的农业，一般来说，带有小片耕作的特点；土地被分割成许多小片，拥有极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居多数。保加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由小规模农户进行生产的国家。但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却导致这一类型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的解体。由于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国家（以重税形式）的残酷剥削，以及农业技术的极端落后，贫农和中农的破产过程在二十世纪初加速了。一个相当大的农村资产阶级的阶层形成了，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剥削贫苦的农民。1908年，大约44%的土地（二十八万公顷）为仅占农民总数0.3%的一千零五十人所占有，每人占有一百公顷

以上；其余的56%的土地（三十五万公顷），则分散在二十八万九千五百七十八个小农手中，每人只有零点五至三公顷。耕作所使用的机器越来越多，但都逐渐落到大地主的手中，使他们得以更加发财致富。1910年，约有十九万名根本无地或只有极少土地的农业劳动者被迫成为农业工人。贫苦农民大量参加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行列。其另一部分虽继续从事农作，但已不是小土地所有者，而成为佃农了。 270

手工业的衰落在这一时期也加速了。当时，手工业者不仅苦于外国工业品的倾销，也苦于国家保护的地方工业产品的竞争。截至巴尔干战争，甚至在此以后，手工业生产虽处于衰落状态，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1911年，它约占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截至巴尔干战争，尽管资本主义工业正在日益发展，保加利亚仍然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国家。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可以用下列数字加以衡量：1900年，保加利亚具有一百零三个较大的国家保护的工业企业，共拥有一千九百八十二万

三千列弗的资产，雇用着四千七百一十六名工人。到1911年，这类企业增加到三百四十五个，拥有九千一百零九万八千列弗的资产和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六名工人。企业数增加了两倍多，资产增加了三倍以上，工人数也增长了两倍以上。1911年，三百四十五个国家保护的工业企业的产值，达到了一亿二千二百五十万列弗。对于象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刚刚摆脱了外国统治的小国来说，这无疑是一项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这只是限于轻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而且，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也因而日益加深了。

食品、饮料工业的发展尤为显著。1911年，属于这一类工业的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2.3%，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5.1%。面粉工业在食品工业中居首位。在富饶的农业区建立了一些具有271现代化设备的大型面粉厂，其产品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出口。

纺织工业（毛、棉、亚麻、大麻）也有显著的发展。就地可取的原料，相当丰富的生产经验，以及某些手工或机器纺织工业中心拥有的大量工

人，都有助于纺织工业的发展。如所周知，甚至在保加利亚挣脱土耳其羁绊之前，斯利文、加布罗沃和卡尔洛沃这几个城市中就建立了最初的一批较大的纺织厂，集中或分散进行的纺织生产已很普遍。除这些老的纺织中心外，在索非亚、瓦尔纳、延保尔和其他城镇还建立了一些纺纱厂和织布厂。瓦尔纳和延保尔的纺织企业，都是用英国资本开办的。

与农业和林业相联系的其他工业生产部门，如制革工业、木材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陶瓷工业等，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制造植物油、肥皂、安全火柴、纸张、粘胶、火药等产品的企业纷纷建立。比利时资本参与了其中一些制造食糖、火柴、酒精等产品的企业的建立。

电力生产、采矿、冶金、工具和机器的制造等工业发展最慢。金属加工企业建立得不多，规模很小，它们或为运输业的需要服务，或对进口的机器设备进行保养和检修。截至巴尔干战争，资产阶级统治的保加利亚还不能自己生产钢铁和机器，只有采煤业（在贝尼克、波波夫多尔和旧普拉尼纳的矿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从事电

力生产和矿石（铜、铅和锌）初步加工的小型企业也建立得不多。总之，保加利亚根本没有自己的工业基础，它在工业发展上完全依赖于资本主义大国。

由于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工业，保加利亚不272得不为发展中的工业、农业和运输业进口各种机器、零件和工具。这些进口商品逐年增加。1911年，保加利亚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和工具的总值，比1886年增长了一百三十倍。

随着工业发展的高涨，农产品和原料出口的增加，以及机器和工业品进口的增长，这一时期中国内运输网的建立也加速了。腊多米尔——丘斯滕迪耳线、图尔诺沃——旧扎果腊线（继沿伊斯克河谷的铁路线而修筑的横跨巴尔干山脉的第二条铁路）、察雷伐利伐达——加布罗沃线等几条新的铁路先后修成。铁路线的总长度在1900年为一千一百二十九公里，1911年达一千九百三十一公里。公路网也扩展了，1911年公路总长度达到了八千九百四十五公里。1911年，邮局的数目达到三百七十四所（1879年仅为四十一所）；电报、电话线路长度分别达六千五百一十七公里和三

百八十公里（1879年各为一千六百三十公里和五公里）。

黑海上的港口布加斯和瓦尔纳，多瑙河上的港口维丁、斯维希托夫和鲁塞，都彻底地进行了重建或改修。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1911年的对外贸易总额比1887年增加了两倍多，达三亿八千二百万列弗（其中进口额为一亿九千七百四十万列弗，出口额为一亿八千四百六十万列弗）。主要的出口项目是农产品（1911年的出口额为一亿二千九百四十万列弗）。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银行和股份公司的资本起了重要作用。除当时已有的国民银行、商业银行、吉尔达普银行和一些小的地方银行外，又开办了几家新的外资起重要作用的大银行。1905年和1906年初，德国、法国、奥匈和比利时一些大的财团和银行，分别在索非亚建立了信贷银行、保加利亚通用银行和巴尔干银行它们成了国内最有势力的金融机构。一些新的保险公司（如"联合"、"凤凰"、"通用保险"等）和它们的分支机构，也在外资的参与下开办起来。外国资本

或外国和保加利亚的联合资本还兴办了一些股份273公司，从事于工业生产和国家自然资源的开发。然而，外国资本的主要活动领域并不是工业，而是信贷和汇兑。

这一资本在信贷、汇兑和工业领域里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成立股份公司。此类公司的数目及其资产，在1900—1911年期间增加了大约两倍。1912年，保加利亚已有一百七十二个这样的公司，拥有资产一亿三千六百万列弗。

股份公司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作用的提高，也反映了当时正在发生的资本集中过程。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相对微弱的，但在某些生产部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在整个生产中起主要作用的庞大企业。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合并这一帝国主义的特征，虽然尚处于萌芽状态，已在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中开始出现。有些大银行如通用银行、信贷银行等，都设立了从事于工业生产的股份公司。这样，保加利亚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受到其普遍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外国资本的影响，还在其早期，就已出现垄断的趋势。

以上就是二十世纪头十年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表现和趋势。只需再补充一点，即在巴尔干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向保加利亚的流入加快了。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在保加利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到优势而加剧了斗争。在巴尔干战争前夕，德国和奥匈资本的输入大大加快了。这就导致德国帝国主义影响的扩大和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中亲德派地位的巩固，也就是这些人后来使保加利亚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站到同盟国一方。

虽然在巴尔干战争前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相当成就，保加利亚仍保持了轻工业和加工工业仅达中等发展水平的落后农业国的特点。小规模生产处于衰落和解体状态，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因而不断分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两个阶级的形成和壮大：一个是大资产阶级，另一个是工人阶级。政治生活发展了，阶级斗争也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展开了。 274

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　这一时期保加利亚历史发展的特点之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为工人运动的加强创造了条件。因此，为了阐明工

人阶级的成长和它所起到的日益重大的作用，有必要专门对工人运动加以探讨。

工人运动的加强，虽以资本主义发展高潮为其物质基础，但也取决于一系列其他普遍原因和保加利亚的特殊条件，并表现为它们所起作用的结果。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工人阶级的艰难处境，以及早在1903年一个健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人党(左翼社会党)①的成立。这个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以便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并用与资产阶级统治毫不妥协的精神教育他们。因此，在这头十年里，保加利亚的工人运动已具有一种有组织的、有目的的革命性质。它在胜利地克服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机会主义的影响后，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而不断地发展和巩固，成为巴尔干半岛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革命运动之一。

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工人阶级人数的急剧增长。根据正式统计材料，保加利亚的工人总

①该党的正式名称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人党，但1903年分裂后，为了与右翼社会党相区别，在这一名称后加上了“左翼社会党”字样。

数在1910年达到二十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七名，其[275]中十六万七千七百九十八名从事于工业、手工业、贸易和运输业，其余则为农业工人（农工）。雇佣劳动者的范畴内，还包括了十八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名店员和职员。这样，国内受雇人数共达四十八万一千八百七十二名，约占总人口的20%。

工业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核心。应该承认，他们在数量上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却集中在象索非亚、普罗夫迪夫、斯利文、加布罗沃、瓦尔纳、贝尼克等较大的工业中心，而且都被组织在强大的工人组织之中。

工人阶级的处境极为艰难。他们遭受着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利润率高得出奇，根据保加利亚经济学家的计算，它平均达到125%。在某些企业内，一天的工作时间，竟达十六小时。工人工资微薄，还要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辛勤操作。他们没有假日和星期天，资本家还任意对他们科以罚款和解雇。各企业根本不遵守卫生和保健规定，也不采取任何安全预防措施。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资本家在企业中雇佣女工和童工，付给他们的工资比男

工的低得多。根本就没有任何保护妇女和儿童劳动的法规，工人阶级也因而面临着衰亡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要保护其自身利益，除选择阶级斗争的途径外，别无其他出路；而他们要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也只有通过开展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因此，随着工人人数的增加，其中参加社会民主党（左翼）和工人运动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了。

在社会民主党分裂和右翼社会党人被清除出去后，党和工会运动的发展开始了一个迅速成长276的时期。右翼社会党人虽然已被揭露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并被清除出去，仍企图在工会运动中保留他们的影响。为此，他们提出了工会"中立"的口号，企图借此使工会脱离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政治领导。但是，他们的阴谋又一次遭到失败，大多数工会在分裂后宣布支持左翼社会党，并谴责了右翼社会党人关于"中立"的号召。

为了促成工会运动的统一，挫败右翼社会党人把工人阶级引离革命斗争道路的企图，1903年于鲁塞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议成立一个总工会的决议。次年，即1904年，在普罗

夫迪夫召开了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拥有一千五百名会员的五十三个工会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成立总工会的决议，批准了总工会的章程，并选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作为其执行机构。

右翼社会党妄图使工人阶级脱离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政治领导而未得逞，也在同年召开了一个工会代表大会。他们在会上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工会。这个工会在从事私人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中实际没有任何影响，它仅仅在公务员的某些阶层如教师、铁路员工、邮电人员等中间有些影响。当时，这些人的境遇还不象私人雇佣的工人那么艰难。

总工会成立后，所属的工会和会员的数目都飞速增加。1912年，它已拥有十三个行业工会，会员总数达八千人左右。在1909年的第六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当选为总书记。

保加利亚人民的杰出儿子季米特洛夫，在1882年6月18日诞生于科伐切符威村（腊多米尔附近）的一个贫苦工匠家庭里。他的父母原籍马其顿，由于土耳其的封建压迫才离开了那里。 277

他们在腊多米尔附近居住了一个时期后，迁往新获解放的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幼年的季米特洛夫就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后来，由于没有钱，他不得不离开中学，于1894年当上了印刷工人。这样，季米特洛夫从童年时代起，就亲身遭受了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并受到了工人阶级的理想和斗争的影响。由于他正好处在当时最有觉悟、最有组织的那一部分工人阶级、即印刷工人中间，他们给他灌输了对于科278学社会主义的热爱，并且磨炼了他的斗争意志。这一期间，季米特洛夫还发奋自学，研究了保加利亚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的著作，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作品和小说。他在很年轻时就参加了工会运动，成为印刷工会的会员。1901年初，他被选为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即1902年，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当索非亚党组织内掀起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勇敢地站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积极地参加了建立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党组织的工作。1904年，他作为代表参加了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委员。后

来，他又被选入社会民主党（左翼）中央委员会。这样，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从早年起就参加了保加利亚工人革命运动的行列，并成为它最勇敢的领导人和战士之一。

社会民主党（左翼）这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表明了保加利亚的工人运动的加强。它在这一时期中的根本的和最典型的特征是：在党和总工会的队伍内，为了保持工人阶级思想上的纯洁和组织上的统一，捍卫工人切身的重大利益，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展开无情的和持续的斗争；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全世界劳动者皆兄弟的精神，对保加利亚工人阶级进行教育。

在1905年反对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曾宣称反对党的纪律的无政府自由主义者，从社会民主党（左翼）的队伍中被清除出去。以后在1908年，那些宣称支持工会“中立”这一右翼原则的“进步派”分子，也被清除出党的队伍。这样，社会民主党（左翼）就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了它对工人阶级 279 的影响以及同他们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

了党的队伍。这个党，由于其党员成分和纲领，以及它为了对现存的资产阶级政体进行革命改组所作的斗争，已成为一个真正工人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社会民主党（左翼）在分裂以后的整个发展时期里，为了对工人阶级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同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为了抵制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以武力兼并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好战政策，社会民主党（左翼）提出的口号是：支持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这两个行省内部的革命民主力量；支持这两个省与巴尔干其他地区合并成为巴尔干民主联邦的自治共和国。它参加1909年召开的巴尔干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大会也体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要求同巴尔干各国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的沙文主义与好战政策作斗争。社会民主党（左翼）还按期参加了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会议，并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

社会民主党（左翼）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所面临的基本任务是：把党和城市工人阶级的革命工会的队伍组织起来，并提高其阶级觉悟。这一

任务胜利地完成了。于是，党开始把精力投入到有着广大农业无产者的农村。由于违背了列宁关于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工农联盟的教导，党在农村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基地。虽然这些左翼社会党人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工人运动的一些根本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却并不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他们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他们不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他们没有把在保加利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确定为工人阶级的迫切任务。左翼社会党人的主张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保加利亚尚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进行这样一种斗争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而就不必去作准备。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努力地把农民争取过来，使之成为自己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同盟者。这是在应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上的一种宗派主义的做法。

280

工人们在这个时期中的艰难处境，迫使他们为捍卫自身利益而进行了坚决斗争。斗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是罢工。在这十年里，先后发生了数十起有好多万产业工人、矿工和运输工人参加的

罢工运动，其中规模最大、斗争最顽强的是贝尼克矿工的罢工，1906 年铁路员工的罢工，1908 年斯利文纺织工人的罢工和 1909 年科斯特内茨安全火柴厂工人的罢工（持续达一百三十三天）。多数罢工是由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和领导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这方面尤为积极。

与罢工同时，工人阶级也为制定劳动法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02 年，社会民主党（左翼）的议会党团向国民议会提出了一项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法案草案。草案遭到了否决，但斗争却在广大工人群众的参加下继续下去。1905年初，人民自由党政府被迫自己制定了这项法案草案，并由国民议会加以批准。

1905年初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爆发，对工人斗争的加强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民主党（左翼）的领导下，国内开展了声援俄国无产阶级并对这次革命的起因和性质进行解释的广泛运动。在它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也加剧了。

281 **第二斯塔姆博洛夫政府 伊林顿起义和普列欧布拉兹赫尼起义** 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中，保

加利亚的政权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里。这就决定了它对内、对外政策的性质和任务。

资产阶级的对内政策，是用反动手段和政治恐怖手段来巩固其阶级统治。它通过保护政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保加利亚和外国的资本家大发横财。广大人民却受到了越来越厉害的剥削和压迫。

对外政策的目标则是兼并色雷斯和马其顿，以确保保加利亚的领土扩张。可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同土耳其进行战争；而要打胜这一仗，保加利亚的军力还嫌不足。因此，寻求盟友、建立军队和在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摇摆不定，就成了资产阶级政策的显著特色。

尽管资本主义有了蓬勃发展，大资产阶级仍旧是一个人数较少和经济上软弱的阶级。其内部各派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权力的斗争。各资产阶级政党都以攫取政权为其目的，以便发国库之财并对其追随者加以庇护。斐迪南大公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建立其所谓的“独夫政体”；这个政体对全体人民来说，具有巨大

的危险性，因为斐迪南热中于好战和冒险的政策。

进步自由党倒台后，斐迪南委托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人民自由党（其党人为斯塔姆博洛夫的追随者）组织新政府。为了更有效地操纵新政府的政策，斐迪南指定"无党派的"腊乔·彼得罗夫将军为内阁总理，此人从斯塔姆博洛夫专政时期就以甘为斐迪南走狗而臭名昭著。新政府于1903年5月3日成立，即所谓的"第二斯塔姆博洛夫政府"，这个政府后来虽然一再改组其内阁，却一直持续到1908年初。

282

第二斯塔姆博洛夫政府时期，是一个资产阶级对于人民进行无情迫害和残酷剥削的时期。政权一到手，人民自由党就竭尽全力地帮助其追随者发财致富。它在全国建立了警察统治，并用创建"民族工业"的口号来掩盖其掠夺政策。

人民自由党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使保加利亚摆脱在民主党和进步自由党统治时期已增强的俄国的政治影响，而去投靠同盟国。这个党代表了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中与德、奥匈两帝国主义有勾搭的集团的利益，他们对俄国拒绝支持保加利亚

兼并马其顿的政策感到不满。

尽管资产阶级的各个政治集团对于保加利亚对外总方针（倒向协约国或同盟国）在看法上有分歧，他们在保加利亚对土耳其的政策方面还是一致的。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确保色雷斯和马其顿并入保加利亚。历届政府，不问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如何，都奉行此政策。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的，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除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外，其他巴尔干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也对如何解决马其顿和色雷斯问题感到兴趣。这就使马其顿和色雷斯问题变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伊林顿起义和普列欧布拉兹赫尼起义反映了马其顿和色雷斯居民为自由而战的决心；它们的爆发，更增加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困难。

马其顿和色雷斯争取解放的运动，是与保加 283 利亚的历史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起初，即在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解放前，马其顿和色雷斯居民反对土耳其封建制度的斗争，是与保加利亚北部和南部的保加利亚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一起进行的。这些居民大多数是斯拉夫血统，

他们具有保加利亚的民族意识。因此，在保加利亚摆脱土耳其统治以前，并不存在单独的马其顿和色雷斯问题，它是在柏林会议废除了圣斯特法诺条约中有关保加利亚的规定后才出现的。

虽然柏林条约第二十三条许诺要进行改革，但在1878年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大地主对于马其顿和色雷斯居民的政治压迫，横行霸道和掳掠抢劫却有增无已。由于外国的竞争完全不受限制，手工业生产被搞垮了。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居民的生活已不堪忍受，从而导致了伊林顿起义和普列欧布拉兹赫尼起义的爆发。

起义的组织者是马其顿—亚德里雅那堡内部革命组织①。如前所述，它是1893年在萨洛尼卡成立的，并由哥策·德尔切夫、达梅·格鲁耶夫和亚内·散丹斯基这些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担任领导。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居民在种族上是混杂的（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瓦拉几亚人、希腊人等等）；保加利亚、塞尔维

①马其顿—亚德里雅那堡内部革命组织，the Internal Macedonian—Adrianopl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IMRO)，以下简称“内部组织”。——译者

亚和希腊之间，为了在马其顿和色雷斯争夺霸权并吞并它们，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从上述事实出发，“内部组织”的领导人提出的口号是：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自治的马其顿和色雷斯。这一口号也得到了拥护社会民主运动的人们的支持。

建立自治的马其顿和色雷斯这一口号，以及“内部组织”准备举行群众武装起义的行动，为保加利亚大资产阶级和斐迪南大公所仇视。他们为了同“内部组织”进行斗争，利用了马其顿—亚德里雅那堡最高委员会①，这个建立于保加利亚的组织也成了他们推行沙文主义和好战政策的工具。

1902年，“最高委员会”在斯特鲁马河流域煽 284 动了一次不成熟的武装起义（果尔纳焦马亚起义）。这一起义的爆发，对“内部组织”的活动起了反作用，使它在马其顿东部的许多委员会被解散了。城镇和较大的村庄中都进驻了强大的土耳其军队，阻碍了这个组织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准

①马其顿—亚德里雅那堡最高委员会，the Supreme Macedonian—Adrianople Committee，以下简称“最高委员会”。——译者

备活动。国际形势也有所恶化。帝国主义列强害怕巴尔干武装冲突的爆发会转化为一场大战，而他们对此尚无准备，于是就宣称他们反对革命运动，主张在土耳其维持现状。

尽管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很不利，“内部组织”在 1902 年事件后，立即着手准备一次武装起义。这一方面是由于马其顿形势的极端紧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混进“内部组织”领导核心的“最高委员会”分子所施加的压力。

1903年初，“内部组织”在萨洛尼卡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宣布武装起义。这次代表大会285按规定是不完备和不合法的。一些最杰出的革命工作者如哥策·德尔切夫、吉奥尔切·彼得罗夫等，虽未参加大会，但由于怕把整个组织打乱，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服从了大会所作出的决议。1903 年 5 月 4 日，在起义准备进入高潮时，“内部组织”的领导人哥策·德尔切夫被一个土耳其暴徒在塞尔区巴尼察村杀害了。

根据已制定的计划，比托拉革命区被选定为马其顿起义的主要根据地。“内部组织”在那里的革命支队数量最多，训练最好，当地居民也已作

好了进行群众武装斗争的准备。在这个地区，居民遭受着大地主和一帮帮盗匪的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这也是他们乐于参加即将来临的武装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起义在预定的日子——1903年8月2日（圣伊利亚日、根据教历称为“伊林顿”）爆发了，并很快地蔓延到马其顿的整个西南部（比托拉、累临、卡斯托、奥赫里德和基切伏各区）。它是一次群众性的起义。起义军攻下了克鲁舍沃城，并在当地的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和希腊人这三大部分居民的参与下，组成了著名的克鲁舍沃共和国。他们曾力图把土耳其族村民争取过来，但却未能成功。这些土耳其村民虽然也受到政府和大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但由于宗教狂热的蛊惑，他们对起义采取了仇视态度，并参与了对它的镇压。有些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教徒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在马其顿的其他的革命区，起义采取了由武装支队进行活动的方式。其目的是用破坏交通设施的办法，阻止土耳其军队调往已经爆发起义的地区。此外，他们也对分散的小股土耳其驻军进

行袭击。

马其顿居民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持续了大286约三个月。为了镇压起义，土耳其政府在起义地区调集了大量正规部队和“巴希—巴佐克”部队，它们对保加利亚居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二百多个村庄被焚毁；五千人被杀害；七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三万人为了免遭土耳其当局迫害而离乡背井，逃往保加利亚。

在伊林顿起义达到高潮时，普列欧布拉兹赫尼起义又于1903年8月19日在色雷斯东部爆发。这一起义也由“内部组织”筹划，并波及到保加利亚人占居民大多数的这一地区的北部。起义军攻打和击溃了马耳科—图尔诺沃区和洛曾格勒区一些村庄的土耳其驻军，解放了黑海上的两个小港口，又在那里建立了有名的斯特兰贾共和国。但这一共和国只存在了二十六天。

象在马其顿一样，土耳其政府也集中了大量正规部队和“巴希—巴佐克”部队来镇压色雷斯东部的起义。它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杀害和毁灭保加利亚居民，或把他们逐离故土，使保加利亚人在色雷斯的亚德里雅那堡周围绝迹，因为那

里离帝国首都实在太近了。几十个保加利亚人居住的村庄遭到洗劫和焚毁；居民中有二千五百人被杀害，另外的二万人则被迫去保加利亚避难。

伊林顿起义和普列欧布拉兹赫尼起义，是马其顿和色雷斯居民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最英勇的业绩。它们表明，当地的革命力量力图以革命民主方式解决马其顿和色雷斯问题，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不激起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除为了斗争求解放外，引起农民大批参加起义的根本问题则是土地问题。起义的失败只是暂时地推迟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身，必然导致封建耕作制的废除，以及一切与土耳其国家的存在相联系的中古剥削和压迫方式的废除。 287

数百名来自自由保加利亚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志士，怀着对被奴役居民所受苦难和牺牲的深切同情，参与了伊林顿起义和普列欧布拉兹赫尼起义的组织工作。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武装斗争的日子里牺牲了。他们为正义和进步事业的胜利而战斗，这一事业为巴尔干的和平以及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作出了贡献。保加利亚的人民群众，也对

马其顿和色雷斯革命者的事业寄以深切同情并给予各种支持。

然而，保加利亚的大资产阶级和君主，却对马其顿和色雷斯的革命斗争抱不同态度。他们已看出“内部组织”是他们推行好战政策和兼并政策的障碍，因而企图从内部瓦解和摧毁它。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最高委员会”假意满足马其顿和色雷斯公众的愿望，说什么一旦发生起义，他们将予以援助。但在伊林顿起义和普列欧布拉兹赫尼起义爆发后，人民自由党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支援武装斗争。这引起了起义居民的极端失望，他们由于一切期待和希望的破灭而感到受骗了。尽管这样，即使在起义失败之后，他们仍然继续为争取解放而斗争，并得到了保加利亚民主主义者的支持。

人民自由党政府，没有利用伊林顿起义和普列欧布拉兹赫尼起义的时机来实现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兼并马其顿和色雷斯的计划，因为它对与土耳其作战尚无准备。因此，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它便转而迅速地扩建和装备军队。武器和弹药是从国外购买的，政府的一些支持者充当了掮

客，从中捞取巨额利润。甚至一些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也染指于贪脏枉法的勾当，如总理腊乔·彼得罗夫本人就被控告在军械和战争物资的备办中有贪污行为。288

当然，所有这些事都是背着人民干的，而且遭殃的也是人民。1903—1907年期间，间接税几乎增加了一倍，国家预算中的岁入则从一亿列弗增加到二亿四千一百万列弗。这激起一场广泛的抗议运动，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具有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罢工和抗议示威多次爆发。1907年1月3日索非亚的国立大剧院举行开幕式时，国立大学的学生和正在罢工的铁路员工，对这一压迫和掠夺人民的政权得以存在的罪魁祸首斐迪南大公报以嘘声。这件事激怒了政府。学生遭到大规模逮捕和扣押，他们之中还有许多人被强征入伍。大学教授对政府这种专横行径提出抗议，但大学却遭封闭，教授们也被解聘了。

人民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压迫和政治上的非法行为进行了斗争；政府为了镇压这一斗争，对国内的一切进步力量、首先是社会民主党（左翼）

和革命工会的成员进行了迫害。为了限制工人和雇员罢工、加入工会、举行公共集会和示威的权利，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动法令。此外，政府还在黑海沿岸组织了对于希腊居民的大屠杀，其目的在于转移群众对于国内严重局势的注意。

但是，任何做法都不能转移和阻止群众对反人民的反动政权的斗争。斐迪南大公懂得这一点，他害怕人民愤怒的风暴会把他和他的宝座一起冲刷掉，决定改组政府。他不通过议会而完成了这件事，这就再一次表明其独夫统治的加强。

289 **保加利亚宣布独立** 反抗第二斯塔姆博洛夫政府这一斗争的加强，不仅危及斐迪南大公的统治，而且也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基于这一原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党——人民党、进步自由党、民主党、激进党、右翼社会党等，暂时克服了它们的内部矛盾，于1906年末成立了所谓的“爱国集团”，企图利用人民的不满而夺取政权。“集团”诸党宣称他们是“真民主”的捍卫者，企图以此欺骗人民相信这就是他们反对政府的目的。

当第二斯塔姆博洛夫政府摇摇欲墜和斐迪南

大公决定踢开人民自由党时，“爱国集团”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民主党人不但没有象他们曾经大肆宣扬和允诺的那样，与独夫政体进行斗争，反而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斐迪南的邀请，由他们一个党来组织新政府。“集团”内的其他政党感到受了骗，便对其前盟友指责和恫吓了一番，接着就把“集团”解散了。

新政府于1908年1月16日由民主党的领导人亚历山大·马林诺夫组成。它取消了斯塔姆博洛夫分子强行贯彻的一些非常措施，以便在国内稍为安定一下人心。被开除的学生回到了大学；曾公开反对过人民自由党人的横行霸道和违法乱纪的教授们，也都恢复了原职。政府宣布保加利亚开始了一个“真民主”的时期。但是，这只是一项空头诺言；所谓“真民主”，原来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新形式。斯塔姆博洛夫分子赤裸裸的恐怖统治虽被一种更隐蔽的压迫和掠夺工人阶级的方式所代替，目的还是一个：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一小撮工业家、银行家、商人和大地主靠榨取人民发财致富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290

民主党早在取得政权以前，就已经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变为一个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与英一法资本以及俄国有实力的经济界和政界都有联系。为此，在它执政期间，俄国对保加利亚的政治影响恢复了。与此同时，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想借助于俄国兼并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希望也再次浮现。

民主党统治期间，保加利亚历史上的最大事件就是宣布独立。它的实现表明了保加利亚在其独立存在的三十年中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增长，也与其毗邻的土耳其国内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密切攸关。

伊林顿起义和普列欧布拉兹赫尼起义被镇压下去后，马其顿和色雷斯居民争取摆脱土耳其羁绊和废除腐朽封建制度的斗争有增无已。武装支队日夜活跃在被奴役的土地上，与土耳其军队交战。斗争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除当地的革命支队外，一些巴尔干邻国派来推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政策的武装支队，也活跃在马其顿。这些武装支队阻碍了革命运动力量组织起来，并恶化了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关系。

被奴役居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受到世界上一切民主力量的称赞和支持。列强迫于进步舆论的压力，又害怕巴尔干武装冲突的爆发会转化为一场大战，而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人民的处境。1903年秋，俄国与奥匈达成一项协议，要在马其顿实行军事、行政、司法等方面的改革。当这些措施行之无效时，俄国又取得英国的同意，想把马其顿立为自治省。 291

俄、英关于建立自治的马其顿这一协议的达成，使土耳其统治阶级大为震惊。青年土耳其党或所谓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①，决定在本国政府中实行改革，以消除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1908年6月，马其顿的庞大土耳其驻军中有一些军官（上述委员会的成员），发起了反苏丹的暴动，要求实行宪法。从此开始了曾被误称为“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青年土耳其党政变。

起初，苏丹对此予以拒绝，但当其他土耳其驻军也参加了这一暴动时，他只好宣布恢复1876

①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政党，1889年成立，又称为“统一进步党”，欧洲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译者

年宪法①。实行宪政的运动，受到了“内部组织”战士们的支持。宪法公布后，这一组织的武装部队从山上下来，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握手言欢。青年土耳其党人庄严宣布：一个“平等、博爱和自由”的时期已经在土耳其开始了。马其顿解放运动中的右翼分子，组织了一个被称为保加利亚立宪俱乐部的新党，它所推行的是保加利亚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左翼人士则组织了民族联盟党，宣布要为建立自治的马其顿而战斗，并要通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也成立了。

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宣称的“自由”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苏丹于1909年又废止了宪法。这激起了青年土耳其党人新的暴动，他们组织了旨在推翻苏丹的进军。马其顿的革命者也参加了。运动取得了成效，宪法又恢复了。但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对马其顿解放运动的态度，不久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们在推翻

①1876年宪法，是1876—1877年米德哈特任首相时制订的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1878年，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建立了恐怖统治，宪法乃被废止。——译者

苏丹并巩固其地位后，开始对“内部组织”的战士进行迫害。这是因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力图恢复业已崩溃的帝国荣誉，而“内部组织”战士关于实行马其顿自治的要求，却妨碍了他们这一沙文主义意图的实现。他们抛开了“平等、博爱和自由”，宣布建立一个新的土耳其民族，所有被征服的民族都必须合并在内。大地主对农村居民的剥削和压迫也加强了。

292

土耳其的事变，使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和斐迪南大公大为震惊。他们原想利用马其顿居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来实现其兼并政策，害怕宪政的实行会使他们失去这一机会。民主党政府密切地注视着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政变后的事态发展，进行了紧张的战争准备。与此同时，它也决定利用这一形势来宣布独立，使保加利亚摆脱对土耳其帝国的臣属关系。

但是，宣布独立却意味着对柏林条约的违背，也会给保加利亚带来巨大危险。因此，民主党政府和斐迪南大公决定谋求与奥匈进行合作。根据柏林条约，奥匈本应在1908年底将它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归还土耳其，但是，它却毫

不掩饰地想在规定期满后继续占有这两块斯拉夫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的要求支援当然受到了欢迎。斐迪南为初步试探的成功所鼓舞，亲赴奥匈进行秘密协商，以便两国步调一致地拒不接受柏林会议的决定。

有一次，土耳其外交大臣举行外交午宴，没有邀请保加利亚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代表参加，保加利亚政府就利用这一侮辱性事件召回其外交代表以示抗议，并着手准备宣布独立。斐迪南从奥匈一回来，便于1908年9月22日在保加利亚古都图尔诺沃庄严地宣布了独立。他向保加利亚人 293 民发表了特别咨文，宣称保加利亚为“王国”，他自己则是“保加利亚人之王”。次日，奥匈也宣布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宣布独立是保加利亚历史上的一个进步行动。虽然保加利亚已在实际上获得独立，但它对土耳其的臣属地位，却阻碍其国际地位的巩固。此外，保加利亚继续承受着西方国家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负担，也有碍于其经济和文化发展。因此，广大人民群众都对宣布独立热情洋溢地表示了欢迎。

但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和君主所执行的狭隘的阶级政策，宣布独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保加利亚虽然摆脱了对土耳其的臣属关系，但却未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摆脱对列强的依赖。宣布独立加强了君主的地位，也有助于奥匈对南部的斯拉夫人实行掠夺政策。

宣布独立后，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保加利亚政府害怕受到武装进犯，开始在保土边境集结军队。土耳其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气氛日益紧张，战争爆发只在旦夕。俄国的干涉才使这场战争得以避免。俄国政府主动地在保土之间进行了调解，它同意豁免1877—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规定的土耳其赔款；作为交换条件，土耳其也放弃了它对保加利亚的赔款要求，并承认了保加利亚的独立。

与土耳其关系的恶化，促使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在军事上和外交上进行了紧张的战争准备。军队建立起来，并加紧用西方国家的武器弹药加以装备。随之而来的是竭力寻求盟国的活动。但要把一些国家争取过来，就要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同它们进行长时间的秘密协商。这就促使民 294

主党政府提出了修改图尔诺沃宪法第十七条的要求，以便授权斐迪南可与别国进行秘密协商，而不必通知国民议会并取得其同意。

后来，以伊凡·盖朔夫为首的人民党和进步自由党政府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并为此在1911年6月召开了大国民议会。除第十七条外，议会还修改了宪法的其他一些条文。这样，斐迪南的权力就进一步扩大了。

在修改宪法的讨论中，资产阶级党派的议会党团公开宣布他们支持政府的提案。只有左翼社会党、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激进党和右翼社会党反对修改宪法。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们仅仅是反对加强斐迪南的“独夫政体”，而左翼社会党人却是为了废除君主制度和粉碎资产阶级好战政策而进行斗争。

在关于修改宪法的辩论中，农民联盟的年轻领导人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表现了极大的勇敢。当时，联盟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众多小农和中农盟员的政治组织，他们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剥削。但是，虽然联盟宣称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却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民政

府的口号。这是一种错误的乌托邦思想，它阻碍了工人和农民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

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　二十世纪初，在保加利亚和在其他独立的巴尔干国家——塞尔 295 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资本主义都获得了相当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获得了发展。各国的资产阶级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便指望通过领土扩张以增辟财源。同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一样，他们都把目光转向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变后仍处于衰落状态的邻国土耳其。对土耳其领土的觊觎，激励着巴尔干国家为进行巴尔干战争作准备。

但是，这并不能充分说明巴尔干战争的起因，事情要错综复杂得多，其根源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初的整个内部（巴尔干）形势和国际形势。巴尔干国家与土耳其的矛盾有其历史根源。产生这些矛盾的基础，是土耳其封建制度的解体，以及巴尔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封建运动的发展。但是，巴尔干各国争取民族解放和废除封建制度的

斗争并没有完成，它被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用来进一步推行其好战和兼并政策。

在巴尔干解决民族问题和消除中古残余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土耳其的巴尔干领土上人民大众的革命民主斗争，以及一个自由国家联邦的建立；一是通过战争的途径，而这几乎必然要导致巴尔干国家在如何瓜分所得土地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巴尔干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采取了第二条途径，但他们却为了掩盖其扩张领土的野心，提出民族解放以及保护被奴役人民免受苏丹暴政和掠夺的口号。

在巴尔干各国中，保加利亚在领土和人口上都居首位，在经济和军事上也最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提高了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并使其对外政策活跃起来。在宣布独立后，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296 1911年意土战争的爆发，推动了巴尔干战争的直接准备。意大利的胜利，暴露了土耳其在军事上的软弱。同时，它也表明在“巴尔干的领土分配”上，有可能出现危险的觊觎者。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既已在为这一场孕育已久的战争作

直接准备，便去和俄国接触以寻求援助。但是，俄国却运用外交手腕拒绝了这项请求，以便促使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达成协议。俄国力图缓和保塞之间的矛盾，并指望在万一与奥匈或土耳其发生战争时，能使保塞两国在其领导下联合起来。

由于俄国从中斡旋，盖朔夫政府开始与塞尔维亚谈判。谈判圆满结束，两国于 1912 年 2 月 29 日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一旦发生战争，两国要互相援助。条约还带有秘密附件，对如何瓜分预计要占领的土地达成了协议。两国政府同意将斯特鲁马河下游以东地区让给保加利亚，而把夏尔山西北地区划归塞尔维亚。至于马其顿，在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后，被分为两个区域：没有争议的区域和有争议的区域。前者包括戈冷山峰——奥赫里德湖线东南的地区，划归保加利亚。后者是指此线西北的地区，它究竟归属于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将取决于军事行动的发展以及塞尔维亚能否取得一个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出口。

1912 年 5 月 16 日，保加利亚又与希腊缔结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规定一旦与土耳其发生战争，两国应互相援助。这个条约，与保塞条约不

同，没有就如何瓜分那些预计占领且双方均有要求的土地达成协议。其后，保加利亚也与门的内哥罗缔结了一项对土耳其联合行动的条约。这样，联合巴尔干各国力量共同对土耳其帝国作战的巴尔干同盟便形成了。这个同盟是在俄国的帮助和297保护下建立起来的。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一直在为打垮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而斗争，但又想利用它限制同盟国对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渗透。

尽管缔结巴尔干同盟的谈判进行得异常秘密，但有关这一蓄谋中的战争的流言仍然泄漏到保加利亚社会之中，公众反应十分强烈。各资产阶级政党都宣布支持备战，并竭力加紧战争宣传，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也被对土战争的宣传冲昏头脑而盲目地相信，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人民，只有通过一场打赢的战争，才能获得民族解放和统一。

公开宣布反对备战，力求以民主方法解决巴尔干民族和社会问题的唯一政党，是左翼社会党。1912年8月，在索非亚召开了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反对资产阶级好战政策的决

议。它指出，土耳其奴役下的巴尔干人民获得解放的唯一正确途径，是建立一个巴尔干民主联邦。当战争准备变得极其明显时，左翼社会党便在全国各地组织了抗议集会。用印刷品进行的反战宣传也加强了。

但是，只凭工人运动的力量，还不足以使保加利亚脱离战争的道路。原因之一是小资产阶级群众被资产阶级的宣传所欺骗，看不清其战争政策的真正目的。

为战争所作的外交准备一经完成，结盟的巴尔干国家就着手进行直接的军事准备。俄国对此颇为不满，它一心想把这些盟国作为自己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后备力量，坚持要把战争推迟。然而，其愿望却未能实现。巴尔干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迫不及待地要取得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属于他们的领土；军队也求战心切，急于同 298 蹂躏被奴役人民的自由、尊严和财产达数世纪之久的土耳其人一决雌雄。

预定的计划是把色雷斯东部作为主要的作战地区，因为准备进犯的土军主力就集结在那里。土军的总数约为五十万人，而与之对垒的则有保

军三十五万人左右、塞军十五万人、希军十万人和门的内哥罗军队三万人。联军方面在兵力上占了优势。但是，土耳其却拥有辽阔的领土和巨大的后备力量可资利用。在色雷斯东部，双方兵力是旗鼓相当的；而在其他战线上，联军却具有相当优势。

1912年9月，同盟各国宣布了动员令，并开始沿毗连土耳其的边境集结军队。指定在色雷斯东部作战的保加利亚军队分为第一、二、三军。另外还组织了数支单独的特遣部队，其任务是跨越罗多彼山脉而下，一路直指爱琴海，一路则沿斯特鲁马河进入马其顿。塞军在新帕扎尔区和马其顿北部集结并准备作战，希军沿埃皮鲁斯和色299萨利集结，门的内哥罗军队则沿阿尔巴尼亚北部集结。军队的集结一经完成，同盟各国即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一项照会，要求给予巴尔干信奉基督教的居民以行政自治。照会被拒绝，同盟各国随即于1912年10月5日对土宣战。

宣战受到保加利亚人和巴尔干其他民族普遍的热情支持。军队的情绪也分外激昂，他们在发动攻势后便勇往直前，迅速推进。在交战的头几

天，保加利亚的第一军和第二军就粉碎了土耳其的反攻，并开始包围亚德里雅那堡城；而第三军则攻下了洛曾格勒城。土耳其统帅部对败退的军队进行了整编，以便在卢累布尔加兹和布纳尔希萨尔两城之间的卡腊加奇河流域重新发起总攻。在那里，经过五天（10月15—19日）的血战，土军又被击溃，并开始向乔尔卢和君士坦丁堡仓皇退却。亚德里雅那堡被围后，保军继续向格利博卢半岛和位于马尔马拉海西岸的地区挺进。

与此同时，在爱琴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作战的保军，也取得了巨大胜利。吉乌米乌尔季纳、德腊马、塞雷、伐洛维察、斯特鲁米察和希提普 300 各城均被攻陷。第七里拉师的一个连，与希军一起开进了萨洛尼卡。联军还分别在埃皮鲁斯、阿尔巴尼亚北部和马其顿胜利挺进。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土耳其就面临了军事上的全面崩溃。只有被围攻的亚德里雅那堡、雅尼那和斯库台里这几个大要塞还在进行抵抗。

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政府向保军总司令斐迪南国王求和，提议缔结停战协定。斐迪南野心

勃勃地想要攻下君士坦丁堡，拒绝了这一提议，并进而下令攻打土耳其在恰塔耳贾的阵地，那里工事坚固并配有野战炮和海岸炮加以防守。由于保加利亚的进攻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与后方的联系又被切断，这次攻坚战乃以失败而告终。只是在这时，斐迪南才接受了提议，并于11月21日同土耳其缔结了停战协定。

此后不久，在伦敦开始了和平谈判。同盟各国要求土耳其割让米迪亚——埃内兹线以西的全部土地和爱琴海上的全部岛屿。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列强进行了干预。土耳其政府在同盟国的怂恿下，迟迟不接受巴尔干同盟的要求。当它最后决定接受时，君士坦丁堡却发生了政变，亲德派人士攫取了政权并再次同巴尔干国家作战。但是，这一企图扭转败局的挣扎仍归于失败。保军击退了土耳其在恰塔耳贾、夏克约伊和布累尔发动的一切进攻，并于3月13日攻下了亚德里雅那堡。雅尼那和斯库台里这两个要塞也被相继攻陷。

亚德里雅那堡失陷后，土耳其乞求恢复在伦敦的和谈。同盟各国同意进行谈判，但并不放弃以前所提出的领土要求。他们之所以急于缔结和

约，也是因为在被占领土地的瓜分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和争执。罗马尼亚政府借口保加利亚已获得较大的领土扩张，而且在马其顿居住的瓦拉几亚 301 族居民又将归保加利亚管辖，要求得到多布罗加南部作为补偿。由于俄国从中斡旋，两国开始了谈判，最后决定将保加利亚的锡利斯特拉城及其周围的一小块领土让与罗马尼亚。

土耳其与巴尔干同盟各国的和约，于1913年5月17日在伦敦签订。土耳其将米迪亚——埃内兹线以西的土地以及爱琴海上的所有岛屿割让给同盟各国。此外，阿尔巴尼亚人也得到了民族自由。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就此结束。尽管巴尔干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怀有兼并野心，但这一场战争对巴尔干各民族的发展，还是起了进步的作用。战争废除了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封建统治，为被压迫人民的进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列宁在他所写的几篇有关巴尔干战争的文章里，都指出了这一点。被奴役的民众把联军当作自己的救星来欢迎，向他们提供了全面的支援。在保加利亚军队里，就组成了一些马其顿和亚德里雅那堡特别志愿队直接参加作战，给了保加利亚军队可贵的

支援。许多活动于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游击支队都参加了这些志愿队。

但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也给被占领地区居民和巴尔干各族人民带来了一些恶果。它导致这些地区的分裂和巴尔干同盟各国关系的恶化，并最终导致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的爆发，即军事史上所称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这是由于对中古残余的废除，是在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点在土地问题的解决上，表现得比在其他方面更为明显。外逃土耳其地主的土地，并没有分给农民，而是被收归国有后卖给或让与塞尔维亚和希腊的游击队和殖民者。

302 同盟各国因瓜分土地而引起的关系紧张化，对巴尔干各族人民利益的危害最大。甚至在伦敦和约签订前，以保加利亚为一方，塞尔维亚和希腊为另一方，就在马其顿的瓜分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为了证实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权利，双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证，有历史方面的，人种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军事方面的，不一而足。塞尔维亚政府不仅对“有争议的”地区，而且对“无争议的”地区也提出了要求。它提出这些要求的根据是：

一、它未能取得亚得里亚海上的出口；二、有必要在巴尔干保持均势，以免为保加利亚的"过分"扩张所破坏。希腊政府则对包括萨洛尼卡、塞雷、卡瓦拉和德腊马各城镇的马其顿南部和东南部提出了要求。罗马尼亚也要求保加利亚补偿新的领土。争论从外交场所转移到报纸刊物上，抑制不住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象浪潮一样地席卷巴尔干各国。但是，资产阶级的政客和记者之中，谁也没有征求过马其顿居民对解决这一领土问题的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口头的论战转变为公开的敌对行动。塞尔维亚和希腊当局在他们所占领的马其顿地区，开始对保加利亚籍教师、教士和居民进行迫害。某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塞尔维亚和希腊两国的政府，为了确保夺得马其顿的大部分，缔结了一项针对保加利亚的秘密同盟条约。

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贪婪也毫不逊色。它对整个马其顿提出了要求，其论据有二：一、在打败土耳其的战争中，保加利亚军队起了主要作用；二、在马其顿的人口中，保加利亚族居民占多

数。

列强为使同盟各国相互争吵和敌视，极尽其煽动之能事。德国和奥匈一心想瓦解巴尔干同盟，他们鼓励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提出其领土303要求，而同时又唆使保加利亚不要让步。协约国，特别是俄国，则极力调解同盟各国间的矛盾，表示愿意在领土问题的解决上尽力从中斡旋。

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浪潮日益高涨，并把巴尔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小资产阶级政党都卷了进去。在保加利亚，为反对新的战争威胁而进行斗争的唯一政党，是左翼社会党。它清楚地看到了奉行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正把国家推向绝境，因而力图防止这一日益迫近的灾难。在它的宣传工作的影响下，许多部队里发生兵变，反映了人民对新的战争准备自发的不满。

灾祸在1913年6月16日降临了。这一天，斐迪南以总司令的身分，干了一桩“犯罪的蠢事”：他无视保加利亚人民的利益，下令攻打占领着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就此开始。塞、希军队对这一袭击早有所料，很快就转入攻势。当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和土

耳其也参加了这一场混战时，保加利亚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它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被迫停战求和。因为保军虽已击退了塞、希的进攻，甚至还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罗军却占领了保加利亚北部，土军也夺回了色雷斯东部并继续向西挺进。

1913年7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塞尔维亚和希腊获得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土地，罗马尼亚获得了多布罗加的南部。保加利亚只得到爱琴色雷斯和马其顿的一小部分。1913年9月16日，保加利亚又在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签订了一项新条约，规定包括亚德里雅那堡在内的色雷斯东部仍由土耳其管辖。这样，对保加利亚来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就以深重的民族灾难而告终。它给人民带来的不但不是民族的统一，反而是苦难和牺牲。在这场未经正式宣战就已输 304 掉的战争里，数以千计的保加利亚男儿被杀害。人民意气沮丧。国内掀起了一个运动，要求惩办应对这一民族灾难负责的那些人。站在这一运动前列的是左翼社会党人及其拥护者，他们指出罪魁祸首就是斐迪南和保加利亚资产阶级。

保加利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保加利亚经济形势开始迅速好转。军队复员了，人民也投入了和平劳动。1913年收成良好，粮食供应的困难得以克服。成千上万来自马其顿和色雷斯东部的难民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他们被安置在较大城镇和保加利亚内地的一些地区。

民族灾难带来了巨大的沮丧情绪，同时也使人民产生了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但是，大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的意愿却恰恰与此相反。他们觉得保加利亚受了前盟友的愚弄，因而，巴尔干战争一结束就着手准备报复。于是，他们便把这一意愿的实现，寄托在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上。

大资产阶级在使保加利亚卷人一场新战争这点上是一致的，但他们在国家对外总方针上却有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同俄国和整个协约国重归于好，而另一部分人则力图投靠同盟国并借助于他们收复失地。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政权落人亲德派资产阶级手中。1913年7月4日，以腊多斯拉沃夫为首的政府成立了，它代表了自由党（腊

多斯拉沃夫分子)、人民自由党（斯塔姆博洛夫分子）和青年自由党（汤切夫分子）的联盟。这个政府得到国王斐迪南的全力支持，他当时正打算将保加利亚绑在德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 305

新政府为了巩固其地位而解散了国民议会。1913年末，进行了新的议会选举。尽管在选前采取了恐怖措施，政府仍没有得到必要的议会多数。可是，它不但没有辞职，反而以“无法维持”为借口再次解散议会，并确定在1914年初重新选举。由于这次选举是在更加恐怖和营私舞弊的情况下进行的，政府才取得了勉强的议会多数。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特别是农民联盟，在两次选举中都得到了大量选票。左翼社会党的选票也大为增加。这说明了国内民主力量的壮大，以及群众对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的好战政策的抵制。

1914年夏，在与一家名为“贴现公司”的德国金融康采恩缔结借款协定的问题上，两个资产阶级营垒关于保加利亚对外总方针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这项借款是用来重新武装保加利亚军队和准备新战争的。尽管协约国提出了更为优惠的贷款条件，但腊多斯拉沃夫政府却拒绝加以接受，

从而表明了它的亲德方针。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两个资产阶级营垒间的斗争。同盟国和协约国都力图把保加利亚争取到自己这一方，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来迎合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领土要求。协约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迫切，因为它们正企图强行攻占达达尼尔海峡，而保加利亚能够协助它们击败土耳其军队并切断土军与同盟国军队的联系。当时，还进行了所谓的“德克罗西尔”交易，由协约国代理人在保加利亚购买谷物，不让它们输出到德国去。

306 德国在法国和在东线的胜利，以及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加强了亲德派资产阶级的地位。腊多斯拉沃夫政府为把保加利亚卷入战争而进行了直接准备。保加利亚与德国并因此于1915年8月签订了秘密的友好同盟条约，以及有关保加利亚从塞、希、罗三国获得领土的秘密条款（对希、罗两国来说，只是在他们站到协约国一方参战的情况下）。此外，还签订了一项保加利亚参加对塞尔维亚作战的军事协定。与土耳其的关系，则通过另一项专门的条约来加以规定，即对

沿马里查河的土保边境进行少量的有利于保加利亚的修改。这样一来，德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四国军事同盟就形成了。

虽然这些条约和协定都是秘密签订的，但一些亲协约国政党的领导人仍获悉了内情，并决定采取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以防止保加利亚站在德国一方卷入战争。他们要求謁见国王斐迪南，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也是其中之一。他当着斐迪南的面指出，一旦参加战争并站在德国一方，保加利亚人民将面临巨大危险。他还警告斐迪南，如再奉行这一政策，那就不仅有丢失王位的危险，而且也可能丢掉脑袋。由于其直言和大胆，斯塔姆博利斯基被捕入狱。

腊多斯拉沃夫政府无视亲协约国各政党的抗议，沿着既定的道路一意孤行。它在1915年9月发布了动员令，军队也开始沿保塞边境和保希边境集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国内各种民主力量采取果断的群众性反战行动才能制止战争。左翼社会党人于是便号召人民立即采取这种行动。

左翼社会党是反对保加利亚卷入战争（不管是站在同盟国一方还是站在协约国一方）的唯一

307 的政党。他们正确地看清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反对资产阶级的用国家统一的口号加以掩盖的战争政策。战争一爆发，左翼社会党人就公开站出来，反对德、法、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大党的一些领导人所采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当显赫一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向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声称他们赞成保加利亚参加协约国一方时，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以其著名的文章《哲学大师的说教》作了回答。在这篇文章里，他驳斥了普列汉诺夫的建议，指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革命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左翼社会党人对呼吁保加利亚站在同盟国一方参战的德国社会党人帕尔乌斯的建议，也作了同样的回答。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左翼社会党人的倡议下，反对保加利亚卷入战争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始在全国各地举行。这个党努力维护巴尔干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和统一，并于1915年7月参加了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巴尔干国家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1915年9月政府发布动员令后，它又呼吁工人阶级为反对保加利亚参

战而斗争。由于这一呼吁，党中央委员会及其议会党团的成员都受到了审讯。

在反战宣传和左翼社会党人的影响下，动员令一发布，某些部队里就爆发了反战示威。有些被征召入伍的人拒绝去军营报到，还有些开了小差。但是，严厉的处罚以及小资产阶级中依然顽固的民族主义狂热，使反战的抗议与示威未能发展成为足以制止保加利亚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群众运动。

军队在西部边境的集结一经完成，保加利亚就在1915年10月1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保军的 308 任务，是协助从北部和西北部挺进的奥匈和德国部队击溃塞军。塞军三面受敌，无力抵抗，只得向南撤退。决定性的一战是在科索沃平原进行的。塞军被打垮，只有一些零星小部队得以越过阿尔巴尼亚的丛山逃到亚得里亚海东岸，倖免于被俘。在对塞尔维亚发动攻势的同时，保军也在马其顿向前挺进。驻扎在那里的塞军，在兵力上相形见绌，最多只能作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此外，当地居民对塞尔维亚的统治不满，期望获得解放，也给了保军以协助。

在马其顿，保军需要同协约国的东线军作战。协约国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之战失败后，又在萨洛尼卡登陆，并匆忙地赶去援助塞军。在接着发生的一场战斗中，保军获胜，协约国军队被迫退入希腊境内。当时，虽然协约国部队在萨洛尼卡登陆，希腊仍保持中立；因此，按照德国最高统帅部的要求，保军停止了南进。这样，自沃尔法尼湾伸向亚得里亚海的东南战线（或称巴尔干战线）就形成了。在整个战争期间，这条战线主要由保军防守，帮助它的则是一些兵力薄弱的德国和奥匈的部队。

当德国政府确信大多数希腊资产阶级站在协约国一方，而以威尼齐洛斯为首的第二个希腊政府又在萨洛尼卡成立时，保军就发起进攻，以便将协约国部队从马其顿南部驱逐出去，但却遭到了失败。这样，巴尔干战线上就开始了一场持久的堑壕战，它耗尽了保加利亚的实力，流尽了保加利亚人民的鲜血。

1916年秋，保加利亚又同罗马尼亚发生了战争。起初，战争是在多布罗加进行的，保军同强309大的罗马尼亚和俄国的军队进行了一场血战后，

占领了这个地方。后来，战线移到了瓦拉几亚。在德、奥匈、保联军攻陷布加勒斯特后，战线沿着塞勒特河和多瑙河三角洲稳定下来。在那里也开始了阵地战，并一直持续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从战争的最初日子、即保军进犯塞尔维亚并占领马其顿北部时起，各资产阶级反对党就宣布支持腊多斯拉沃夫政府。它们的议会党团投票支持战争预算，并把斐迪南和腊多斯拉沃夫吹捧为“国家统一”的建筑师。甚至连由于斯塔姆博利斯基被监禁而丧失了领导人的农民联盟的议会党团，也表示支持资产阶级的“解放”政策。

但不久，人们就从在塞、罗两国获胜的陶醉中清醒了过来。尽管政府一再许诺取得胜利易如反掌，指日可待，战争还是一拖再拖，旷日持久，引起了国内经济生活的崩溃。由于群众被动员参战以及耕畜被征用，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了。此外，大量的消费品和原料被运往德国；工业品的产量也下降了。物价飞涨，出现了饥荒。各类奸商和黑市贩子乘人民遭受苦难与牺牲之危，牟取暴利，大发横财。战争的破坏性和野蛮性充

分地显示出来。

生活的极端困苦和前线的惨重伤亡，促使反战运动迅速加强。临阵脱逃和个别部队兵变的事例，日益增多。这一运动也在城乡劳动人民中间展开了。军政当局企图以残酷的镇压措施来限制和镇压反战斗争，但已经无济于事，而且往往引起相反的后果。

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更加促使反战运动加310强起来。军队中开始建立了地下委员会。沿塞勒特河和多瑙河三角洲的前线上，保、俄军队握手言欢的事例越来越多。城镇里挨饿的妇女和儿童不断起来闹事。在乡村中，人们也起来反抗征用委员会的掠夺行径。

左翼社会党及其同情者领导了反战运动。他们组织了地下委员会，并号召人民和军队进行反战斗争。“以战争反对战争”这一口号，就是左翼社会党人提出来的。他们在反战斗争中非常积极，并把这一活动与广泛的社会主义宣传结合在一起。左翼社会民主党，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311则，对先后在齐美尔瓦尔得（1915年）、基恩塔耳（1916年）和斯德哥尔摩（1917年）召开的

几次社会党人的国际会议，或派代表参加，或对其决议表示了坚决的支持。由于其上述表现，并由于他们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的积极斗争，保加利亚左翼社会党人不愧为坚持不渝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愧为列宁所称呼他们的“真正国际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0卷，第128页）。然而，他们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在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没有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也没有致力于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其主要原因是他们错误地认为，在保加利亚，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有限，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立即实现。这种看法使得社会民主党(左翼）未能利用1918年的大好革命形势，与农民联盟联合起来，着手为推翻资产阶级——君主统治的群众武装起义作准备。

从解放到1917年期间的文化发展 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的解放，大大推动了保加利亚文化的发展。俄土战争实现了保加利亚人民在民族复兴时期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废除土耳其封建制度和赢得民族解放。于是，人民的力量被引向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以及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发展。

新的国家，则运用共行政机构和物质手段，着手促进保加利亚文化的发展。

保加利亚人民在解放后的文化发展，是以民族复兴时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为基础的。这个英雄时期中国家在各方面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群众教育的普及，以及定期刊物和文学作品的出版，提高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为解放后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民族复兴的思312想继续鼓舞着人民去建设他们历尽苦难和牺牲才赢得的新生活。与此同时，俄国军队在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业绩，已深深地铭刻于人民的记忆之中，并对保俄友谊的加强和俄国文化影响的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解放后，保加利亚文化发展的条件，与民族复兴时期有着根本的区别。随着土耳其封建制度和异族压迫在保加利亚的废除，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巩固的道路被扫清了。这就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条件。解放后，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并能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来决定保加利亚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向。

这时的保加利亚文化，反映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因而其发展是不平衡的。除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外，也存在着民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些因素，它们反映了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斗争。在解放后的头几十年里，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是人民大众——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斗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形成了。这就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各种因素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种社会主义新文化继承了民族复兴时期和解放后头几十年民主的文化传统，并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思想倾向。

解放后，保加利亚学术界还处于当时盛行于西欧的资产阶级学术的影响之下。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五花八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的观念与学说，纷纷渗入保加利亚，并在资产阶级知识界广泛传播。同时，俄国民粹派思想 313 也充斥于小资产阶级之中，阻碍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工人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保加利亚文化的发展中，1888年所开办的

一所设有历史和哲学、物理和数学以及法律这三个学院的高等学校（后来改为国立索非亚大学）起了重大作用。1895年，在索非亚开办了一所艺术学校，一些出色的保加利亚艺术家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解放前在布勒伊拉城成立的学术协会（1911年改为保加利亚科学院），也是促进保加利亚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力。可是，截至1944年9月9日，科学院尚未发展成为一个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工作中心。它主要地还只是对社会科学的某些部门进行研究。

保加利亚在解放后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然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原则为基础，仍获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索非亚大学的开办，为进行各个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并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在这方面，波巴赫美提耶夫（生物物理学）、拉依诺夫（化学）、格奥尔基·兹拉塔尔斯基（地质学）、瓦西耳·兹拉塔尔斯基（历史学）、加夫里耳·卡察罗夫（考古学）和亚历山大·捷奥多罗夫·巴兰（语言学）都特别有名。俄国、波希米亚、波兰等斯拉夫国

家和某些西欧国家的大批科学家和学者也来到了保加利亚，并对其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卓越的捷克历史学家康斯坦丁、伊列谢克，是保加利亚早期的教育部长之一，他曾对巴尔干的历史和历史地理作过很有价值的研究。

在教育领域里，也获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俄国临时当局时期的教育部长马林·德里诺夫教授的活动。他在创办教育中保留了民族复兴时期所建立的民主传统。后来，在斯塔姆博洛夫统治和民主党人执政时期，国民议会批准的教育法令中，却塞进了一些反动条文。但尽管这样，在1912—1918年的几次战争以前，教育事业仍获得了进展。1879—1910年期间，学校的数目增加了两倍，学生的数目则增加了五倍以上。1910年，城镇的识字人口达到63%，而农村的则为35%。为适应普及教育的需要，还按照民族复兴时期的传统精神，建立了许多新的公共阅览室和图书馆。后来成为全国最大藏书中心的国立索非亚图书馆，其基础就是在俄国临时当局时期奠定的。

314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迪米特尔·布拉戈耶

夫，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保加利亚的传播，为了反对俄国民粹派的思想，进行了坚持不渝的斗争。他在发表于社会主义期刊中的许多篇文章里，以及在其整本著作里，驳斥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所提出的反科学的反动论点，为工人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好了准备。在反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斗争中，布拉戈耶夫也为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作为第一个在研究保加利亚历史中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人，他还为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奠定了基础。由于布拉戈耶夫的洞察一切的才智和深刻的理论思想，他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最好的学生。保加利亚工人运动能在健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伟大智慧以及他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进行的不懈斗争。

出版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早在俄国临时当局时期及其后不久，国内就开始出版以下一系列的报纸：《马里查报》、《图尔诺沃宪政报》、《保315加利亚之声报》、《独立报》等等，其中大部分是

当时正在形成的各政党的机关报。一些论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艺问题的定期刊物也开始出现。保加利亚北部和南部合并之后，报刊的数目增加了。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版的一些日报，它们虽不隶属于各个政党，但却为整个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宣传其政策。随着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社会主义的报刊也开始出现，如杂志《当代指南》、报纸《工人》和《工人报》以及左翼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等等。

保加利亚文学也开始繁荣起来。在取得独立的最初几年里，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以[316]及与俄土战争有关的一些重大事件，还在直接影响着保加利亚的作家和诗人。这些事件也成了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在保加利亚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伊凡·瓦佐夫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歌颂了群众在争取解放斗争中的英雄事迹和俄国的伟大功勋。瓦佐夫最重要的作品是小说《轭下》、中篇小说《逃亡者》以及诗集《旗和琴》和《保加利亚的悲哀》。激于对新兴的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贪婪和野心的愤慨，他还写下了

著名的史诗《被忘却的人们》，并在其中歌颂了最杰出的民族解放战士和革命者的不朽英雄业绩与爱国主义。扎哈里·斯托扬诺夫和康斯坦丁·韦利奇科夫在独立后的最初年月里，也以同一主题进行了创作。扎哈里·斯托扬诺夫写了几本回忆录和传记作品，其中写得最好的是那本著名的《保317加利亚历次起义札记》以及关于瓦西耳·列夫斯基和赫里斯托·波特夫的传记。康斯坦丁·韦利奇科夫则是回忆录《狱中》的作者。

保加利亚北部和南部的合并，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以及资本主义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发展。这就使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得以发财致富，而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则大批陷入贫困和破产。阶级分化过程的加速，以及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为保加利亚文学提供了新的主题。一个新的平民文学运动出现了，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作家托多尔·弗拉伊科夫、赫里斯托·马克西莫夫、安东·斯特腊施米罗夫、米哈拉基·格奥尔基耶夫和埃林·彼林，以及诗人粲科·策尔科夫斯基和佩尤·亚沃罗夫（指他写诗的初期）。平民派的作家和诗人，现实

地描绘了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打击下农民阶级衰318落的过程，以及农民们对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和警察官僚国家的贪婪剥削的社会性反抗。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有了力量。然而，平民派作家和诗人所力图实现的社会理想却是反动的：他们不是引导人们前进，而是要使人们倒退到一个已经过去的社会发展阶段，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注定要消失的家长制生活方式和小所有者的生产关系奉为理想。

阿列科·康斯坦丁诺夫的作品，在现代保加利亚文学的早期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其著名的作品《巴依·迦纽》中，主人公的贪得无厌、肆无忌惮、举止粗鄙、不学无术和野心勃勃，正好是这一时期中保加利亚暴发资本家的缩影。斯托扬·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作品里，也充满了批判与讽刺的精神。

二十世纪初，由于西欧资产阶级文学中的没落倾向的影响，一个新文学运动——个性派和象征派——也在保加利亚出现，其典型代表是彭乔·斯拉威科夫、佩尤·亚沃罗夫、捷奥多尔·特腊扬诺夫和尼古拉·利利耶夫。文艺评论家

基·克鲁斯特夫博士，作为《思想》杂志的编辑，成了这一运动在思想上的领导者和赞助人。这一新文学运动的追随者害怕并避开社会主题，主张自我反省，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心情和经历。这是对于国内不断加强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牌号的逃避主义。他们提出“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口号的原因也在于此。但是，个性派和象征派的作家和诗人，终究不能完全超脱人民大众的生活，所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也还是创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文艺作品。

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在《社会与文学问题》论文集的许多文章里，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保加利亚文学的一些主要作品进行了文艺批评和分析。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从此得以奠定基础，并在与资产阶级唯心主319义文艺理论的不断斗争中得到发展。早期的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文艺作品的出现，也是与工人革命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格奥尔基·基尔科夫和迪米特尔·波利扬诺夫，是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文学的创始人。

解放后到大战爆发前的期间，除文学外，戏

剧、音乐、美术和建筑也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解放前，当最初的一些保加利亚剧本写出时，曾举行过舞台演出。解放后，1880年首先在普罗夫迪夫创办了一些剧团，由印刷工人和业余舞台艺术爱好者进行了演出。后来，那里又成立了职业剧团。塞保战争后，在索非亚也创办了一个职业剧团，并修建了一个专门的剧院。1892年，索非亚演员组成了“哭和笑”剧团，后来改为由国家资助的保加利亚国立大剧院。一些最有才能的保加利亚演员如克鲁斯提乌·萨腊伏夫、阿德里安娜·布德夫斯卡、斯托扬·布奇瓦罗夫、赫里斯托·甘切夫等，都在那里工作。除保加利亚作家的剧目如瓦西耳·德鲁梅夫的《伊凡科》，伊凡·瓦佐夫的《逃亡者》等以外，国立大剧院也排演了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剧作家果戈里、契诃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剧本。多数演员是俄国舞台艺术学校的学生，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学习过。歌剧艺术的发展则比话剧要晚得多。最早的歌剧演出，是由德腊哥米尔·卡扎科夫和伊凡·武尔彼组织的。俄国和捷克的音乐家，为保加利亚培训了最初的合唱队和管弦乐队。保加利亚的首批音

乐作品也出现了。最杰出的作曲家当推艾曼努尔·马诺洛夫。他跟多布里·赫里斯托夫一起创作了好些至今仍包括在合唱节目中的群众歌曲。二十世纪初，创作了下列以人民生活和民族解放斗争为主题的第一批保加利亚歌剧：伊凡·伊凡诺夫和卡奥特斯基的《喀门与泽纳》、迪米特尔·哈治·格奥尔基耶夫的《塔希尔·别哥维扎》以及歌剧大师格奥尔基·阿塔纳索夫的《格尔加纳》。

320 绘画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保加利亚历史画的创始人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解放后继续进行了创作。原籍捷克但在保加利亚定居下来并从事绘画工作的伊万·姆尔克维卡和雅罗斯拉夫·维辛创作了不少以人民生活为主题的现实主义作品。姆尔克维卡的《霍罗舞》和《鲁切尼察舞》以及维辛（他后来也成为最优秀的战争油画家，画有《白刃战》和《土耳其人在卢累布尔加兹退却》）的《哈伊杜克》这几幅画，是特别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与他们同时，安东·米托夫（《索非亚的集市日》的作者）和伊凡·安格洛夫（《神授和神取》的作者）以及其他一些人也很著名。在肖象画领域里，策诺·托多罗夫和斯特凡·伊凡诺夫

创作了有价值的作品。热科·斯皮里多诺夫和博里斯·沙茨创作了首批的雕塑作品——人民领袖和杰出的知识界代表人物的胸象、浮雕与全身雕象。

解放也推动了建筑的发展。在独立后的最初十年里，由于保加利亚缺乏建筑专家，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主要是外国人。以后，一些在国外学习过的保加利亚建筑师逐渐地开始同他们一起工作。除豪富资产阶级的私人住宅外，为了适应国家、城市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需要，也兴建了一批大的建筑物——学校、教堂、营房、公共浴场、工厂等等。为了纪念民族解放斗争和俄国兄弟般的援助，还修建了许多纪念碑。在这方面，最令人难忘的当推索非亚的亚历山大·涅弗斯基纪念教堂和解放者纪念碑。

第九章　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打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321　**1918—1919年的革命危机**　如前所述，保加利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内经济生活崩溃，民怨沸腾。当人民意识到战争的反人民性质及其后果——巨大的贫困、苦难和牺牲时，其怨愤越发强烈。在此基础上，又由于左翼社会党人的革命宣传，1916年末，特别是1917年初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在保加利亚掀起了一个广泛的反战运动。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反战运动更加高涨，其特点是组织得更为完善，目的也更加明确。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它已变成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和推翻资产阶级—君主统治的群众运动。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予保加

利亚以巨大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民所处的严重困境及其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愤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左翼社会党人在传播十月革命思想并保卫其伟大事业方面所进行的活动。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这一活动对于保加利亚革命运动的发展，322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左翼社会党，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初步接受了列宁主义，并大大加强了革命宣传。然而，甚至在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它也没有想在保加利亚为发动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作直接准备。因此，推翻资产阶级一君主统治的斗争，即帝国主义战争到国内战争的转变，不是在它的领导下，而是自发地进行的。1918 年 9 月末爆发的士兵起义就属于这种性质。

保加利亚劳动人民以万分喜悦的心情迎接了十月革命的爆发。左翼社会党在它的机关报《工人报》上热烈欢呼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而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同时，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印发了秘密传单，宣传革命思想，号召群众为迫使政府接受布尔什维克关于立即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这一建议而斗争。十月革命爆发后，社会民主党（左翼）加强了它的反战活动。由于参加

反战运动，数以百计的党员和党的拥护者遭到监禁，另有数十人被判死刑并枪决。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也因进行过反战宣传而被判处监禁。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8年春爆发了由地下士兵委员会领导的群众暴动，参加的有士兵、军官、左翼社会党人和农民联盟盟员。这些委员会是由左翼社会党人带头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左翼）中央委员会鼓励建立士兵委员会，以便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从前线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在323塞勒特河畔和多瑙河三角洲的前线上，保俄两国士兵普遍地开始握手言欢。反战运动也蔓延到后方的劳动人民中间。在数以百计的城镇村庄里举行了抗议示威，反对物价高涨和饥饿，要求立即缔结和约。示威群众时与军警发生冲突并有伤亡。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在不断发展着。

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决定玩弄手段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在夺自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北部归谁占有的问题上，保加利亚与同盟国之间发生了争执。德国和奥匈不同意把多布罗加北部割让给保加利亚，它

们便签订了一项共同占有这块土地的协议。资产阶级反对派利用这一事件，加紧攻击腊多斯拉沃夫政府，并终于在1918年6月把它推翻了。接着，民主党和激进党组成了以亚历山大·马林诺夫为首的新政府。改组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缓和群众的愤激情绪，因为他们越来越坚决地要求采取独立行动来结束战争。新政府是由两个亲协约国的政党组成的，因此，一时在人民中间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保加利亚就要采取缔结和约的行动了。

可是，和平的希望不久便成为泡影。马林诺夫政府重申它忠于与同盟国的联盟，并宣称它将继续作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它不顾人民群众的期望，没有采取任何缔结和约的步骤。新政府一组成，就为继续作战进行准备，加重人民负担，并采取行动以扑灭反战运动。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被派往前线去说服士兵，要他们为维护已经实现了的“民族理想”而继续作战。这说明，想使资产阶级自动放弃那些侵占的领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正是要赖以发财致富。[324] 所以，只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君主统治的斗争，

才能真正结束战争。

1918年夏，当新政府暴露了它要继续作战的意图时，人民才看清了这一点。也只是在这个时候，举行武装起义的呼声才在后方，特别是在前线，日益广泛地出现。协约国军队在多勃鲁平原突破保军防线一事，更加速了起义的爆发。

突破该处防线的协约国部队装备精良，数量上和技术上都比保军占有很大优势。在多勃鲁平原发动攻势的同时，协约国军队也在马其顿东部开始攻击多依兰城。英国部队在那里很活跃，但却受到了挫折。

协约国军队于1918年9月15—18日突破了多勃鲁平原防线之后，又迂迴到保军的背后。他们先后占领了普里累普、佛累斯和斯科普里，这样就把部署在突破地点以西地区的大约十万名保军包围起来，从而瓦解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防御。还在协约国部队最初进军阶段，保军司令部就向德国最高统帅部告急，要求予以援助。然而，援军却没有派来，因为当时德国自己正在西线进行着激战。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显然已近尾声。保军开始从巴尔干防线西半段（瓦

达河以西）撤退，士兵起义的火焰也在撤退中开始燃烧起来。

撤退的士兵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们渴望惩办那些应对保加利亚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和惨遭深重民族灾难负责的人。地下士兵委员会，在没有政治领导的条件下，自动地着手组织一支起义军。9月22日和23日，起义的连队在马其顿的贝罗伏和佩切伏两城附近组成，接着就向丘斯滕325迪耳、果尔纳焦马亚（布拉戈耶夫格勒）和腊多米尔三个城镇进发。9月24日，一支起义部队攻克了设在丘斯滕迪耳的最高司令部，逮捕了那里的一些军官。这样，帝国主义战争就自然地转变为武装起义了。

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来后，内阁会议唯恐起义军再向索非亚推进，决定向协约国请求停战，并同时尽力设法"安抚"那些起义的士兵。为此目的，它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到腊多米尔去，其成员之一是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农民联盟领导人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

然而，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够制止起义的蔓延。农民联盟的全国代表拉伊科·达斯卡洛夫，也是

派往腊多米尔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与斯塔姆博利斯基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领导起义。9月27日，在腊多米尔宣布保加利亚为共和国，由斯塔姆博利斯基任共和国总统，达斯卡洛夫任起义军总司令。

左翼社会党的许多党员及其拥护者参加了起义军。起义的爆发主要是由左翼社会党人的反战宣传所促成的。但党的中央委员会却拒绝了斯塔姆博利斯基提出的两党应共同斗争以夺取政权的建议。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它不仅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表现，而且对于已为推翻资产阶级—君主统治和建立工农政权提供了时机的发展中的事态来说，也是一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

起义军从腊多米尔开赴索非亚。他们在途中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它自动放弃政权。资产阶级不甘心让出政权而向德军求援。德军开到后，便和政府军一起把起义的连队击败了。1918年10月2日，政府军占领了腊多米尔，这次起义就此告终。

在起义的日子里，政府也同协约国在萨洛尼卡举行了停战谈判，并于9月29日签订了停战

366

协定。按照该协定的条款，保军撤到原国境线，保加利亚也被协约国军队占领。除占领军外，协约国还把大量部队派入保加利亚，继续同德国和奥匈作战，并准备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对协约国的东线军司令部来说，保加利亚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它力图尽快地平定已在保加利亚掀起的革命浪潮，并继续保持那里的资产阶级—君主统治。在协约国的要求下，保加利亚只是换了一个君主，国王斐迪南因与德国关系密切而被迫让位，其子博里斯被捧上了王位。这样做也是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协约国为镇压保加利亚革命运动所作的努力，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它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反革命势力。

士兵起义被镇压下去，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革命危机的结束。起义只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的开始，而这一斗争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仍在进行着。除资产阶级和在革命危机的发展中已成为主力军的工人阶级之外，国内还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小资产阶级，其行动对于事态的结局，尤其是对于夺权斗争的结局，起着决定作用。战

后，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组织在农民联盟内的劳动农民，在政治上表现得特别积极。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严重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以及中欧和东南欧各国革命事件的影响。劳动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不过，他们大多数也并不准备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实行根本的民主改革，以便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并限制其剥削。

327

这一点正是保加利亚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所应牢记在心的；在当时处于革命危机的形势下，他们本应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全力把农民争取过来，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保加利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首先要经过争取民主的斗争，劳动农民也完全能争取过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后备军。当时，虽然左翼社会党在农民中的影响已很强大，它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却刚刚迈开步伐，因而对于争取农民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还是缺乏认识的。另一方面，农民联盟的领袖们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一心想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农民政权，既反对资产阶级，又反

对工人阶级。这样，他们就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成为资产阶级镇压1919年末到1920年初的革命运动（运输邮电职工大罢工）的工具。

保加利亚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后，人民的悲惨处境更加深了革命危机。这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爆发了数百次罢工和抗议示威；要求改善国内的物资供应情况；要求对那些因参加反战运动而被判刑或正在受审的人实行大赦；要求处分那些应对保加利亚卷入战争负责的人；要求没收非法牟利者的财产，等等。同时，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秩序的口号也开始提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5月末于索非亚举行了社会民主党（左翼）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其中规定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迫切任务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会还批准了党参加第三国际（在此以前党曾参加过第三国际的 328 创建工作），党的名称也由社会民主党改为共产党。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左翼）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也就成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左翼）第一次代表大会，它为党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开始的

布尔什维克化开辟了道路。保加利亚工人革命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瓦西耳·科拉罗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以代替卧病的格奥尔基·基尔科夫。

保共（左翼）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事业蓬勃发展和工会运动空前高涨的条件下举行的。战后，数以千计的城乡劳动人民参加了党的队伍。1915年，党的各级组织只有一百零三个，党员约为三千人；而到了1919年5月，各级组织就增加到六百个，党员也增为二万五千人。与此同时，总工会则拥有二百个基层工会和一万五329千名会员。青年联盟以及党领导下的妇女组织、教师组织和其他组织，其成员也都有所增加。《工人报》的发行数达三万份。

这次代表大会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除经济性罢工外，政治性的罢工也开始爆发了。1919年7月27日，不顾政府的禁令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群众性的抗议活动。这一活动是为了抗议食物缺少，也是为了保卫苏俄免受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干涉。

1919年8月举行了议会选举。农民联盟和保

共（左翼）获得的票最多，资产阶级政党则遭到惨败。选举结果反映了群众的左倾趋向及其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决心。1919年10月初，农民联盟在与右翼社会党谈判失败后，又同两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人民党和进步自由党——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领导了政府。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加入联合政府后，就假手农民联盟反对革命运动。

斯塔姆博利斯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同协约国缔结和约。这一和约是在没有让保加利亚参加的情况下制定并专横地强加于它的。1919年11月27日，斯塔姆博利斯基于巴黎近郊涅依在和约上签了字。保加利亚被迫割让了多布罗加南部、爱琴色雷斯、西部边境地区和斯特鲁米察河流域。此外，和约还把总数达二十二亿五千万法朗的巨额赔款强加于保加利亚，而这显然是经济本来落后、战后又疮痍满目的保加利亚所无法偿付的。

涅依和约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条约，它使保加利亚人民又一次遭受深重苦难和牺牲。这要归咎于资产阶级和君主的政策。为了反对这种

政策，从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人民就已在进行斗争。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许诺的公正的和平，已是全无踪影。这就使反对造成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和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群众斗争，更进一步加强起来。

330

运输邮电职工大罢工，是1919年末到1920年初这段战后不久的保加利亚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这次罢工是为了改善运输工人和雇员的物质生活，但也有其政治目的，即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免受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干涉。这是一场波及全国的总罢工，它把铁路员工、邮电员工、码头工人等各种运输工人和雇员都席卷在内。在斗争中最积极和最顽强的是共产党员。大罢工持续达五十五天，工人和雇员在罢工中显示了惊人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保共（左翼）组织了一次为期一周的政治性总罢工予以声援，而这一总罢工还在某些地方引起了与军警的武装冲突。

农民联盟政府　运输邮电职工大罢工结束后，农民联盟决定不再同右翼人民党和进步自由党联合，以便采取更加独立的政策。为此目的，

它解散了国民议会，并举行了新的议会选举。选举结果，资产阶级政党再次失败，共产党和农民联盟的选票大为增加。联合政府被解散，1920年5月21日成立了由农民联盟一个党组成的新政府。

政权落入农民联盟手中的原因之一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无能，他们已因其好战和冒险政策而在群众中丧失威信。另一个原因则是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和巩固，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把权力让给农民联盟，是想利用它来反对共产党。他们认为农民联盟是一个“较轻 331 的祸害”，为了积蓄力量以重新攫取政权，也不得不暂时顺从它。

农民联盟并不拒绝接受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也不反对其基础；它的主张反映了农民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剥削的愤恨与反抗，它的一些领导人则想通过推行一整套改革来“限制”这种政治压迫和剥削。这些改革是为了巩固小商品生产者的地位，限制商业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活动范围，以及废除大规模耕作制。

当然，这种想法同农民单独掌权的想法一样，

都只是幻想而已。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并使这一斗争在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来进行。否则，斗争必归失败。农民联盟政府所推行政策的结局正是如此，因为它只着眼于“改革”，而不着眼于废除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月里，资本的集中以及信贷、生产和商业垄断的形成的过程加速了。这一过程战后仍在继续中。由外资兴办或合资兴办的新银行陆续开设起来，其中有一些是协约国各国大银行的分行。在战后的年月里，外国资本不但经营信贷和外贸业务，而且也开始投入工业生产。一些工业企业日益依附于外国（主要是协约国）的资本。这就使保加利亚受到外国资本更大的奴役，也使劳动人民受到更为深重的剥削。

上述情况可由下列数字予以证实：从解放到1911年，在保加利亚才开设了一百五十七个股份公司，资产总值为九千九百八十万列弗；而在世界大战的最后三年（1916—1918年）内，就开设了一百三十个股份公司，资产总值达六亿列弗。

332 1919年一年内所开办的股份公司数，就相当于

1902—1912年这十年内所开办的。1919—1923年这段时间内，股份公司的数目又增加了24%，这些公司的资产则增加了57%。大多数股份公司和银行的资本，是由几个外资起重要作用的大金融财团所控制的。1912年，外国资本几乎操纵了保加利亚的整个制糖工业，并在采矿工业、烟草工业、食品工业以及其他工业中占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农民联盟的改革未能制止战后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不断增强。这也就是农民联盟政府始终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人心所向的政府没有取得某些有进步意义的成果。它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也试图按照人民的利益来改变保加利亚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在农民联盟执政时期，革命运动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工农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利益一致的思想也日益深入人心。

甚至当农民联盟还是联合政府的一个成员时，它就已在国民议会中通过了一些影响到大资本利益的法令。其中之一是谷物贸易法，它规定谷物贸易由国家和农村合作社共同参加的一个大

商业机构（财团）经营。清一色的农民联盟政府组成后，改革活动更加强了。在人民的压力下，一系列法案提交到国民议会。于是，劳动服务队法、土地改革法、以及大的城市房地产征归国用或公用等法令都一一通过。最重要的是头两项。劳动服务队（和平队的一种形式）法规定，所有的男女青少年，都要通过一种特设工作队的形式，从事于公益劳动。土地改革法规定，凡超过三十333公顷的私有土地，一律由国家强迫征购，转让给无地或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民。除这些进步的、民主的法令外，国民议会也通过了一些针对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教育法的某些条款、有关禁止公务人员参加罢工和示威的法令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农民联盟的对外政策，旨在使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正常化，以及同远近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在协约国和美国的压力下，农民联盟政府拒绝了苏俄政府提出的保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并容许弗兰格尔男爵的白卫军居留在保加利亚。但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也答应俄国红十字会派工作团前来安排俄国流亡者返还苏俄的事宜。在保

共（左翼）的领导下，国内开展了一个援助伏尔加地区遭受旱灾的苏维埃人民的广泛运动。

农民联盟政府力图摈弃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政策。1923年，它与南斯拉夫缔结了一项改善关系的专门协定。这个政府也曾为改善与希腊的关系作了巨大努力，但希腊对圣雷莫会议（1920年）保证保加利亚获得爱琴海出海口的决议却拒不执行。1920年末，保加利亚加入了国际联盟。

清一色的农民联盟政府成立后，政权问题仅仅是暂时地得到了解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通过他们的政党，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决战作准备。农民联盟政府越是通过各项改革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资产阶级就越是加紧策划夺取政权。由于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小，以及他们的政党在选举中只获得很少的选票，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开始建立秘密组织，并准备搞法西斯政变。1919年， 334 一些反动军官创立了一个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军官同盟。稍后，一个以亚历山大·粲科夫教授为首的秘密法西斯组织“人民协商”联盟又组成

了。为使资产阶级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反对革命运动和农民联盟政府，也进行了种种努力。把三个自由党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自由党的做法，就是这一努力的表现。人民党则与进步自由党合并为民族进步党；后来，这个党又同民主党和激进党结成了所谓“宪政同盟”（人民给它起的綽号是“黑同盟”）。

运输邮电职工大罢工失败后，工人阶级意识到了联合的必要性。1920年秋，两大工会组织——总工会和自由工会根据共产国际的原则合并了。稍后，右翼社会党又发生了分裂，其左派参加了共产党。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社会民主党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它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也就不再起什么特殊作用了。

在这些年月里，革命运动的力量继续得到巩固。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大道上迈开了新的步伐。在这方面，1921年春举行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它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保加利亚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其中指出

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然而，在结成这个联盟上的一些实际做法却是不正确的。例如，虽然在反击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时，保共（左翼）与农民联盟已有过行动一致的表现，但与农民联盟结盟的可能性却被否定了。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联盟采取了旨在迫害共产党及其工作人员的政策，也使工农联盟的组成受到了阻碍。

335

大资产阶级利用这一点，策划了推翻农民联盟政府的军事法西斯政变。1923年6月9日，在陆军和一些法西斯组织的协助下发动了政变。这一政变也获得了与法西斯阴谋分子有联系的国王博里斯三世的同意。大部分农民联盟的部长被捕。

由于政变威胁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在国内许多地方纷纷揭竿而起，反对那些法西斯阴谋分子。武装起义先后在普列文、舒门（科拉罗夫格勒）、卡尔洛沃、卡赞勒克、哈尔曼利等区爆发。在共产党员阿森·哈拉切夫的领导下，普列文城的工人们攻占了几乎整个城区。在帕扎季克区，领导起义的是斯塔姆博利斯基。他这时才认

识到在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与共产党一致行动的必要性。不久，起义被镇压下去，斯塔姆博利斯基也惨遭杀害。

反对6月9日政变的起义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它主张在法西斯阴谋分子与农民联盟政府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从而在客观上使法西斯分子能够比较容易地镇压人民的抵抗，并巩固他们自已的统治。尽管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已有了较大进展，但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新型政党，还不能迅速采取正确方针，作出最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决定，以促进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336 **1923年9月的反法西斯起义**　6月9日的政变不是一般的行政权力的更迭，即由一个政府推翻并取代另一个政府，而是用武力推翻了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农民联盟政府，代之以大金融资本的政府。政变也以公开的恐怖独裁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这种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

6月9日政变后，保加利亚进人了一个持续达两年(1923—1925年)之久的内战时期。资产阶

级的夺得政权，加深了国内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就已存在的革命危机。1923年9月的人民反法西斯起义，是战后革命危机达到的顶点。

保共（左翼）中央委员会在估计6月9日政变的原因和性质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断定政变是城市资产阶级与农村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认为党在这一斗争中应该保持“中立”。这个错误立场，使法西斯大资产阶级得以把6月反法西斯起义镇压下去，并接着又向它的主要敌人——工人革命运动发起了进攻。

政变后马上组成的粲科夫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摧毁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资产阶级感到，只要存在着坚强的共产党和健全的革命工会，它的统治地位就不可能稳定下来。因此，早在反对军事法西斯政变的起义的日子里，党内许多杰出的干部，包括普列文起义的领导人阿森·哈拉切夫在内，就已被逮捕并判处监禁，或被谋害。党的俱乐部遭到封闭，党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妨碍。农民联盟的组织生活也完全被破坏，它的好多成员被捕，一些比较杰出的成员则被杀害。被杀害者中有1918年士兵起义的领袖拉伊科·达斯卡洛夫，　337

由于他曾企图以武装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当然不能被放过。

与此同时，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侵犯。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才获得的社会法制，资本家却可以蛮横无理地违反而不受到惩处。他们任意地开除从事政治活动的工人，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克扣工人的工资，等等。因土地改革法而蒙受损失的地主，也收回其被征收的土地，夺去农民在所分土地上生产的谷物。

那些为镇压共产党而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产生法西斯分子所预期的结果。党已在城乡劳动人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法西斯当局的种种暴行，并不能使他们放弃反对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的革命斗争。与此相反，这些暴行却使人民的斗志日益增强，也促使党的领导纠正了错误的中立立场。资产阶级报刊对党发动了一场广泛的诽谤运动，坚决要求把党列为“非法”，也就是说，要取缔它。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共产党，桑科夫政府对各资产阶级政党施加压力，要它们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法西斯集团。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经过其领导人之间的长期磋商，终于在1923年8月初，结成

了“民主协商”联盟，其中包括“人民协商”联盟，民族进步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治集团。“民主协商”联盟未能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一个单一的法西斯集团，而这就表明了它的虚弱。

6月9日的政变一结束，保加利亚同南、希、罗各国的关系就开始恶化。政变意味着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中复仇心最重的沙文主义者掌了权，这使邻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大为震惊。南斯拉夫开始在保加利亚边境集结军队，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当保加利亚的法西斯阴谋分子陷入困境的 338 时候，英、意两国出面支持粲科夫政府，从而迫使南斯拉夫打消了它已与希腊和罗马尼亚共同策划好的武装干涉保加利亚的想法。

法西斯主义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和对劳动人民利益的粗暴侵犯，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愤怒的巨浪。人民坚决表示，为了维护他们自已的利益，为了保卫共产党，他们已做好了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革命高潮时期在国内开始。可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错误的中立立场，低估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狂进攻对革命运动

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于6月和7月，就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许多党的基层组织谴责了中立立场，并要求对法西斯主义的猖狂进攻进行反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给了很大帮助，它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揭示了6月9日政变的实质及其后果，并指出为了推翻法西斯统治，国内的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必须联合起来。

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瓦西耳·科拉罗夫（他从1922年末起，一直任共产国际书记）于7月初到达保加利亚，协助党中央在当时的形势下采取正确政策。可是他一到达便遭逮捕，并被拘留了一个月。其时，为改正对6月9日政变所采取的错误策略而进行斗争的力量，已在党内占了上风。

8月5日至7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对于共产党和保加利亚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会议作出着手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法西斯政府的决议。决议指出，在339即将到来的斗争中，有必要组成一个包括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统一战线。中央委员会向农民联盟、

社会民主党、手工业者协会、马其顿革命组织①（成立于第一次大战后以代替原有的“马其顿—亚德里雅那堡内部革命组织”）以及其他党派团体发出号召，建议组织一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农民联盟和马其顿组织接受了这个建议。其后，马其顿组织在那些与保加利亚反动资产阶级有联系并窃据领导地位的反动人物的压力下，又和法西斯政府同流合污。于是，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就剩下农民联盟一个党了。

在为反法西斯起义进行政治准备和传播统一战线思想方面，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8月末到9月初发表在《工人报》上的一些论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论文清楚地指出，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季米特洛夫在其中的一篇论文中这样写道：“法西斯主义不仅反共，同时也反人民。它的任务就是保证资本的进攻从政治上获得成功，使为数很少的资本家能对人民进行剥削和掠夺，并巩固这一小部分人对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的统治

①马其顿革命组织，the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马其顿组织”。——译者

权。”（《季米特洛夫全集》，保文版第7卷，第210页）在推翻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党提出了成立工农政府的口号。

在为起义作政治准备的同时，也从军事上和技术上进行了准备。党中央委员会为此设立了一个军事与技术委员会，由它制订了全国起义的计划。此外，各区的详细起义计划，则分别由本区党的委员会来制订。当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其整体来说，对准备武装起义的决定是拥护的。于是，把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武装起来的工作，也开始加紧地进行。

340 遗憾的是，在整个共产党内，包括中央委员会以及某些区和地方委员会内，有些党员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观点还没有完全被克服。在中央委员会8月5日至7日的会议上，党的组织部长托多尔·卢卡诺夫就站出来反对组织武装起义。某些区党委成员也对此表示反对，或采取了动摇不定的立场。因此，即使在8月5日至7日的决议通过后，以瓦西耳·科拉罗夫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革命核心，仍然需要克服相当大的困难。

其时，法西斯政府决定打击共产党，以便使起义的准备工作陷入瘫痪。9月12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被捕人数超过了二千名。由于党对这一打击早就有所提防，并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一些最活跃的干部和领导成员都没有被捕。作为对大逮捕的回答，党中央号召劳动人民举行大规模的政治性罢工。罢工于9月14日在索非亚爆发，并大有立即蔓延全国之势，但却由于准备不足和领导上意见分歧而中止。

9月12日的大逮捕，引起了党所组织的战斗队与警察之间最初的武装冲突。接着又在旧扎果腊区爆发了一次不成熟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宣布全国起义的决定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6月20日党中央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在9月22日至23日举行起义。起义的目的是推翻粲科夫政府，建立工农政权。决议规定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和农民联盟的代表组成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共产党委派科拉罗夫、季米特洛夫和弗拉查区的党委书记加夫里耳·盖诺夫三人代表党参加这个委员会。

如前所述，在国内某些地方，9月起义是在 341

规定时间之前爆发的。9月3日，它首先爆发于旧扎果腊区的穆格利希村。政府派了一支强大的部队去进行镇压，起义者不得不撤退到巴尔干山脉，并在那里一直等待到9月19日至20日旧扎果腊全区爆发起义的时候。起义波及于这个区所属的旧扎果腊、新扎果腊、卡赞勒克和契尔潘四个县。区内多数村庄都建立了工农政权，同时也为攻占这四个县城进行了组织工作。参加人数最多、组织得最好的战斗是在新扎果腊进行的。率领那里的起义军的是英勇的革命者佩特科·埃涅夫。在他的领导下，几乎整个县城（除兵营外）全被占领。对其他县城的攻打进行得也很坚决，但起义军力量薄弱，未能粉碎兵员众多、装备优342良的政府部队和白卫军的抵抗。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旧扎果腊区的起义者未能得到邻区起义军的支援，尽管事先曾规定在某些地区起义提前爆发的情况下，邻区应予以支援。这样，政府就得以从那些地区的驻军中抽调部队去对付旧扎果腊区的起义军。于是，在全国爆发起义之前，这一地区的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

9月22日至23日，根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决议，起义在其他一些革命区先后爆发。保加利亚西北部的弗拉查和维丁两个区的起义组织得最好，也得到了最好的声援。在弗拉查区，各村镇的劳动人民都奋起反抗法西斯统治，仅弗拉查城除外，因为那里驻有强大的卫戍部队。斐迪南[343]（现改名米哈伊洛夫格勒）、贝尔科维察、白斯拉提纳和奥里亚霍伏这几个城在起义爆发后不几天即被攻克。起义领袖瓦西耳·科拉罗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加夫里耳·盖诺夫所在的斐迪南城，成了起义的中心。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工农政府，它为全面援助起义军而采取了种种措施。法西斯政权派出了一支强大的部队，打败了斐迪南城的起义军，并占领了邻近该城的博伊契诺夫戚车站。然而，9月25日，起义军指挥部又胜利地收复了博伊契诺夫戚。政府派来的军队被打垮和俘虏，起义军缴获了许多枪炮弹药，其中有几挺机关枪和两门轻炮。

在维丁区，洛姆城的起义规模最大。那里的起义军几乎攻克了整个县城，并在各县的所有村庄都建立了工农政权。在布鲁萨戚车站与政府军作战中，著名的安德列神父表现得异常英勇。在[344]

弗拉查和维丁两个区，起义部队的一些指挥官如赫里斯托·米哈伊洛夫、格奥尔基·达米扬诺夫、扎姆菲尔·波波夫等，也都表现出巨大的勇敢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与保加利亚西北部爆发起义同时，劳动人民奋起反抗法西斯统治的地方有索非亚区的伊赫提曼和多耳纳班亚一带，腊兹洛格、帕扎季克、佩希特腊、波波伏、格鲁多伏、新帕扎尔诸地区，以及其他多处。索非亚由于叛卖行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失策而没有发生起义。国内其他较大的军事、行政和交通中心，诸如普罗夫迪夫、鲁塞、瓦尔纳、舒门（科拉罗夫格勒）、普列文、布加斯等地，也没有举行起义。这就使法西斯政府有可能迅速调遣军队、法西斯“志愿支队”、白卫军和马其顿恐怖分子到起义地区与起义军作战。到9月29日和30日，起义军的抵抗终于被打垮。保加利亚西北部的起义军则撤退到南斯拉夫境内。

法西斯当局在镇压起义时，对居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数以千计的起义者未经审讯即遭杀害。被捕的人被用绳索捆绑起来，拉到村镇外杀死，或者吊在电线杆上，“以儆效尤”。许多共产党员

和农民联盟盟员，并未参加起义而只是反对法西斯统治，也被杀害了。无恶不作的法西斯“志愿支队”、白卫军和马其顿恐怖分子，洗劫和焚毁了数以百计的村庄。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达二万余人。

9月起义之所以被镇压下去，是由于在战后革命危机时期和在武装斗争的直接准备中，共产党在理论上和策略上犯了错误。失败是由于党还不够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它未能摆脱“紧密”社会主义的弱点和错误。长期以来，共产党并没有把劳动农民视为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 345 争中的同盟军，也没有和农民联盟采取广泛的一致行动，尽管在同反动势力和法西斯的猖狂进攻作斗争时，党曾与农民联盟有过某些行动一致的表现，如要求审讯造成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的运动，把弗兰格尔阴谋集团分子逐出保加利亚国境，等等。在作出宣布起义的决议时，共产党也未能与国内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建立起一个统一战线。许多党组织没有认识到对6月9日政变所采取策略的错误，没有完全地、毫不犹豫地加以克服，从而使起义未能在国内一些工人集中的重要地区

爆发。起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党未能把军队争取过来。

尽管9月起义失败了，它在保加利亚革命运动的发展上，还是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它是党的布尔什维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维护了党的革命荣誉。资产阶级镇压起义的法西斯暴行，促使人民同他们划清界线，势不两立。保加利亚 346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是建立工农联盟，而在9月起义的日子里，在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这一联盟的坚实基础终于奠定了。

反抗法西斯专政的斗争　9月起义的失败，对于共产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数以千计的党员遭到杀害，还有一些则被监禁或被迫移居国外。尽管这样，党并没有被消灭。它很快就得到恢复，表现得非常坚强，经受住了法西斯恐怖的考验。起义的失败使人民对法西斯刽子手更加痛恨，使党更加坚决地要把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科拉罗夫和季米特洛夫在10月23日发表的公开信就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号召劳动人民为争取建立一个工农政府而继续斗争。

粲科夫政府在把起义镇压下去之后，更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数以千计的教师、铁路员工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公务人员被撤职。农民联盟政府在城乡建立的议会都被解散，其组织者也遭到迫害。土地改革法被宣布为“违宪”，其条款或被修改，或被完全废除。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被取消，罢工和示威也被禁止了。八小时工作日法整个被废除，工资也降低了。在许多地方，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工人全被开除，俄国白卫军和马其顿恐怖分子也被派到企业中去，对工人施加压力和进行恫吓。一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压低了，而间接税却提高了。这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他们也和工人一样，饱受物价飞涨之苦。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使其血腥统治“合法化”，于1923年11月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在 347 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与“民主协商”联盟结成了一个联合集团。这是右翼社会党人对工人阶级利益最无耻的叛卖。他们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已经垮台，就迫不及待地与人民的刽子手缔结同盟，以便分享一官半职，捞到一些油水。可是，党并未被打垮。

选举结果足以证明这一点。三十余万人民投票拥护反法西斯各政党，其核心是共产党与农民联盟左翼的同盟。面对这种大规模的坚决抵抗，政府煞费苦心地搞出一套国家安全法，取缔了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群众组织。

9月起义失败后，机会主义分子又在共产党内抬起头来，他们想要转移党对革命斗争的注意，使党屈从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被称为“取消派”，因为他们想要摧毁党，取消党。他们人数不多，都被开除出了党。绝大多数党员忠于党的革命传统，并没有屈服于法西斯恐怖。党在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经受了一场新的严重考验。在把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去后，党保持了它的统一，更加巩固了它的团结。

早在9月起义后的头几个月里，共产党就已开始准备一次新的武装斗争。为此目的，党与以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佩特科·佩特科夫为首的农民联盟左翼达成了采取一致行动的协议。党在9月起义后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上，批准了为新的起义作准备的行动方针。这个会议是1924年5月17日至18日在索非亚附近的维托夏山举行的。

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在反法西斯运动处于普遍高潮的情况下进行的。法西斯主义对劳动人民利 348 益的进攻，引起了群众性的反抗，表现为罢工和抗议示威的多次爆发。1924 年 5 月 17 日，保加利亚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逝世。在为他进行葬礼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参加者约五万人，这是人民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的最明显的表现。

1924年春，党中央又与马其顿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1924 年 5 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著名的 5 月宣言，公开反对巴尔干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声明只有同巴尔干各国的共产党合作并取得苏联的帮助，才能使马其顿获得解放。然而，马其顿组织的领导成员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却在以后宣布废除这个宣言，倒向了粲科夫政府一边。

马其顿组织的成员是留居在保加利亚的大量马其顿侨民，他们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穷苦的工人、商人和雇员，另一部分是富裕的资产阶级。这个组织的动摇，正反映了侨民中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的不同愿望，也引起了组织内部的矛盾

和斗争。5月宣言被废除后，由迪莫·哈季迪莫夫领导的左翼的影响，逐渐在这个组织中扩大了。于是，粲科夫政府便阴谋除掉这些左翼领导人，并在1924年秋先后把他们暗杀了。在索非亚和各省内，也有数十名反法西斯运动的杰出领袖，以及一些农民联盟左翼的领导人，没有经过审讯就被杀害。这激起了共产党的反抗，为了反对法西斯恐怖和准备重新起义，游击队在许多地方建立起来。

从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初，国际形势和保加利亚的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经济生活正349在逐渐正常化。不少欧洲国家的战后革命危机，都以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某些国家实行了法西斯专政，人民的反抗暂时被镇压下去。工人阶级队伍中明显地出现了疲惫迹象，革命浪潮显著低落。在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引起的巨大动乱以后，一个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稳定的时期来到了。

国内外形势的这些变化，也给保加利亚阶级斗争的发展打上了烙印。1924年底到1925年初，在保加利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稳定的迹象。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看到了这一点，就

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停止进行武装起义。然而，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法西斯血腥恐怖的情况下，要党改变方针，并不那么容易。在与“取消派”斗争之际，党曾低估了左倾宗派主义以及逐渐形成的一种极左倾向的危害性。某些党员热中于向法西斯恐怖作斗争，竟想用反恐怖和武装支队的行动来代替群众革命斗争。索非亚大教堂事件① 因此而发生，它就是由背离党的路线的一些党员策划和执行的。粲科夫政府即以这一事件为借口，于1925年4月犯下了空前的新暴行。无法无天的法西斯匪帮，不加审讯地又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农民联盟盟员和党外的反法西斯战士。

这次大屠杀在苏联人民和欧洲进步人士中间引起了广泛的抗议运动。法西斯分子杀害了许多保加利亚的优秀儿子，如格奥米列夫、谢尔盖·鲁米扬策夫、迪米特尔·格龙查罗夫、帖美耳

①索非亚大教堂 (St. Nedelya Church) 事件，1925年4月16日，粲科夫政府各部部长，国会议员和著名的政治人物齐集于索非亚大教堂，参加格奥尔基耶夫将军的葬礼，教堂内突然发生了爆炸事件。——译者

科·嫩科夫等人，他们都是保加利亚的一些积极的、政治上进步的人物。这就激起了欧洲和全世界的一些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的公愤。著名的作家和记者纷纷来到保加利亚访问，并在其著作中揭350露了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恐怖。这些著作中包括马塞尔·瓦亚德的《保加利亚见闻》、卡尔·毛斯的《保加利亚在发生着什么?》、亨利·巴比塞的《刽子手》等等。国际红色救济会和苏联的劳动人民都来援救他们的保加利亚同志和兄弟。德国人权保障同盟也为保卫法西斯恐怖的受害者而积极展开了活动，它出版了有关法西斯分子在1923—1925年期间所犯罪行的大批材料。

资本主义在保加利亚的暂时和局部稳定，建立在经济生活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之上。它在政治上则以工人阶级在1923年革命斗争中的失败为起点。然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一稳定都具有暂时的、不完全的和不稳定的性质。在农业方面，由于农民联盟执政时期城市的牧场用地改为耕地以及沼泽地被排干，播种面积不但恢复了战前水平，甚至还有一定增长。一些精耕细作的农作物如烟叶、甜菜、棉花、葡

萄等的产量也有所增加。人口的自然增多，来自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加的难民的大批定居下来，以及原始农具的继续使用，都意味着对土地的迫切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工业的不发达状态妨碍了农业的现代化，也使巨大的失业隐患难以消除。农民因受到银行和高利贷资本的无情盘剥而大批破产。雇农由1920年的二十二万三千人增加到1926年的二十六万五千人。1922年，农民欠农业银行的债款达十亿列弗；五年后，总额上升为二十七亿列弗，1929年更增加到四十六亿列弗。由于缺少土地，受商业资本和信贷资本剥削，又缺乏能吸收过剩劳动力的副业，国内许多地方有大批人陷于饥饿。

工业领域内，在新企业的兴建和原有企业的扩建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展。机器和设备得以部 351 分更新，生产过程也有了某些改进。战争期间所积累的资本开始用于发展生产。当时如同战前一样，只有轻工业和采矿工业得到了发展，再就是加工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由于保加利亚资本家想要取得最大利润，也是由于加紧渗入的外国资本对发展保加利亚的重工业和机器制

造业毫无兴趣。外国资本在许多生产部门占了强有力的地位，垄断了某些主要农产品，如蛋、酒、烟草等等。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合併也增加了。九个大的金融机构控制了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其中五个是外国的。外国资本是通过取得开发国家自然资源的特许权和贷款给保加利亚政府的形式侵入的。保加利亚政府在稳定时期与外国签订了两项借款协定：一项是难民借款，总额为八千二百万金法郎；另一项是稳定借款，总额为一亿金法郎。这两项借款是由英美合资银行和法国银行提供的，条件非常苛刻：前一项年息为8.4%，后一项年息为7.5%；贷款人并有权控制借款的支用。

资本开始在保加利亚得到暂时和局部稳定这一事实，也要求政权机构有所更迭。当粲科夫政府已完成它镇压革命运动的刽子手的使命以后，保加利亚资产阶级这时需要一个能得到外国资本支持的新政府，因为外国资本要求国内安定以保护其利益。1925年4月事件发生后，“民主协商”联盟内部出现了一个反对派，迫使粲科夫政府下了台。1926年1月，以安德列·利亚普切夫为首

的新政府成立了，这个政府的各部虽经几度易人，却一直执政到1931年6月为止。

新政府所维护的，仍然是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中支持过粲科夫政府的那些极端贪婪和反动的集团的利益。不同之处仅在于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此时又变换了打击革命运动的手法。利亚普切夫声称他将采取“温和手段”来统治，实际上他却继续采用了粲科夫政府的恐怖政策，只是其杀害反法西斯战士的方式不再是伏击，而是通过法西斯法庭处以死刑罢了。352

在利亚普切夫执政时期，革命运动的最大胜利，是组成了合法的工人党和合法的工人青年联盟。在此以前，还建立了一些独立的工会。由于共产党已被取缔，工人阶级正在寻求新的途径组织起来进行群众政治斗争。1927年2月工人党的组成，就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熟的一种表现。利亚普切夫政府之所以容许组织工人党，则是由于它认为这样就能更便于注视工人运动的发展。

虽然国家在利亚普切夫执政时处于资本主义稳定的时期，但工人阶级的状况却毫无改善。因

此；尽管当局进行了残酷迫害，工人还是以罢工作为他们进行斗争的最有成效的手段。为了对付资产阶级的反苏诽谤，国内掀起了一个广泛的运动，要求派遣一个工人代表团去苏联，但后来由于当局的禁止而未能成行。政府对工会干部进行了种种迫害，其中不少人被判处死刑，其罪名是进行“危害国家”的活动。

1929—1934年的经济危机和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 1929年末，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一场经济危机的袭击，其范围之广，持续之久，来势之猛，都是空前的。它影响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工业、农业、信贷、汇兑等，从而结束了资本353主义的暂时和局部稳定。保加利亚由于国民经济落后，依赖于国际金融资本，而且法西斯资产阶级的政策又力图将危机的重负转嫁于人民，也深深受到了这一危机的影响。

经济危机使保加利亚的工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数以百计的工业企业倒闭了，还有些则不得不缩短工作时间。早在危机爆发后的头一年，工业产值就降低了大约40%。这导致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1932年已达二十万人之多。危机也促使生产

急剧集中，并增强了金融资本的势力。许多破产企业被当时的垄断财团所吞併；这些财团的活动范围，也随着外国资本、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撤回而扩大。垄断企业使工业产品保持高价，并为此进一步限制了国内市场上的销售。与此同时，农产品的价格却不断下降，到1933年年中，其售价已较1929年降低了55—60%。由于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输出的减少，对外贸易也急剧衰退并出现逆差。危机导致农产品产量的降低，从而使农民收入减少，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投机商人，以及银行资本和信贷资本。农村里大批农民日益贫困化。政府向农民增收赋税，企图以此来弥补其支绌的财源，这就更加速了上述过程。公务人员和私营企业雇员的状况也迅速恶化，他们的薪金不仅一再降低，而且积欠累月。成千上万的城乡劳动人民长期陷于饥饿和贫困。

经济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保加利亚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间的矛盾，特别是使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同大资产阶级 354 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农村中加强了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危机既促进了

贫苦农民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开展，又为工人和农民在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和法西斯制度的斗争中，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提供了机会。

工人阶级处境的急剧恶化，引起了罢工运动的高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企业的工人奋起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首先起来的是烟草工人，其罢工蔓延到国内烟草卡特尔所属的各个烟草加工企业。接着起来罢工的有五金工人、制鞋工人、斯利文城的纺织工人、里拉自来水系统所雇用的建筑工人等等。

经济危机、罢工运动的高涨以及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普遍不满，使利亚普切夫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面临丧失政权的危险，"民主协商"联盟内部原来互相敌视的各派言归于好，并把民族自由党内某一派的领导人也拉进了政府。然而，这也未能使政府的地位得到巩固。大部分资产阶级看出利亚普切夫政府已无法再维持其政权，便想在这种新形势下设法找到一条出路，即与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主要是农民联盟联合起来。于是，9月起义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后备军便起到了作用。以亚历山大·马林诺夫为首

的民主党，在此后备军中起着领导作用。这个党同农民联盟的中间派、激进党人和部分自由党人一起，组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反对派集团，叫作“人民集团”，表现了它在政治上的灵活和精明。

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推翻令人痛恨的法西斯政权，并为联合全国一切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创造条件；因此，“人民集团”的组 355 成，是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成就。由于资产阶级一直在力图阻挠农民群众向左转，并防止工农联盟建立起来，他们使“农民联盟”参加其集团就更是一个胜利。资产阶级取得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犯了错误，因为党的领导权在1929年落入左翼宗派主义者手中，他们采取了一种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的非布尔什维克政策。左翼宗派主义者错误地把农民联盟看作“农民法西斯”党，拒绝与其领导人采取一致行动。

在1931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集团”获得了胜利。合法的工人党与农民联盟左翼联合起来参加选举，从而组成了一个工农集团，或称劳动联盟。工人党赢得了十七万张选票和三十一个席位。选举的结果，成立了一个以亚历山大·

马林诺夫为首的“人民集团”政府。这就结束了令人痛恨的6月9日政权，也为加强革命运动创造了条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法西斯主义已被废除。“人民集团”的执政，只是为了调整一下大金融资本的专政，使之与经济危机时期保加利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新形势相适应。

新政府的国内政策，还是沿袭了“民主协商”联盟政府的政策。其目的是维持金融资本的最高权力，镇压人民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为达此目的，“人民集团”政府采取了同样的恐怖手段：拘捕，驱散劳动人民的罢工和示威，处死等等。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工人、农民和职员的处境每况愈下。然而，“人民集团”内各党派所感兴趣的却并不是改善国民经济状况，而是为了使他们那一伙人发财致富。他们由于都想分到各部和各种机构的肥缺而在政府内争吵不休。贪污356行贿达到了空前规模。饥饿、物价高涨和疫病流行等现象遍及全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蛊惑人心的改革法规，以限制垄断资本家、主要是外国资本家的掠夺，但却没有取得什么切实效果。各资本

家财团任意决定工业产品价格，攫取高额利润，已经完全操纵了国家的经济生活。

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是反人民的和反动的。它谋求与法西斯意大利亲善，以便取得它的支援，实现资产阶级的复仇野心。在德国建立纳粹政权后，“人民集团”政府也向它大献殷勤。这就影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保加利亚的态度。在保加利亚采取新外交方针的情况下，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速了它们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即已开始的抽回资本的过程。取代它们的是德、意两国的垄断企业。于是，保加利亚的经济开始从属于德帝国主义的利益，并部分地从属于意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两个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期间，也在保加利亚取得了特殊势力。

人民的困苦状况和政府的反人民政策，为革命和反法西斯运动力量的迅速扩大创造了条件。工人阶级继续在这一力量中占了领导地位。“人民集团”执政时期，许多企业的工人进行了持久的坚决斗争，并在有些地方得到了劳动农民的支援。这在工人运动发展史上是一种新事物，也是在反

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工人和农民逐渐结成联盟的一个预兆。劳动农民在严重的经济危机迫害下，愈来愈认识到政府政策的反人民性质，成批地加入了工人党的行列。仅在1932年一年内，工人党357的党员总数就从六千人猛增至三万人，其中多数新党员来自农村。工人党的力量和影响的迅速扩大，表现在1932年的城市选举中。工人党在这一年获得的票数，比1931年议会选举时多六万张。政府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是在索非亚，那里的工人党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和半数以上的席位。然而，政府却拒绝将首都的行政权力移交给新选举出来的市议会，并以变本加厉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工人党的胜利。它再一次大规模逮捕工人，封闭党的俱乐部，驱散示威队伍，并折磨罢工者。政府当局通过马其顿恐怖分子和其他恐怖分子，杀害了一些最杰出的工人干部。在军队和当地居民中开展了所谓"揭发阴谋"的活动，从而使好多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受到审讯，并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1933年4月，工人的议会代表被剥夺了代表权。接着，对合法工人报刊的迫害也加剧了。尽管这样，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斗

争，却继续在发展壮大着。国内出版了数十种工人报刊和反法西斯报刊，如《回声报》、《工人事业报》、《展望》、《硫磺》、《统一》、《女工》、《星》等等。反法西斯报刊广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并要求与苏联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初，在保加利亚开展了一个为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人辩护的广泛运动，他们都是由于纳粹策划的国会纵火案而受到牵累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英勇行为和大无畏精神，及其对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坚定信心，再次鼓舞了反法西斯运动的广大战士。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儿子，又是光辉的9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这个事实，提高了保加[358]利亚共产党的威信，并使它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不幸的是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权还在左翼宗派主义者手里，从而使党未能扩大和加深它已经取得的成就，更主要的是未能阻止另一次军事法西斯政变的发生。

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工人反法西斯运动的加强，使资产阶级各集团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也动摇了“人民集团”政府的基础。当政府已充分表现

359 其无能时，资产阶级阵营内又着手重新组合力量。从国外回来的一些与英法资本有联系的农民联盟的干部，组成了一个反对派，以对抗农民联盟中的吉切夫派（即所谓“弗拉布察”派）。他们宣称反对工农联盟，建立了一个新的农民组织（即所谓“普拉得内”派）。6月9日政变的刽子手粲科夫按照纳粹的方针，组成了一个名叫“国家社会运动”的法西斯组织，准备搞一次新的法西斯政变。在“民主协商”联盟执政时期即已建立的政党“环节”联盟，也在打着同样算盘。但是，他们不象粲科夫的法西斯组织那样寻求纳粹德国的支持，而是采取了亲法政策，并提出了“完整的南斯拉夫”（即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统一起来）这一口号，以实现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对土耳其、希腊和罗马尼亚的领土野心。当时，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力图建立一个“能者”的“独裁主义”政权，以便用国家干涉的办法来制止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瓦解，“环节”联盟许诺了为他们实现这一目的。这个组织的成员普遍具有反对君主制度的思想，也和“军官同盟”有着联系。

当“人民集团”政府的地位无法再维持下去

时，“环节”联盟便在1934年5月19日发动了政变，组成了一个以基蒙·格奥尔基耶夫为首的新政府。新政府解散了国民议会，取缔了所有的政党。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地方自治则被撤消了。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失业现象的借口下，国内几十所中学也遭到封闭。政府为了欺骗群众，特设了一个名为改革管理局的宣传机关，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吹捧新政府及其假改革的运动，但却丝毫没有起到作用。

5月19日政府① 的政策，是为了加强垄断资本的地位。它采用了一种新的垄断组织形式，全面地控制了这个国家。“环节”联盟建立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通过创办一个大规模的国营金融企业，即保加利亚信贷银行，并颁布很多“法令”，以便使国家能更多地指导和控制经济生活。新政府的对外政策，旨在使保加利亚同法国和南斯拉夫携手合作。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解散以伊凡·米哈伊洛夫为首的一个马其顿的法西斯组织，它曾对皮林区的居民进行过残酷镇压，

360

① 5月19日政府，指“环节”联盟在1934年5月19日发动政变后组成的政府，即基蒙·格奥尔基耶夫政府。——译者

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充当了对南斯拉夫实行复仇政策的工具。在人民的压力下，这个政府也于1934年7月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最初的几个保苏协会成立了；它们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宣传苏联的成就及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建立了两国间的文化交往。

1934年5月19日的政变是一次反动的军事法西斯政变，其目的是企图弥合正在瓦解的资产阶级制度，而其结果则是人民的权利进一步被剥夺。新政府虽然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却对共产党员及其拥护者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它实行大规模逮捕，又把许多进步人士判处死刑。工人运动的一切合法行动全部遭到取缔。

君主法西斯专政　保加利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基蒙·格奥尔基耶夫政府的社会基础薄弱，支持它的只有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及预备和现役军人中的某些集团。博里斯国王以及同德意两国有联系的资产阶级都对它不满。博里斯担心失去王位，而资产阶级则对某些经济改革以及同法国和南斯拉夫亲善的政策极为不满。鉴于新政府的主要支柱是“军官同盟”，博里斯便致力于

争取它的一些领导人。这些人都受过忠于王室的教育，而由于同南斯拉夫亲善将使资产阶级的复仇目的无法实现，他们也反对这样的政策。于是，他们就撤销了对5月19日政府的支持。国防部[361]长彭乔·兹拉特夫将军加入了这一伙，在他的协助（也就是军队的协助）下，博里斯终于迫使格奥尔基耶夫提出了内阁辞呈。1935年1月22日，以兹拉特夫将军为首的过渡政府成立了。不到三个月，安德列·托舍夫的政府又接替了过渡政府，并一直统治到1935年11月。为了反对托舍夫政府，"军官同盟"的一些领导人曾企图组织一次新的军事政变，但却未能成功。政变的策划者都被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以托舍夫为首的第二届过渡政府不久也下了台，并由宫廷大臣格奥尔基·基奥赛瓦诺夫组织了政府。这样一来，政权便完全落到国王博里斯手中了。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制度又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公开的君主法西斯专政，而这也是金融资本专政的最后一种形式。

君主法西斯政权所代表和维护的，是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中那些与德、意垄断资本有联系的复

仇主义集团的利益。这个政权导致保加利亚的对外政策急剧转变，使保加利亚日益依附于法西斯国家。这就促使法国、比利时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加速从保加利亚经济中抽回资本，并为德国资本的渗入大开方便之门。1934年后，许多德国企业，象汉萨、索雅、保加利亚水果、特拉基亚、新马其顿等股份公司（都是德国一些大垄断财团的分支机构），纷纷在保加利亚开设起来，经营农产品的加工和出口以及矿石的采掘和加工。此外，建筑股份公司有锡克洛普公司和雷拉叔侄公司，制造船舶、机车和货车的有柯拉洛伐格股份公司，经营运输的有洲际公司等等，它们原来都是由德国人投资建成的，现在又扩大了活动范

362 围。这些德国的财团追使许多保加利亚企业（如塔克福扬公司、保加利亚出口公司、维塔米那公司等等）从属于其利益，它们所采取的手段是或者根本不予投资，或者只作少量投资。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保加利亚经济中抽回资本的另一原因是，5月19日政府和此后的几届君主法西斯政府，在信贷、外贸、外汇等方面，都采取了国家监督和限制的政策。德国的财团正

忙于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未能全部接替法、比等国抽回的资本，致使保加利亚工业中外国投资所占的比重由1921年的26.8%降到1941年的18.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在经济上摆脱了外国垄断资本的灾难性影响和掠夺。德国垄断资本掌握着保加利亚的经济命脉，使它变为第三帝国[①]的农业附属国和原料供应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前夕，保加利亚的对外贸易也已从属于德国的利益。资产阶级放弃了保护本国工业的政策，在德帝国主义者掠夺保加利亚国民经济的活动中扮演着经纪人的角色。

在公开的君主法西斯专政的年月里，保加利亚垄断资本也在不断加强其势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下列途径来实现的：限制西欧垄断资本的势力范围；把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进一步融合起来；迫使较小的企业从属于大的垄断财团。保加利亚商业银行成了保加利亚金融资本的核心，它使国内信贷、工业、贸易、保险等系统的好几十个企业在其统一指挥下联合经营。5月19日政

①指1933年1月希特勒执政后的德国——译者

府创办的另一个主要垄断财团是保加利亚信贷银行，它以经营贸易以及与之有关的信贷业务为主。

保加利亚垄断资本的最普遍的组织形式是卡特尔。其他高级形式——辛迪加、康采恩和托拉斯——还处于创始阶段。垄断性的合併往往只是363短期的。尽管如此，作为保加利亚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其腐朽性仍已充分显示出来。其具体表现如下：与巴尔干战争以前相比，工业的发展速度降低了；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许多工业部门的产量水平还不高，但却已宣称达到了饱和点；资本家将其大部分利润投入非生产性用途而使生产投资日益减少。

君主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经济剥削和压迫进一步加重了。它也意味着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基础缩小了，因为垄断资本使保加利亚屈从于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和第三帝国的军事需要，这也就压制和剥削了许多小资产阶级集团，并限制了民族工业资本的活动范围。从政治上来说，君主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原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权

利已被剥夺，也为它们的一些领导人及其普通党员的某种民主和反法西斯倾向的加强创造了条件。上述这一切都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加强，以及反法西斯斗争基础的扩大。

可是，这些都只是加强革命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客观有利条件；此外，还需要有主观因素，即进行反抗垄断资本专政斗争的动力——共产党。然而，如前所述，在“人民集团”统治时期，“左翼”宗派主义者窃据了共产党的领导，而正是这些人，不顾工人运动的高涨，力图阻止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他们错误地认为农民联盟和社会民主党是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的支柱，并把这两个政党的成员叫作农民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虽然这两个政党的领导人已在实际上卖身投靠法西斯资产阶级并为其利益服务，但是它们的绝大多数党员（尤其是农民联盟的成员）都反对其领导人的政策，并对日益发展的反法西斯运动寄予同情。此外，共产党的宗派主义领导人也对资本主义在保加利亚的力量作了错误判断，认为它已陷入深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必将以“自动”崩溃而告终。 364

因此，他们虽然已在1934年5月19日政变即将到来之前得到警告，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制止，而在政变得逞后，也没有组织群众起来抵抗。相反，他们却向党提出了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错误口号，以之作为最迫切的任务。当时党面临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的统一战线，以便共同反对金融资本的进攻和推翻公开的法西斯专政。而已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并取得崇高威望的工人党却被解散了，这说明党对事态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任务还缺乏正确的理解。

要使共产党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彻底克服“左翼”宗派主义。这个任务终于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完成了。季米特洛夫从纳粹监狱中获释后，便成为党的领袖，并在清除了“左翼”宗派主义者之后，领导党沿着一条新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前进。这一路线符合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内，建立一个由一切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参加的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保加利亚共

产党便致力于建立一个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并组织人民为保卫其切身利益而进行斗争。在党的指导下，1936—1937年期间，烟草工人、纺织工人和其他工人先后组织了群众性大罢工。大部分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参加了 365 1937年的城市选举和1938年的议会选举，赢得了大量选票。工人党重新建立起来，并与共产党合併成为保加利亚工人党。工人青年联盟、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由社会民主党领导）、农民青年联盟（由农民联盟领导）以及其他一些青年组织，也成立了一个青年人民阵线。共产党大力展开活动，在读书俱乐部、体育组织、禁酒组织以及其他群众组织中，甚至在君主法西斯当局设立的、官办的保加利亚工人联合会和农民协会中，广泛地与人民群众进行了接触。

资本主义世界在1935—1936年期间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复兴后，又在1937年下半年受到了一次新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危机使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关系紧张起来，它们开始积极准备战争。战争的主要温床是德、意、日三国。纳粹德国在备战同时，加速了对保加利亚的经济和政治渗透。

三年中保对德输出增加了约五分之一，1939年更达出口总额的67.8%，而德对保输出则达保进口总额的65.5%。于是，保加利亚在政治上日益依赖于德国。1937年，在德帝国主义者的压力下，保、南两国签订了一个“永久友好”条约，旨在割断南斯拉夫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系，并使其倒向德国。以后，巴尔干各国政府又在萨洛尼卡缔结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保加利亚有权改组其军队，并可自由地重整军备。为把保加利亚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一系列准备从此开始。这次大战以德国进攻波兰为先导，于1939年9月1日爆发。

波兰被占领后，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也先后遭到了进攻。纳粹德国不久就成了366中欧和西欧的征服者，接着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巴尔干半岛，打算利用它作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意大利也把侵略矛头指向巴尔干，并于1940年秋对希腊发动了进攻。与此同时，德国又占领了罗马尼亚。战火很快就逼近了保加利亚边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保加利亚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战争缩小了国外市场，加深了保

加利亚经济上对德国的依赖。粮食和原料的对德输出进一步扩大，德国工业品的输入不断减少。进出口的剪刀差以巨额债务的形式继续增大，到1944年9月9日前夕，其总额已达七百亿列弗。至此，保加利亚不仅成了纳粹德国的农业附属国，而且也成了它的债务国。

国外市场的缩小和国内失业人口的增长，迫使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寻找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1940年初，保苏两国签订了一项相互提供货物和原料的协定。这使得保加利亚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并消灭了纺织工业中的失业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保加利亚处于土耳其和英、法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下之时，苏联为维护其民族独立出了不少力。保加利亚还在1940年秋借助于苏联同罗马尼亚签订了一项归还多布罗加南部的协定。

然而，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和君主政权却根本没有考虑同苏联建立牢固的友谊。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1940年11月，当苏联政府通过其副外交人民委员阿尔卡迪·索波列夫建议保苏两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时，保加利亚

当权派瞒着人民加以拒绝。然而，人民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开展了要求政府接受苏联建议的广泛运动。卷入这个367运动（通称“索波列夫运动”）的有数十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表明保加利亚的绝大多数人民主张与苏联和平友好，反对保加利亚站在德国一边卷入战争。

尽管人民的意志表示得这样明确，1940年初成立的波格丹·菲洛夫政府继续执行了反人民的政策。国民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反动法令，其中有反对犹太人的《民族保卫法》，还有《保加利亚青年组织法》。法西斯组织“布朗尼克”，就是根据《保加利亚青年组织法》建立起来的。在镇压1940年猛烈爆发的工人阶级的一些罢工中，法西斯恐怖搞得更凶了。为了给保加利亚站在德国一边参战作准备，政府于1940年秋容许德国部队以所谓“经济”、“游览”、“自然科学”等“团”或“小组”的名义，留驻在保加利亚领土上。这些部队为纳粹军队的入侵开了路，入侵是在1941年3月1日签订了那个让保加利亚参加三国公约的条约之后实现的。纳粹军队占领保加利亚后，又

向南斯拉夫和希腊发动了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军队虽然进行了抵抗、终被击溃，整个巴尔干半岛落到了法西斯侵略者手中。保加利亚的君主法西斯军队也以“解放”被奴役的国土为借口，占领了瓦达马其顿和爱琴色雷斯，后来又占领了爱琴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部分领土。这样，保加利亚虽未积极作战，但已经站在纳粹侵略者一边，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1944年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 巴尔干半岛被征服后，整个西欧、中欧和东南欧，连同其巨大的工业和军事潜力，都处于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倚仗其军事优势，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了进攻。纳粹统帅部指望几个月内结束对苏战争，然后再挥戈粉碎英美两国的抵抗。苏联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在此危急存亡之际一致奋起。纳粹侵略者推行的所谓“新秩序”，把他们种种非人道的、反动的和野蛮的意图暴露无遗，也使欧洲和世界文明蒙受毁灭的威胁。面临这一巨大危险，全世界一切进步人民都起来进行英勇斗争，声援苏联和欧洲被奴役的人民。保加利亚人民也在共产党领导下，

368

加入了这个斗争的行列，并为击败纳粹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的背信弃义的进攻，使保加利亚人民义愤填膺。他们受到共产党关于热爱苏联、热爱社会主义和忠于苏联、忠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已有多年，在反抗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又曾作出巨大牺牲，因而很了解反纳粹侵略者斗争的重大意义，并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

就在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呼吁，号召保加利亚人民不让德国法西斯利用他们的国土和军队来侵略苏联，并要在解放战争中帮助苏联人民。党在呼吁中指出："历史上，没有一场战争比法西斯侵略者发动的这场反苏战争更富于强盗性质，更富于帝国主义性质，更富于反革命性质。反之，也没有一场战争比苏联人民现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更富于正义性，更富于进步性。各国人民的命运，将取决于这一战争的结局。"两天后，党的中央委员会又举行了会议，决定发动一场反对纳粹侵略者、反对君主法西斯政府的群众性武装斗争。

保加利亚共产党迅速作出这一决定，表明了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人阶级 369 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力量以及他们随时准备奋起战斗满怀信心。这一决定，也表现了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在推翻君主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武装斗争将不得不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而且比在一些其他国家内还要困难些。这是因为保加利亚毕竟是德国的盟国，尽管仅仅是在形式上如此。纳粹侵略者入侵保加利亚时，并未摧毁其法西斯国家机器，而是把它保存下来，用以间接地、隐蔽地压迫和掠夺保加利亚人民。他们把保加利亚军队派往色雷斯和马其顿，从而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造成了保加利亚即将得到统一的某些幻觉，法西斯当局也就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来加强它和德国的联系。

尽管这样，与其他卫星国不同的是，在保加利 370 亚还是展开了群众武装斗争。这主要表现为一个广泛的游击队运动的形成。早在反苏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腊兹洛格、杜普尼察（斯坦克季米特洛夫）、帕扎季克区的巴塔克村（曾因土耳其镇压1876年4月起义时在此所犯的滔天罪行而为人

所共知）、卡尔洛沃、塞夫利厄伏、加布罗沃、东斯雷德纳戈腊山脉等地即已建立了游击队。同时，共产党还开始组织战斗小组，袭击纳粹和保加利亚的军事与经济目标。他们在瓦尔纳烧毁了装运纳粹军用汽油的列车，在鲁塞破坏了一个纳粹汽油库，还进行了许多其他破坏活动。工人们开始连续不断地降低产量，破坏机器，并毁掉供给纳粹德国的制成品。农民则把谷物藏起来，拒不缴371纳法西斯当局规定上缴的农产品。

在组织武装起义中，赫里斯托·波特夫广播电台起了主要作用。这个电台是由党的海外局倡议创办的。许多侨居苏联的久经考验的保加利亚革命战士，纷纷乘潜水艇和飞机回到祖国来，支援武装斗争。他们多半被法西斯分子捕获和杀害，但是，那些倖免于难的都参加了反对君主法西斯政府的斗争，并以其丰富的经验，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其中之一是茨维亚特科·腊多伊诺夫，他领导了党中央设立的负责武装斗争的军事委员会。法西斯当局竭尽全力，想把方兴未艾的革命力量扼杀在摇篮里，可是并没有成功。斗争的规模逐月扩大起来。游击队作战屡获胜利，君

主法西斯政府被激怒而进一步加强了恐怖统治。一些党中央的成员及其合作者被捕。1942年7月，中央委员安东·伊凡诺夫、诗人尼古拉·瓦普察洛夫和其他一些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被判死刑并枪决。

武装斗争最主要的成就，是使保加利亚未被卷入反苏战争。这是因为君主法西斯政府在武装斗争四起的情况下，不敢派遣军队到东线去。但是，由于纳粹所施加的压力，它还是间接地协助了反苏战争。在这一战争中，保加利亚被用作供应和军事基地。保加利亚军队对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占领，也使德国得以抽出那里的部队派往东线作战。在保加利亚国内还曾招募了一些农业工人、建筑工人和其他人送往德国。君主法西斯政府在纳粹德国的要求下，向英、美两国作了“象征性”宣战。后来，英、美空军对索非亚和其他城[372]市进行了多次狂轰滥炸，把保加利亚首都毁坏了一大半，这个“象征性”战争也就转变为可怕的现实了。

保加利亚的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太上皇的存在，引起了国内经济生活的深刻瓦解。根

据已签订的一些协定，保加利亚不得不以粮食和原料供应纳粹德国，而换回的工业品几乎等于零。粮食储备消耗殆尽，造成了大批居民的饥饿。工业生产极度紊乱。粮食和工业品的缺乏，导致物价的急剧上涨和本国货币的贬值。定量供应居民的粮食微不足道，黑市买卖和投机倒把因而大量出现。

保加利亚人民处于困境，德国又无把握在东线取胜（由于1941—1942年冬纳粹军队在莫斯科的败北），这就促使保加利亚的爱国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战线，向政府的反人民政策进行斗争。随着战争的进展，全体爱国人士越来越看清，保加利亚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灾难；防止这场灾难的唯一办法，是解除与纳粹德国的联盟，推翻君主法西斯政府。这就为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在季米特洛夫的倡导下，共产党于1942年夏着手建立这个统一战线。1942年7月17日，赫里斯托·波特夫电台广播了党的海外局在季米特洛夫领导下制定的祖国阵线纲领。这是一个民主的、反帝的和反法西斯的纲领，它规定了一些迫切任务，

完成这些任务就有可能拯救国家，免遭迫在眉睫的灾难。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一、阻止保加利亚卷入反苏战争；二、从南斯拉夫和希腊境内撤出保加利亚军队；三、解除与纳粹德国的联盟，退出三国公约；四、停止向德国输出粮食和原料，373 保证人民的粮食供应；五、同苏联人民和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结盟并建立友好关系；六、解散一切法西斯组织，严惩法西斯罪犯；七、保护国家的财富和劳动力免受外国侵占，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为了建立祖国阵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同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磋商，其中有农民联盟、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环节”联盟以及其他党派团体。这些党派中的一些领导人，如尼古拉·穆沙诺夫、迪米特尔·吉切夫、克鲁斯 374 提奥·帕斯土霍夫等，都反对建立祖国阵线，他们指望博里斯国王会自动改变其对外政策，请他们去当官。另外一些人，象尼古拉·佩特科夫和格里戈尔·切什美季耶夫，虽然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参加了祖国阵线的组织工作，却一直在破坏其活动，尤其是破坏它的扩大武装斗争的活

动。最早的一批地下祖国阵线委员会是在1942年建立的，之后便不断增多；它们是创建中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萌芽性机构。建立这些委员会的基本的和决定的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这种联盟在数十年的反法西斯共同斗争中，已经有了深远的历史根源。翌年，即1943年，组成了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共产党、农民联盟中的“普拉得内”派、社会民主党和“环节”联盟的代表，以及一个无党派人士。

375 纳粹军在斯大林格勒①溃败后，保加利亚的游击队运动就更加扩大了。建立了许多新的游击队组织，还组成了一些较大的游击支队，如罗多彼山脉的“安东·伊凡诺夫”支队、博特夫格腊特区的“查夫达”支队、东斯雷德纳戈拉山脉的“赫里斯托·波特夫”支队、里拉·皮林支队、特兰支队等等。全国分成十二个军事作战地区，各有指挥部，并成立了一个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挥的总参谋部。保加利亚的游击队，还同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游击队并肩战斗在后两个国家的领土

①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斯大林格勒改名伏尔加格勒。

上。他们为了破坏粮库和木料场，夺取武器用以武装游击战士，切断铁路交通，惩办臭名昭著的法西斯政权的帮凶等，曾经成功地进行了多次战斗。君主法西斯政府企图用加强恐怖统治的办法 376 来消灭游击队运动，但却根本没有奏效。军警当局被赋与无限权力。政府又给叛徒或凶手以奖金，规定每杀死一名游击队员，奖给五万列弗。被害游击队员的头颅被吊在长杆上，在村镇里游街示众，“以儆效尤”，而他们的尸体则遗弃于广场，惨遭亵渎。游击队员的全家遭到杀戮，他们的房屋及其庇护者和帮助者的房屋都被烧光。1943—1944年，游击队员和战斗小组的参加者有三万多人，连同他们的庇护者和帮助者共有二十万人，而他们的伤亡总数则达二万九千五百人。一支兵力达十万人之多的军队被用来对付游击队，还为此专门组成了一支宪兵队，由加强的警察部队予 377 以协助。在武装斗争中，有许多杰出的革命爱国者阵亡，其中包括赫里斯托·米哈伊洛夫、弗拉多·特里奇科夫、莉莲娜·迪米特洛娃、约尔丹卡·尼科洛娃和迪乔·彼得罗夫。

在苏联军队以及从北非和意大利登陆的西方

列强军队的沉重打击下，法西斯轴心国开始土崩瓦解。法西斯意大利被打垮而退出战争，匈牙利也在寻求与英美政府接触。保加利亚资产阶级这才发现了灾祸临头的预兆。国民议会内组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反对党，宣称反对政府的政策。1943年春，博里斯突然死去，由其尚未成年的儿子西美昂登位。基里尔亲王、波格丹·菲洛夫和米霍夫将军三人组成了摄政会议，并成立了一个以多布里·鲍日洛夫为首的新政府。

摄政会议和新政府的组成，并未导致国家政378策的改变。这一统治集团声明他们赞成维持保德两国的联盟关系，并采取了摧毁游击运动的新措施。然而，法西斯统治已是命在旦夕了。苏军发动的攻势，象一台强大的压路机摧枯拉朽地扫荡敌人。战线不断向前推进，日益逼近保加利亚边境。这就迫使保加利亚资产阶级采取行动。6月1日，一个由伊凡·巴格里扬诺夫为首的政府组成了，它宣告即将改变保加利亚的外交政策。然而，这只是欺骗人民的一种手法。新政府无意拆散与德国的联盟。它想争取时间，期望东线能稳定下来，那时它就可以应付游击运动了。

这样，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便再次（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表明它不会割断与德国的联盟关系，国家也再次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民族灾难。只有由祖国阵线组成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把保加利亚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然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必须通过人民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君主法西斯集团。1944年夏，共产党和祖国阵线开始准备举行这样一次起义。国内总的形势和1918年夏间相似，只是那时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是自发的，而现在，领导革命运动的是一个强大的马列主义政党，它已成功地把保加利亚人民广大的爱国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领导他们进行武装起义。

1918—1944年的文化发展　保加利亚参加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都使它遭受到深重的民族灾难，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形势下，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一个尖锐的革命危机已在国内形成。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着手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行直接

379

斗争。1923年9月的反法西斯起义，就是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联合起来为建立一个工农政府而斗争所达到的高潮。那次起义的失败，只是暂时削弱了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共产党在克服了"紧密"社会主义的一些缺点以后，已逐渐地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列宁主义的政党。1944年9月9日，它在苏军的决定性帮助下，领导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概括地说来，这就是1918—1944年期间保加利亚文化发展的背景。

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保加利亚人民的整个思想意识和文化发展上，引起了深刻的变化。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及保加利亚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出现大好革命形势以前，国家的文化领导权一直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决定着文化生活的形式和内容，并以此强加于人民。资产阶级又蛊惑了多数小资产阶级拥护它所谓的"民族理想"，实际上却是以这种"理想"，掩盖它扩大国内市场和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霸权的目的。

资产阶级两次把保加利亚引上了民族灾难的

道路，这一事实暴露了它的那些“民族理想”的虚伪性，也促使人民转而为实现新的理想，也就是工人革命运动的理想而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英勇斗争中，这些理想成了鼓舞人民的力量源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革命运动的普及，使工人阶级成为发展民族文化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衰落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保加利亚 380 的资产阶级显示出根深蒂固的反动本质。它为维护其阶级统治而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就更表明了它的无能和反动本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于西欧和美国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的反动的、虚假的科学“理论”，日益扩大其影响。与此同时，非人道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也开始渗入资产阶级知识界。然而，这些都没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下根来。过去的民主和革命传统，以及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英勇斗争，都使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无法获得广大的社会基础。其所以如此，主要应归功于共产党，因为它一直在揭露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并与之进行着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党的队伍，

他们竭尽全力，为争取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而奋斗。除布拉戈耶夫外，在党内以及在党的帮助下，还出现了大批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文艺批评和其他领域的理论家和学者，他们都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进行工作并成长起来的。

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以及在提出保加利亚和国际革命运动的战略战术方面，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瓦西耳·科拉罗夫都写过一些颇有价值的著作。格奥尔基·巴卡洛夫、托多尔·巴甫洛夫、托多尔·萨莫杜莫夫、萨瓦·加诺夫斯基等人，则从事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已在人民的知识分子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他们绝大多数拥护共产党的事业，特别是教师和知识分子中同人民有联系的其他阶层，以及作家、画家等文化战线工作者。

尽管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法西斯的理论与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也尽管在法西斯专政时期，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比战前更加疯狂地利用科学和381文化来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并达到它的民族主义的和复仇主义的目的，保加利亚的文化在此期

间还是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进行了颇有价值的研究，也出版了不少著作。这一期间比较著名的学者，在历史学方面，除兹拉塔尔斯基外，还有尼科夫和穆塔夫奇耶夫；在语言学和语文学方面，有姆拉德诺夫、佐内夫、米列提奇和伊凡诺夫；在考古学方面，有米亚特夫；在古今语文方面，有亚历山大·巴拉巴诺夫、德切夫、古卢博夫和托莫夫；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数学家奥布雷什科夫、波波夫和查卡洛夫，物理学家彭切夫和纳德热科夫，化学家卡腊奥格拉诺夫、巴拉列夫和兹拉塔罗夫，生物学家梅索迪·波波夫和达斯卡洛夫，医生沙普沙耳、曼科夫斯基、莫洛夫和契洛夫，等等。

在教育的发展上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在农民联盟执政时期。当时曾通过一项新的“教育法”，根据这项法令，十四岁以下的儿童都能享受义务教育，许多初级中学也开设了起来。国立索非亚大学开办了三个新学院，美术学校和音乐学校也都改为学院。除国立大学外，在索非亚还建立了一所不是由国家资助的私立财经贸易学院。在斯维希托夫和瓦尔纳两个城市里也办起了

高等财经学校。1939年，大专院校的学生总数约为九千五百人。许多大学生，特别是学习医学、建筑和工程的，都是在中欧和西欧完成其学业的，因为法西斯当局对学生的入学和培训横加限制。此外，有一些科学和学科也没有条件在国内学习以取得学位。1934年，法西斯政府还关闭了许多中学，说什么知识分子在保加利亚已达“饱和”程度，这是对发展教育事业的一个打击。由进步的社会工作者领导的民众读书俱乐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开展了大量的活动。

尽管法西斯政府竭力限制和禁止民主报刊和382革命报刊的出版，但定期刊物的发行还是有所增加。根据法西斯的国家保卫法，数以百计的进步报刊的编辑和投稿者被判刑入狱。共产党的机关报刊《工人报》、《新时代》、《平等》等，在农民联盟执政时期销数有很大增长，但在9月起义后都被取缔了。于是，党开始印发地下刊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期刊《共产主义旗帜》。后来，在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稳定时期，合法的工人报刊又开始出现。在“人民集团”执政时期（1931—1934年），

工人报刊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高潮。当时被许可发行的报刊达三十多种，其中有些传播得特别广泛，如日报《工人事业报》和《回声报》、文学报《工人文学战线》、周刊《展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幽默报纸《硫磺》、期刊《星》等等。1934 年 5 月 19 日政变后，工人报刊全被取缔，于是，地下工人报刊又增多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人民解放运动期间，《祖国阵线报》开始秘密出版。从 1923 年末到 1944 年 9 月 9 日，在保加利亚一共出版过大约一百四十种地下报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反对资产阶级统治和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斗争，知识分子中深刻的思想变化和动荡，都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战斗性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是战后革命危机时期的革命斗争的第一个阐明者，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 383 命胜利的第一个歌颂者，也是保加利亚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斯米尔宁斯基的诗歌以及他的全部文学著作，反映了战后保加利亚人

民生活的转折点，以及他们奋起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斯米尔宁斯基也预告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保加利亚即将到来。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在开始于1918年士兵起义的人民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一些保加利亚作家和诗人克服了他们的个人主义和象征主义，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观点。这些人中间最主要的是格奥·米列夫、赫里斯托·亚瑟诺夫和柳德米尔·斯托扬诺夫。1923年9月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米列夫创作了他最著名的长诗《九月》，诗中颂扬了起义人民的英雄气概，刻划了法西斯刽子手的邪恶无耻。战后的头几年涌现出一批新的无产阶级作家和诗人，如克鲁姆·库乌利亚夫科夫、安格尔·卡腊利伊切夫和尼古拉·富尔纳季耶夫。在战前即已负有声望的现实主义作家埃林·彼林、安东·斯特腊施米罗夫和约尔丹·约夫科夫，继续进行着他们的创作。斯特腊施米罗夫写了出色的长篇小说《圆384舞》，义愤填膺地揭发了1923年9月起义失败后法西斯分子的暴行。约尔丹·约夫科夫被誉为文体綺丽的散文大师之一。他写了好几部享有盛名

的作品，书中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苦难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他的主要作品是《收割者》、《安蒂莫伏旅店之夜》和《巴尔干的传说》。

进步文学的发展在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柳德米尔·斯托扬诺夫、格奥尔基·卡腊斯拉沃夫、赫里斯托·拉杰夫斯基、奥尔林·瓦西列夫和尼古拉·赫列耳科夫，作为最有才华的作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他们都参加了战斗的劳动作家联盟。他们的作品是以人民的生活方式及其摆脱资本主义羁绊的斗争作为主题的，例如卡腊斯拉沃夫的《婆母》和斯托扬诺夫的《霍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过文学作品进行反战宣传曾经风行一时。在这方面，康斯坦丁·佩特卡诺夫的《浴血红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尼古拉·瓦普察洛夫创作的革命诗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虽然只写了一部诗集《马达之歌》，但却以 385 其卓越的艺术才能，在诗歌中成功地反映了人民反抗君主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以及他对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坚定信心。如同赫里斯

托·波特夫和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一样，瓦普察洛夫也是保加利亚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由于他进行了英勇的反战斗争和反法西斯斗争，他在死后被授予最高的国际荣誉之一——名誉和平奖金。

尽管法西斯当局竭力限制苏联文学作品的流传，许多伟大的苏联作家和诗人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等的作品被译成保加利亚文，并在国内广泛传播。1936年阿森·兹拉塔罗夫教授所写的《在苏联国土上》这本书，在向保加利亚公众介绍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文化的衰落，以386及民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成长，也表现在戏剧、音乐和绘画的发展上。在法西斯当局的压力下，索非亚的国立大剧院和各省城剧场都不得不停演进步的和现实主义的戏剧，而上演反现实主义的戏剧。最有才华和最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和演员受到了迫害，其中有些人不得不移居国外。然而，尽管处境这样困难，在话剧和歌剧演员中还是涌现了一些杰出的舞台艺术大师，如伊凡·迪莫夫、

弗拉基米尔·特伦达菲洛夫、康斯坦丁·基西莫夫、奥尔加·基尔切娃等等。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后，苏联的剧本开始在保加利亚演出，苏联电影上演得也更频繁了。同时，两国还在体育运动方面建立了初步联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保加利亚的音乐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在音乐创作上取得显著成就的有潘乔·弗拉基格罗夫（《保加利亚狂想曲》）、佩特科·斯塔伊诺夫（《色雷斯舞曲》）、柳博米尔·皮普科夫（《第一交响乐》）、斯维托斯拉夫·奥布雷特诺夫（《巴尔干，唱一支哈伊杜克之歌》）和马林·哥列米诺夫（《火焰舞曲》）。歌剧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歌唱家如赫里斯蒂娜·莫尔佛娃、斯特凡·马克当斯基、米哈伊尔·波波夫等人，都在索非亚歌剧院发展其才能。

在绘画艺术方面，现实主义的和民主的艺术同西欧现代主义的颓废影响进行了斗争。站在斗争最前列的，绘画方面是赫里斯托·斯坦切夫（《侍女》和《田间》）、弗拉基米尔·迪米特洛夫大师（《母与子》、《挖掘者》和《婚礼》）、德奇科·乌祖诺夫和伊利亚·彼得罗夫；雕塑方面是

伊凡·拉扎罗夫（《他们胜利了》）、伊凡·富涅夫（《母亲》）和安德列·尼科洛夫；政治漫画方面则是亚历山大·鲍日诺夫、伊利亚·贝什科夫、亚历山大·仁多夫和斯托扬·维涅夫。进步的政治漫画，对揭露资产阶级和君主法西斯政权的反人民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筑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可以从以下387一些建筑物看出：国立大学、农学院、索非亚的法院和国家银行以及普罗夫迪夫的邮局。耸立在斯托列托夫峰上的纪念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的修筑是为了纪念1877年希普卡隘口的英勇保卫战，表达保加利亚人民对其解放者俄国衷心的感激和热爱。

第十章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保加利亚

1944年9月9日的人民武装起义 苏军不[388]断向西推进，使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和君主法西斯政府的营垒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到1944年夏，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当时苏军已越过国境，开始解放中欧和东南欧人民。骄横不可一世的轴心国趋于土崩瓦解。芬兰步意大利后尘投降了。

1944年夏，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和君主法西斯政府对纳粹德国的胜利所抱的信心，已变为对不可避免的灾难的恐惧。资产阶级反对党又活跃起来。有人开始鼓吹使保加利亚脱离纳粹德国，并与西方列强达成和解。伊凡·巴格里扬诺夫政府通过土耳其，与美、英就建立联系的问题进行了试探性谈判，但却没有宣称与纳粹德国断绝联盟。谈判的目的，是要使英军和土军占领保加利亚，从而阻止苏军进入保加利亚领土，并借以摧

毁国内革命运动的力量。保加利亚部分资产阶级的这一政策，与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不可告人的企图不谋而合，即通过建立所谓“巴尔干特殊地区”，堵塞苏军向中欧和东南欧进军的道路。389 1944年8月底，纳粹和罗马尼亚的部队在雅西与基什尼奥夫溃败后，苏军对保加利亚重兵压境，这一阴谋也终于成型。

但是，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君主法西斯政权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未能同西方列强迅速达成协议。在此期间，苏军向巴尔干半岛的神速进军，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对党和伊凡·巴格里扬诺夫的反人民阴谋。它推动了反对君主法西斯的武装斗争，也推动了祖国阵线着手为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作直接准备。

1944年8月下旬至9月初，游击队的兵力开始迅速扩大，并对纳粹和保加利亚法西斯的军事与经济目标发动了几次成功的袭击。里拉—皮林支队沿里拉河所进行的战斗，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次战斗中，数十名纳粹和保加利亚法西斯官兵被击毙或俘虏，大量武器被缴获并用以武装新来的游击队员。在保加利亚西部（特兰地区）和

其他地方，游击队也进行了一些大规模战斗。

1944年8月末，保加利亚出现了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尽管君主法西斯政府加强了恐怖统治，其地位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事态日益迅速地向高潮发展。8月26日，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四号通知，要求一切革命力量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君主法西斯专政，建立祖国阵线政权。各游击支队也接到了民族解放军总参谋部关于着手占领城镇和村庄的命令，这些地方的政权将由当地的祖国阵线委员会加以接管。8月27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致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中，说明了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要点。保加利亚的人民和武装部队将站到苏军一边，共同肃清保加利亚境内的纳粹占领军和保加利亚卖国贼。 390

巴格里扬诺夫政府想用使保加利亚与纳粹德国“转辙”并“脱离”的政策欺骗人民，又企图摧毁革命运动，但是都没有能得逞。它终于在1944年9月2日垮了台。以康斯坦丁·穆拉维耶夫为首的新政府成立了。这个政府是由所谓的“合法反对党”组成的，其中包括1934年5月19日以后

解散的亲西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如民主党人穆萨诺夫、右翼农民联盟盟员吉切夫和迪莫夫、人民党人大实业家布罗夫等等。穆拉维耶夫政府一成立，就公开宣称它将遵循对一切交战国“完全中立”的政策；对所有参加解放斗争的人，不论是被判刑或正在受审的，一律实行大赦。然而，这些仅仅是政府的空头支票，它由于感到末日来临而不得不求助于虚假的民主橱窗。穆拉维耶夫政府不但没有遵循“完全中立”的政策，反而允许溃败的纳粹军队带着装备经由保加利亚撤退，以便重整旗鼓，继续顽抗。它也根本没有实行大赦。为了把保加利亚从所谓“布尔什维克灾祸”中拯救出来，它还派了政府的全权特使在开罗与美、英继续进行谈判。

穆拉维耶夫政府掩护纳粹军队撤退并策划由英、土军队占领保加利亚的罪恶活动，被苏联政府的英明决策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所粉碎。9月5日，苏联政府照会保政府，揭露其“完全中立”的虚伪政策，并对保宣战。同一天，工人党政治局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提出以游击支队、地方战斗小组和已转向人民一边的军队的联合行动来

推翻君主法西斯政权。主要的打击目标定为穆拉维耶夫政府和军队指挥部的所在地索非亚。

为了完成起义计划，9月6日至7日在索非亚和其他较大城市周围，游击支队开始集中，战斗小组也着手组织起来。与此同时，活跃在军队里的地下党和工人青年联盟的小组，也加紧活动以争取军队的支持。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通知穆拉维耶夫政府，9月6日将在国内几个大城市举行公开集会，说明祖国阵线的纲领。政府下令禁止举行这样的集会，并扬言将用武力加以驱散。9月6日和7日，成千上万的人不顾政府的恫吓，参加了祖国阵线在贝尼克、索非亚和其他地方所组织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法西斯当局对此进行了血腥镇压。在一些城镇里，爆发了群众性的工人罢工，并波及到所有的生产和运输部门。在锡利斯特拉、瓦尔纳、普列文和其他城镇，群众迫使当局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9月8日，游击支队占领了加布罗沃、皮尔多普、帕纳吉尤里希特、路科维特、贝尔科维察和其他一些城镇，并建立了祖国阵线政权。在扩大了的保加利亚西部各游击支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一民族解放师，它解

放了大片地区并开始向索非亚进军。

9月8日，苏军越过罗保边境进入保加利亚国土。他们在短期内就解放了鲁塞、舒门（科拉罗夫格勒）、瓦尔纳、布加斯和其他一些城镇，并继续向内地挺进。各地人民都热烈地欢迎苏军。集中于东北部的保军，对苏军也没有作任何抵抗。392在地下士兵委员会的领导下，他们拒绝听从法西斯司令部的命令，并开始转向人民一边。这标志着资产阶级军队的迅速和全面崩溃的开始，它已不再是君主法西斯政权的支柱了。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推翻君主法西斯政权的决定性进攻于9月8日晚在索非亚打响了。集中于城内外的游击队和战斗小组，协同转到人民一边的军队，占领了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门，逮捕了政府和摄政会议的成员。以基蒙·格奥尔基耶夫为首的祖国阵线政府成立了。它在9月9日清晨发表公告，向保加利亚人民宣布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全国人民以无法形容的热情欢迎公告的发表。各游击支队开进城镇和村庄，建立了新政权，粉碎了军警中少数法西斯分子的顽抗。资产阶级

和穆拉维耶夫政府被这一打击的力量和速度吓得丧魂落魄，再也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短期内，祖国阵线的统治就在全国建立起来，它开始组织政府机构和人民保安队，并着手对军队进行革命改编。各地政权均由原有或新建的祖国阵线委员会加以接管。

推翻君主法西斯专政和建立祖国阵线政府，是保加利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几十年来，人民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顽强斗争，为9月9日的胜利做好了准备。在这一斗争中，特别是在1923年9月反法西斯起义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及其进行期间，一个以工农联盟为支柱的、国内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的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第二次 393 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的劳动农民在反对君主法西斯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一边。其他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是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捍卫者。在此情况下，9月9日的胜利就成为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一个自然的、期望已久的高潮，而这一斗争，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9月9日人民武装起义的胜利，结束了君主法西斯专政和保加利亚对于纳粹侵略者的依附地位。在保加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它致力于把保加利亚从第三次民族灾难的威胁下拯救出来，并通过建设社会主义，使保加利亚沿着物质和精神进步的道路全面地发展。人民政权的诞生和胜利，是二十年来英勇顽394强斗争的结果。这个政权的赢得，是以巨大的苦难和牺牲为代价的；因此，从过去到现在，它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

9月9日人民武装起义，把推翻君主法西斯政权和争取保加利亚的民族独立作为它的迫切任务。首先，它必须解决民主、反法西斯和反帝的任务。然而，在完成这些任务时，它也必然要从根本上动摇保加利亚的资本主义制度。9月9日被推翻的君主法西斯集团，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没落时期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因此，这次起义既要摧毁君主法西斯专政，就不能不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统治。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并有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革命力量为了确保其胜利，也必须同时向资本主义进攻；否则，这次

起义也不可能完成它的民主、反法西斯和反帝的任务。

9月9日人民武装起义的胜利，结束了保加[395]利亚资产阶级的统治，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就其性质和意义来说，这次起义是以推翻君主法西斯专政和建立祖国阵线统治为起点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9月9日，人民民主政府在保加利亚成立了。这是一个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以及国内其他民主力量结成联盟的政府。人民民主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群众性的反法西斯和反帝斗争的条件下出现的。它成功地实现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并具有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以苏维埃政权形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基本特征。所存在的一些差别是次要的，是由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殊条件所决定的。

9月9日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特点之一，是工人党在第一届祖国阵线政府中，与农民联盟和“环节”联盟一样，代表的名额各占四

个。政府中还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两名和无党派人士一名。虽然工人党的代表只占少数，但是依靠着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民，这个党仍在政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的赢得，也是由于数十年来工人党同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它是用最先进和最富有战斗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它对推翻君主法西斯政权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国家，也有明确的远见。由于维护了祖国阵线的团结，工396人党成功地挫败了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一切企图，并逐步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在它的领导下，保加利亚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

没有工人党的积极参加和它的领导作用，9月9日人民武装起义的胜利和人民民主政府的建立是不可想像的。在反对君主法西斯的斗争中，工人党建立了最伟大的功勋，也作出了最巨大的牺牲。它的威望因此而空前提高。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以及坚定不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正是由于强大的、具有权威的工人党的存在，才使劳动人民的坚强团结得以实现。

祖国阵线政权的建立及其初步措施　保加利

亚参加反纳粹战争　9月9日人民武装起义胜利后，人民民主政府面临着许多重要和迫切的任务。首要的任务是在中央和地方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另一重要任务，则是对公共事业和文化生活的一切部门进行改组，解散原有的各种法西斯组织，有步骤地肃清这些组织和君主法西斯政权所灌输的法西斯思想。一切法西斯政权的得力帮凶和那些对人民犯有罪行的人，都被清除出政府机构。祖国阵线委员会在各部和地方政府的中心机构里建立起来，这些机构的文职官员中的法西斯分子也都被清除出去。人民保安队于9月10日建立，其成员为游击运动参加者和祖国阵线积极分子。那些顽固不化的法西斯军官全部被解职，代之以忠于人民的军官。建立了设置副职指挥官的制度，促进了军队的革命改编工作。然而，这项 397 改编工作还不能一下子就全部完成，因为缺乏训练有素的指挥干部。在一段时期内使用一些旧军官是必要的，但这却构成了对人民政府的威胁。

就在人民胜利的那一天和以后的几天里，君主法西斯政府的死党，血腥镇压人民解放斗争的刽子手，以及那些使保加利亚卷人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罪魁祸首都被逮捕。政府建立了一个人民法庭审讯这些人，对他们作出了严厉而公正的判决。一切反人民的法西斯法律都被废除。部长会议公布了新的法令，以便使人民广泛地参加政治和文化生活。被法西斯政权解散的各种工会组织恢复了，总工会也成立了。工人阶级在工会组织上的统一从而实现。

9月9日以后，政府所面临的又一重要和迫切任务是恢复经济。在战争的年代里，纳粹侵略者和保加利亚走狗的掠夺政策，已使经济全面崩溃。物价飞涨，在食品和工业品的买卖上投机成风。人民贫穷困苦，营养不良日益加剧。食品和工业品被大厂主、大商人以及形形色色的掮客和投机倒把分子囤积居奇，并以劳动人民买不起的高价在黑市上出售。由于缺乏原料和备品，许多工业企业停工或减产。农业和畜牧业也遭到严重破坏。既无储备粮，又无其他农产品。列弗的贬值，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祖国阵线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采取迅速有力的措施恢复工农业生产，最充分地把一切可用的资源都利用起来。工业企业中

实行了工人参加生产管理，从而限制了资本家的398肆意活动和剥削，使工人得以为全面管理企业作好准备。工资提高了；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农业生产也进行了革新，富农的非法活动和掠夺受到了限制。政府颁布了成立合作农场的法令，并于9月9日后马上着手进行。农业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改组从此开始。在合作农场里，土地集体耕种和使用，但其所有权仍属于各个农户。他们除按其土地领取租金外，并按所完成的工作日获得劳动报酬。祖国阵线政府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发行自愿认购的公债，名为“自由公债”。人民热情地认购公债，二百亿列弗的原定指标，在短期内就超额完成。这对列弗的稳定起了有利作用，并使祖国阵线政府得以更有成效地实现其经济和政治措施。

推翻君主法西斯专政和建立人民民主政府，是对资产阶级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和势力已被肃清，更不意味着它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资产阶级的势力，依赖于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就无法加以消灭。由于

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未定，以及还有一系列国内任务需要完成，人民民主政府并没有在9月9日后立即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和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只有少数资本主义企业被收归国有，因为这些企业主曾与君主法西斯政权公开勾结，并已被人民法庭定罪。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资产阶级仍然保持了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这就使它有力量反对人民民主政府，以恢复其失去的政权。

399 资产阶级反对人民政府的活动，是打着所谓“祖国阵线反对派”的旗号进行的，并得到了9月9日后复活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这一活动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特别是美、英帝国主义势力的鼓励和支持。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在人民中早已没有政治威望，国内外反动势力决定盗用祖国阵线的名义和威望来从事颠复人民政府的活动。9月9日后，美、英帝国主义立即把他们的代理人盖奥尔基·梅·迪米托洛夫（盖梅托）派到了保加利亚。他同农民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科斯塔·路耳切夫等人拉上了关系。这些人反

对人民政府，特别是反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盖梅托一到达保加利亚就竭力破坏祖国阵线，并宣称反对与工人党合作。在他的主谋下以及同他一路货色的人民敌人的指挥下，社会民主党和农民联盟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敞开了大门，他们也千方百计地企图控制这些政党，并从内部破坏祖国阵线。

盖梅托及其同伙的这一活动，实质上是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它遭到了祖国阵线及其所属政党——农民联盟、社会民主党和“环节”联盟的坚决抵制。在这些政党内部展开了一场尖锐斗争，反对祖国阵线的敌人，维护它们和工人党的联盟。这次斗争持续了较长时间；其结果，盖梅托和其他帝国主义代理人都被祖国阵线各政党开除了。但是，农民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也从此形成。

9月9日以后，人民民主政府面临的一项最重要的对外政治任务，是确定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必须尽快同苏、美、英三国缔结停战条约，把保加利亚在君主法西斯政权时期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德国同流合污的丑名洗刷掉。然而，

400

这只有在保加利亚积极参加最终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战斗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人民民主政府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它也表明人民群众是多么憎恨纳粹侵略者。

虽然苏联政府已向保宣战，但9月9日以后，它立即与人民政府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与保加利亚政府一建立初步联系，苏、保两国就解除了战争状态，并为缔结停战条约开始了谈判。在美、英代表的参加下，这一谈判又在莫斯科继续进行，并于1944年10月28日结束，双方签订了停战条约。

停战条约为保加利亚积极参加反纳粹战争准备了条件，也为苏军经过保加利亚时提供了运输工具等保证。它规定苏军在一定期间留驻在保加利亚。又规定，保政府应废除为吞并希腊和南斯拉夫部分领土而制订的一切法令和条例，并采取措施惩办法西斯战犯。对实施停战条约的监督，则由一个以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担任。

9月9日以后，祖国阵线政府立即主动提前完成了停战条约的各项规定。保加利亚的军队和

行政机构分别从瓦达马其顿和爱琴色雷斯撤回。法西斯战犯被拘留并交由人民法庭审判。保加利亚又积极地参加了反纳粹战争。因此，停战条约的签订，只不过起到使保加利亚履行它对盟国的义务合法化的作用，而这些义务却已提前在人民 401 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完成了。根据停战条约，保加利亚军队被置于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下，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各部队协同作战。

在停战谈判过程中，美、英两国代表宣布他们反对保加利亚参加反纳粹战争，因为他们对苏联和人民民主政权怀有敌意。他们制定了阻止苏军在巴尔干半岛和中欧挺进的计划，并反对保加利亚的人民政府。保加利亚军队参加反纳粹战争，是为了加速苏军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并对稳定保加利亚国内外局势作出贡献，而这正是美、英帝国主义者所不喜欢的。

9月9日以后，在工人党的倡议和指导下，参加反纳粹战争的准备工作立即开始。这些准备工作是在纳粹驻南斯拉夫军队的恫吓、挑衅和公然进犯的情况下进行的。与此同时，军队的革命改编也在进行中。

纳粹司令部企图阻止驻扎在马其顿的保军撤回本国。这些部队宣布他们支持祖国阵线政府，并强行撤到保加利亚的传统边界。9月9日后，纳粹军队马上在保加利亚西部的几个地方发起了挑衅性进攻。这些进攻被“格奥尔基·本科夫斯基”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这两个游击营以及正规军的一些部队击退了。某些顽固透顶的保加利亚法西斯匪徒逃往纳粹一边，并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阵线的敌对宣传，煽动反革命力量进行叛乱。

在这种形势下，保加利亚宣布了动员令，并402开始沿西部边境集结军队。工人党号召人民积极参加反对纳粹的解放战争。各游击支队和大批青年志愿者加入了军队。同纳粹作战的军队分为三个军，共计四十五万人左右。他们经过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已作好准备，整装待发。但是，还必须先与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建立联系，以便在南斯拉夫的国土上联合行动。这项工作在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协助下完成了。保加利亚军队于10月初开始挺进。国内群情激昂，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的号召。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交给保军的任务是向西进军，切断纳粹军沿瓦达河和摩拉瓦河流域的退路。这次进军十分重要，因为在希腊和爱琴海群岛驻有三十五万名左右纳粹军，必须粉碎他们经由马其顿和塞尔维亚撤退到克罗地亚与匈牙利的企图。

保加利亚第二军为了切断沿摩拉瓦河的道路，于10月8日发动了进攻。苏联空军也配合作战，对纳粹加强防守的阵地进行了轰炸。经过同“欧根太子”师等纳粹精锐部队激战后，保军于10月13日解放了尼什城，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进军的目的达到了。纳粹军队退到科索沃平原，那里的道路沿着伊巴尔河蜿蜒向前，把马其顿同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连接在一起。这就要求第二军继续挺进，以便把纳粹军队的这条退路也加以切断。

第一军也于10月8日沿着丘斯滕迪尔——克里伐帕兰卡——库马诺伏——斯科普里这条路线挺进。在斯特腊津和斯特腊青的特别加强防守的阵地上，保加利亚军队遭到了纳粹守军的顽

抗。经过持久的激烈战斗，这些阵地都被攻克。

403 10月13日，第二军和第四军解放了斯科普里，于是，纳粹军沿瓦达河的退路就被切断了。

第四军经由察雷伏塞洛——科恰尼——希提普——佛累斯向瓦达河流域，并沿斯特鲁米察河发动了进攻。11月10日，第四军的部队攻占了佛累斯城，并参加了解放斯科普里的战斗。

11月中旬，保加利亚第二军和第一军的部队在粉碎纳粹军的顽抗后，直插科索沃平原。11月21日，他们占领了武威特伦，翌日，又占领了密特罗维察，从而切断了纳粹军沿伊巴尔河的退路。留在希腊和爱琴海群岛的纳粹军队，被迫越过阿尔巴尼亚的崎岖山岭向北撤退，有的则向盟军投降了。保加利亚参加反纳粹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保加利亚军队出色地完成了苏军司令部交给的任务，协助解放了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保军所到之处，人民都热情地欢迎他们，对他们为从法西斯侵略下解放南斯拉夫所作的牺牲表示敬佩。在卫国战争第一阶段，保军伤亡总数达一万六千四百六十三人。

404 但反纳粹德国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根据1944

年11月24日工人党的倡议，祖国阵线政府向人民发布了一项宣言，号召他们与军队一起继续投入战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兵力约达十三万人的保加利亚第一军于12月组成，继续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领土上进行反纳粹的战争。它被编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在萨瓦河和多瑙河之间集结待命。后来，它又被调到匈牙利，布置在沿德拉瓦河及其以北直到巴拉顿湖的战线上。被派到这两支军队所属部队来的苏联军官，协助其保加利亚同志指挥战斗，并把自己多年来在反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所积累的战斗经验传授给他们。

1945年3月初，纳粹司令部决定给予布置在德拉瓦河、巴拉顿湖和多瑙河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和保加利亚第一军的部队以打击。为此目的，它于3月6日在德拉瓦河以北——保加利亚第一军的后方——调集了大量兵力，从巴拉顿湖的西南和东北方向，以步兵和坦克部队发动进攻。开始时，纳粹司令部曾突破保军防线，并向德拉瓦河以北调去大量部队，使保加利亚军队面临被包围的威胁。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后，保军转入了反攻。它在苏军一三三军团的协助下，打退了

纳粹的进攻，并肃清了德拉瓦河左岸的敌军。在德拉瓦索博耳茨、德拉瓦波尔科尼亚和德拉瓦泽契进行的浴血苦战中，保加利亚人民民主军队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敌军从巴拉顿湖西南方向的进犯也被击退了。接着，保加利亚军队于3月末发动凌厉攻势后向西转移，到达阿尔卑斯山麓，并与从意大利出发的英军建立了联系。这一切都发生在纳粹德国全面无条件投降的日子里。

405 于是，在卫国战争的第二阶段里，保加利亚军队同样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交给的任务，并对击败纳粹德国作出了一定贡献。保加利亚第一军的胜利，受到了苏军最高统帅部的高度赞扬。战争的第二阶段，保加利亚军队有一万四千九百零八人死伤和下落不明。在战争的两个阶段中，保军死亡总数① 超过了三万一千人。由于参战并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保加利亚当然期望着在即将召开的和会上得到应有的公平对待。

①根据上文，此处的“死亡总数”实应为“伤亡总数”。——译者

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纳粹德国投降后，保加利亚军队光荣地凯旋归国。复员令下达了，国家也进入了和平状态。祖国阵线政府和全体劳动人民又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任务，它们都是些与加强人民民主以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关的重要和迫切任务。

为了巩固劳动人民因9月9日的胜利而赢得的成果，加强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祖国阵线政府在战后不久就决定于1945年8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妇女有权与男子一样参加选举，选举年龄降到十九岁，候选人的年龄限制也降为二十三岁。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所谓的“祖国阵线反对派”，对政府关于选举国民议会的决定极端仇视。议会选举的举行意味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加强，反动势力为了加以破坏，竟然不惜进行叛国活动。选举前夕，尼古拉·佩特科夫与盟国管制委员会以 406 及美、英驻索非亚使团进行接洽，要求迫使选举延期并在盟国的监督下进行。这是一个由全部反动分子参加的大规模反政府运动的信号，它得到了美、英在外交上的支持。这两个国家通过其驻索非亚外交代表宣称，他们将不承认选举结果，

也不让保加利亚在和约上签字。鉴于这种情况，为了避免使局势更加复杂化，政府决定将选举推迟三个月左右，以便采取措施粉碎资产阶级及其外国帝国主义保护人重新夺权的反革命行动。

选举延期举行使反动势力更加猖狂。依靠美国和英国的支持，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又抬起头来，公开地暴露了反革命企图。旧日的民主党恢复了，农民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分子也分裂出去自立新党。四个部长倒向反对党一边而辞职，祖国阵线政府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工人党的领导下，政府依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支持，终于克服了这些困难。选举前夕，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儿子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返回祖国，受到劳动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

选期逼近，反对党又一次企图进行破坏，但未能得逞，便决定以抵制选举来加以阻挠。然而，它们的打算又错了 祖国阵线发表了所属各政党共同的预选纲领和成员名单，以绝对多数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在总数为四百五十万一千零三十五人的选民中，三百八十五万三千零九十七人参加了选举，其中三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七十二

人（占88.18%）投了祖国阵线所属各政党的票。反对党在失败后提出了新政府内应包括其代表的 407 要求。祖国阵线同意反对党在新内阁中拥有两名代表，但它们却提出了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条件和要求，使已经开始的谈判陷入僵局。于是，一个依旧以基蒙·格奥尔基耶夫为首的新的祖国阵线政府成立了。

国民议会和新政府面临着如下任务：批准部长会议自9月9日以来颁布的全部法令，并为管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制定新的法令。短期内，一系列重要的法令陆续制定并经国民议会通过，诸如关于没收以投机和非法手段获得财产的法令、劳动保护法、土地改革法、人民政府保护法以及军队的领导和监督法等等。在所通过的法令 408 中，最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占有土地不得超过二十公顷（多布罗加为三十公顷），超过部分将被没收并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人民政府保护法是针对反动派的活动而制定的。这是因为卫国战争期间，反动派的活动大为加剧，而在破坏选举的活动失败后，他们又采取了放火烧毁合作农场的财产、暗害或袭击祖国阵线的工作人

员等恐怖活动。军队的领导和监督法也很重要，它确保了从军队中把反动军官清除出去。

1946年夏，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对君主政体——保加利亚旧政权的残余——进行公民投票的法令。9月9日以后，君主法西斯政权虽为新的摄政会议所代替，但君主政体却依然保留着。1946年9月8日举行了公民投票，92.7%的参加者赞成保加利亚成立共和国，而除一部分废票外，只有4.2%的人赞成保留君主政体。9月15日，在国民议会的一次庄严的会议上，保加利亚被宣布为人民共和国。瓦西耳·科拉罗夫当选为共和国临时主席，他也在9月9日后就已返回祖国，并积极地参加了组织和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

9月9日以后，由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民主政府面临着制定新宪法的任务，以便把革命的成果巩固下来，并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此，在决定举行公民投票的同时，国民议会还通过了一项选举国民大会的法令。选举于1946年10月27日举行，这次连反对党也参加了。尽管反对

党不断地进行诽谤和讹诈，甚至以美、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来威胁劳动人民并使用了所谓的“原子讹诈”，祖国阵线又一次在选举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总数为四百二十六万六千六百一十四人的选民中，祖国阵线所属各政党获得了二百九十八万一千一百八十九张选票（约占70%）。工人党赢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在被选入国民大会的四百六十五名人民代表中，工人党占二百七十五名，农民联盟占六十九名，社会民主党占九名，“环节”联盟占八名，激进党占一名。（恢复了活动的激进党在选举前即已加入祖国阵线。）反对党则获得了九十九个席位，还不到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瓦西耳·科拉罗夫当选为国民大会主席。

11月22日，成立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祖国阵线政府，这是祖国阵线的第三次继续执政。政府中包括工人党代表十名，农民联盟代表五名，社会民主党和“环节”联盟的代表各二名，还有无党派人士一名。新政府的成立，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工人党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领导作用，也为采取更起决定作用的措施来加

强人民民主政府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保证。国民大会开幕后，马上着手准备制定新宪法，选出了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为首的议会委员会来起草宪法草案。委员会把苏联宪法作为起草的蓝本。与此同时，全国劳动人民也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很多建议，使它更为完善和精确。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保加利亚内政的阴谋并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反法西斯联盟的成员国签订和约极为重要。和约的条款是由苏、410 美、英三国外交部长共同拟定的。1946年夏，为了通过对保加利亚和对其他战时与纳粹德国结盟国家的和约，在巴黎召开了和会。保加利亚代表团也应邀出席。在拟定对保和约时，美、英代表毫不掩饰他们对人民政府的敌意，以及把沉重负担强加于保加利亚的企图。他们无保留地支持希腊政府对保加利亚的无根据和不公正的要求：割让罗多彼山区约一万公里① 的领土，偿付九亿美元的巨额赔款。苏联代表团驳斥了上述不利于

①按计算面积的惯例，此处的“一万公里”实应为“一万平方公里”。——译者

保加利亚的要求，指出这样做是不公平和不现实的。由于苏联的维护和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的军事贡献，在1947年2月10日签订的最后和约中，保加利亚终于保住它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应予偿付的赔款减为七千五百万美元，其中五千万美元给希腊，二千五百万美元给南斯拉夫。

和约的签订，是对国内反动势力的一次新的打击。由于无力阻止人民政府得到巩固，反对党——民主党、农民联盟反对派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又采取了更为广泛和猖狂的阴谋活动。他们在农村大造舆论，反对成立合作农场。一些思想反动的神父，也疯狂地进行与人民为敌的活动。反对党的报纸上充满了对政府的威胁和诽谤。与此同时，反对党开始建立发动政变的组织。好几个这样的组织被破获，如“克鲁姆沙皇”、“中立军官团”等，他们主要是由思想反动的军官建立的。这些组织是在反对党领导人的授意和直接参与下建立的，他们放弃了合法斗争而准备搞政变。反对党的代表还在国民大会里不断地进行捣 411
乱和挑衅，破坏它的工作。

反对党的敌对和阴谋活动是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指挥下进行的，他们不甘心于人民政府的巩固，力图通过反革命政变在保加利亚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这一企图失败了。国家机关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就将反对党的领导人交付审讯并加以惩办。反对党被解散了，反动报纸也被勒令停刊。这对于日益站不住脚的反人民的反对党，又是一次新的打击。

在与反人民的反对党进行斗争中，人民政权不断地得到了巩固。与此同时，祖国阵线政府又在1947年春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直接准备。为此就必须恢复国民经济，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在保加利亚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下，这只有在有计划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因此，1947年4月1日，国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两年经济发展计划的法令，而实际上早在同年初就已经开始为完成这一计划而努力了。

两年计划的目标，就是要使劳动人民尽力恢复在纳粹占领和君主法西斯统治时期国民经济所遭受的破坏，达到并超过战前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为此，这一计划规定要修建一系列的工厂、水坝、

电站和公路，加速农业生产合作化和推广农业技术。在两年经济发展计划开始前，工农业生产总值仅为战前的85.9%。当计划在1948年底完成时，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71.5%。在成千上[412]万的劳动人民参加下，建成了许多新的工业企业、公路、水坝和其他工程项目。为了完成两年计划，在人民中掀起了一个真正的、创造性的热潮。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成了工会和青年运动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任务。青年突击队运动开展起来，1948年有二十五万名青年男女参加了这一运动。苏联提供了机器，帮助了农业沿着合作化的道路发展。国营农场和修配机械的机器拖拉机站也纷纷建立。

经过长时间的广泛讨论，宪法草案提交到国民大会，并于1947年12月9日通过。它是9月9日胜利后保加利亚人民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新宪法巩固了人民政权，也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人民拥有主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也在不否认私有制的前提下，进一步肯定了国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

不废除大资本所有制，要想使国民经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得到发展并战胜资产阶级的抵抗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宪法通过后，国民大会于1947年12月23日通过了工业和矿山国有化的法令，接着又于12月27日通过了银行国有化的法令。对外贸易和国内批发业也归国家控制。国民大会还通过了一项法令，由国家将私人的农业机器买下来，转交给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

人民热烈拥护把大型的资本主义产业收归国有。群众性的增加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竞赛，在工业企业中开展起来。一个广泛的突击手和革新者的运动出现了，这些先进人物用自己的413榜样带动了其他工人。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涌现的上述新气象，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才有可能。大型的资本主义产业的国有化，推动了全国生产力的发展，保证了两年经济发展计划的完成。

在新宪法通过和国有化实现后，实际上早从9月9日就已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要求把国内一切爱国力量联合在坚强的祖国阵线中，保持其团结并进一

步加强这个阵线。1948 年 2 月初，在索非亚举行了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改了纲领，整顿了组织，使上述要求得以实现。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和章程，祖国阵线也从此成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祖国阵线既没有基层组织和个人成员，也没有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这个组织是由代表着各政党、工会、青年联盟、妇女组织等的各个祖国阵线委员会组成的。现在这些都撤销了，祖国阵线从成立基层组织、选举领导核心、发展个人成员等方面开始了全面建设。

祖国阵线在变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同时，并不否认单独政党的存在。然而，“环节”联盟和激进党由于接受了祖国阵线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而解散，它们的成员则参加了祖国阵线的各个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党又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这样，就只剩下了工人党和农民联盟两个政党，而农民联盟也清除了它内部的反动分子和富农分子，接受了在工人阶级及 414 其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于是，保加利亚又沿着团结人民力量以完成即将到来的

奠定社会主义基础这一首要任务的道路，迈进了一大步。

1947 年和 1948 年，保加利亚分别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借助于这些条约，保加利亚摆脱了 9 月 9 日前所处的政治孤立状态，并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般的援助下，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基础的奠定 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并不象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意味着社会的革命改造已经完成，而仅仅是它的开始，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开始，以及对全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进行深刻变革的开始，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独具的特点之一。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也是这样。9 月 9 日人民武装起义，只不过是保加利亚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进行深刻的革命变革的开端。在巩固了人民政权和恢复了国民经济后，必须发展生产力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于保加利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落后，这样做就尤为必要。尽管在轻工业和加

工工业、煤炭和有色金属矿的开采、木材加工和金属加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9月9日前夕的保加利亚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不发达，完全依赖于外国垄断资本，特别是德国的垄415断资本。

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及其战斗的先锋队工人党，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中起了领导作用。一个健全的、强大的工人革命政党的存在，保证了这次革命从一开始——9月9日人民武装起义的爆发——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充分证实了工人阶级政党这一主观因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它已成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斗争中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保加利亚，与其他中欧和东南欧国家不同，早在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解放时，就已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目标，既无条件也无必要像这些国家一样去进行这种革命。因此，保加利亚的人民民主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经过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

9月9日胜利后，工人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领导作用得到了加强，并已为祖国阵线各政党所一致公认。这不仅是由于工人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立下了最伟大的功勋和作出了最重大的牺牲，也是由于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内，只有工人阶级和它的战斗先锋队工人党，才能在战胜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确保正确与坚强的领导。9月9日以后，成千上万的新成员加入了工人党的行列。几年之内，工人党的党员总数达到五十万人之多。由于有了这一支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工人党于1948年年底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1948年12月下半月召开的工人党第五次代416表大会，作出了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决议。因此，这次代表大会对于党和整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大会听取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报告回顾了党从成立到1948年为止的发展和斗争中的各个基本阶段，着重论述了9月9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和起义的性质，以及保加利亚1944年以来的发展。根据马

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发展的理论，季米特洛夫对人民民主下了科学的定义，认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还对保加利亚人民所面临的、与建设社会主义有关的各项基本任务作出了规划。

大会讨论了9月9日胜利以来保加利亚的科学、艺术和文化的状况，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深入开展正在进行中的文化革命，并肃清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工人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对党章所做的一些修改也在会上通过了。

大会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批准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它规定这一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国家的工业化和电气化，以及农业的合作化和机械化，在保加利亚建设社会主义。"

国民大会于1948年12月29日通过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法令。它是在苏联经验以及保加利亚完成两年计划期间所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也是对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进行了深刻研究的结果。其中指出，保加利亚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一切条件：起着无产

阶级专政作用的人民民主政权，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联盟，工业、银行和贸易的国有化，合作农场这一保加利亚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的建立，以及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要想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通过建立重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增加电力和煤炭的生产，修建新的公路和铁路等等，使保加利亚摆脱经济上的落后状态。

在制定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法令时，农业的发展及其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改造受到了高度重视。为此，它着重指出必须建立新的农场，并向其提供现代化的机器和装备。在这五年期间，国民收入预计提高到1939年的两倍多。计划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则为1944年以前二十年投资总额的两倍。在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中，40%用于工业，22%用于交通，17.8%用于农业，剩余部分用于文化、教育、卫生和其他需要。从这五年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来看，主要精力集中于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电力生产。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法令的通过，受到了人民的热烈赞同，也激发了他们的创造热情。计划中规定的任务清楚明确，符合人民提高保加利亚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愿望，因此，它激发了人民群众在生产和建设中的巨大干劲。计划的基本指标提前完成了。在完成这一计划的四年（1949—1952年）中，新建或扩大并投入生产的工业企业有七百多项，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939年的四倍多。在罗多彼山脉发现了巨大的有色金属矿并着手开采。多布罗加也开始生产石油。 418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一些大型工程建成并投入生产，如季米特洛夫格勒的化工厂、季米特洛夫格勒、贝尼克和索非亚的火力发电厂、威达玛和阿森尼查的水电站、石棉水泥厂、电缆厂、机器制造厂、安斯特·台尔曼纱厂、两个汽车修配厂、格奥尔基·基尔科夫锅炉厂、瓦西耳·科拉罗夫水坝、卡林水坝等等。

计划完成后，工农业产值的比例改变了，保加利亚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农业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连同职员合计，1952年约达九十五万人。

农业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合作农场达到二千七百四十七个，占地为全国可耕地的60.5%。进口了大量的农业机器，拖拉机达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五台（1944年前为三千五百台），联
419 合收割机达一千三百六十三台（战前根本没有）。化肥的使用增多了，农业产量也得到了提高。此外，还修建了一些排、灌渠道，与战前相比，灌溉面积增加了五倍半。

连接索非亚、布加斯和瓦尔纳的巴尔干铁路支线于1952年年末通车，它具有巴尔干半岛最长的隧道（位于科兹尼查，长达六公里）。在瓦尔纳修筑了大型船坞，并开始制造海轮和江轮。修建了不少新的公路，特别是在山区和丘陵地区。在苏联的帮助下，还建立了空中运输。

在公用事业、房屋建筑、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并修建了无数新的医院、产院和疗养院。建立了新的学校，还在成年人中开展了彻底的扫盲运动。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对保加利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极为重要。早在1945年3月，

当保加利亚还在进行卫国战争，并因缺乏食品、机器和工业原料而在经济上陷于困境时，苏联政府就已与祖国阵线政府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给[420]保加利亚运来了棉花、羊毛、生橡胶、石油、铁、有色金属、拖拉机、卡车、谷物、饲料等大量货物。1946年，由于同苏联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从苏联运来的物资也随之而增加。1945—1948年期间，保加利亚从苏联得到的纺织品、铁、生铁、钢、有色金属、机器和其他货物，总值达二百三十亿列弗之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增运物资的同时，苏联还给一些建设中的工业企业送来所需要的设计图纸和机器，并派专家来指导这些工程项目的建设。大批保加利亚青年被派往苏联学习，以便成为生产上的专家。

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对保加利亚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极为可贵的，特别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援助。贝尼克的“共和国”大型火力发电厂是捷克斯洛伐克帮助修建的；全国最大的安斯特·台尔曼纱厂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帮助修建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大规模建立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的同时，继续进行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建设。1949年初，通过了建立地方政权机构——人民会议的法令。它是参照苏联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建立城、乡公社的经验。1949年5月，举行了区、县人民会议的代表和陪审员的选举，祖国阵线的候选人赢得了胜利，得到了90%以上的选票。全国的行政区域重新进行了划分，选举产生的人民会议的权力得以加强，它们在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活动也进一步开展起来。1949年年末，由于国民大会的使命已经结束，421 选出了常设的（立法的）国民议会和各区的人民会议；祖国阵线的候选人又在这些选举中以更大的多数而获胜。

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里，保加利亚人民遭受了一个重大损失，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1949年7月2日逝世了。他在同保加利亚反动派和法西斯进行斗争并积极从事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漫长年代里，备极辛勤，积劳成疾；特别是国会纵火案审讯期间在法西斯监狱度过的几个月中，他的健康更受到了严重损害。9月9日

以后，季米特洛夫又全力投入了创建和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1949年初，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他被送往苏联就医并在那里逝世。他逝世后，政府由他的忠实战友瓦西耳·科拉罗夫领导。但他健在的时间也不久。科拉罗夫为了组织和加强保加利亚与国际革命运动，同样付出了巨大精力。他也是人民民主的新保加利亚最积极和最受尊敬的创建人之一。科拉罗夫于1950年1月逝世，这对共产党和全体劳动人民来说，是又一个严重的损失。但是，激励着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终生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建设计划已经制定出来。保加利亚劳动人民在与他们的伟大领袖告别后，更积极、更坚定地为实现既定的伟大目标——短期内把保加利亚变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瓦西耳·科拉罗夫逝世后，由契尔文科夫负责组织新政府。

保加利亚人民继续一往直前地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由于经济建设上的胜利，1951年年初取消了对工业品的配给制，随后又取消了对食品的配给制。1952年5月进行了货币改革，保

422 证了保加利亚列弗的稳定。工业品和食品的几次减价，也有助于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截至1952年，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已比1939年提高了30%以上。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在1953年开始了。在1954年2月末至3月初举行的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这一计划的基本条文。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强调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又一次把发展重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增加电力生产以及建立水坝网放在优先地位。

然而，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议，却不顾列宁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的教导，把发展消费品工业作为一项首要任务。

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了农业和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并为更充分、更全面地满足人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创造了条件。计划中最大的一些工程项目是：贝尼克的列宁炼钢厂、巴塔克水电站工程、索非亚附近的伊斯克水坝、卡尔·马克思碱厂、斯都腾·克莱德涅茨水坝和基尔加利的铅锌厂。在土地经营的合作化方面，取得了

新的进展。其结果，在作物栽培、牲畜饲养和农业的其他部门中，农业技术和机械化得以更大规模地推行。在村镇的建设和都市化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有些地方的房屋几乎全部翻修。新的工业城镇出现了；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在索非亚，开始修建新的住宅区。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医院、学校、疗养院以及其他建设也得到了加强。

1956年4月，召开了一次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全会。全会谴责和摒弃了伏尔科·契尔文科夫的个人迷信时期在党、国家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上的错误方法，恢复了处理党、国家和经济事务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绳。优先发展重工业又被提到了首位。全会通过了一条这样的路线：增进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消除滥用职权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以及全面加强劳动人民参与国家和经济事务的管理。契尔文科夫被免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423

这些决议的贯彻，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随之而出现了全面跃进。其结果，第二个五年计划胜利地完成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产值与战前的1939年相比，几乎增加了八倍。工农业产值的比例，1939年为24.8∶75.2，到1957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为68.3∶31.7。保加利亚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农业国。

在工业化的同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胜利地完成了。1957年，二百个机器拖拉机站共拥有拖拉机二万六千二百台、联合收割机四千三百台、脱谷机四千三百台、机引播种机一万二千一百台，以及一些其他农业机器。与1939年相比，灌溉面积增加了十倍左右。1948——1957年期间，农业产量提高了将近20%，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则从三百三十二万五千人降到二百九十五万人。

1957年，国民收入达1939年的二点三倍。

加速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8年6月召开的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回顾了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所取得的成果，并展望了国家今后发424展的前景。九百六十三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以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为首的三十六个

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大会。

大会一致赞同苏共“二十大”和1957年11月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估计，并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是保加利亚对外政策的基础。

大会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奠定，在工业、农业、贸易和交通方面都已大体完成。由于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社会主义已在保加利亚取得了胜利。

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规定了党和人民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的经济和政治任务，提出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大会确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基本任务是继续发展工业，把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化学工业等放在优先地位。农业方面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可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赶上先进农业国家的生产水平。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改进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个领

域里的领导方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提出的。

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425了进一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在三、四年内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口号被提出来了。它调动了党、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一个增加生产和开发新资源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在农业方面，将现有的合作农场加以合并，场数从三千四百五十七个减少为九百七十五个。重新划分了全国的行政和经济区域，成立了三十个区以代替过去的一百一十七个县和十三个区。

由于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坚持不懈的热情劳动，这一个五年计划在三年内就基本完成了。1960 年，工业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 63%。马里查一东方电力工程不仅开始修建，其第一期工程并已竣工和投入生产。贝利·伊兹伏尔村（弗拉查区）的大型水泥厂、帕扎季克的电池厂和拉兹格勒的玻璃厂都投入了生产。贝尼克的列宁炼钢厂完成了扩建工程，该厂所属的一个大型轧钢厂和许多其他重要工业项目均已投入生产。旧扎

果腊的一个新氮肥厂、普罗夫迪夫的铅锌联合工厂、布加斯的炼油厂、奥里亚霍伏的纤维造纸厂、克雷米科夫齐钢铁厂等工程，也已开始修建。农业、交通和贸易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提前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在向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道路上，又跨进了一大步。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也使第四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长期规划的第一个五年时期)，得以提前在1961年就开始执行。

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62年11月5日至14日在索非亚召开，它标志着保加利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一千零五十五名优秀的、积极的共产党员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来自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外国的六十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三个民主组织的代表团，也出席了大会。 426

大会听取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所作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论述了关于国际形势和保加利亚国内状

况及其发展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大会接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也在会上致了贺词。大会最后通过了根据报告所作的决议以及对1980年前国家发展的指示，还通过了新党章。

对1980年前国家发展的指示，提出了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通过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产量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伟任务。这可以从如下的基本指标看出：到1980年，工业总产值将增加近七倍，农业总产值将增加两倍半。保加利亚的煤产量将达到八千万至八千五百万吨，石油产量将达到四百万吨，电力将达到五百亿至五百五十亿瓩。钢产量则要求达到四百五十万至五百万吨。为此，必须重建和扩建列宁炼钢厂，并建成索非亚附近巨大的克雷米科夫齐钢铁厂。指示中还提出要大力发展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427交通运输业，也为进一步发展农业和提高其产量作出了规划。在教育方面，义务中等教育的实行，已作为一个为期不远的任务规定下来。1980年的大学生人数，将由1960年的五万四千七百九十五名增加到二十二万名。科学技术各部门也将得

到极大的发展。国民收入将增长五倍左右，人民大众的福利和文化，将在此基础上获得相当的改善。

大会对于为克服契尔文科夫、于哥夫、粲科夫等人推行个人迷信和粗暴违犯社会主义法制所造成恶果而进行的斗争，也作出了最后的结论。

大会结束后，国民议会选出了以托多尔·日夫科夫为首的新政府，其首要任务是实现使社会主义保加利亚发展和繁荣的宏伟规划。

社会主义文化革命　9月9日人民武装起义胜利后，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以及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保加利亚的文化领域里也开始了一场迄今仍在继续着的深刻的革命。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为社会奠定了新的经济基础以后，都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对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自9月9日以来的保加利亚文化革命，是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以及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这一最广泛的范围内全面开展的。它正在继续向深广方面发展，涉及到包括各

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人民。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的。它是一种具有着崭新性质的文化——形式上是民族的，428 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它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组织和团结人民，改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并剷除一切阻碍进步的旧的残余势力。

虽然在性质上是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是建立在保加利亚民族和各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文化成就基础之上的。它综合了过去文化成就中的一切进步和民主的成分，其中包括在资本主义时期即已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因素。它也创造性地从别国人民、首先是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苏联人民的文化成就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

保加利亚在战后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上的深刻变化，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艺术和文化的物质基础。与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1944年以后，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倒向了人民一边，继续从事于他们的研究活动。教师、作家、

艺术家、医生等其他知识分子也是如此。这主要是由于保加利亚的工人革命运动对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革命的和民主的。因此，1944年后，保加利亚没有出现过缺少知识分子的现象。

由于从君主法西斯政权的束缚下获得了解放，保加利亚的科学在战后开始迅速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与社会主义建设更直接有关的应用科学，得到了尤为巨大的发展。保加利亚战前的经济落后状态，阻碍了它在国内培养和提高技术专家；现在，这个问题很快地得到了解决。除索非亚大学和其他一些高等财经贸易院校外，许多工、农业高等院校也开办起来。从这些院校里毕业了成千上万个土木工程、采矿、机器制造、建筑、化学、农业和其他学科的工程师和专家。为了满足迅速发展 429 的工业和新农业的需要，几十个研究所也建立和扩大了。在这里，研究工作和社会主义实践——修筑水坝，建立工厂，发展农作物新品种等等——直接地结合起来了。

保加利亚科学院成了全国研究活动的中心。

它在1944年以后进行了改组，以便能主要从事于自然科学和工艺学的研究。其下设立了八个部和四十一个研究所，拥有科学家、技术员和辅助人员共四千多名。通过所设的这些部和研究所，科学院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满足其需要。1962年，又成立了一所农业科学院。

在高等院校里进行着大量研究活动。1962年，高等院校从1939年的五所增加到二十二所；学生人数由一万零二百名增加到七万一千一百名；教授和讲师的人数则由四百五十三名增加到四千二百三十名。开设了一些新的系科，并为此编写了大量具有独特见解的科学技术文献。对学生的培养做到了联系实际，他们在教授的帮助下，经常探讨一些重要的科技问题。

由于开办了数以千计的新的中等学校，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尤其是在多布罗加、罗多彼、保加利亚西南部等一些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新建的中等专业学校数量特别多。国家也为土耳其和吉卜赛等少数民族开设了许多学校。截至1944年，全国只有二百五十四个幼儿园，容纳儿童一万三千名；而到1961——1962年，人民民主政

府已建立了六千八百四十七个常年的和季节性的幼儿园，容纳儿童三十万零九千名。由于上述种种努力，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在人烟稀少或居民分散的地区，还成立了寄宿学校。各类学校的学生总数，已从1939年的一百零七万二千二百五十名增加到1962年的一百五十八万八千三百名。

在过去的几年中，为了使教育更加联系实际，并在普通中学里推行工艺教育，教育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没有机会上正规学校的人，还开办了大量的夜校。通过这些夜校和许多文化补习班，国内彻底扫除了文盲。就中等学校毕业生的数量而言，保加利亚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图书俱乐部也从1939年的二千六百一十个增加到1961年的四千五百一十四个，参加人数超过了八十五万名。通过讲演、业余舞台演出和其他业余艺术活动的形式，在这里广泛地开展了文化教育活动。同时，祖国阵线各级地方组织及其全国委员会的各个宣讲小组、科学家协会、工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青年组织、体育组织以及许多其他组织，也开展了广泛的教育活动。

430

除了1944年以前就有的索非亚、普罗夫迪夫和舒门(科拉罗夫格勒)的图书馆以及各图书俱乐部所属的图书馆外，在城乡各地又开办了许多新图书馆，它们拥有文学和科技方面的藏书数十万册。在索非亚建立了一所培养图书馆员的图书馆学院和一所保加利亚文献学院，以便改进对图书馆的管理，并编写文献著作、参考书籍和各种书目资料。图书馆发展中的一件新事，是在工厂、工业企业和机关里普遍建立了图书室。从 1952 年到 1961 年，全国图书馆的购书资金几乎增加了一倍，藏书则从八百万册增加到二千四百万册。博物馆也大大发展了。到 1958 年，全国已有一百零三个博物馆，其中包括一般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地方博物馆、考古博物馆、人种博物馆、纪念性博物馆等等。在索非亚建立了一个保俄—保苏友谊博物馆，还建立了许多纪念馆，纪念在革命运动中和在反对资产阶级统治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最杰出的领袖，以及保加利亚文化界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如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格431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瓦西耳·科拉罗夫、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伊凡·瓦佐夫、尼古

拉·赫列耳科夫等人。

报刊和文学作品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推翻了君主法西斯专政后，国家接管了原有的资本家经营的出版社并加以合并，也为出版小说和科技读物建立了新的出版社。与此同时，为了印刷期刊和书籍，新的印刷厂和复印联合工厂也建立起来了。报纸和杂志的发行量增长了好几倍。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工人事业报》、《祖国阵线报》、《人民青年报》、《文学阵线报》和《人民军报》。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是《新时代》、《哲学思想》、《历史评论》、《语言和文学》、《地理》、《九月》和《火焰》。许多外国报刊，特别是由于普遍学习俄语而最易为公众读懂的苏联报刊，发行的范围也很广。

战后人民生活的深刻变化，促进了保加利亚文学的巨大繁荣。人民的胜利以及他们建设新生活的成就，激励着保加利亚的作家们写出大量为劳动人民所爱读的文学作品。在1944年以后，保加利亚作家和诗人的生活条件与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过去相比，他们现在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保加利亚作家

联盟在改组后有了自己的出版中心。联盟向它的成员分配任务，并组织他们对一些已出版的书籍和普遍性的文学问题进行讨论。这对于提高出版质量并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趋于完善是极为有益的。

1944年9月9日后的头几年，文学作品主要描写人民在君主法西斯统治下争取解放的斗争，以及保加利亚参加卫国战争的情况。后来，432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又成了主要题材。除1944年前已经成名的作家和诗人外，许多新作家也巩固了他们在文学界的地位。不同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成功地克服了他们原来抱有的荒诞、狂热的偏见，许多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些曾经参加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人，写了大量的回忆录。

1944年后，世界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古典作品，以及苏联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在保加利亚极为流行。1961年出版的保加利亚和外国书籍的发行量，是1939年的六倍。

话剧、歌剧和芭蕾舞也有极大发展。保加利

亚的剧院，只是在1944年以后才成为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的真正的人民剧院。它推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提高他们普遍的文化水平。国家的剧院、歌剧院和交响乐团建立起来，业余戏剧团体也在许多城镇成立了。剧院总数从1939年的十三个增加到1961年的四十五个。戏剧家们写出了一些成功的保加利亚剧本，如奥尔林·瓦西列夫的《警报》、《爱情》和《幸福》，卡门·集达罗夫的《沙皇的仁慈》和《伊凡·希什曼》，洛赞·斯特雷尔科夫的《侦察》等等。

在歌剧和芭蕾舞剧方面，柳博米尔·皮普科夫的歌剧《蒙契尔》、帕腊什克夫·哈季耶夫的歌剧《阿尔波纳》、亚历山大·拉依契夫的芭蕾舞剧《哈伊杜克之歌》等等，都是一些了不起的成就。摄制得较好的保加利亚电影则有《警报》、《九月起义者》、《人之歌》、《第一次打击》、《星》、《我们曾是年轻人》、《被俘的舰队》、《烟草》、《太阳和影子》等等。

1944年以来文化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业余艺术的巨大发展。在全国组成了数以千计的业余团体，它们是天才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这些团

体举行业余的戏剧演出和一些声乐、器乐音乐会。为了发展业余艺术，文化教育部和各区人民会议433还举行了地方性和全国性汇演。索非亚成立了一个民间歌舞团，经常到国外演出。

战后保加利亚的音乐也大有发展。为了歌颂保加利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作曲家譜写了大量音乐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斯托扬诺夫的《天亮吧》和奥布雷特诺夫的《为和平而战斗》。斯塔伊诺夫、弗拉基格罗夫、库特夫、皮普科夫、斯托扬诺夫、哥列米诺夫等人的交响乐作品都很著名。合唱歌曲也创作了不少。

美术界的基本主题，围绕着反对君主法西434斯政权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绘画、雕刻以及应用美术方面，都创作了许多有价值的作品。绘画方面的主要成就有斯托扬·维涅夫的《告别》、伊利亚·彼得罗夫的《游击队员》和《行刑》、尼古拉·米尔切夫的《审讯》、亚力山大·波普利洛夫的《行刑后》、嫩科·巴尔坎斯基的《家庭主妇》、纳伊登·佩特科夫的一组单色版画、维赛林·斯塔伊科夫的取材于中国某故事的一组版画

和马尔科·贝哈的取材于游击队员日记的一组版画。雕刻方面的主要成就有伊凡·富涅夫的“游击队员”纪念碑（兹拉提察村附近）和格奥尔基·阿塔纳索夫的《起义者》。建筑方面最卓越的作品有索非亚的国立图书馆、国立索非亚大学、里拉新建的巴尔干游客旅馆、瓦尔纳附近的“金色沙滩”胜地和纳塞巴尔附近的“向阳海滩”胜地的一些旅馆等等。许多地方为解放保加利亚的苏军和解放斗争中牺牲的战士们树立了雄伟的纪念碑。在索非亚和其他大城市的建筑规划以及季米特洛夫格勒、马丹、鲁多曾等一些社会主义新城镇的建设中，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国家、和平的国家　保加利亚是欧洲的小国之一，据中央统计局的统计，它在1962年只有八百万人口。但它的历史却饶有兴味，发人深省。中古时期一个具有高度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是东南欧人民沿着进步发展道路迈出的重要一步。当时，保加利亚人对斯拉夫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创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保加利亚在土耳其统治下的沦亡，使它的发展中断了很长一段时

期，并使保加利亚人民濒临灭绝的危险。但是，保加利亚人民却从未向奴役他们的人屈服过。十八世纪后半期到十九世纪初，保加利亚土地上出现435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复兴运动，这才使保加利亚人民不致被人们所遗忘，并使其成为一股伟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后，一个强大的工人革命运动又在国内形成，并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1944 年 9 月 9 日人民武装起义胜利后的保加利亚历史，特别吸引人和富有教育意义。由于英雄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以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帮助，保加利亚人民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成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社会主义已在保加利亚取得完全胜利。保加利亚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和机械化农业的、物质和文化力量不断增长的、发达的工业—农业国。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1961 年它已占全国总产值的 60%。生产资料的产量，1961 年比 1939 年增长了三十倍。

农业正在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化肥的使用日益扩大。保加利亚是继苏联之后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国家。

保加利亚在文化发展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盲已全部扫除。文化已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组。现在，每一万人中就有八十九名大学生。1939年，每二千零二十一人中只有一名医生；现在，每六百七十五人中就有一名医生。

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儿子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曾经指示：其他国家在不同条件下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任务，保加利亚应在十五至二十年内加以完成。现在，这一指示已经实现了。

但是，所有这些成就并没有到头，社会主义制度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具有历史意义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为1980年前保加利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436 制定了宏伟的规划。它也提出了最后建成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以及逐渐过渡到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任务。代表大会通过的长期指示规

定，工业总产值应从1960年的四十九亿二千八百万列弗增长到1980年的三百三十亿列弗。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的总产值，计划比1960年增加十六至十七倍，而化学工业的总产值，则将比1960年增加二十五倍。

在这二十年内，保加利亚的教育事业将得到一个规模空前的发展。到1980年，所有各种学校的学生总人数，将从1960年的一百四十一万六千六百八十二名增加到二百四十万名。二十年后，全国每四个人之中就将有一名学生。义务八年教育制将从1963年开始实行，义务中等教育制将从1980年开始实行。

科学工作者大军，将从1960年的六千名扩大到1980年的三万五千名。

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指示中规定，要在全国的城镇和村庄中实行电气化，并建立电影院以及公共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放映系统。

437 这一切都展示了未来的二十年中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将获得的巨大发展。这一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本质都说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是不需要战

争的。它为争取和平而努力，并将为维护和平而战斗。和平共处是保加利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由于对自己的力量、对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充满了信心，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从容地展望着它的未来，勇敢地捍卫着社会主义和和平事业。

人 名 索 引

条目后所附为原书页码和地图号。原书页码另见正文页边。

地名、民族名索引

条目后所附为原书页码和地图号。原书页码另见正文页边。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保加利亚简史　　（上、下册）
作者＝
页数＝６３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